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周恩来军事生涯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第一章 为了中华之崛起

- 周恩来的家世，并没有什么武事家声，倒可以说是书香绵泽。
- 一次老师提出“读书为了什么”时，他毫不迟疑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
- 在现能找到他最早的一篇作文中，提到学校要“更振之以军国民之精神”。
- “军盛则国强”，在南开学校所写《海军说》中，主张国家必须“尚武”。
- 在参与发起组织的“敬业于群会”中，有个“军事研究团”。
- “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他写道：青年应“作砥柱中流之任”。
- 怎样来救国？怎样来强国？青年周恩来提出：要“练军兴实业”。
- 从南开学校毕业时，他向同学喊出：“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1898年3月5日晨6时左右，江苏淮安城西北驸马巷一幢青砖灰瓦的宅院里，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

从周恩来的家世看，并没有什么武事家声，倒可以说是书香绵泽。

周恩来的祖先，有谱可稽的应上溯到宋朝的大学者周敦颐。他是湖南道县人。传至元朝周茂时，迁家到浙江绍兴。周茂是元朝进士，也是文人，官至左丞相。此后辈出文臣学者。到周恩来的祖父周起魁，来到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为幕友，晚年为山阳县候补知县。周起魁也是文臣，是清朝教育制度中最高学位的国学生。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也是国学生。

那么，为什么后来周恩来却从事军旅，成为一代有名的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呢？

首先因为周恩来生长的年月，正是中国处于历史大震动的时期。

他诞生的前四年，即1894年（甲午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到1895年，清廷在战争中遭到惨败，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更深地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遇。

从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就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55年间，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规模较大的有第二次鸦片战争、日本入侵台湾之役、中法战争等，此外还有许多冲突几乎走到了战争边缘，如1875年的马嘉理案、1879至1880年的琉球事件、1880至1881年的伊犁交涉等，几乎隔不多年就发生一次，真是洋焰嚣张，硝烟弥漫。

但中国毕竟地广人多，是个庞然大物。甲午战争将发生时，西方列强普遍认为中国海防力量强于日本，战争胜利的希望是“中国七，日本三”。清廷朝野也还自认是堂堂大国，打败东邻小国日本不成问题。大臣李鸿章说过：“方倭事初起，中外论者皆轻视东洋小国，以为不是深忧。”一些官僚、士大夫也盲目乐观，说什么“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挡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

结果，后起的小国日本，打败了庞大虚胖的清廷，震惊了中外各国。清朝这个纸老虎被戳穿了，人们彻底地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中国的国力如此孱弱，被帝国主义分子看作是分割中国这块肥肉的大好机会。有的说：“中国非崩溃不可。”有的提出：“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英国伦敦的《每日新闻》甚至鼓吹与沙俄、法国“商

定各国接管的范围”。

在周恩来诞生的前两年，即 1896 年，德皇威廉二世与大臣们商定要占领中国山东的胶州湾，拟定了详细的占领计划。在周恩来诞生前一年的 1897 年，德国海军的三艘军舰侵入我国的胶州湾，德皇决定采用“租借”的名义，实行永久占领。

德国采取行动后，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说：“鉴于德国人已占领了青岛，我们占领某个中国港口的大好时机来到了。”就在周恩来诞生的前两天，1898 年 3 月 3 日，沙皇政府向清廷提出要租借我国东北的旅顺、大连和建筑铁路到黄海海岸的无理要求，限五天答复。清政府要求暗借旅大，“勿存租界之名”。沙俄断然拒绝，并威胁说，如果在 3 月 27 日之前不答复，“俄国即自行办理”。这样，清政府被迫与沙俄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第二年，俄国还擅自把租借地改为“关东省”，设总督进行统治。在周恩来出生后的第八天，1898 年 3 月 13 日，法国向清廷总理衙门提出四项条件：一、中国不割让或租借邻近越南诸省给其他国家；二、中国允许法国政府或由它指定的公司修建由越南到昆明的铁路；三、中国将来设独立邮政局并专派大臣管理时，必须聘请法国人；四、中国把广州湾租借给法国，为期 99 年。第二年，又与清廷签订了《广州湾租界条约》，规定在租界之内，全由法国管辖。这样，中国的广东、广西、云南就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德国与俄国抢占我国海军基地后，英国立即后随，命令它的舰队驶向威海卫，并且在 1898 年 3 月 25 日训令驻华公使窦讷乐说：“必须用你认为最有效的和最迅速的方式，取得在日军撤退后占领威海卫的优先权。占领条件必须和俄国占领旅顺口相同。”接着，清廷被迫同意把威海卫租让给英国，期限直到俄国把旅顺口归还中国为止。这时，长江的中下游，已经是英国的势力范围。

所以，当周恩来还在襁褓中的时候，他的祖国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一股瓜分中国的浪潮，正席卷中国大地。正如列宁当时在《中国的战争》一文中所说：“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拼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瓜分中国的议论并不是无的放矢。”

后来，周恩来在中学作文时曾经写道：“莽莽神州，茫茫大陆，风雨霾霾，烟雾沉沉。俄叱其北，英伺其西，法啖其南，日据其东。我国处此飘摇震荡之时，岂非千钧一发之中国乎？”（《征蒙论》）这就刻划了当年中国所处的危险境地。

中华民族的灾难如此深重，敏感的爱国知识分子对于时局，无不焦虑万分。特别是甲午战争败于日本，割地之多，赔款之巨，使很多人痛心疾首，悲愤填膺。维新志士谭嗣同在诗中说：“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严复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尝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

比周恩来年长 20 岁的吴玉章，甲午战争那年是 17 岁。他说：“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指马关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

中国的志士仁人，恍如从大梦中醒来，纷纷寻找救国的道路。孙中山领

导的广州起义，就在 1895 年 10 月爆发。甲午战败后这股民族自救的飓风，刮遍了中原大地，而且一直绵延不绝，直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1961 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见日本一些代表团时说：“我是 1898 年生的，离 1894 年仅差四年，因此印象很深。”他讲了从 1894 年到 1945 年中国人民因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所受的灾难后说：“以我来说，大半辈子就是在这期间度过的。”

当然，开始的时候，周恩来还小，他接触到的还只是家庭和个人的不幸，两个母亲相继去世，失学，穷困。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逐渐接触到了国家兴亡的喟叹。

周恩来九岁的时候，生母万氏去世了。嗣母陈氏带着周恩来投奔宝应的娘家，依傍大哥陈伯容和嫂子。但是，早就患有肺病的陈氏病势逐渐严重，第二年，不幸去世。周恩来又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老家居住，而父亲远在湖北做事。家中料理完万氏、陈氏两次丧事，已经债台高筑，靠典当和借债度日。

这时候，周恩来需要的，他渴望的，是上学。当年还没有后来兴起的小学，上学要进私塾，可是怎么出得起这笔费用呢！幸亏他的表舅龚荫荪帮助了他，让他进了“龚家塾馆”。在这里，周恩来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条件。塾师教的固然仍旧是四书五经，但是周恩来也有机会阅读其他的历史、文学读物。更重要的，是周恩来接触到了甲午战争以来中国救亡图存的思想浪潮。

龚荫荪原来是眼膺康梁维新派思想的，后来成为孙中山的信徒。他到过日本，认识一些同盟会的成员，当时是属于革新派的人物。他很喜欢聪颖的周恩来，给周恩来讲鸦片战争的故事，讲太平天国的故事，回答周恩来提出的一些政治时事问题。周恩来从龚荫荪那里，得到了很多的社会政治知识。在周恩来幼小的心灵中，逐渐滋生出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思想萌芽，心中已有了沉重的民族振兴的责任感。在一次修身课上，当老师提出“读书为了什么”时，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半个世纪后的 1952 年，龚家的一个表姐妹前来看望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对她说：表舅（龚荫荪）是他政治上的启蒙老师。

周恩来在青少年时代就认识到军事对于强国的重要。

这恐怕除了龚荫荪给他讲的鸦片战争以后的故事，列强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影响外，还同淮安这个地方的环境有关。

周恩来出生在淮安。淮安本身，自古以来是个军事重镇。它位于徐、海、通、扬四州的中心，东濒茫茫黄海、西控江淮平原，北临淮泗两水，南有白马、射阳等湖泊。在过去没有铁道、航空的年代，邗沟和京杭大运河挖通后，淮安就成了南北交通的咽喉要地，纷乱年代的兵家必争之地。

远的不说，就讲南宋时期抵抗金兵侵略的巾帼英雄梁红玉吧，她就是淮安人。周恩来小时候随同奶妈蒋妈妈睡在床上，就爱听她讲梁红玉抵御金兵的故事，常常听得不想睡觉，激起无限崇敬的心情。

南宋高宗年间，梁红玉和她的丈夫韩世忠带领七千士卒，驻守京口，抵挡由北方大举而来的金兵。金兵数万人在四太子兀术率领下，分乘几百艘战船，沿运河蜂拥南征，企图消灭南宋。会战中，梁红玉在十几丈高的船桅上冒着流矢，击鼓指挥，杀得金兵大败，并且用计把金兵堵截在黄天荡里将近两个月。金兵援尽粮绝，金兀术愿意归还南下以来所有掠夺财物，只求放他一条生路，被韩世忠拒绝。后来，金兵掘开早已湮没的老鹳河故道，才得逃窜。梁红玉和韩世忠乘胜追击，来到家乡。他们在淮安大力修整城池，以淮

水为据，抵抗金兵，“兵仅三万，而金人不敢犯”。守了十多年，淮安稳如磐石。

更近些，就是抵抗英国侵略的名将关天培的故事。他也是江苏淮安人。

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有一员积极支持林则徐禁烟的将领，他就是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关天培命令水师严加巡查，截住了英商企图偷渡的满载鸦片的船只 22 艘，收缴鸦片近 170 万公斤。林则徐将这批鸦片当众在虎门烧毁，大煞了英方的气焰。关天培估计到英国不肯罢休，必将武装来犯，他增筑或改造了海防炮台，添造大炮，在近海设置障碍，整顿部队，严明纪律，并且组织训练了一支民兵队伍。当英军挑起穿鼻洋海战时，关天培挺立在桅杆前，高举腰刀，亲自督阵，打得英军大败。这样的战斗，连续六次，都以英军失败而结束。英军舰眼看在广东不能得逞，只好掉头北上，在浙江占领了定海，以后又进入渤海直指天津海口，威胁到了北京。惊慌失措的清廷道光皇帝忙派琦善到广州接替林则徐，开始了以“和谈”为名的投降活动。关天培决心以死报国，与虎门炮台共存亡。他把掉下来的牙齿和一绺头发等封在一个小匣里寄回家中，与亲人诀别。在英军进攻虎门炮台时，关天培督厉士卒奋勇杀敌，激战七个小时，自己受伤数十处，鲜血满袍甲，最后为敌炮击中，壮烈殉国。关天培牺牲之后，遗骸运回淮安，葬在城区东郊。淮安城里建造了关天培祠堂，供人们凭吊。

幼小的周恩来在听了关天培的故事以后，心中很久不能平静，缠着嗣母陈氏要去看关天培祠堂。后来，终于有一天，由塾师邹先生带领着他和同学们去瞻仰关祠。这是一个肃穆的院落，中间三间享殿，关天培顶盔贯甲，凛然站立在神坛上。周恩来肃然起敬，恭恭敬敬地对关天培的塑像鞠躬，内心响起了人生应该如此的祝祷。在关祠内，赫然高悬着林则徐亲自撰写的挽关天培的对联：

六载固金汤，问何时忽坏长城，孤住空教躬尽瘁

双忠同坎，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

周恩来默诵这副挽联，牢记心间。后来，在 1939 年，正是抗日战争烽火正炽的年代，周恩来到了原籍浙江绍兴，面对抗战前方，还向故乡亲友背诵了这副挽联。

周恩来六岁时曾和嗣母陈氏，随生母万氏迁居到清河县清江浦镇（今江苏省淮阴市）的外婆家居住，在青江浦住了三年，直到生母万氏病故后才离开。淮阴有一座岳飞祠，周恩来曾经去瞻仰过。在大殿正中，岳武穆白面长须，威风凛凛地坐在那里。匾额上，四个遒劲的大字——还我河山。这是岳飞的传世名言。两边的楹联，分别镌刻着：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大殿四壁名人碑刻很多，周恩来默诵着，切记着。

十年后，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敬业》刊物上发表的《飞飞漫墨》中，还记叙了当年在岳庙里所见的一首七律。并说：“其辞则凄凉欲泪”。该辞为：

一自金牌颁十二，常教热泪洒英雄。

奇冤不恨埋三字，和虏终惭失两宫。

南渡江山悲逝水，北征鞍马付秋风。

低徊往事成千古，祠宇空余夕照红。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曾记述淮安是尚武之乡。在一篇《射阳忆旧》

的文章中说道：“淮阴古之名郡，扼江北之要冲，清时海禁未开，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经之孔道也。余本浙人，自先大父为宦吴省，遂徙家而居焉。生于斯，长于斯，渐习为淮人；耳所闻，目所见，亦无非淮事。……淮郡人民，素称强悍”。后来，他又在一篇小说《巾帼英雄》中，写了一个女子青儿，说：“青儿本家大江之北淮阴：旧址因逼近徐属，俗尚强悍，故父习武，略工拳术，具好身手，往来山东一带，作保镖生涯。”

时代、历史、社会，都使周恩来在深感民族危亡、国土沦丧之际，有萌发以军事挽狂澜这一杰出思想的潜因。随着他环境的变迁和学业的增进，这一思想终于脱颖而出。

1910年，周恩来12岁。这时，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在奉天省银州（今辽宁省铁岭县）工作。春天，周恩来随堂伯父周贻谦到了铁岭，入银岗书院读书。

在周恩来来到铁岭的前五年，爆发了日俄战争。这场战争是日本与沙俄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中国的东北，而在中国的国土上进行的。

1904年2月8日夜，日本海军偷袭了当时由俄国占据的旅顺口，使得沙俄的两艘战列舰、一艘巡洋舰被鱼雷击中。9日，又在朝鲜的仁川港外击伤两艘俄舰，使得军舰自行炸沉。10日，两国正式宣战。到了七八月间，日本以13万多的兵力，逼近我国东北的辽阳，俄国集中了22万人拚命抵抗，后被迫向北退却。与此同时，日军5万人向俄太平洋舰队的最大基地旅顺口发动攻击，俄军3万多人防守。从8月中旬打到年底，日本才迫使俄军于1905年元旦投降，日军占领旅顺口。日军于3月1日对奉天发起总攻，10日占领奉天。直到当年8月，双方在美国的斡旋下停战，俄国将旅顺、大连及其附近领土、领海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并将从长春到旅顺间的铁路和在这一地区的特权、财产无偿地转让给日本。从此，日本在这里建立了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殖民扩张的桥头堡。

铁岭附近，有一座龙首山。1910年夏天，周恩来与伙伴们登上了龙首山。

在日军为日俄战争中战死者立的“日露战迹碑”前，小伙伴们愤恨难平：外国人跑到中国来打仗，还立啥碑，这叫什么名堂？！这时，周恩来给伙伴讲起淮安“状元兵”抗倭的故事。

那是明朝的事了。淮安出了个状元沈坤，为人正直，不趋炎附势，一直不得升迁，只当了一名主管教育的不大的官，后因母亲病故，回淮安守孝。适逢倭寇来犯，所到之处，朝廷派兵抵抗，孰料官兵腐败，不敌倭寇。眼看家乡父老受害，沈坤忧心如焚，变卖家产，召募乡勇千余人，亲自率领迎敌。他冒着敌矢，身先士卒，一箭射中敌酋，倭寇大败而逃，沈状元乘胜追击，取得抗倭胜利，众乡亲便把这支队伍称作“状元兵”。倭寇并不甘心失败，后又纠集人马来犯，而且愈加猖狂。沈坤率领状元兵配合官兵，杀得倭寇丢盔弃甲只顾逃命，状元兵紧追不放，追至淮安东乡姚家荡，将千余倭寇一举歼灭。状元兵将倭寇尸体掘地埋葬，坟冢似山，名为“埋倭山”。同时，淮安父老为沈坤建了报功祠和状元楼。

周恩来讲完，皱着眉头，攥着拳头，愤愤地往“日露战迹碑”捶了一下，转身走下龙首山。

1900年，八国联军由大沽口登陆，经天津向西，攻占北京。清廷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第二年，清廷与帝国主义签订条约，规定巨额赔款，拆毁大沽炮台，外国军队驻扎北京、天津、山海关间。此后，清廷考虑作些

变革，废科举，办学堂。

1910年秋，周恩来12岁时，移居到奉天府（今沈阳市）四伯父周贻賡家中，入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学习。这学堂是1905年创设的，后来与第七两等小学堂合并，称为东关模范学校。奉天和铁岭一样，都是日俄战争的遭害区。日本和沙俄的军队为了争夺奉天城，在这里打了10天。

1911年的暑假，周恩来随着同学何履祯到了他的老家魏家楼子。何履祯的爷爷何殿甲，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老人。他带领周恩来他们观看了日俄战争的战场。魏家楼子是日俄两军争夺奉天之战中的主战场之一。当时，村东的烟龙山成了一片火海，魏家楼子的所有房屋被烧成灰烬，很多中国的老百姓惨死在战火中。

何殿甲在山风飒飒中吟哦起来：

登彼龙山兮山巅，望彼河水兮潺潺，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

吾已生于斯兮长于斯，恨不能翱翔兮五湖烟，今吾老兮有何志愿？图自强兮在尔少年。

面对着民族的丧亡，国土的凋零，老人的声音满含着悲痛和哀伤。他已经将近走到生命的终点，但是总不甘心看着自己的民族亡国灭种，他把希望寄托在周恩来他们这些青少年人身上。

周恩来站在当年的战场上，望着经过炮火浩劫的遗迹，倾听当地农民的血泪控诉，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亡之感。他感慨于老人的嘱托，悲愤地唱起当年流传的一首歌曲。歌名叫《何日醒》。歌词中说：

辽东半岛风云紧，强俄未撤兵。呜呼！东三省，第二波兰错铸成。哥萨克队肆蹂躏，户无鸡犬宁。日东三岛，顿起雄心，新仇旧恨并。舰队联墙进，黄金山外炮声声。俄败何喜？日胜何欣？吾党何日醒？！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朝政府被推翻，周恩来在学校里率先剪去了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

周恩来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读书的时间不长，两年多一点。但是在这里却留下了现在能找到的他的最早一篇文章——《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教师的评语是：“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心长语重，机畅神流。”这篇作文写于1912年10月。1913年6月，被选为甲等作文，在奉天省教育品展览会上展出。同年，又作为范文被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一书。1915年，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后来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两书，都收入了这篇作文，成了全国性的范文。

在这篇文章中，周恩来讲到了青少年一代对于国家民族应该担负的责任：

吾全校之诸同学乎！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耶？圣贤书籍，各种科学，何为为吾评究而悉讨？师之口讲指画，友之朝观夕摩，何为为吾相切而相劘？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校三四年中，同学，同学，宜如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

在这篇文章中，周恩来说到学校要“注重道德教育，而辅之以实利美感，更振之以军国民之精神”。

这里，周恩来提到了“军国民”。

这是周恩来最早提到了“军”字。

周恩来早年曾在一篇作文中写道：

兵，凶器也。战，危机也。此右文之言，岂尚武之国之宗旨乎？是以立国于今世，无不视其军事之强否，以判其国（之）优劣。军盛则国强，军衰则国弱，斯人人所奉为公理，百验不磨者也。

这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学时，在一篇题为《海军说》的作文中所说的话。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周恩来谋求中华崛起，主张必须“尚武”，“军盛则国强”，认为这是“百验不磨”的。

1913年2月，周贻康调到天津改任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长。周恩来这时15岁，就随着周贻康夫妇搬到了天津。在天津，他们住在元纬路元吉里，在现在的河北区，几间平房，居处狭小。这里虽然还不能说是贫民窟，但在天津来说，远称不上是富庶人家的居住区。

天津是我国华北通海外的门户，也是京师北京城的卫护城市，过去称为天津卫。1860年8月14日英法联军攻占塘沽，24日占领天津。到这年10月，英法联军侵占北京，抢劫和火烧圆明园。清朝廷同英国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同法国签订了《中法北京条约》。1861年1月，天津开埠，辟为通商口岸。根据不平等条约，天津这里有英、法、俄、德、日、比、奥、意、美等国家的租界。所谓租界，就是弱国受列强欺凌而形成的国中之国，中国的这块土地，由外国人来管理。从此天津成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城市，工商业比较发展，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和新式的教育制度也逐渐在这里产生。周恩来到了天津，既深切地看到外国列强的统治，也大大开阔了眼界，接触到近代社会的气息。

周恩来当时是一个学生，到了天津，伯父母仍让他上学。他准备报考南开学校。南开学校是一所中等学校，比较有名，成立于1904年10月17日，当时是私立学校。创办人严修（字范孙）在清朝做过翰林和学部侍郎，思想比较开明，南开学校就是在严修自设的严氏私塾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严修任董事，张伯苓任校长。张伯苓原来是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后来因为受到甲午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决心从事教育工作来挽救中国。他到日本和欧美考察过教育，想按照欧美教育制度的模式，认真办好南开学校。

从1913年8月到1917年6月，也就是从15岁到19岁，整整四年，周恩来就在南开学校念书。

从长春的小学进入天津全国知名的南开学校求学，程度上有一定距离。因此，入南开学校不久，“初至英文非佳”。接连几篇作文，教师的评语也不很好。1914年春天，有一篇作文，题目是《羊叔子平吴疏书后》，老师的不佳评语使周恩来的思想上有了很大的震动。他专门在作文本的页边写下了作文评语不佳感言：

人人作此均佳，我独何故而草草塞责？致劳先生之口舌。岂从斯无扬眉吐气之时耶！翔宇，翔宇，汝宜三思，须知人之所能为者，己即能为之。汉文落第，英文不及格，尚何面居于丁二班？若长此以往，恐降班有你，南开不久亦非汝插足之地矣！宏图壮志，竟将抛诸大海。活泼精神，亦将沉沦脑外，虽有同志同仇，亦将不汝答矣！岂不羞煞也哉！

周恩来写下了这段话，用来自勉自责。此后，他“发愤攻读，始同趋步”。不久，他的各门功课都取得了优良成绩。同时，他的爱国、救国的思想，也在南开学校的环境中，得到了发展。

周恩来当年的同学张轮远，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回顾到当时时势：“时值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外寇侵袭，内政腐败，军阀横行，国无宁日。于是致有‘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之愤慨语言，流传殆遍。”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说周恩来“当时目睹时艰，爱国心切，忧民救国，见诸言行。以天下兴亡为自己之责任，虽在少年读书时期，而其心志自有在也。乃时时召集有识之同学，追求真理，商讨救亡之大策。1914年在校组织‘敬业乐群会’其目的即为敬所业，乐群众，共同爱国，拯救中国于危亡耳，同时并创办《敬业》学报，周总理被推任该报总编辑，以提倡爱国及研究学术等，全校师生均乐于参与，勇于投稿，为一时各校办刊物之冠。南开除《敬业》学报外，尚有《校风》周刊一种，亦由周任总编辑，刊登校务及诸同学之新作品。周几乎每期皆执笔为文，发表爱国及救国之宏论，对同学问进步影响极为广大。”

当周恩来还是一年级生的时候，他写过一篇作文，内容是写“勤”字的，题目是《一生之计在于勤论》，说要勤不要惰。不过周恩来说“勤”的立足点，不是说“勤”可使个人如何飞黄腾达，而是其思在国。他写道：“闻鸡鸣而起舞，无忘雪耻之志。”“履勤而不怠之轨，求毕生之计，大至于国，小至于身，殆无不受其赐。”“人人能勤，则一国之事定矣。”周恩来的一生，他的勤勉始终超过常人。邓小平曾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

也就是在他一年级的时候，1914年春天，周恩来和同班同学张瑞峰（蓬仙）、常策欧（醒亚）三个人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在“敬业乐群会”的成立宣言中，周恩来写道：

青年为斯世将来之主，学者为领导标新之人。况生值学道将绝之国，大厦濒倾之邦，则吾辈后生责任，不更加重大耶？果欲尽此重大责任，舍在学时代极力锻炼身心增进智能而奚求。

在这篇宣言中，讲到了“校课限于普通，而求精务资同志，独修每嫌孤陋，斯自治必先合群”。这里，提出了“合群”的思想。后来，周恩来在一篇文章中对此作了阐释，这篇文章的题目叫《爱国必先合群论》。

他说：“国无社会不名，社会无团体不生。国与社会，两相表里，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是故爱国者，必先及其社会，首必爱其群，斯为爱国之士焉。”他还说：“吾国民果欲占颜色于世界也，则当爱国。欲爱国则必先合群，……合人群而成良社会，聚良社会斯能成强国。神州不沉，吾种不灭，均如干钧之系之一发，吾国可不于此加之意乎？”

值得注意的是，在“敬业乐群会”的简章中，规定活动的内容为研究、执行两种，而在研究类中，除了演说团、俱乐部、演剧团等外，有一个军事研究团。这在当时的中等学校中是很少见的，也说明周恩来等当年已对军事予以重视。

16岁的周恩来，当时对世界的认识是：“今之世一战争之期，非曩昔可比。”他对中华民族处境的认识是：“丁此大难将兴之日，一发千钧之时，强邻逼处，虎视眈眈。”“欧风美丽，日遍神州，吾不图存，彼将代之。”

周恩来：《春郊旅行记》，作于1914年春。

周恩来：《光阴最宝贵，试各述暑假所为勿隐》，作于1914年秋。

当然，这些话，还都是片言只语、然而忧国的思想已可看到。

后来。他在 1915 年冬天，写了一篇《或多难以固邦国论》，比较透彻地说了他的忧思。他写道：

返察吾国，自海禁大开，强邻逼处。鸦片之役，英入侵我；越南之战，法人欺我；布楚之约，俄人噬我；马关之议，日人凌我；及平庚子，诸国协力以谋我。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岌岌乎不可终日。此固非常之时势也，而人民之鼾睡如故。逮乎辛亥，国建共和。……列强借口以进兵，俄英从中而播动。土地丧失，国亡即在目前，此固非常之时势也。

这时候，正值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约的时候，如周恩来所写“东邻，乘欧战方殷之际，忽来哀的美敦之书”。他大声疾呼：“事急矣！时逼矣！非常之势，多难之秋，至斯亦云极矣！”

这声声呼唤，饱含着周恩来的焦虑，反映着当时中国人民的血和泪。虽然这只是一个中学生的一篇作文，但是却写出了中华民族面临灭顶之灾时的呼唤，写出了在北洋军阀政府卖国统治之下人民的苦难。

老师看到了这篇作文，不禁拍案加评语说：“才思骏发，波澜老成。中后历陈时事，尤如贾长沙痛哭流涕之情，诚杰构也！”

在这样的时势之下，周恩来将怎么样？

周恩来立志救国。但这时的周恩来，比只说一句“为了中华之崛起”的少年周恩来，已经深沉多了。

他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他说：“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并且说：“其中不乏爱国之士，发愤以图强，立志以自振。”表示了对同胞们的期待。不过实际上，这也是他对本身的自许，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当兹神州存亡危急千钧一发之秋，吾党青年，正宜努力前途，以作砥柱中流自任。”

中流砥柱，这一黄河中游三门峡的擎天石柱，就是周恩来对人民、对民族的自许的象征。

怎样来救国？怎样来强国？周恩来着眼的是军队。这就是他所说的：“立国于今世，无不视其军事之强否，以判其国优劣。军盛则国强，军衰则国弱，……”

或者用周恩来的另一种说法，那就是：

公理后必恃铁血，彼以铁血凌人，我徒恃赤血而无黑铁，忍辱含垢，低首言和，不得已亦势之必然也。

所以，要“练军兴实业”。

这时期，在周恩来的文章中，“闻鸡起舞”、“枕戈待旦”这类的话，是时常出现的，可以看到周恩来的尚武精神。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学习的时候，有一个同班同学叫王朴山，比较要好。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议论国是。他们在学校学舞剑，并且还合作吟作了一首诗：

周恩来：《答友询学问有何进境启》，作于 1915 年 9 月 29 日。

周恩来：《约友入足球队启》，作于 1915 年 2 月。

周恩来：《或多难以固邦国论》，作于 1915 年冬。

周恩来：《广募救国储金致友人书》，作于 1915 年 6 月。

华年惜绿鬓，午夜啸青锋。
学道雄心淡，观时热血浓。
无成惭画虎，有侍爱潜龙。
诗思飞何处，云山几万重。
周恩来在一年级时，还写过一首诗：
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
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
这里的“啸青锋”、“博浪椎”，也都反映了当时他的尚武精神。

在南开学校上学四年的周恩来，是贫困的周恩来。当时的学生都穿长衫，周恩来只有一件白布长衫，一个星期六天，没有替换，只有等到星期天回家洗净，然后星期一再穿着上学。他住在伯父家，伯父收入微薄，家计还要靠伯母编织一些线袋、自行车把套等出卖来补贴支出，周恩来的学费常常不能及时缴付。由于周恩来品学兼优，后来校方免除了他的学杂费。周恩来还在课业之余或者节假日，替校方刻蜡纸、油印或者抄写讲义，得到一点收入作为补贴。南开的《同学录》中说他：“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能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造成斯绩。”所谓“斯绩”，说明他在各方面的成绩是优良的。

在南开学校上学四年的周恩来，是活跃的周恩来。他与人创办“敬业乐群会”，为《校风》、《敬业》等刊物写了很多稿子；他参加讲演比赛、作文比赛、球类运动，特别是积极投入了新剧活动。当时因为男女分校，没有女演员，周恩来就男扮女装，参加演出了《一元钱》、《新村正》、《华娥传》、《醒》、《五更钟》等新剧，大多以颂扬民主和爱国精神为主题，“描写社会之腐败，发抒少年爱国之精神，令人欲歌欲泣，鼓掌如雷，亦可见当日之盛也。”校长张伯苓曾经告诉学生说：“诸师生不惟今日在校内登上戏剧舞台，将来还可登上世界之舞台。”果然，几十年后，周恩来登上了世界舞台，大显身手。

在南开学校上学四年的周恩来，是好友的周恩来。他当年的同学王庆民说：“他为人中肯，热心为群众服务，善于团结同学，深受大家敬爱。”周恩来当年自己说：“余性恶静，好交游，每得识一友，辄寤寐不忘。”而他的同学则说他“美仪容，善辞令，待人接物，蔼然可亲，勤劳朴素，自奉甚薄”。他和很多同学都合得来。

但是，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四年间，最为突出的，还是他的爱国救国的热忱。张伯苓的儿子张希陆回忆起周恩来说：“他辩难析疑，勇于追求真理，渴望祖国富强，是一个朝气蓬勃、立志救国、才华出众的爱国青年。”张伯苓一再说过：“周恩来——南开最好的学生。”

周恩来在南开的四年间，正是中华民族多难的四年。1911年推翻了清廷，结束了几千年的帝制后，国家政权很快落到了北洋军阀袁世凯的手里。1913年，袁世凯派人暗杀了革命党人宋教仁于上海车站，这年爆发了“二次革命”，江西、江苏、安徽、广东、福建等省由革命党人宣布独立，但被袁世凯平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派军队在中国的山东半岛登陆，名义上是宣称对在华的德军作战，实际上是侵略中国，占领了济南车站和青岛。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其

周恩来：《本会成立小史》，作于1914年10月。

中包括中国政府必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顾问等，限中国在 48 小时内答允。袁世凯一方面答允“二十一条”的“修正案”，一方面准备在日本的支持下登基做皇帝，并承认外蒙古自治权和沙俄在外蒙的一切侵略特权。沙俄还把中国黑龙江省的一部分划为“特别区”，实行“自治”。1916 年，护国战争发生，袁世凯在全国人民唾骂声中死去。1917 年，军阀张勋率辫子军进入北京，拥戴清朝废帝溥仪复辟。这一年，美国与日本订立《蓝辛——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

周恩来当时是莘莘学子，但是关心国事，而且近在京城不远的天津，这一桩桩一件件外忧内患，无不冲击着全国社会，也冲击着周恩来的心灵，上面所引用的文章，文章中的炽热词句，都是有所感而悲愤，由悲愤而迸发出来的火花。

周恩来在文章中，也在诗句中，抒发他的悲愤情怀。1916 年 6 月 6 日袁世凯死后，安徽督军张勋为了打击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势力，在 9 月间召开徐州会议，勾结各地军阀，组成所谓“十三省区联合会”，订立北洋军阀们的攻守同盟，策划复辟帝制阴谋。南开中学的国文教师张皞如从报纸上得知这个消息后，掷报流泪，写成《伤时事》一首：

太平希望付烟云，误国人才何足云。

孤客天涯空涕泪，伤心最怕读新闻。

周恩来作了一首诗和张皞如老师：

茫茫大地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

最是伤心秋又到，虫声唧唧不堪闻。

当然这不是一首写景的诗，而是一首射时的诗。周恩来在演说中抨击道：“试问督军何人？徐州何地？乃竟有十三省联盟之事，自为盟主，干涉宪法，取消国会，改组内阁，排挤总长，甚而至有废旧约法之议。”

他在另一首诗中高呼：

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

对救国救民，他慷慨地作出了承诺。

当时的中国社会，在愤慨和忧虑之中，很多人提出过各种的救国之策。例如，当时社会上流行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对周恩来产生过吸引力的。当时社会上还有一种“贤人政治”的说法，也对周恩来产生过影响。但是对周恩来影响更大的，恐怕要算是东邻日本的兴起。

日本原本是一个小国、弱国，与中国差不多同时被西方列强打开了门户，然后它实行明治维新，几十年间，国势强盛了起来。

“东瀛亦以岛国，一战而败我，再战而胜俄，占台湾，据朝鲜，居近世之后起，为黄种之出色。”为什么日本能这样？周恩来认为，这是日本注意了军队，强国必先强军。甚至于，他对于日本实行的军国主义，也有了兴趣，认为有研究的必要。

1917 年夏天，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同学们东西星散，各奔前程。周恩来向同学喊出：“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中国同日本离得近，路费也比较便宜，这是周恩来选择去日本的一个原因。另外，周恩来确实很想看看日本，究竟它是怎样强盛起来的，它实行的

周恩来：《中国现时之危机》，作于 1916 年 10 月 4 日。

周恩来：《海军说》，作于 1915 年冬。

军国主义是不是适合于救中国呢？

周恩来来到日本东京后，曾经在东京神田区中猿乐町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上过学。这是一所主要以教中国留学生日语为目的的学校。当时在东京，以天津南开学校和天津法政学校留日学生为主，曾经组织起一个“新中学会”。这个学会在东京牛迂区鹤卷町 112 番租了房子作为活动地点，叫“新中寄庐”。周恩来在 1918 年春夏之交加入了“新中学会”，搬进“新中寄庐”，和十几个留日学生住在一起，自行打扫卫生，轮流值日做饭，每周聚会一次，交流学习心得，讨论国际形势。周恩来还常常到神田区北神保街的“中华青年会馆”阅读日本报纸和书刊，以及从国内寄去的《新青年》、《南开思潮》等报刊。当时也在日本的陈铁卿回忆说，青年会里报刊很多，周恩来常去看，“注意吸收新思潮”。周恩来来到日本，固然是为了进一步求学深造，同时也是为了研究日本社会，为了研究军国主义。周恩来在旅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周恩来是有救国的大志向的。

军国主义能不能救中国呢？到日本后，周恩来看到军国主义的日本，既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繁华景象，更有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饥饿和失业大军，占国民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备受艰辛。现实告诉周恩来，中国不能实行军国主义。

周恩来在 1918 年 2 月 18 日的日记中说：“然而细细的考究起来，德意志的军国主义已招各国反对了。”在 2 月 20 日的日记中，他继续写道：“日本也是行军国主义的国，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的。”“而且军国主义必定视扩张领土为重要的事，将来欧战完后，德意志的军国主义保怕难保住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不知又教谁打呢？军国主义在二十世纪上，我看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

周恩来抛弃了用军国主义来救中国的设想，但是他并没有抛弃对军队的重视。

有一次，他与几个同学谈到中国东北三省的情况。同学们谈得很多，周恩来听了非常感慨。他想起东北三省现在已经差不多落入了日本和沙俄的手中，要想救东三省，以当时中国的国势来说，是非常难的了。鉴于当时中国北洋政府的腐败卖国，他认为要靠他们去挽救东三省是办不到的，不能成功的。他设想，东三省应该独立自主，奋发自强。他写道：“不仰仗政府，自谋生路，招收红胡子造枪炮，先从军政两方入手，如果能练兵十四个师团，日本就不足怕了。”

在这天的日记前端，他写下了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一句诗：“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他借用这句写唐明皇想念杨贵妃的哀思，来寄托祖国在强邻侵略下弱小无力的愁和恨。

周恩来在日本参加了爱中国的活动。1918 年 5 月，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将要同日本政府订立“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消息传了出来，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群情激愤。大家举行抗议集会，周恩来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亲自起草了学生救国团体的组织条例。

在 1918 年 5 月 7 日的东京《日日新闻》上有一则报道：在京支那人留学

生连日来时有不轨举动，……昨天下午一时许，约 700 名学生在神田区北神保町 10 号民国中央青年会馆集合，密闭室门，严禁警察和其他日本人出入，似在讨论何事。……更有 40 名干部集合于同区今川小路 1—4 维新号支那料理店楼上，饮酒并激烈争论不休，致使神田署数十名警官赶到现场，……

东京《日日新闻》记者，曾经采访过周恩来的神近市子说：那时中国留日学生约有 4000 人，在他们中间，周恩来已经是一个“大人物”了。周恩来被认为是这次集会的领导人。

怎样才能救中国呢？

1918 年 7 月到 9 月，日本发生了“米骚动”，广大劳苦人民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形成了强大的运动。这场风暴席卷日本全国，虽然后来被日本政府镇压下去了，但周恩来从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这时正是俄国十月革命刚发生不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各种流派的思想涌入日本。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反映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书籍，在书店里可以买到。周恩来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等，研究了堺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和其他一些报刊，对宣传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文章也读到过。河上肇主编的《社会问题研究》出刊后，周恩来是热心的读者。

周恩来在苦闷、彷徨之中，对于中国的出路，看到了一线光明。

第二章 从参加五四运动到去欧洲

- 从日本回国后，全身心地投入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 “今后的目的，重在社会的根本改造”，在斗争中有新的思索，去“另辟一条新道”。
- 赴欧洲勤工俭学，为的是继续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路。
- 决心走俄国人的路，说：“革命是不能不流血的。”
- “争先去弄潮儿！”预见到太平洋上之战，并说“预备乘机掀起太平洋上革命之潮”。
- “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这是周恩来当时的结论。

1919年4月，周恩来由日本神户乘船，回到中国。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人民这一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去了。

在五四运动爆发前，从1915年到1919年初，兴起了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第一卷叫《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是“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宣战对象是封建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新青年》的出版方针，是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向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开火。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强烈地反对了封建伦理道德。他还写了许多文章。李大钊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从他们当时的思想来说，都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毕竟重重地打击了封建思想的统治，使人们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唤醒了人们对国家民族的关心。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巴黎和会上，美、英、法等国完全满足日本的要求，严重损害也是战胜国的中国利益时，导致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

5月4日，北京的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三千多学生在天安门前开会，决心“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会后进行游行，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算帐。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镇压。6月3日开始，成百名地逮捕北京学生。6月5日起，上海开始工人罢工。从6日到10日，罢工或罢课、罢市扩展到南京、厦门、宁波、松江、镇江、苏州、常州、无锡、扬州、芜湖、杭州、天津、济南、汉口、广州等城市。上海参加罢工的达六七万人。

群众运动的怒潮使反动统治阶级内部惊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这是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和沪海道尹沈宝昌6月8日联名打给北洋政府的电报中的话。在严重的形势面前，北洋政府被迫于6月10日下令免去曹汝霖的交通总长、章宗祥的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币制局总裁的职务，对被捕学生也陆续释放。

接着，全国开展了反对巴黎和约上签字的运动，形成五四运动的又一个高潮。参加这个运动的有广泛的社会阶层，形成各界的共同行动，“就连亲英美派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也表示反对在和约上签字”。沸腾的民意，使北洋政府不敢坚持签字的主张，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专使终于拒绝签字。五四运

动取得了胜利。

有的外国评论家说，在中国，“这类民意的表示是未曾有的，……他们将一种新的原质投入中国的政治。将来不能不考虑这些学生创造国民新政党的可能性”（密勒氏的评论）。

确实，在此后几十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有不少是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知识分子中，如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董必武、赵世炎、马骏、郭隆真、张太雷、方志敏、林祖烈、张闻天、许德珩、闻一多、黄日葵、阮啸仙等，成为中国共产党或靠拢共产党的领袖人物。走向国民党方面的有傅斯年、罗家伦、盛世才、张其昀、左舜生、曾琦、段锡朋（抗日战争中成为汉奸）等。当时积极参与运动的北大教职员陈独秀、李大钊、马叙伦、马寅初、胡适等，报界的邵力子、叶楚伦等，教育界的黄炎培、蒋梦麟等，都是日后中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

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在大连上岸，先去沈阳看望了伯父，后来又回到哈尔滨东华学校作客，谢绝了校长邓洁民留他当教员的邀请。五四运动爆发，他赶回天津，以校友身份天天到南开去，全力参加运动。天津学生为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在5月14日成立了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推谌志笃、马骏为正副会长。6月下旬，谌志笃、马骏请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说：我所以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负此责任义不容辞。他搬进南开学校，带头举行话剧义演，募集办报经费，并筹划解决纸张、印刷、出版、立案等问题。7月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

五四以来群众运动的热潮，鼓舞着周恩来。他在7月12日出版的《南开日报》上，发表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一文，开头就说：

“这次全国学生自动的事业，在世界上可以说很不希罕，但是在我们东亚，实在是不甚多见。日本的米骚风潮，朝鲜的独立运动，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在东亚历史上增加些国民自觉的事迹。我们学生学识本甚浅陋，思想又是枯窘，但为着这个时期感受这种潮流，本我们的良心，实在是不能不有个觉悟。因着这个觉悟，就生出许多的举动。明知此动，未必便能生出极大的效果，可是社会各种团体受这环境的影响同束缚，不能将意志直接表出，所以我们学生惟有不顾利害先动起来，求大家的同情。……”

从这段叙述，可以看到周恩来感到五四群众运动在中国来说是“不甚多见”的，表示出了人民的力量。我们学生应当先动起来，进而带动社会各界。值得注意的是“明知此动，未必便能生出极大的效果”这句话，可以认为周恩来当时感到，只是群众运动，还不能从根本上推倒封建军阀的统治。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表示民意，同反动统治对抗，还只有靠群众运动。

这年7月下旬，日本宪兵在山东省的济南、青岛等地擅自逮捕中国人。山东的学生、商业各界群众几千人到省公署请愿，要求政府向日本领事馆交涉，要求日方放人。北洋军阀政府不但不听，反而宣布山东实行戒严，并且任命亲日派安福系的马良为戒严司令。马良对山东人民进行镇压，8月5日，杀害爱国的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三人。

消息传到天津，群众义愤填膺，学生运动又趋高涨。8月6日，周恩来写了《黑暗势力（一）》，发表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其中写道：“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文章中，说到山东学生被

见上海《时报》，1919年7月1日。

捕，北京北大学生被捕，安福系的报纸造谣，日本则“简直看中国不成一个国家”。周恩来说：“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倚仗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

当时，有一个日本学生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曾经发表《日本东京学生致中国学生书》，表达了他们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主张中日亲善的良好愿望。

8月9日，周恩来发表了《敬告日本来华的学生》一文，文中说：“现在诸君既知道军阀不好，侵略主义不好，社会要改造，平民势力要增加，人类要平等，诸君就应该同去做真正的平民运动，推倒你们的军阀，打破日本国民侵略的野心，然后两国国民的社会运动，才可以接近。”

那么，用什么办法来推倒军阀呢？周恩来说：“我们自己到底用什么法子去讨他呢？我们当知道，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

天津各界联合会发出了要求北洋军阀政府严惩马良，在山东解除戒严以谢国人的通电。然后，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商定派刘清扬、郭隆真等10名代表到北京去请愿。她们到北京后，同北京代表一起，在8月23日这一天到总统府递交请愿书。结果，北洋军阀政府派出军警，把代表全部拘捕。

消息传到天津，周恩来当即布置《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连夜赶出号外，把情况向全市人民报道，并且与天津学联负责人商议，发动学生进北京斗争。8月26日，北京、天津学生三四千人到北京的总统府门前请愿示威，总指挥是天津的马骏。斗争坚持了三天。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调动数千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和保安队，再加上骑兵，把请愿的群众驱赶到天安门前，用木棍和枪托打伤学生一百多人，逮捕了马骏等代表。在天津的周恩来闻讯后，就和张若茗等率领天津学生五六百人赶到北京，连日在总统府外露宿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并发动舆论支持斗争，开展营救活动。在全国舆论的支持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在8月30日释放了全部被捕的代表。

但是，安福派并没有被打倒，他们在山东、上海成功了，还要扩张到天津去。要靠学生的运动，来推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等，并不是很容易的。要靠群众运动，来推倒军阀统治，更是谈何容易。

经过这次斗争，周恩来感到：“我们的请愿，是认定为群众运动的导火线。政府的罪恶，现在已彰明于国内外，所短的就是没去真正点这个导火线。上次天安门的确已架好了，就是没有人去点，现在我们想想应该怎样去点？”

周恩来在思索中。

然而迫害日益逼近了。

天津警察厅杨以德，在天津解散各界联合会，逮捕上街讲演的学生，查禁《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还派军警恫吓印刷厂不许承印。

10月10日，天津各界四五万人在南开大学操场举行共和纪念会。周恩来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之一。大会发表宣言，痛斥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和逮捕爱国群众。杨以德派出大批警察包围会场，阻止大会进行，并不准上街游行。男女学生多人被打伤。邓文淑（邓颖超）等带领女学生首先冲破警察的包围，走上街头。他们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城示威游行。最后，游行队伍来到警察厅，推举周恩来、李毅韬等四人为代表，找杨以德质问。杨以德避而不见。为了抗议，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决定南开大学等13所中等以上学校罢课四天（后来改为六天）。但是，斗争未能如愿，杨以德依然当他的警察厅

长。

这年11月16日。日本暴徒在我国福建省福州市打伤了多名抵制日货的中国学生，还打死了一名警察，造成“福州惨案”。福建学生罢课抗议，各省市学生起而响应，形成全国抵制日货的高潮。天津的学生联合会也号召抵制日货，声援福建学生。周恩来当选为执行科长。

抵制日货，当然需要商界的合作。12月15日，周恩来与天津商会会长卞月庭和会董多人，商讨抵制日货的办法。周恩来说：“所以抵制日货者，系因我国处此时际，人民虽有战争之心，而无战争之力，故惟有以抵制日货激醒彼国民族。”

“虽有战争之心，而无战争之力”。只凭群众运动，内不能推翻军阀统治，外不能抵御强敌。从实践中，周恩来会有新的思索，正如他在12月间所说，“去另辟一条新道，接续不断的望前走”。

1920年1月23日，天津学联调查员在魁发成洋货庄检查日货时，店主勾引来三个日本人将他毒打。这事激起社会公愤。接着还发生了警察厅拘捕学生等事。当各界代表向直隶省公署请愿时，当局不但不惩办店主等人，反而派保安队将各团体代表马千里、时子周、马骏等12人拘押。此后几天，还在继续逮捕抵制日货的学生。1月29日，周恩来带领各校学生数千人到直隶省公署请愿，要省长代电中央催办福建交涉，取消中日军事协约，释放被捕代表，不干涉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省长曹锐不敢出见。大家公推总指挥周恩来和于方舟、郭隆真、张若茗四人为代表进去见省长，四人竟被拘捕，先被关押在营务处，2月6日被押往警察厅，一直到7月17日，才被宣布释放。

1920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一周年。周恩来所编的《检厅日录》中记载：“今天是‘五四’纪念。回想去年今天学潮突起，引得这一年来的学潮起伏，有无穷的感触，当然是各人脑中所能免的。将来的希望，尤隐隐约约在各人脑中颤动不已。”

在监狱中，周恩来等曾经开过“特别讨论会”，对未来进行研究，讨论的结果是：“今后的目的，注重在社会的根本改造。”在监禁中，周恩来更加认清了严酷的现实，重新思考许多问题。后来他在谈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时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国内，是这样的情况，军阀专政，暴力横行，只有强权，没有公理。还在狱中的时候，周恩来已经决定去欧洲考察了。1920年6月8日，他在天津地方检察厅看守所中给赴欧洲勤工俭学的李愚如的诗中，已经说到：

三月后，
马赛海岸，
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

周恩来出狱了，但是他已经被南开大学开除。11月7日，他从上海乘波尔多斯号邮船去法国勤工俭学。

周恩来到欧洲勤工俭学，不光是为了上学读书。他说：“主要意旨，惟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虚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也就是说，他继续在探求拯救中华民族、拯救中国之道。他认为到国外“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

所应研究之科目也”。

周恩来 12 月中旬到巴黎。1921 年 1 月 5 日，到英国首都伦敦。英国当时是世界上的最强国，号称日不落国。周恩来在没有出国之前，虽然也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会对英、法有很大的影响，但总以为战争所毁坏的不过是部分而已，不会是整体受到影响。等到亲自到欧洲一看，才知道原先的想法等于梦话。英、法等国，生产集中，交通发达，贸易发展，但是在战争中人力征调，生产破坏，物资消耗，商业阻隔，“已不可计算”。周恩来在巴黎、伦敦市面上观察，觉得虽然繁华超过东亚，然而物资供应如煤、电、粮食、糖等，还不如中国的上海、北京、天津富足。至于失业人数，仅英国伦敦和苏格兰，就已超过百万。这种状况，不光是英、法如此，欧洲各国都这样。英国、法国还是战胜国，战败国比他们还要惨。而国与国之间，斗争十分剧烈。例如法国，就想把德国解除武装，限制兵备，使它陷于“穷蹙之境”。从战败国如德国来说，国力枯窘，对赔款百亿英镑心存抵赖，意图报复。欧洲本来是一个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的地方，弱小民族图生存，力量较强的谋兼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操纵一切，睥睨天下。既然想操纵，目的就在于肥己；肥己就必然会瘦人，于是发生许多“不平之事”。周恩来感到这里“隐伏将来无穷之祸福”。

从东亚来说，周恩来认为太平洋由美国和中国据其东西岸，日本在中间，这三国的利害关系最大，其次是美国属地菲律宾，英国属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然而过去主宰太平洋的是英、日两国，这是很不公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英联盟瓦解，美、英两国共同遏制日本，提出海军战舰吨位比例美、英、日限制在 5 5 3，日本是不甘心的。日本一手制造中国内乱，一面又向世界宣传中国内乱的危险，“其用心之险，自无与比”。

总之，“各国政治界黑暗如故”，“强弱相欺，大小相吓，殆无公开平等之足云”。至于一些国际会议，打的都是和平的旗号，实际上参加会议的各国“多各怀鬼胎，思图眼前之利，从无推诚相与，一计将来利害，为全世界着想者”。例如前几年的巴黎和会，实际上是列强分赃的会议；现在的华盛顿会议，实际上是斗角钩心的会议。从东亚来说，“不管日美的战争急不急，总之，太平洋上的风云已密布了。他们预备的是帝国主义战争”。

周恩来已经预见到太平洋上之争，将来美国、日本必战。他说：“要切实地预备，预备乘机掀起太平洋上革命之潮，联合起各国被压迫的民众，携手冲上潮头，争先去弄潮儿！”

周恩来到欧洲，是想探求救国救民之道。经过到欧洲后的初步观察，他了解到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英国的渐进的改革，“以保守而整其步法”，求取成功；一种是俄国的暴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一洗旧弊。周恩来感到在中国来说，“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这是周恩来 1921 年 1 月 30 日写给他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说的。从中可以看到他是倾向俄式革命解决问题的，只是考虑到受制于列强，才考虑到渐进的改革。接下来他写道：“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以今日社

周恩来：《西欧对俄对德之方略》，1921 年 4 月 6 日。

周恩来：《英帝国会议之内幕（二）》，1921 年 7 月。

周恩来：《太平洋上的新风云》，1924 年 6 月 15 日。

会之麻木不仁，‘惊骇物议’，虽易失败，然必于此中乃能求振发，是又弟所深信者也。”从而也可以看到他是倾向于武装暴动的。

几个月之后，1921年春，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他决心走俄国人的路了，而俄国革命是实行武装暴动取得成功的。从周恩来自小所受尚武重军的熏染，以及五四运动后以群众运动并不能推倒军阀统治的事实，到国外又看到列强称霸无非是因为军力强盛，终于形成一种思想——重视军事，革命要有军队，这就很自然的了。

周恩来诗曰：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他在文章中也写道：“一国一种的民主革命，如法国革命、美国独立都是经过极长期的血战争斗才得使共和奠定，更何况无产阶级的共产革命，须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世界革命呢！”他说：“革命是不能不流血的。”

他对俄国革命的原因和革命为什么取得成功，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一个革命的爆发，总是包含着生产状况的变动和阶级斗争的内容，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革命学说所指出的。俄国革命的成功，是血染就的，而且是工人和士兵的共同行动。周恩来说：“每次革命都是劳动阶级为其中的主动力量，农兵从旁赞助，而中等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既无真实力量又无团结训练，以致制宪运动民主革命均无建树，国力政权终落到无产阶级手里，使十月革命独著其功勋了。”

当时的共产国际中，有人提出：“赤军是供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用的。”卢森堡过去说过：“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周恩来说：“这都是见到之语。”

周恩来主张革命要有军队，这是已经很明白的了。这点，在他同时代的中国革命者们中间，是少有的远见卓识。这一主张，是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的，是有的放矢的。

周恩来讲过一篇中国的军阀祸国史。

中国的军阀中，主干是北洋军阀。清朝曾国藩练湘军，李鸿章练淮军，就使清朝的统治有了裂痕。到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树立起北洋军阀的基础。帝制被推翻后，袁世凯上台，他手下的“王龙段虎冯狗子”，都是有野心的。不过王士珍手下没有军队，虽然当过国务卿、总理，毕竟斗不过冯国璋、段祺瑞。冯、段成为直皖两系，互争北洋正统。袁世凯死后，冯、段争霸。徐世昌是仰仗段祺瑞上台的。后来吴佩孚为直系军阀报仇，战胜段祺瑞，又战

周恩来：《生别死离》，1922年3月。

周恩来：《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1922年12月15日。

周恩来：《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1922年9月。

周恩来：《十月革命》，1922年12月1日。

胜张勋，赶走徐世昌、黎元洪，拥戴曹锟进了中南海。不料四周的军阀还没有倒，直系内部又起了正统之争。这是北京城内的内哄。从外省说，吴佩孚拥曹锟登位后，其他直系军阀自成系统。于是吴佩孚委部下几个师长为光杆督军，不兼师长，也就没有了兵权，并使之互相牵制、互相争夺。吴佩孚如此，其他军阀也不坐视，也都在纵横连络。破坏革命的陈炯明，暗中与吴佩孚相通，但还不敢公开。这些军阀内哄，形成极为混乱的局面，靠军阀自身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靠国民革命来解决。

不过，军阀手中都有军队，国民革命如果只有群众而没有军队，是不能打倒他们的，也必须有军队。

当时，胡适在《努力》周刊上发表政论，主张召开公开的“各省会议”，解决时局问题，实现全国统一。

周恩来说：现在群盗割据，争为雄长，这样的会很难开成。就算开成会了，又怎么能满足这些人的各方欲望？不能满足，还不是争吵？

胡适说：如果争吵，就“用手枪炸弹罢工罢市”对付分赃会议的办法对付他们。

周恩来说：与其这样弯曲，何如不直说“打倒军阀呢？”

接着，周恩来从本质上说明了问题：“况且手枪炸弹罢工罢市只能做革命的导火线，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若徒以手枪炸弹罢工罢市来恐吓，则手枪炸弹，他有躲避之法，罢工罢市他更可以军队来压迫。”

革命要有革命军，否则军阀是打不倒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周恩来正是指出了这个关键。

这种军队，是革命军队，是同旧式的军队不一样的。这一点，周恩来在欧洲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当有人攻击共产主义具有宗教精神时，周恩来解释说：“共产党当然不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但共产党也决未曾想造出蠢如鹿豕只知服从的党员”。接着，他说：“旧式的军队除掉被愚弄和服从外无他事，今日的红军却有了劳兵会议。军队犹如此，他种组织，更不待言。”这就是说，革命军队，是有民主生活的，是有觉悟的，是不同于旧军队的。

后来，周恩来回国后，开创了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看来，这种思想是在欧洲时已经有了的。

第三章 国共合作时期在广东

- 1924年9月回国到广州，参加了平定商团暴动的战斗。
- 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创革命军队政治工作。毛泽东曾说：“第一个做政治工作的是周总理。”
- 与蒋介石等率黄埔校军东征。鼓励和组织共产党员冲锋陷阵。给学生军讲《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指明“这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
- 组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后以此为基础组成叶挺独立团。这是第一支由我党掌握的革命武装，曾扬威北伐战争。
- 第二次东征中，亲临前线参与决策和指挥。
- “起举国皆兵之风”，这一思想的提出，在当时是创造性的。

1924年9月初，周恩来回国，到达广州。

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有枪就是“王”。

当时的广州，是孙中山的广东政府所在地。国共合作，是中国革命的希望。

但是孙中山的力量，也只能统辖广东省的三分之一，即从广州到韶关的广东中部地区。广东东部，有背叛孙中山的陈炯明率军盘据。广东西部，有军阀邓本殷等率军盘据。

1923年10月，孙中山在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发表了国民党改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正式宣告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等参加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委员。国民党在改组的过程中，左派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右派公开表示反对，有些投机分子则以“左”派的面目出现，暂时混在革命阵营内部。

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几十年，但是他没有革命的军队。辛亥革命胜利了，北洋军阀袁世凯夺去了胜利果实。他在广东一手提拔陈炯明，但是陈炯明背叛了他，投靠了北洋军阀。现在，他依靠了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等部队，但是这些人并不是来革命的。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来人和中共的建议，于1924年1月27日筹办黄埔军官学校，5月建校完成。苏联派来军事顾问和教官，共产党派了干部和学员。这年10月，苏联运来首批8000支有刺刀的俄式步枪，每枪200发子弹，并资助200万卢布开办费。

孙中山的革命新面貌，引起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惊恐。帝国主义加紧从广州内部组织反革命武装，企图颠覆广州政府，于是就有商团之乱。

周恩来到广州的时候，正是商团之乱的时候。

广州商团是买办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武装组织，有团员七八千人，团长是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的买办陈廉伯。8月4日，陈廉伯向挪威商南利银行订购步枪4850支、子弹115万发，连同短枪共计9000余支，并于13日成立了“全省商团联防总部”。陈廉伯为“联防总长”。广州政府颁发给商团的购枪执照是40天内运到，但是在颁照后6天就到了，数目也不符。这就引起孙中山的怀疑。他命令省长廖仲恺扣留驶入省河的挪威轮船哈佛号，禁止商团联防总部成立。陈廉伯逃往香港。12日，商团2000余人游行请愿。13日，广州商人罢市。20日，廖仲恺布告：“陈廉伯勾结吴佩孚，定于8月14日起事，自为督军，投降北廷。陈又私运军火，事发避港，煽惑罢市，

奉帅令予以通缉。”商团当即在西关布防戒严，并宣布全省总罢市。28日，英国军舰九艘开到广州白鹅潭，炮口对着中国军舰，英国沙面领事向廖仲恺提出警告。29日，英驻广州总领事向孙中山发出最后通牒，宣称：奉香港舰队司令命令，如遇中国当局有向城市开火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付之。9月1日，孙中山为了抗议英帝国主义支持商团叛乱，发表对外宣言，并对英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提出严正抗议。

10月10日，广州各界人民举行庆祝双十节集会，到会的有30多个团体，三四万人。周恩来出席了大会。他以广东民族解放协会代表的身份在会上发表讲话，说：

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极大，反革命派的气焰日涨，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

这个讲话里，兵士作“先驱”，这正是他一贯重视军队的思想，而把工人、农民、学生、商人与兵士联系在一起来实现实力，已经闪烁着人民军队的思想。

这一天，商团竟放出步哨，在长堤西壕口一带戒严。当群众大会后举行游行，队伍经过永汉路（今北京路）南出天字码头，转入长堤西壕口向太平路（现人民南路）进发时，商团向群众开枪，当场死20余人，受伤和被抓几十人。商团还构筑街垒，封锁市区，发动武装暴动。

这时候，孙中山正在广东北部的韶关准备北伐，知道后立即打电报给胡汉民等，叫他们严办，不得“再事姑息”。他下令从北伐军中抽出一部分军队回师广州平叛，成立革命委员会，由谭平山、廖仲恺、陈友仁等为全权委员。共产党人周恩来、陈延年、杨匏安、阮啸仙等都参加了军事指挥部的工作。14日，胡汉民下令解散广州市内一切商团机关。15日，广州领事团公然叫嚣要派水兵登陆进行武装调停。但是，革命军在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援下，很快就击溃了商团军，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资产阶级的一次重大胜利。广东局势转危为安。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参加战斗。

1924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广东区委，工作范围包括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周恩来任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11月，周恩来被任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黄埔军校正式名称是陆军军官学校，因为校址在距广州25公里的珠江之中的黄埔长洲岛上，所以简称黄埔军校。校总理是孙中山，校党代表廖仲恺、校长蒋介石。校本部下设政治部、教练部、教授部、管理部、军需部，有入伍生总队长、教育长、政治教官和军事教官等。这时正办第一期，据11月1日统计，军校共有1500人，其中教员和下级军官62人，行政人员131人，学员950人，办公室和勤杂人员120人，服务人员237人。军校学生主要来自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大中学生，有革命的决心。第一期毕业生中，有共产党员39人。

周恩来是党组织派遣去的，也是应孙中山、廖仲恺的邀请去任职的。在他之前，政治部第一任主任是戴季陶、副主任张申府，但两人都很快离去。第二任是代主任邵元冲。邵元冲1924年11月随孙中山北上，周恩来接任，开始了革命军队灵魂的工作——政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经说过：“第一个做政治工作的是周总理。你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做政治工作

你资格最老。”

周恩来以旺盛的革命斗志、炽热的爱国精神、忘我的工作态度，开创政治工作的局面。他调一些共产党员到政治部工作，并对他们说：“过去黄埔军校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学校也没有多少真正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你们看，蒋校长办公室门前挂的是于右任为他写的‘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的对联，学生手中流传的是蒋校长主持编写的‘曾(国藩)左(宗棠)治军语录’，这样怎么能把学生训练成真正革命的军事干部呢？今后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真正在军校推行列宁创造红军的经验。”

在周恩来去之前，黄埔军校虽有政治部，但既“无具体组织”，又“很闲淡”。周恩来去后，将只有两个记录员的政治部扩大，分设指导、编纂、秘书三股，成为真正的政治工作机关。为了对学员及官长进行政治教育，他制定了“政治课程训练计划，政治训练教授调查表”，对士兵颁布了“革命格言”，进行了“日课问答”。并且“1.发行刊物：当时有壁报、画报……并组织政治军事月刊社，聂荣臻为政治编辑主任”，“2.编制歌曲……3.成立剧社”。他规定工作细则，进行有关调查，出版《军事政治月刊》、《革命军》、《黄埔潮》等。对学员的政治教育课程，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主义》等。周恩来亲自给学生们作报告，政治部专设的政治教官大都是共产党人。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创建了中共黄埔党组织和青年团的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发动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黄埔共产党方面，自始至终是周恩来负责领导的。”他还受校党代表廖仲恺之命，指导全校各级党代表，“指导全校党务”。这是指的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事务。周恩来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对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进行了改造，如在特别区党部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的五个委员中，吴明为宣传委员、罗振声为组织委员、周逸群为常务委员，这三人都共产党员。

当时，革命的政治工作十分红火。一进校门，大字标语就是“拥护三大政策”、“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校歌中高唱：“怒潮澎湃，红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这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全校除一间俱乐部是砖瓦房外，教室、宿舍、厨房、厕所全是草棚，墙是竹帘、草席，穿的是布袜、草鞋。这里的生活又是活跃的。在周恩来的倡议下，成立了“血花剧社”，自编自导自演革命戏剧。陈赓当时是“血花剧社”领导人之一，也是有名的演员。后来又组织了“火星社”，团结了进步的学员。进而又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联合广东各军进步的青年军人，对在军队中扩大革命影响，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政治部对政治思想工作领导得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又起了核心作用，学员们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尽管环境艰苦、生活紧张，但始终斗志旺盛，革命的情绪很高。

当时是军校学员的徐向前说：“在周恩来主持下，军校的政治工作相当活跃，革命性、战斗性很强，有力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忱。”苏联军事顾问

毛泽东：《在听取全国工文政治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谈话》，1965年2月21日。

王逸常：《周恩来与军校政治部》。

方鼎英：《几句老实话并答复乔君》，1927年6月。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切列潘诺夫说：“共产党人在政治部里起了积极作用，因而政治部的工作提高了学员的训练水平并大大加强了黄埔军校的纪律性。”

周恩来身兼数职，工作繁忙。每天清晨，他步行到码头坐船到黄埔军校工作，傍晚回广州，晚上到广东区委办公室。桌上放满了各种书籍和文件，星期天常到工会、农会作报告。当时黄埔军校的入伍生总队长张治中说：“黄埔军官学校成立，我随进了黄埔，便认识了周恩来先生。他是政治部主任，我们一见如故。他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吸引力。”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工作时间不长，但是，开创了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影响是很大的，使军校成为革命的军校。

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各自在其势力范围内专政，另一方面则存在着谋求统一的民主运动。1923年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对时局的宣言中，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1924年11月在第四次对时局的宣言中，又重申这项主张。孙中山接受了这个主张，发起召开国民会议。当直系政权倾复后，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西北的冯玉祥等先后请孙中山北上讨论时局问题。11月13日，孙中山由广州动身，22日到上海，12月4日到天津。他在各地受到工人、学生的热烈欢迎。12月31日到北京，之后就患病治疗。在广东东部的陈炯明认为孙中山病情严重，广东政府群龙无首，是一个可乘之机，于1925年1月7日在汕头下了反攻广州的命令。他外恃段祺瑞政府和闽赣两省北洋军阀的支持，内与广东西部邓本殷、申葆藩等勾结，十分猖獗。

2月1日，孙中山大元帅府发令讨伐陈炯明，这是第一次东征。东征军共分三路，黄埔军校以第一期毕业生为骨干，组建了两个教导团，参加了右路军。许崇智是东征军总指挥兼右路军指挥，叶剑英是参谋长。那时，军中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耳目。

周恩来参加了东征。在中共广东区委内，他此时任常委兼军事部长。2月3日，他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同校长蒋介石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等率黄埔校军出发东征。当时以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名义发出《黄埔军校布告》说：

我军奉命东征，实为讨贼救民；
父老苦秦久矣，不得已而用兵；
所过秋毫无犯，所到鸡犬不惊；
不住民房抢物，买卖尤属公平；
绝不拉夫筹饷，三民主义实行；
我军所到之处，箪食壶浆以迎；
党军讨贼勇敢，与民相见以诚；
望各安居乐业，指望东江安宁。

周恩来规定了“不拉夫，不筹饷，不强占民房，不用军用券”等纪律。军行所至，纪律严明，鸡犬不惊，当时曾有“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鸡和鸭”的“爱民歌”。政治部一再激励官兵为“救国救民”而英勇作战，要“千万爱护人民，不可扰乱人民”。“革命军所到之地，人民乐于贸易，自愿帮助运输并代作侦探工作，所以作战顺利，一战即克服东江，此乃中国军队第一次战时政治工作之成绩。”

三路东征军，左路、中路领导各怀异志，与陈炯明暗中勾结；只有右路

军按计划出征，2月10日进抵淡水城郊。淡水易守难攻，地势险要。周恩来和蒋介石、加伦等听了叶剑英的攻城作战计划，确定黄埔校军由平湖、龙岗突击淡水南面；粤军由城西北、东北进击。15日发起攻击。敌军凭借工事猛烈抵抗。教导2团团团长王柏龄在紧急关头逃跑了。周恩来领导政治部与各级党代表紧密合作，鼓励校军坚持战斗到底。共产党员彭干臣带领的敢死队（全队百人，十名官员中有八名是共产党员）奋勇爬城，终于攻下淡水城。这一仗，打垮了叶举、熊略、洪兆麟二万多人，俘敌千余人，其中有敌军旅长、团长十多名。淡水一仗，为第一次东征胜利奠定了基础。黄埔学生军打出了威风。几十年后，周恩来还记得这场战斗的艰辛，同叶剑英谈起过。

从单纯军事观点说，当时广州政府拥有20万之众的粤、湘、滇军，血战经年，不能打败陈炯明。后来以黄埔师生几千人，组成两个团，举兵东征，却对胜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奇迹是怎样产生的呢？因为这是新的军队，是有着革命的政治工作的军队。政治力量超过了敌人，提高了战斗力，保障了军队本身及军队与人民的团结正如参加这次战斗的一位苏联顾问所说：“军阀队伍里的士兵不肯拼死作战，只想抢劫财物，黄埔军校教导团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没有沾染军阀习气，在组织良好的政治工作的影响下正在成长为真正的革命战士。东征开始前，政治工作人员就准备了50万份致士兵的传单，10万份致农民的传单，5万份革命歌曲。这些材料在东征中散发。农民们特别是海丰、陆丰两县的农民们高兴地迎接国民革命军的队伍，仔细倾听宣传员的宣讲，自愿协助部队，在很多村子里还成立了欢迎革命士兵的委员会。”“人民的一致支持是国民革命军东征旗开得胜的首要因素”。“取得胜利的第二个原因是建立了黄埔军校第一、二两团这样新的国民革命军的坚强骨干。”“这些士兵们受到政治工作者（共产党员）和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年轻的革命军官的良好影响，充满了革命精神。他们明白，他们是为了什么目的去战斗的。”

周恩来2月6日曾在东莞欢迎东征军的群众大会上讲话，明确指出：“如欲使中国和平，须有真正之革命军，须有为人民所用之军队。”在革命军队中，“于军事教育外，授以政治教育”，强调“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另一方面，革命军队如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

2月27日，东征军攻克海丰。3月6日，周恩来随军进驻揭阳。3月12日至22日期间，东征军攻占潮汕，陈炯明部的林虎率万余人反扑。13日，黄埔校军教导第1团千余人林虎军激战，周恩来亲赴前线，激励士气，教导第1团在第2团和粤军第7旅支援下击破林虎军。15日，再次击败林虎军的反扑，林虎败逃兴宁。东征军乘胜追击，18日取五华，20日克兴宁，22日收复梅县。至此，取得这次东征的胜利。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5月中旬，在英帝国主义的收买支持下，广州政府派驻广州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利用东征军主力远在东江地区的时机，勾结北洋军阀段祺瑞、云南军阀唐继尧和广东军阀陈炯明，在广州密谋发动武装叛乱，推翻广州政府。广州政府急令东征军主力从前线回广州平定杨、刘叛乱。5月21日，东征军回师，6月12日到达广州郊区向叛军发起进攻。周恩来指示当时留守广州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配合主力作战。在工农群众的支援下，6月15日，叛军杨、刘两部被

迫缴械，广州政府转危为安。

在东征军回师途中的6月2日，周恩来给黄埔军校的学生军讲《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他鲜明地讲了四条：

- 一、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
- 二、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被压迫阶级的工具的。
- 三、军队的组织有很重大的意义，是实现我们的理论的先锋。
- 四、军队有种种集成的方式，这方式是依社会环境各时代的生产方式而变迁的。

周恩来讲了自从有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就用军队来压迫人。但是，组成军队的是劳动人民，是工农。工农受了过甚的压迫，必然会觉悟起来利用武力去反抗压迫者。例如，俄国十月革命，工农利用武力推翻了俄皇贵族。中国的被压迫群众觉悟到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压迫的时候，也会从他的本身造出的武力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

1926年7月，周恩来还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上，讲了《国民革命及军事政治工作》。他说：

国民革命军是建筑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的基础上的，是由封建制度下经济不安的社会里出来的，我们要把这些不安的人民收集于革命旗帜之下，不可让他们走入军阀军队之中。

然后，他分析不同情况，讲了政治工作的不同作用：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使革命军队确实有革命观念。在革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也要因对象不同而有不同使命：对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

关于军队中的政治部，他说：政治部是军队组织里面的一部分，以进行政治教育，使军队革命化、纪律化、统一化。在军中做政治工作的人，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十分勇敢，而且比士兵更勤苦。

政治工作的近期目的，要使官佐、士兵和一切群众晓得党的主义、理论、政策，行动要按政策办事。

周恩来的这两个讲话，可以说是革命军队创建时期政治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此外，他还作过《革命军部队政工与民众运动》、《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会上的政治报告》等，讲到政治工作要使士兵明白怎样与工农联合，共同打倒帝国主义；讲到革命军是为人民解除痛苦的，另一面，若无人民援助，就不能负重大责任。这些都是政治工作的重要的概括。

上面所说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是周恩来经孙中山同意后建立起来的。周恩来从黄埔军校选调了徐成章、赵自选、周士弟，从外面调了廖乾吾、曹汝谦，负责具体组织，还从各地调来一批工人、农民、青年当队员。铁甲车队的所有人员的配备、调动，它的工作与活动，都直接请示中共广东区委、周恩来决定。后来孙中山去世，周恩来就在铁甲车队的基础上组成叶挺独立团。这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军队，在北伐战争中无往不胜，号称“铁军”，功勋卓著。

曾经参加过“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魏鉴贤，有一段回忆：

铁甲车队共有一百多人，为“三三制”编制，队下辖三个排，排下辖三个班，驻地在广州市大沙头。队长徐成章，党代表廖乾吾，副队长周士弟。所以叫“铁甲车队”，是因为装备了铁甲列车，官兵的装备也较好。它的全部活动受广东区委直接领导，廖乾吾经常去向周恩来请示汇报工作。廖不会

讲广州话，外出常带我随行，这样我也就有机会常去周恩来那里。周恩来住区委二楼办公，房内陈设很简单，只有一张办公桌，几条长板凳，墙上挂着马克思、列宁、孙中山的像，报夹夹满了报纸。他待人诚恳，待士兵亲如兄弟的作风，深深地铭记在我心里。

铁甲车队参加第一次东征，任务是保卫广九铁路广州至石龙段的安全并掩护东征军，打通了广九路，运送兵员、给养、军火。东征军转入进攻淡水、平州之敌时，铁甲车队担负保卫广九铁路安全的任务。

在镇压刘、杨叛乱中，铁甲车队迅速投入战斗。先是掩护广州市内大元帅府、省政府、苏联顾问团等机关渡过珠江，撤往土敏土厂，然后回来保护大元帅府安全。东征军回到广州外围后，铁甲车队就配合入校不久的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攻占石牌车站，中午攻占沙河，继而一鼓作气打下观音山，缴获溃逃敌军大批武器弹药，受到广东区委赞扬。

1925年7月1日，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铁甲车队改名国民政府铁甲车队。后来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任团长。独立团实际上由共产党掌握，营建党小组，团设支部，周恩来给予直接指示。

广州政府平定了杨希闵、刘震寰之乱后，革命政权得到一定程度的稳固。但是，陈炯明在第一次东征被击溃退到粤闽边界后，从香港英帝国主义殖民政府那里得到援助，又从北洋政府段祺瑞那里得到军饷，力量逐渐恢复，开始蠢动。乘黄埔军回师广州，陈炯明于1925年9月15日派部将刘志陆，带兵驱逐驻潮汕的粤军和所派的军政人员，再占东江地区。云南的唐继尧则任命刘震寰为“援桂军总司令”，拟与陈炯明联合进攻广州。广州国民政府9月下旬决定再次东征。

10月1日前，陈炯明部占领潮州、汕头、揭阳，并向海丰—河婆—五华一线推进，并制定了进攻广州的计划。针对陈炯明的进攻，国民革命军制订第二次东征计划，调拨兵力，任蒋介石为总指挥。9月中旬，周恩来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第1军政治部主任，授少将军衔。2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周恩来为第1军第1师党代表。29日，他又被任为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全权负责前方政治工作。

这次东征，关键之战是惠州战役。惠州地处东江水陆交通枢纽，是一座有1300多年历史的名城，兵家必争之地。民谣说：“铁链锁孤州，飞鹅水上游，任君天下乱，此地独无忧。”此时，陈炯明部守惠州的是第6军军长杨坤如，守城部队有4000多人。

10月11日，东征军到达惠州城郊，包围了惠州。总指挥部设在城南的飞鹅岭。国民政府曾向杨坤如发出劝降电，遭拒绝，遂决定13日发起总攻击。上午9时45分，战斗打响。东征军炮兵开始轰击北门，敌军炮兵及电台、城防司令部目标被击中，城墙也被摧毁一部。然而，当天下午1时45分开始连续五次强攻，都没有成功，东征军伤亡惨重。这时，总指挥部笼罩着一片悲观沮丧情绪。蒋介石认为，第二次东征一开始就损伤过大，太不合算，主张放弃进攻惠州，改道前进。蒋的参谋长胡谦竟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以肉击石的。”这种消极情绪受到周恩来的反驳。他说：“攻下惠州，对整个战局，不仅在事业上，而且在政治上影响甚大，要重视政治。”

周恩来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人支持。接着，周恩来亲自到飞鹅岭阵地上视

察地形，并和苏联军事顾问罗加觉夫以及其他指挥官一起研究，提出了攻城作战新方案。周恩来说：“瓮中捉鳖，鳖会咬手，在瓮的三面打击，留一面让鳖爬出来，捉鳖较为容易。”指挥部采纳了这个新的攻城方案。

总攻开始，周恩来亲临前线参与指挥作战。当年的政治宣传队工作人员肖隼英回忆说：“周恩来主任在前线，冒着炮火，不怕危险，边鼓动部队作战，边指挥农民协会组织武装，配合军队攻打惠州城。”敌军侧翼有一个机枪阵地极为隐蔽，拼命抵抗，东征军就调山炮轰击，两发炮弹命中目标。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作了战地动员，又以党的名义，密令共产党员组织敢死队。当时团的党代表蒋先云、张际春、傅维玉、王逸常等，遵照周恩来指示，分别在第3师各团率领连党代表，组织敢死队，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报名参加。共产党员、第7团党代表蒋先云立即组织敢死队，亲自率队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用竹梯强行登城。他左手举着盒子枪，右手挥着指挥刀，深入重围，指挥战士与顽敌展开肉搏战。他身上多处被刺，流血不止，仍坚持战斗，奋勇当先。陈赓在东征军任连长，身先士卒，攻上城头，左腿受伤，他把弹片拔出，继续冲杀。

下午4时许，东征军500名敢死队和机关枪队，十人一队，一手挽梯，一手持枪，在步枪机枪掩护下在北门登城成功。杨坤如大腿受伤，见大势已去，带残部由水东门沿东江上游逃窜。东征军攻破北门后，战斗仍在进行，周恩来带共产党员何友述和两名护兵由小西门直趋敌军司令部收缴文件、枪支和物资。敢死队将各城门启开，东征部队鱼贯而入。此战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品，是第二次东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摧毁了陈炯明的主力。

在两次东征中，周恩来不仅开创了革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而且直接参与了军事决策和指挥作战，从多方面的实践中增长了军事领导的才能。

惠州之战后，周恩来与何应钦率部队从惠州出发，20日到赤日，22日克海丰，26日占河婆，27日至30日同陈炯明的林虎、洪兆麟等部万余人在华阳、河婆一带决战，击败洪兆麟部，歼灭了林虎主力。随后，进驻揭阳、汕头，收复东江各地，一路顺利。11月，进入福建省追歼陈炯明残部，在永定、平和一带全歼逃敌，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

11月21日，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管辖惠（州）、潮（州）、梅县和海陆丰下属25县行政工作。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人任地方行政的主要领导职务。周恩来既是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又处理地方行政事务。

这时候，周恩来已经看到了革命战争是人民的战争。他说：“扫除反革命刘、杨之役，从东江而来的军队，与农民连成一气，三条铁路的工人，同时罢起工来，与革命军人，好似兄弟互助一样，所以打平东江，不是军队的能力，是工人、东江农民，与革命军的势力，打倒刘、杨，也不是军队的能力，也是广州工农与革命军联合的势力。”东征军军行所至，周恩来以政治工作宣传群众，唤醒群众，组织群众。1926年二三月间，他主持召开东江各属行政会议，会议中曾讨论了《组织人民自卫军之提案》，提出人民自卫军应从工会、农会、学生会中定期征募，从区到县逐级地组织起来，定期训练，定期退伍，“起举国皆兵之风”。这样的思想，在当时是创造性的。

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东征军的胜利，是同东江各地工农的

支持分不开的，他们报敌情，抬担架，搞运输，配合作战。海陆丰等县的农民协会、农民，从各方面策应东征军。共产党员古大存以省农民协会特派员的身份，在五华一带领导农民援助东征军。岭东同志会的同志赴潮汕领导群众迎接东征军入汕头。周恩来说：“西方的社会革命与东方——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同的地方很多，而其最重要的就是农民问题。”当年的广州歌谣说：

国共合作是高招，扶助农工是头功；
革命列车跑得快，工农阶级打先锋；
农民要想办农会，广东有个海陆丰；
当兵要想称好汉，黄埔军校出英雄。

周恩来主政东江时，扶植农民运动，各县农民协会纷纷建立，公开活动。1926年1月15日，在汕头市成立广东省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专门指导各县农运。到1927年2月，潮梅所属各县农会会员达35万多人。周恩来认为，当时各地的民团，百分之九十九在土豪劣绅手中，他们利用这个武装来压迫农民，抽收苛捐杂税，简直是农村中的军阀，所以就武装上说，民众武装在广东已成为自然必不可少的组织。为除暴安良计，为保护交通河道计，政府军队以至省防军必有需于农民武装之相助。为乡村自卫计，为保护工会安全，防止工贼捣乱计，农民自卫军、工人自卫军之组织也为势所必需。

在第一次东征克服海陆丰后，周恩来就支持彭湃建立了农民自卫军。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周恩来在1926年2月召开的东江各属行政会议上，就曾通过“组织农民自卫军”的议案。后来周恩来还选派黄埔军校毕业生到东江各属县训练农军骨干。例如，派黄埔军校生钟鼓到潮阳，林本、余立寰到普宁，莫协民、颜永堂到惠来。经过训练后，潮阳成立了百余人的农民自卫军基干大队，普宁成立了二百多人的农民自卫军基干大队，惠来也成立了几十人的农民自卫军的模范队。这些农民武装后来在反抗反革命政变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成为广东工农革命军第3、5、6团的前身，以及1929年7月成立的活动于大南山根据地的红6军16师第47团的基础。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逮捕了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拘留了国民革命军第1军中的共产党员，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所，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据茅盾回忆：这天早晨，陈延年、张太雷、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苏联顾问住所，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和立场。但是，苏联高级使团团长布勃诺夫拒绝了这一建议。当天上午，周恩来到广东造币厂（蒋介石发动这一事件的指挥部），当面质问蒋介石，并斥责他制造事件破坏国共合作，无理扣押共产党人，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下令释放拘留的人员。

此后不久，周恩来离开了广东。

第四章 指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 此时的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上海区委军委书记、第三次武装起义特别军委负责人。

- 关于夺取上海依靠什么力量？怎样武装？什么时候起义？他与陈独秀有不同看法。

- 提出起义的军事工作纲领性计划，核心是建立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

- 在起义的关键时刻，作为起义总指挥没有执行陈独秀的错误命令，从而取得了胜利。这是国际共运史上少有的城市暴动成功的范例。

- “四一二”政变后，曾主张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但未被采纳。大革命失败的结局为他所言中。

1926年12月，周恩来离开广东，秘密到达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

这时候，国民革命军北伐，已经占领汉口，吴佩孚的军事力量基本上已经被北伐军消灭。北伐军的主力部队转向东南战场，指向另一个直系军阀孙传芳。11月4日，国民革命军第4军攻占九江。8日，占领南昌。孙传芳军队退出江西。

在孙传芳军队退出江西之前，上海和浙江的局势已经在发生变化。1926年10月24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在南市、闸北、沪西三处同时举行，但是由于装备不足，被孙传芳军队镇压了下去。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因而升任第9师师长。11月14日，苏浙皖三省的士绅在上海成立联合会，分派代表到粤、奉、直、鲁各地呼吁和平，要求停止军事行动。李宝章对共产党员、工人、学生和进步人士进行残酷镇压。孙传芳下令，对一切新组织起来的团体一律封禁，12月8日封闭了上海总工会。

北伐军的节节胜利，使得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惶惶不安。1926年9月，就发生了英国军舰炮击四川万县，毁民房千余家，死伤千余人的事件。1927年元旦广州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英军在租界边沿布防，保持战时状态。1月3日，英租界当局调大批水兵登陆，用刺刀冲击街头讲演的宣传员。5日，汉口市民与英捕房巡捕发生冲突，数万市民举行反英示威大游行，政府接受人民要求，接管了租界。接着，江西九江又发生英国水兵枪伤中国工人和英舰开枪挑衅的事件，九江英租界也被中国政府收回。这是中国政府打破不平等条约的行动，大快人心。

英帝国主义虽然被迫放弃了汉口、九江的租界，但是决不愿意放弃上海的租界，联合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准备应付事变。上海和长江一带聚集了外国兵舰63艘，其中美国21艘、英同18艘、日本17艘、法国7艘。英国还调动威海卫第2舰队和鱼雷艇共27艘开到上海印长江中下游一带。

孙传芳军队在浙江与北伐军作战，被北伐军打败。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占领浙江省会杭州。孙传芳在江西战败后，曾同张作霖、张宗昌在天津举行会议，就地盘分配和进兵计划达成协议，同意张宗昌和李景林的军队（直鲁联军）南下援助。北洋军阀头子张宗昌2月24日偕同孙传芳到上海，命令鲁军第8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率军到上海接替防务。

由于以上情况，率领北伐军入浙江的将领何应钦、白崇禧等，害怕触犯帝国主义，不敢从沪杭线进攻上海，进军遽然停顿。

上海工人阶级把从北洋军阀手中夺取上海的任务担当了起来。2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上海工人实行总罢工。这时仍为上海防守司令的李宝章，组织了大刀队搜捕和屠杀工人、学生。罢工人数由10万人发展到20万人，进而发展成为起义。工人群众在杨树浦召开了动员大会，随即进攻闸北警察所夺取枪支。反动军队进行镇压，起义遭到失败。

周恩来曾说，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起义”，“许多地方工人同警察发生了冲突，开了枪，工人遭到了逮捕”。他说：“应当把这次起义看作是为将来的起义做准备。”他也说到了对这次起义的领导工作的教训。他认为：“问题全在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从中央的指导方针来说，“全党甚至没有夺取政权的打算”，“党一直采取了不提出夺取政权的立场”。这是针对陈独秀一贯的右倾思想而说的。当时，陈独秀领导着中国共产党，正实行着一条右倾的错误路线。

1927年2月，周恩来任中共上海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23日，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的决定有：“停止今天的暴动”。也就是停止第二次武装起义。“扩大武装组织，准备暴动”。也就是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组织特别委员会指导工作”。其中包括“组织特别军委”。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组成。特别军委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组成。周恩来是特别军委的领导人。

陈独秀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又是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对于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是积极的。但是，对于夺取上海依靠什么力量？怎样武装？什么时候起义？陈独秀与周恩来等是有不同看法的。

陈独秀认为，“我意北伐军不到上海，上海无法解决。在将到时，我们要集中口号工作，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大会”。这一指导思想反映到上海区委领导发出的指示中，就是：“武装暴动是以广大的民众的热情跑到街市，随时随地夺取武装，以打倒敌人的势力，建立自己的政府等意义。”

周恩来是有军事工作经验的，在广东领导过军队，指挥过战争，深深体会到自己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他认为，现在北洋军阀的部队是在瓦解之中，这些队伍是很不巩固的，我们可以做宣传工作，可以分化他们，甚至把这些部队拉过来。“但是，既要举行武装起义，而工人又武装得不充分，那末，尽管部队同我们取得了联系，尽管我们在他们中间做了宣传，情况还是不妥的。”“这些部队对我们能起多大作用，这取决于我们对工人的武装程度，取决于工人拥有的力量。假如工人的力量薄弱，这只会有利于他人，反之亦然。”

他在特委会议上提出，要有“自己的准备”，要组织纠察队、自卫团，“纠察队、自卫团都有规定特别工作”，“并加暴动起来夺取武装”。他的主张得到瞿秋白等人的支持。瞿秋白认为发动武装起义，“要有作战计划，

周恩来：《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1927年3月3日。

1927年2月26日，特委会议记录。

有主力军之训练”。瞿秋白提出一方面重在夺取武装，别方面的目的在建立政权，方针有二：“一、准备群众的武装示威及群众的夺取武装示威”；“二、准备主力军之造成方法及其布置（如‘自卫团’及海军取得方法）”。后来，陈独秀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周恩来提出了军事工作的纲领性计划，包括：建立领导机构，组织武装力量，加强队伍训练，准备武器，加强敌军工作，开展情报活动等。核心是建立一支由自己直接领导的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作为发动武装起义的主力军，在关键时刻能够克敌制胜。

周恩来组织了三支武装力量：纠察队——“目标五千，先组三千”。到3月11日，组成了常备军一团，后备三团。最后总数超过两千人。自卫团——用手枪，“目标五百”。3月4日发展到800人。据3月11日报告，“自卫团可扩充到一千人，预备把他们都加入党，将来分配到纠察队里面去做核心”。特别队——开始人数很少，到3月6日已增加到900多人。

有了队伍，要加强训练。周恩来制订了《武装暴动训练大纲》。特别军委对各个区的工人纠察队实行统一编制和组织，整个上海的工人纠察队成为一支有统一领导、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武装力量。

当时的军委秘密设在法租界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中路复兴坊）。那里有三栋楼房，周恩来住在第三栋的楼上。楼下住着孙津川（上海工人纠察队铁路工人大队总指挥）夫妇和孙的母亲。周恩来“经常深入到工人纠察队中去，亲自指导浦东、南市、小沙渡、杨树浦、商务印书馆等地区的军事训练，教工人练习射击、进攻与防御。周恩来非常机敏灵活，为工人们所敬佩。他除了住在辣斐坊以外，有时也去孙津川的家乡开会和部署工作。孙津川的家乡在上海郊区江湾徐家宅，离江湾火车站不远。那里是我们党当时设的一个据点，十分隐蔽。”据当年周恩来从北伐军浙江前线调来担任纠察队指挥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侯镜如说：周恩来“冒着随时被捕牺牲的危险，亲自潜到各个训练地点，与纠察队干部们谈话，并亲自作政治形势报告，甚至有时还亲自对工人们进行军事训练”。

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是闸北工人纠察队的骨干力量之一。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是周恩来亲自抓、亲自领导的。当时有十几支枪。周恩来主要是抓扩充队伍，同时增加武器。晚上，在印书馆的铸造部翻砂车间，利用那里的噪音练习实弹射击，周恩来教大家使用武器。有一次，在练习中有一人手枪走火，打伤了另一个人。大家没有经验，感到很紧张，周恩来马上说“大家不要紧张，不要乱，要镇定下来”，稳定了大家，然后有秩序地离开现场。

据参加武装起义的孙长胜说：第三次武装起义是有计划、有准备的。1927年3月8日，组织上派人来找我，要训练工人纠察队，让我担任临时教官。我1925年参加党，以前被拉夫在学兵连当过三年兵。联系的同志说，要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当场把徐航安介绍给我，说徐1926年到苏联学习过，懂一点军事。四天后，来通知喊我去上课，地点在培开尔路仁寿里西壁过街楼上。楼上有八个人，一个小姑娘送来一只方盒子，打开一看，里边有一支白朗宁

1927年2月24日，特委会议记录。

瞿秋白：《上海二·二二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

徐梅坤：《回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一些情况》。

手枪，三发子弹。我给大家讲了一个礼拜的课，然后去侦察地形，第一，香烟桥警察局，第二，天水路五区第三警察署，把来去路搞清了。最后一个据点是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东方图书馆，里边驻有毕庶澄的一个骑兵连，把敌军的兵力、枪支等了解清楚。准备工作做得很细致。两天后，3月21日中午，总工会紧急通知：上海工人总罢工。沪东纠察队集中在王德英家里。当时区委书记张叔平调到浦东去了，新调来张永和作区委书记。人到齐后，徐航安说，我们的枪已领来，按名单发，没有发到枪的不要急，马上有枪发给你们。王德英从皮箱里拿出十几支枪和一百发子弹，然后发袖章，徐航安是总指挥，我是副总指挥，其他是纠察队员。广场上有几万工人群众，我们把工会负责人请来，让他们保护工人群众安全，工人队伍与纠察队保持一定距离，以免流弹伤人。

当时参加过起义的商务印书馆工人任其祥讲过一件事：二次武装起义后，资产阶级非常害怕，闸北商会会长发起组织保卫团。周恩来得到消息以后，召集商务印书馆纠察队干部开会，要纠察队员打进保卫团去，掌握枪支。我当时也参加了这个会，在会上反对参加保卫团。我说：“保卫团是资产阶级的武装组织，我们参加保卫团去保卫资本家吗？”周恩来听了哈哈一笑说：“我们现在缺少什么？”我说：“现在缺少枪啊！”他说：“你们参加保卫团，一人有一支枪，还有好多子弹，领了武器不是可以增加我们的武装吗？”这样一讲我们的脑筋开通了，有三十多人参加了保卫团，对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了作用。

什么时候举行武装起义？

陈独秀感到我们力量薄弱，不要发动太早，提出两个标准：一、上海已无北洋军阀的驻兵；二、北伐军到达上海南边的松江县后仍旧前进，或者在到达龙华后。

周恩来不同意这两个标准，认为根据江浙战场的形势分析和上海敌人驻军情况，“假使松江下，必可动，因毕（毕庶澄）决不致再守上海。苏州下，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枯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一部溃散”。最后确定：“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路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

这时的上海，已经战云密布，帝国主义也已动作起来。3月3日，公共租界工部局派兵在海格路（今华山路）底与霞飞路（今淮海路）交界处挖掘战壕，并在原已有铁丝网、铁栅的要道口加堆沙包，一到晚上9时就关闭铁栅。3月5日，美国水兵千余人登陆在南京路、北京路、静安寺路一带示威游行。北洋军阀的直鲁军由褚玉璞守南京，毕庶澄守上海。3月12日，沪宁路工人在真如、南翔之间拆毁路轨，使直鲁军的运输受很大影响。18日，又拆毁了无锡的一段路轨，使直鲁军的铁甲车受阻。但是，毕庶澄倚持有租界为屏障以及帝国主义的暗中支持，对于上海这个军火、军饷主要来源的城市，拼死不肯放弃。北伐军由浙江北上，占领了江苏的宜兴、吴江后，于20日占领松江继续向前，逼近龙华。但是，这是蒋介石、何应钦统率的军队，始终顾虑进攻上海会与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发生冲突，因而采取迂回作战的战略，不敢正面直入进攻上海。20日傍晚，上海总工会派人去与北伐军联系，蒋介石却命令白崇禧停止前进，这既反映了他对帝国主义的恐惧，也是图谋让北洋军与工人纠察队互相厮杀，两败俱伤。

3月21日中午12时，上海总工会颁布总同盟罢工令，80万工人实行罢

工。中共中央为这次武装起义制定的策略是：“罢工后立即暴动，夺取警察局；以纠察队维持治安，解除直鲁军败兵的武装；占领各公共机关，成立市政府，欢迎北伐军。”

周恩来任起义总指挥，赵世炎任副总指挥。他们以3000名工人武装纠察队为骨干组成起义队伍，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援，同驻在上海的北洋军阀直鲁军毕庶澄部和其他军警约5000多人激战。全体工人罢工到了街市的中心，向预定地点集合。租界内的工人群众，一小时内也齐到了华界。武装纠察队按预定计划向各警署各兵营与军队驻地行动。武装在前，广大群众在后。巷战开始了。陆续不断的枪炮声与群众的口号声，响遍上海市。铁路被截断，电话局被占领，电报局被占领，电灯断电，自来水断水。徒手无武器的群众也逐渐用夺得的武器武装起来。警察纷纷脱下黑色的制服逃散，大小警署的门前抛出枪械，悬挂白旗。在敌人营垒的周围，住户市民借出木板、砖头、布袋，构筑起障碍物。小饭店和烧饼店的伙计们赶做馒头食品，由佩带红袖章的输送队送到前线。佩戴红十字袖章的济难队员，往来前方和后方，扛抬伤员。

周恩来与特委研究决定，将上海划分为七个区域：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闸北，分别安排得力者担任负责人，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大致仅仅一个小时，武装纠察队在广大群众支持下就占领了各警察局。如孙长胜说：武装起义一开始，我们先到香烟桥警察局，那里已被另一部分工人纠察队缴了枪。我们过香烟桥，路上遇到六个警察的巡逻队，我们进行包围，警察投降。姜维新说：起义开始后，南市警察局附近已经集合了許多人。我向警察局后门扔了一个手榴弹，前门也响起了盒子枪，但局里没有声音，我们冲了进去，发现警察已经都逃走了，枪扔的满地。接着，工人纠察队进攻高昌庙制造局（今江南造船厂）。我们找到一辆卡车，把机枪架在上面，开始进攻，敌人不敢开枪，逃跑了。杨福林说：暴动时我们先打虹镇警察局，打下来得了9支枪。后来一直打到宝山路，把保卫团的枪也拿下来了。到宝山路打四区警察局打不进，我们就到附近楼房的晒台上用手榴弹往里扔，这一下警察都逃出来了。这时，从吴淞那边坐火车来了一团兵，要到上海来镇压工人。我们把宝山路桥的铁道搞掉一截，使火车倒在了那个地方。我们只有四十多人，分三个地点与敌军打。他们不知我们有多少人。从下午3点打起，打到第二天上午9点钟，敌人就吹号投降了。在浦东，工人纠察队只有十多支枪，去攻打警察局，一面开枪，一面把爆竹放在火油箱里放，声音像打机关枪，警察马上竖起白旗投降了。沪东、沪西也都很快取得胜利，结束战斗。最后，战斗集中在闸北。

原来的分工是，闸北区由赵世炎、顾顺章负责；南市区由周恩来、徐梅坤、陆震负责；“如南市不重要，恩来调闸北”。下午1时南市工人纠察队和起义工人进攻警察署和淞沪警察厅，很快取得了胜利，接着攻占了高昌庙兵工厂，占领了南火车站，战斗胜利结束。

闸北是北洋军阀部队集中的地区，毕庶澄的司令部也设在闸北。在闸北，工人纠察队攻占了五区警察局，周恩来后就到后将指挥部设在这里。

起义武装在闸北进攻的主要目标有六处：北火车站、湖州会馆、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东方图书馆）、五区总署、广东路公署、中华新路警署分所，后来又增加天通庵车站。敌军有大炮、机枪，而且还有白俄兵坐铁甲车射击。炮火密集，巷战普遍。到下午4时，已占领各警署与湖州会馆，于是集中力

量攻北火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和天通庵车站。周恩来与赵世炎在现场亲自指挥。在攻打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时候，纠察队长徐辉祖负伤，有几个纠察队员被敌军打死，这引起了纠察队员们的极大气愤，准备与敌人硬拼。周恩来马上对大家说：不要硬拼，硬拼会使我们牺牲更多的人。他派纠察队员上到商务印书馆的四楼窗口，监视俱乐部内的敌人，还派队员到周围的老百姓家围困和监视敌人，终于使得敌人被围一天一夜始终没有能够冲出来。

北站方面，敌人在晚间纵火攻纠察队，火势渐炽，烧毁民房几百间，难民纷纷向纠察队的防线内逃来。周恩来看到老百姓东奔西逃，一方面要商务印书馆的消防队来救火，一方面派人保护老百姓撤退。附近的居民对敌军义愤填膺，青壮年自愿加入作战，老人妇女从屋中取出木板等物为纠察队布置障碍物。火势熄灭后，敌人不敢进攻，与纠察队双方枪战。“周恩来同志是啥地方危险往啥地方跑，在枪林弹雨中指挥。”

正在战斗十分激烈的时候，陈独秀发生了动摇。据当时同陈独秀在一起的郑超麟说：

暴动是中午开始的。下午和当夜打得很激烈。我们坐了汽车到闸北去看了一下，黄昏就回来了。这日夜里，我来往于中央宣传部和施高塔路恒丰里之间，那时陈独秀住在中央宣传部，恒丰里则是区委一个机关，传递前方战斗消息的。我们整夜听着闸北传来的疏疏密密的枪声，有几个时候枪声密得同爆竹一般，恒丰里把重要的消息派人送宣传部，陈独秀有时也有指示。我也传递过几次字条。深夜三点钟左右，陈独秀曾写字条叫人送到闸北去，主张把我们的武装撤退到大场方向去，以避免牺牲。可是前方没有执行。

在战争中，战斗到最激烈时，双方都已筋疲力尽，这时往往谁能再坚持一下，谁就能取得胜利。尽管陈独秀这时是中央最高领导，但是命令是错误的，有战斗经验的周恩来以及赵世炎，没有执行错误的命令，终于转变了战局。

“前方没有执行”的结果怎样呢？郑超麟说：

我们站稳了阵地，北兵渐渐失败了。次日，下午我又到闸北去看。东方图书馆内北兵尚未投降，铁门锁闭着，十几个兵都在楼上，看见有人到铁门口来，就开枪。围攻者都埋伏在墙角，或对面商务印书馆工厂里。人家警告我，不要从图书馆前面经过。我绕道至图书馆背后，一个暴动指挥机关，在那里看见赵世炎和周恩来。

到了暴动的第二天天明，敌人已经十分困乏，工人纠察队则仍旧从各方面进攻。到中午，天通庵车站的敌军表示愿意投降，纠察队俘虏了三百多人；有的敌军逃散到广东街，也被纠察队缴械。下午4时半，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敌人有些改穿了便衣逃走，被纠察队生擒，其余敌人表示愿意投降，这个苦攻一昼夜的据点终于解决此后，全部武装集中力量进攻据守北站的敌人。据守这里的是毕庶澄的军队主力。这天上午，北站敌人又用火攻，延烧民房，这时自来水已断，无法救火，纠察队的防线曾经后退，但始终不撤，敌军也不敢进攻。等到起义工人全部武装集中到这里后，发起猛攻，大约一个多小时，敌军力不能支，白俄兵逃进了租界，毕庶澄残部失败溃逃，恰好国民革命军第1师师长薛岳率领部队来到，将溃兵全部俘虏。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这样，北伐军不折一兵不费一弹进入了上海。由于这是工人起义，群众参加很多，帝国主义也不敢贸然行动，他们准备好的“机动措施”也不敢采用。北伐军进入上海以后，从22日到

24日，北洋军阀部队（直鲁军）就放弃了苏州、无锡、镇江、南京各地。整个沪宁线地域归属北伐军。直鲁军上海失守后，毕庶澄逃回北方，后来张宗昌将毕庶澄处死了。

在周恩来指挥下，中国的城市武装起义第一次取得了成功。

在这次起义中，已经采取了正确的俘虏政策。起义工人谢庆斋回忆说：“俘虏政策问题，是很成功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我们俘虏的敌兵有二三十人关在东方图书馆。我们并不虐待他们，群众慰劳工人纠察队的食品，分配时照样给他们一份，使他们很受感动。‘四一二’敌人包围了东方图书馆，我们的同志不会开机关枪，俘虏中的老兵就自告奋勇说我来打。听朱英如说，这俘虏政策也是总理建议的。”

参加这次起义的工人杨福林也说：“在宝山路上，从头天下午三点钟打起，一直打到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敌人吹号投降了。我们把俘虏带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里，周总理亲自跟他们讲话，他说：你们只要把武器丢下来，有亲的投亲，有友的投友。”

这种对俘虏宽大处理的政策，后来一直沿续到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人民解放军，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起义取得了胜利，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革命，则在磨刀霍霍，准备屠杀起义工人。

帝国主义一直在注意物色在中国的新的代理人。他们看到北洋军阀大势已去，于是“随时准备与任何表现出有能力代表中国履行其所负义务的政府建立关系并进行谈判。”他们注意到蒋介石正在“攫取越来越多的权力”。蒋介石在南昌时，上海的大买办虞洽卿就到南昌同蒋介石密谈，答应用巨额款项支持蒋介石，交换条件是反共和镇压工人运动。虞洽卿是同英美帝国主义有密切关系的。之后，买办豪绅的代表、政学系政客黄郛等和亲美派官僚王正廷等都到南昌见蒋介石，密谋破坏革命。1927年3月6日，蒋介石指使党羽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16日又强行解散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

这些情况，在上海的中共特别委员会是有所闻的，特委和中共上海区委也开会讨论过。例如在3月30日的特委会议上，周恩来就说过：“整个的情形，他们对付我们已有预备”，“将来或许是借扰乱治安等名目来干，对党部将来是挑拨错处，我的推测是如此”。“将来他们对付武汉及解决上海只有凭武力。同时，对付民众只有如江西雇佣流氓。”4月6日，赵世炎在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说：“现在上海犹处危险时期，不仅是关系上海革命，也为中国工人胜利与失败的关键。”罗亦农接着说：“上海为一切反革命势力集中的所在。”“蒋介石为一切右派反动派的集中点。”“上海的帝国主义对蒋非常赞同，天天造谣促蒋压迫民众，天天帮助蒋介石。”这时，外边已有传言说蒋介石将要对工人纠察队不利。可是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在上海发言联合宣言，说“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人与工人纠察队”等，都是“谣言”，“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这使很多人思想上失去了警惕。由于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影响，终于丧失了起义胜利的果实。

北伐军占领南京后，英美等帝国主义依凭自己增强了的武装力量，借口

“保护”侨民而炮轰南京城，中国军民死伤很多。这是“南京事件”。蒋介石不是向帝国主义抗议，而是派人向他们疏通。他在上海对外国记者声明事件不会扩大，向帝国主义保证“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现状”。上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蒋表示，只要能把工人打下去，可以“认捐五百万”，“借款可另案办理”。“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纠集流氓打手，侵袭工人纠察队之用。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汪寿华被杜月笙骗到住地，开枪打死。周恩来被北代军第26军第2师师长斯烈骗到师部，遭到扣留，周恩来严正抗议，军党代表赵舒去后，周恩来才被放出来。这时，事变已经发生了。大批武装流氓冒充工人，臂戴白底黑工字袖章，从租界出动，在闸北、南市、沪西、浦东、吴淞等处袭击工人纠察队，跟在后边的国民党军就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双方”枪支。几千名工人纠察队全被解除武装，工人死伤三百多人。13日，上海二十多万工人罢工抗议，六万多群众示威游行，走到宝山路，遭到反动军队机枪扫射。同一天，南市的游行工人也遭到反动军队枪击。接着，大批工人和共产党员被捕杀。据不完全统计，反革命政变后三天中，被杀害300多人，被捕500多人，5000多人下落不明。

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事变发生前后，派李立三、陈延年、魏金斯基到上海，加上在上海的赵世炎、周恩来，组成特别委员会。周恩来在特委会议上提出了意见，其中指出：“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对于前次广东与上海都如此，中央对于争领导权没有决心。”“暴动后中央与区委组特委，特委的政策有错误，起头是模糊，后来是妥协。”“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大家主张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决定由周恩来起草电文给中央。

周恩来在电文中说：蒋介石在上海勾结帝国主义与中国银行界，借款一千万，在上海等地进行大屠杀，捕杀共产党人，我们应当乘它政权未固，迅速出师，直指南京。电文从军事上分析了蒋介石目前能直接使用的军队仅五个师，其中第1、21师的领导人薛岳、严重被蒋赶走；第2师常败，在昆山；第3、14师在南昌。所以，国民革命军的其他各军的兵力大于蒋介石。他写道：“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这是一个既有军事分析、又有政治见地的电文，可惜这个意见到武汉后，没有力陈独秀和苏联顾问鲍罗廷采纳。后来，大革命失败的结果为周恩来言中。

第五章 领导南昌八一起义

- 就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
- “七一五”武汉“分共”后，主张以湘鄂赣为中心，提出进行武装暴动。
- 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赶赴南昌组织领导起义。
- 亲切地对贺龙说：党了解你，相信你，党的前敌委员会已经决定你任起义军总指挥。
- 反对张国焘阻挠起义的意见，果断领导八一起义取得胜利，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 他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中，出了六位共和国元帅，还有叶剑英也参与其事。
- 起义以后怎么行动？他执行中央的决定：南下广东。
- 起义军南下失败后，虽身患重病，仍坚定地说：“我不能离开部队！”

1927年5月15日后，周恩来从上海码头，秘密乘坐英商轮船，到达武汉。同行的有聂荣臻。

这时武汉的政局，十分不稳。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就联合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的军阀，出兵进攻武汉国民政府控制的湖南、湖北，并且勾结两湖的反动军人为内应，企图搞垮武汉国民政府，消灭革命力量。蒋介石任命四川的刘湘为第五路军总指挥、杨森为第五路军前敌总指挥，令他们出兵进攻鄂西。5月5日，杨森的军队由川东出发，占领归州，并向宜昌进驻守宜昌的是国民政府所属军队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早已接受蒋介石的指令，佯装战败，5月7日有意将宜昌让给杨森军队。9日，杨森军队进入宜昌。夏斗寅则率领军队沿长江顺流而下，13日在嘉鱼登陆，随即发出反共通电，声称进军武汉。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此时正在河南同北洋军阀军作战，远水不及救近火。17日，夏斗寅军逼近纸坊，武汉震动。武汉卫戍司令是叶挺，在这危急关头，他在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支持下，率所部与夏斗寅部激战，20日将夏军击退，夏军向南溃去。

紧接着，长沙发生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驻守长沙的许克祥团突然袭击总工会、农民协会等团体，与武装的工人纠察队激战了一夜，终于在第二天解除了工人武装，然后解散湖南省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一事变也是蒋介石策动的，幕后主持者则是第35军军长何键。长沙的工农革命团体和工人武装虽然被摧毁了，但是长沙附近各县和湖南全省的革命武装，还有很大实力，革命和反革命处在剧烈斗争之中。周恩来正是在这个时候到了武汉。

在此之前，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虽然没有到会，仍被选为中央委员。接着，在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他列席了。会议决定周恩来担任中央军人部（也称军事部）部长，军人部长必要时参加中央常委会议。四天后，5月29日，由于张国焘要去河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又决定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

从此，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历经几十年，一直到1976年去世。

周恩来主持中央军人部后，调聂荣臻、王一飞、颜昌颐、欧阳钦等为助手，一方面对军队进行组织、联络和政治工作，一方面对湖南、广东的农民运动和武汉的武装工人纠察队进行指导。周恩来在上海指挥工人武装起义的时候，同时也很关心农民起义。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孙诗圃说：周恩来那时对农民运动也考虑到了，同罗亦农、赵世炎他们也谈到，不光是搞工运，还要搞农民运动。我怎么会记得呢？因为当时上海总工会一个工作同志叫万一，他到宜兴去搞暴动，他是宜兴人，江阴还有别人去。这些人到宜兴，到江阴，到无锡去搞暴动，就是周恩来、赵世炎他们决定的。

当时，广东普宁、揭阳、潮阳等县的农军，在4月23日举行武装暴动，进攻普宁县城，中共潮安县委书记方临川等也率武装队伍赶来参加战斗。5月中，暴动失败，派方临川到武汉向中央军事部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就指示暴动队伍可到湘南同汝城的农军合编为一个师，就地暴动。

在武汉，周恩来既关心农民运动，又注意避免蛮干。例如5月下旬，湖南来人汇报说，农军准备从三面攻取长沙。周恩来听后，指出应通知农军“暂集中湘南”待命，“不作硬来”。这不是说他不主张农村起义，而是认为起义应有计划有准备。6月17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湖南军事布置，指出：湖南18个县都可以考虑起义，分散的枪有几千支，有战斗力的队伍在浏阳、平江等地，可以集中于浏阳、平江，计划取湘潭。应将全省划分为数区，各区有集中的预备，集中力量攻下反动力量弱的城池；对反动军队采取强则扰之、弱则缴其械的办法；在长沙设省委，省委下边设军委；各区设农军委员会，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的临时委员会。常委会同意了周恩来的这些意见，决定周恩来去部署。20日，周恩来在常委会上进行汇报，计划将湖南全省划为十个区，将农军集中于区，各区设立农军委员会，军事上则派十个人去，每区都有人进行军事准备，避开清乡的军队，而后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举行各县武装暴动。他准备拟定一个工作计划即日送常委会。但是，这个计划遭到共产国际的代表反对，没有能够实行。

6月8日汪精卫偕同徐谦、顾孟余、唐生智等到郑州，与次日也到郑州的冯玉祥会商后，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的部将刘郁芬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与冯接近的于右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16日又成立开封政治分会，以冯玉祥为主席，管辖豫、陕、甘三省。武汉国民政府将河南让给冯军，命令北伐军唐生智、张发奎各部退回武汉，任命唐生智力第4集团军总司令兼第1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为第2方面军总指挥，黄琪翔为第4军军长，朱晖日为第11军军长，贺龙为暂编第20军军长；原第1集团军1、2、3、5各方面军仍归军委会直辖。这时，已在酝酿“分共”，但尚未开始，在这些部队特别是第2方面军中仍有许多革命人士或倾向革命者，有的还统率着军队。此后，第2方面军全部集结在江西九江附近，其中包括贺龙的20军、叶挺的11军24师，也包括属于第4军建制的原叶挺独立团改编的25师。

7月5日，陈独秀正式在中央常委会上宣布：军事工作应该收缩。由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眼看汪清卫也将背叛革命，形势危急。7月12日，中共中央会议上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成立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临时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持工作。7月15日，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武汉的国民党中央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随后，大规模地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共中央

领导一方面转移和隐蔽，一方面考虑如何应变。周恩来批驳了西退四川的主张，明确以湘鄂赣为中心。他同瞿秋白等商议，提出动用叶挺、贺龙部队进行武装暴动。7月18日，中央召开会议决定举行南昌暴动。

南昌起义的建议是怎样提出来的？

军事部的领导人是周恩来。周恩来讲过这个过程。他说，南昌起义的提出是这样的：“那时，军委想可否搞个起义，主要是鲍罗廷和加伦说可以搞个起义，国际决定上没有。”这就是说，军事部提出要进行起义，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军事顾问加伦是同意的，但不是共产国际的决定。

聂荣臻说：“举行南昌起义，是7月中旬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的。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那天晚上，恩来同志在会后到了军委，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进行了传达，他传达的大意是，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起义。今天，中央会议上做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恩来同志还说，会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定他为书记。他传达完后，就指定贺昌、颜昌颐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但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

这说明还不是最后的决定。之后，聂荣臻等三人出发去九江，李立三、谭平山等也赴九江，正在武汉的朱德也返回南昌。

准备参加起义的大批部队和干部涌向九江、南昌，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汪精卫同张发奎等经过秘密策划，决定以张发奎的名义邀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届时予以扣留。同时令贺、叶的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准备用三个军的兵力包围贺、叶部队。

这个阴谋，被当时任第4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知道了。叶剑英是在革命危急时期的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由中共中央批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他在军中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得知这个消息后，他连夜找到叶挺，将汪精卫等的密谋悄悄告诉了他。他们商定立即通知贺龙、廖乾吾和高语罕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以划船游赏为掩护，商量对策。

“他们要我们上山搞什么名堂？”贺龙一听急了，抢先发问。

“他们名义上要你们上山避暑，商议军情，实际上要把你们扣起来，罢掉兵权！”叶剑英冷静地回答，并将他所了解的内情和盘端

叶挺听后问贺龙军长上不上庐山，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我坚决不去！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们不上庐山，不去德安，只去南昌。”

叶挺接着说：“好，我们不能上他们的当。”

廖乾吾、高语罕支持贺、叶的意见。

经过短时间的磋商，作出了三项决定：一，贺、叶不上庐山；二，不能接受张发奎调贺、叶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贺、叶部队要立即开往中行车站，乘火车到南昌去；三，叶挺的部队先行，贺龙的部队随后行动。

箭已在弦上。而中央派到九江的同志，也开会讨论，认为应当进行南昌暴动。7月25日，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在武汉正式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由周恩来前去领导。

1980年3月26日《光明日报》：《关于南昌起义决定的问题》。

《聂荣臻回忆录》，上卷，第60页。

叶剑英传记组：《叶剑英传》。

周恩来由陈赓陪同，乘船秘密东下。浩淼长江，烟波万里，波涛翻滚。面对这大江流水，周恩来看着远方，思绪起伏。他将要前去用武装的革命来反击武装的反革命，挽救革命的危局。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起义的意义将远远超过起义的本身，中国人民自己的革命武装将从此诞生，后来发展成为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位元帅，有六位参与领导或参加了这次起义。另一位，叶剑英元帅，也出了力。

周恩来7月27日秘密到达南昌，先是住在花园角二号朱德的寓所，后来住在系马桩女子职业学校。他按照临时中央常委会的决定，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这里就成了前敌委员会的秘密指挥中心，为了避免敌人注意，门前挂着“炮兵连”的旗帜。周恩来一到南昌，就全力准备起义的工作。他听了关于南昌以及江西敌情的详细汇报。接着，召开了前委会议，作出了起义方针和部署的决定。后来周恩来说过：“朱德同志在南昌起义时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

7月28日，周恩来到了贺龙的军部，在子固路，原为中华圣公会所在地。贺龙已经从周逸群那里知道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派来领导武装起义的，很高兴、同周恩来紧紧握手。

坐下后，周恩来问贺龙：“现在，革命已到了紧急关头，贺军长有什么打算？”

贺龙回答说：“我完全听从党的指挥，党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周恩来亲切地对贺龙说：贺龙同志，党了解你，相信你。周逸群同志早已向我汇报过，你早已多次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你近来的表现，证明你是跟党走的，并且有决心成为共产党员，有决心听从党的指挥。因此，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党的前敌委员会已经决定，你和叶挺同志的部队就在南昌起义。同时，决定由你担任起义军的总指挥，由叶挺同志担任起义军的前敌总指挥。

贺龙考虑了一下，对周恩来说：这么重大的责任，党要我来担任，这是党对我的信任。但我是否能承担得起，我实在没有把握。因此，我要求党重新考虑，派别人担任总指挥，我一定服从命令，党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

周恩来恳切地说：前敌委员会已经考虑好了，认为总指挥一职，目前只有你担任最恰当。你不能推辞，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前委一定会帮助你，你可随时找我商量。就这样决定了！

贺龙感到不好再推辞，决定接受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坚定地表示：我向党保证，我和20军全体官兵，从今以后就是党的战斗队伍，坚决听从党的指挥，完成党所交给的一切任务。

贺龙还说：“无论南昌暴动成功还是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就上山！”

接着，前委派刘伯承来帮助贺龙搞起义的作战计划和部署。此后刘伯承就搬到了军部来住。

这样，在南昌，起义军方面的兵力有：贺龙的第20军7个团，叶挺的第11军第24师3个团，周士第率领的第4军第25师2个团起义前还在马回岭，聂荣臻被派去将部队拉到南昌。还有蔡廷锴的第11军第10师。共计两万多人。敌方在城内的兵力有：朱培德的第5方面军指挥部警备团，王均第3军

的73、74团和金汉鼎的第9军一个团等，共3000多人。兵力上，起义军占绝对优势。

起义的各项工作正在紧急地进行的时候，29日上午，忽然接到中央代表张国焘发来的接连两份密电，说是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后再作决定。周恩来同前委成员商议后，果断地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继续进行一切准备工作。

30日早晨，张国焘到了南昌。他在前委紧急会议上提出：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也不可动。周恩来和前委其他成员一致反对这个意见。周恩来明确表示：“还是干。”张国焘说：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由于张国焘的身份是中央代表，又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周恩来坚持抗争。他说：国际代表和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次行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要即刻回汉口向中央报告。会上互相争执，没有按张国焘的意见办，成了僵局。31日，周恩来继续主持前委紧急会议讨论，经过几小时的辩论，在得知张发奎参加庐山反共会议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会议最终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

起义进入了最后的准备阶段。31日，周恩来向团以上干部下达起义命令和任务，部队的政治动员也已经做过。这时，发生了第20军第1团一个副营长到敌人指挥部告密的情况。一个士兵发现了这情况，立即向贺龙报告。前敌委员会决定将起义提前两小时进行。领导军事的，有一个军事参谋团。周恩来后来说过：“军事参谋团是我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聂荣臻、贺锦斋、蔡廷锴、张国焘等几个人组成，当时没有人任主任，后来我就指定刘伯承同志来做参谋长，他起初还谦虚不肯答应。”

8月1日凌晨，起义开始，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激战到拂晓，敌人有的被歼灭，有的缴枪投降。第24师72团顺利解决了敌23、24团，第24师71团解决了敌第6军57团，第20军教导团、6团解决了敌第9军79、80团。第20军其他部队解决敌第5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时，伤亡较大，贺龙亲临指挥加以解决。起义完全胜利了，共缴枪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大炮数门。

聂荣臻到马回岭后，8月1日下午知道南昌起义了，很高兴，也开始行动。他同周士第把25师的73团、75团拉了出来，8月2日拂晓赶到南昌。聂荣臻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25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这两个团是这师的基本力量，到南昌后略加补充，编成了一个完整的建制师，隶属11军。南征途中，它是起义军的主力之一。

南昌起义成功后，中共前敌委员会对起义部队进行整编，决定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名义，下辖9、11、20个军。朱德任第9军副军长（因军长未到职，朱德不久即任军长），贺龙任20军军长兼代第2方面军总指挥，叶挺代前敌总指挥兼代第11军军长。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革命军队，有两万多人。

这时的南昌，处于敌人重兵的包围之中。张发奎所部缪培南、李汉魂、许志锐3个师约1万人交黄琪翔统率，由武汉开到九江；唐生智部何键、刘兴等2.4万人，先头部队已到九江；程潜部约1.2万人由两湖向南昌；朱培德、王钧部约1.4万人在江西吉安、万安一带；金汉鼎、杨如轩部3000人驻

江西临川一带。这是属于武汉政府方面的。属南京政府方面的有：李济深部第8路中路总指挥黄绍竑部约9000人在江西大庾、广东南雄一带，第8路右路总指挥钱大钧部约7000人在江西赣州一带，还有一些小部队在江西瑞金、宁都和福建长汀、上杭一带。这么众多的部队，环视威胁着起义军。

敌军数倍于起义军，起义军守南昌是守不住的。起义以后怎么行动？

南昌起义的军事计划，是在武汉时由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制定，由中共中央决定：起义成功后，起义军即南下，取得海口，以求取得国际援助，然后占领广东，举行第二次北伐。当时说是苏联要运来一船军火，到汕头一带海口即可取得，所以计划部队南下广东取得海港，以得到苏联军火接济。

1961年9月，即南昌起义30余年后，周恩来在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曾经感慨地说：我们走了，人民群众是不高兴的。在八一起义后，要不单依靠国际找海口取得外援，而在江西就地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就好了。实际上，当时的江西、湖南、湖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很多铁路、矿山的工人也已经组织起来，他们是很希望革命的武装力量去支援他们的。

周恩来的组织性很强，他按照中央决定的计划执行，南下广东。南下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沿着赣江向南走，经过樟树、吉安、赣州等比较富庶的地区，取道韶关，南下广州。这条路是大路，好走，但也是敌人重兵把守的地区。朱培德的第3军在吉安，钱大钧部在赣州，广东李济深可以利用粤汉铁路，集中兵力在粤北阻截起义军，而张发奎所部还有万余人也可能沿着这条路尾追起义军，结果可能前有敌军，后有追兵，成为腹背受敌。另一条路由江西东部经寻邬至广东东江地区，这条路上虽然也有敌军，但比较弱；东江是广东农民运动比较发达的地区，周恩来东征到过，对这里熟悉，可以得到当地群众支持，而且汕头是个重要海口，共产国际的接济也可在这里取得。周恩来等主张走后一条路线。这个主张得到多数领导的支持。

8月3日，起义军开始分批撤离南昌，向临川（抚州）进发。周恩来是5日随革命委员会撤离的。出发前，他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报告了南昌起义的情况。他还找当地党的负责人谈话，了解南下沿途各县的农民运动、地主武装、封建族姓、风俗习惯等情况。他撤离南昌后，前委和中央的联系就中断了。

起义军4日抵达进贤时，在左翼行进的蔡廷锴所率的第11军第10师，突然脱离队伍，经余江折往浙江，这就拉走了将近全军四分之一的兵力。不过当张发奎发电报给蔡廷锴，要他枪决10师中的范孟声、徐石林等四名共产党员时，蔡却派人送走这四人，还给了路费。

接着，又发生一连串的困难。当时任贺龙的警卫连长的黄霖况：

“宁汉合流后，蒋介石、汪精卫、朱培德等对起义军大肆造谣诬蔑，胡说什么‘共产共妻’呀，‘杀人放火’呀，甚至强迫老百姓离乡。因此，从南昌到临川的路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裹胁大批百姓逃的逃、躲的躲，从临川到广昌北面约20多里的甘竹墟，沿途几乎看不见什么人。像宜黄城内约有两万人口，我军到达时，留下来的只有48个60岁左右的男女老人。因此，军队的给养就十分困难。这情况到了甘竹往南，才有了变化。进到离甘竹十来里时，侦察员来报告说，甘竹已准备欢迎我们的队伍。再往前，就看到欢迎的人群手摇红绿纸旗，等队伍一到，就大放鞭炮，鞠躬迎接。

当时正是8月酷暑季节，天气炎热，行军疲劳，加上给养困难，医药缺乏，疾病日益增多，部队不断减员。

对于上述情况，周恩来、贺龙等都异常着急。他们先后采取过各种措施，最主要的就是加强对各级军官和战士的政治思想教育。在临川、广昌时，先后召开过连长以上的军官会议，进行思想教育，并给部队以休整。在离临川南下时，给每个官兵发了两个银元作零用。为了维护和密切军民关系，指挥部曾经三令五申，严禁鸣枪抓夫。经过临川、宜黄、广昌、瑞金等县时，都由革命委员会委任林伯渠任县长，县长贴出安民告示。”

当时的周恩来，已经是一个坚定的军事领导人和能干的指挥员。参加这次起义军的孔原曾经回忆说：“周恩来同志是起义的重要领导人，是中流砥柱。党的前敌委员会能坚持起义的正确主张，是和周恩来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有一件事给他印象很深。那是队伍撤离南昌后，经由汕头向普宁的行军途中，在一个小河的渡口上，李立三同志被一群不听指挥的士兵团团围住，无法脱身。尽管在场的一些高级干部极力劝解，仍旧无济无事，大家感到无可奈何。正在纠缠时，周恩来赶到这里，见此情形，非常镇静，只听他大喝一声“立正”，这些闹事的士兵毕竟是军人，听到周恩来的口令，乱糟糟的声音霎时停止了，他们马上立正站好，并向周恩来行了军礼。局势稳住后，周恩来深入浅出地进行了劝导，这些士兵高兴地离去，一场风波平息了。“周恩来同志超凡出众的力量就是这么大，谁能不佩服？他铁骨铮铮，凛然正气，一字出口，分量不同啊！”

参加南昌起义的士兵胡毓秀说：“我们对待周恩来同志的命令是绝对服从的，从不敢懈怠。周恩来同志对部下要求非常严格；而他对自己的要求尤其严格。”“每天，当行军休息下来的时候，因为过度疲劳，我们总是一倒地就呼呼入睡了，往往一觉醒来，睁眼还看见周恩来同志在豆油灯下工作；或是踱着步子，默默沉思。”

部队在临川休整了几天。这时，军饷一天天困难。在周恩来等的坚持下，改变了原来派款、提款、借款的办法，实行征发（如征发地主的粮食）、没收（没收豪绅反动派的财产）和对土豪劣绅罚款的新政策。8月14日，起义军到宜黄。当晚，周恩来指示总政治部起草一个《土地革命宣传大纲》，油印分发。

在宜黄的另一件大事，是陈毅赶到了部队。陈毅是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党委书记，听说南昌起义，他赶到南昌。但这时起义军已经南下，于是他连夜赶路，终于在宜黄赶上了。周恩来分配他到号称“铁团”的主力部队73团去当指导员，笑着对他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会嫌小。”陈毅爽朗地说：“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陈毅到团下到连队后，觉得战士的情绪很高、很有信心，纪律也很好，对共产党信任，夸称他们是共产党的党军。

起义军18日到广昌，20日离开，向瑞金进发。这时，起义军后边是朱培德部队紧跟着，桂系军阀已在前方集中很大力量，钱大钧所率的18师、新编第1师和另外两个团到瑞金、会昌一线来堵，前哨在壬田。起义军与敌50、60这两个团作战，将其击溃，进占瑞金。

从缴获的敌人大量文件中，得知钱大钧、黄绍竑两部准备在会昌集结18个团。周恩来担心部队继续南下时，这两部敌军从背后袭击。为了免除后顾之忧，决定乘黄的部队还没有赶到、敌军兵力还未集中的时候，先击破会昌的钱大钧部，再行南下。于是就有会昌之战，这是南征中一次激烈的大战，有决战意义。前委决定：前敌总指挥叶挺率第24师、25师为攻打会昌的主

攻部队；朱德和周逸群率 20 军第 3 师第 6 团和教导团第 3 总队、第 2 师第 5 团为佯攻部队；贺龙指挥其余部队为策应。8 月 30 日 6 时，发起攻击，朱德指挥第 6 团进攻，敌集中力量反扑，朱德亲自拿起步枪射击，稳住了阵脚。叶挺所率部队由于走错了路，弯到路口才转向会昌，7 时半才赶到。周恩来对他们说：“部队是很疲劳，可是会昌一定要打下来。你们有没有把握呀！”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都保证一定打下会昌。战斗到下午 5 时，打下会昌。蒋介石嫡系钱大钧部伤亡、被俘、逃散 6000 人，只余 3000 人退走。起义军得胜，伤亡 1000 多人。

贺龙曾多次向周逸群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要求，周逸群把这事向周恩来报告过。会昌之战胜利后，周恩来在瑞金把这事提到前委会上讨论，会上批准贺龙的要求。周逸群、谭平山同贺龙谈了话，作为介绍人。随即在瑞金小学内举行贺龙入党仪式，周恩来代表前委讲了话，鼓励贺龙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奋勇前进。周恩来说：“贺龙同志是个好同志。”

8 月 31 日，前委决定改变原来取道寻邬入东江的计划，改由长汀（汀州）上杭入东江。这是因为：第一，沿原路南下，敌方已在途中驻有重兵，而福建却是敌军兵力空虚之地，行军阻力较小。第二，走长汀、上杭，顺鄞水下韩江，可用船只运送大批伤员和战利品；如走寻邬，都是山路，运输困难。第三，长汀、上杭富饶，可以解决部队给养问题。第四，由寻邬南下的行军计划，已被叛逃的军官向敌人报告，并在报上披露，必须改变。1959 年，有同志向周恩来问到当年为什么改道入粤时，周恩来说：在打下会昌后，叶挺同志在会昌，我在瑞金，叶挺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好几百伤兵无法运走，不改道，我的伤兵怎么办。周恩来正要同他商量时，电话就断了。周恩来经过考虑后，同意了改道入粤。

9 月 5 日，周恩来随起义军进入福建长汀，在这里休整两天，筹办给养。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写了第二个报告。报告中说到：“总瑞金、会昌两役，我军伤亡官兵，约近千数，子弹消耗亦多。本来沿途行军，因山路崎岖，给养困难，落伍逃亡重病之士兵，为数极多，经此两战，我虽胜敌，但兵员与子弹之缺乏，实成为入潮梅后必生之最大困难。”还说：“我方目的在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如情势许可，自以早取广州为佳，否则，在潮汕须一月余之整顿，子弹兵员之补充乃是最急。”“子弹及机关枪缺乏，请电知国际能于外埠装好货物，一俟汕头攻下，在十日内即能运到汕头为好。”“望电知粤省委号召东江潮汕工农响应一切，以巩固工农政权及其武装。”这个报告，周恩来派人化装成商人赴上海送交中央，大约半个月后送到。

在长汀休整时，周恩来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对攻取东江的计划进行详细讨论。周恩来和叶挺主张起义军主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另外，用小部分兵力，至多两个团，直趋潮州、汕头，估计当时潮汕空虚，敌人十分恐慌，这小部兵力一到就可以不战而胜；如果起义军主力先取潮汕，再取兴宁五华攻惠州，就会迁延时日，过于迟缓，给了敌人以集中兵力攻击我军的机会。但是苏联顾问和其他同志都主张起义军主力先取潮汕，只留一部分兵力在三河坝监视梅县敌军钱大钧部，占得潮汕后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他们思想上是担心潮汕的敌军死守，我不能攻占，就难以得到外来的接济。而当时一般军官，经过长期行军，都希望到一个地

方休息，因而都赞成后一种意见。会议决定采取后一种方案。这个决定，对于后来起义军的失败是有直接影响的。

9月10日，周恩来和彭湃率领一团起义军沿汀江，进占上杭。在这里，听取了中共福建党组织负责人罗明等的情况汇报。周恩来说：当前是要打到潮汕，和海陆丰农民斗争汇合起来，建立革命政权和根据地；要求地方党组织协助起义部队做好后勤工作。周恩来还指示部队给罗明留下五六十条枪，要他们在闽西组织武装斗争。在上杭期间，周恩来出席了第9军军部召开的政工会议，在会上提出了整编起义军的设想，准备到汕头后，起义军抛开“国民革命军”的称号，改为“中华革命军”。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应有自己独自的称号。

9月19日，起义军占领广东省大埔县的三河坝。于是按照长汀会议的决定，分兵把守。由朱德率领第11军第25师（约2500人）和第9军一部留守三河坝，主力进军潮汕。9月23日，起义军在与驻守潮汕的国民党军王俊部短时交战后，敌军就退走，起义军进占潮州。24日进占汕头时，敌军早已退去。

在起义军由南昌南下时，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会议选出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周恩来没有参加会，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接着，在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军事部部长。10日，决定成立南方局，任命周恩来为南方局成员和南方局军事委员会主任。当起义军到达汕头后，9月26日，张太雷奉中央之命到达汕头，召开南方局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对前委的指示，要起义军取消原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改为苏维埃，将军队开往海陆丰，与当地农民武装会合，改组为工农革命军。并要张国焘、李立三、谭平山等离开部队，起义军一切事宜由周恩来负责处理。周恩来表示目前军情紧急，面临着汤坑之战，一切变更待击破敌军后实施。起义军留下第20军的第3师据守潮汕，其余出发赴前方。

起义军经过三河坝、潮汕两次分兵，出发前方的只有24师和20军的第1、2两师，总兵力不足6000人。三河坝、潮州、汕头一线，南北相距300多里，兵力分散。而敌军这时已集中兵力于揭阳县属的汤坑（今丰顺）一带，总兵力有一万四五千，居高临下，以逸待劳。起义军据探认为，汤坑敌军只有一千多人，对于当地地形起义军也不了解，这些都是致败的原因。28日，起义军开始在揭阳北部山湖地区向敌军攻击前进，士气旺盛，作战勇敢，一交战就打败了敌王俊的警备旅。第二天，又夺取了薛岳部新编第2师的一片山地，但陈济棠的第2师赶到，抢守山地，难分胜负。起义军经连续苦战，自身伤亡达二千多人，无力再战，30日晨撤出战斗。敌军也因伤亡过大，未敢追击。

正当起义军在揭阳与敌军苦战时，敌黄绍竑部却绕道到了起义军后背，30日向潮州发起袭击。起义军在潮州只一千多人，敌军却有九千之众，兵力悬殊，潮汕又是平原地带，无险可守。黄昏时，潮州失守，10月1日凌晨起义军放弃汕头。

周恩来这时得了疟疾，他同前委机关撤离汕头后，2日到达普宁县境的

流沙。3日，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也来到流沙。起义军领导人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等，就在流沙召开会议作最后的决策。周恩来病情很重，脸色发青，但仍在会上作报告，讲了失败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一下后，说到善后办法是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后向海陆丰撤退，今后作长期的革命斗争；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经物色好当地农会会友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赴香港或上海。会开到午后两时左右，村外山头上发现敌人才结束。周恩来这时发烧到40度，由抬架抬着。别人劝他离开部队，周恩来坚决地回答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

聂荣臻在回忆到这段历史情况时说：

“敌人袭讨，在流沙附近打响以后，部队很乱。24师撤下来的部队，与革委会的人混在一起，各单位插得稀烂，一个成建制部队也找不到，想调机关枪也没有办法，有了枪管找不到枪架，真是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叶挺始终跟着恩来同志。最后只剩下我们几个人，路不熟，又不懂当地话，几个人总共只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能力都没有。多亏彭湃同志在这里有工作基础，农民对我们很好，没有发生意外。

我们设法找到杨石魂同志，他是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我们过去就相识。我对他说，你对当地情况熟，可不能离开我们，我们几个连本地话都听不懂，你得想办法把我们护送到香港，沿途的关系你也熟悉。杨石魂同志很好，满口答应下来，此后便同我们一起行动。

我们转移到离流沙不远的一个小村子，晚上，杨石魂同志找来一副担架，把恩来同志抬上，然后转到陆丰的甲子港。在这里，他又找到一条小船，送我们出海。

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在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到香港后，杨石魂同志同省委取得了联系，把恩来同志安置下来治病，以后他就走了。”

南昌起义军的余部，后来共有两支，一支部队是24师有1200多人，由董朗、颜昌颐率领于10月7日到达陆丰。他们同当地农军会合在一起，改编为红2师。这支队伍推动了东江地区的土地革命，到今年11月，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建立了起来，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也初步巩固。另一支是朱德、陈毅率领的25师和9军一部与进攻三河坝的敌钱大钧部三个师激战三昼夜，6日撤出，保有兵力约两千人，本想南下接应潮汕方面起义军，抵达饶平时遇到从潮汕撤下来的起义军约二百人，才知潮汕已失，山湖战败，于是决定保存这支部队，穿插出敌军包围圈，沿闽粤赣边境隐蔽前进。1928年初在湘南发动轰轰烈烈的起义，随后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在井冈山会师，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

南昌起义军从政治主张方面说，在瑞金决定建立工农政权，在上抗议定土地归农民，在流沙决定革命委员会去掉国民党头衔，打出工农革命军和苏

维埃的红旗，无疑都是正确的。虽然时间太短，未能充分表现，但意义深远。9月上旬，周恩来在长汀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了“我方目的在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这一目的虽然后来因潮汕得而即失，未及实现，但实际上已有了建立根据地并将革命武装与根据地相结合的思想，也就是“工农武装割据”的设想。但此时，还没有形成中国革命应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周恩来说：“1929、1930年，应该产生这种观点。”后来，毛泽东最先认识到了。

第六章 在中共“六大”前后

- 对中央当时的“左”倾盲动主义，比较早地有所察觉和抵制。
- 到香港召开会议，纠正李立三对广州起义所作的错误结论和惩办做法。
- “龙归大海”，支持贺龙去湘鄂西，“做成割据局面”。
- 斯大林接见瞿秋白、周恩来等，指出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 在中共“六大”所作军事报告，是一个成功的报告，是红军军事工作的一座里程碑。
- 是红军初创时期的得力指导者，我党通信、情报和锄奸反特工作的创立人。
- 审定陈毅代中央起草的“九月来信”，妥善处理红4军前委的争论，支持毛泽东任前委书记。

周恩来在香港养病，时间大概有一个月左右，地点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的一间旧房子中。周恩来不能公开身份，对外改姓李，人称“李先生”，杨石魂同他住在一起，算是李先生的弟弟。广东省委派秘书处做接待工作的范桂霞来护理他，另外还有个60岁的老妈子管饮食。范桂霞是个共青团员，父亲是医生，她本人1926年在何香凝主办的护士训练班学过救护工作。

周恩来养病大约半个月后，身体比较好了，就外出到香港坚道开了一连串的会，大约有十多次。这都是由范桂霞陪同去的。她估计可能是研究有关广州起义的问题，在会场上她见到有彭湃、瞿秋白、林伯渠、阮啸仙、李立三等。11月上旬，周恩来动身去上海，是杨石魂、范桂霞送到九龙深水埗上船的。大概在12月初，周恩来又回到香港两三天，开紧急会议，然后又回上海了。据范桂霞估计，可能仍是研究广州起义的事。可惜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有当年的记录留传下来。

南昌起义军南下期间，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已经在考虑迁移地方的问题。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讨论了这个问题。21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决定派人去上海布置房子。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了离开武汉的问题，安排苏兆征当天就去上海；瞿秋白在明后天去上海，同江苏省委（当时设在上海）书记邓中夏谈一下工作，然后去广东；李维汉在10月2日代表中央参加长江局的会议，然后在8日或9日，也到上海。这时已经是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之后，中央领导人已有变化，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第一次会议上，选出常委三人，就是上述的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

为什么中央机关搬迁选择到上海？

这是因为上海地方较大，而且华洋杂处，人口众多，环境复杂，四周是广大的华界，中间则是帝国主义占领的租界，租界又有公共租界、法租界，因而在这个地方活动，敌人的空子很多，有许多矛盾可以利用，便于革命力量的存在。另一方面，上海产业发达，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产业工人就有近百万，而且有革命传统，工人运动发展转快，革命力量比较雄厚。当然，另一方面，敌人力量也十分强大，租界上捕房林立，华界也是军警密布，而且他们有时还联合行动，反动势力对革命者造成的威胁也很大。但是权衡利弊，还是选择了这个地方。

除了在上海设中共中央机关外，还建立了北方局，以蔡和森、王荷波、

彭述之、张昆弟、刘伯庄为委员，王荷波为书记，北方局负责管理顺直（顺天、直隶）、山西、内蒙、山东等地党的工作；建立了南方局，由周恩来、张太雷、彭湃、恽代英等组成，张国焘为书记，南方局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南洋一带党的工作，南方局下设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还建立了长江局，由罗亦农、陈乔年、王一飞、毛泽东、易礼容等组成，罗亦农为书记，长江局负责领导长江中游几个省党的工作。

已经迁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在 11 月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当前形势和任务，因而在 10 月 23 日写信给南方局并广东省委说：“请你们通知恩来务于 7 日以前赶到上海以便出席。”11 月 9 日、10 日两天，周恩来出席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由瞿秋白主持，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指导下进行的。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是罗米纳兹起草的。

决议对当前形势的估计是：“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决议说：“中国革命虽然简直还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决议说：现在党的总策略是：“（一）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有组织的性质；（二）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形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三）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决议说：“现在虽还没有到总暴动的时机，而党的任务却正在于努力鼓动各地城乡革命的高潮，创造总暴动的局面。”

1927 年 11 月这个时候，国民党蒋介石和汪精卫都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共产党员从将近六万人减少到了一万多人，革命是处在低潮的形势下。但是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却错误地认为这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革命形势在继续高涨，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去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的总策略。

11 月 14 日，中央作出了《政治纪律决议案》，认为南昌起义军不坚决提出“耕者有其田”，不发动农民，南下时不走赣西直入广东而避免敌军攻击改走赣东，在瑞金、会昌胜利后不径直南下取梅县而绕道上杭、汀州取潮汕，最终遭到失败是“指导上的错误”，对“前委全体同志应予以警告”。对于湘赣边秋收起义，《决议案》认为不发动农民群众起来，“在暴动区域以内完全没有提出土地革命和政权的具体政纲”，“在工农军所经区域以内没有执行屠杀土豪劣绅的策略”，“这些指导上的错误与怀疑的结果，湖南农民暴动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认为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些论断和处分，是不对的，是中央在“左”倾思想指导下的错误处理。李维汉当时是中央的主持人之一，回顾这段历史，他说：

恩来说南昌起义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这个论断是对的，但主要责任在中央，不在前委。因为第一，当时党内的指导思想还是城市中心论，武装起义就要占领城市。南昌起义就是脱离张发奎去占领广州，毛泽东等八七后回湖南的计划就是要打长沙。第二，还是正规战思想占优势，不是游击战思想占优势。山地游击战争的思想在全国都是逼出来的。这两种

思想都是共产国际经过它的代表传达来的，中国同志由于幼稚没经验，无条件接受了。至于南昌起义军要南征去占领潮汕，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更是共产国际的具体指示。

十一月会议决议案指责八一起义军前委犯单纯军事行动的错误，毛泽东、彭公达等犯军事投机的错误，都是由于他们不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这种指责不是实事求是的。第一，当时政治形势是革命处于低潮，到处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第二，暴动就是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发动群众，发动分田事前要有准备，而起又是边打边走，只能做些口头的或文字的宣传。至于发动农民分田，要在粉碎了敌人进攻，站住了脚才行，八一部队没有取得这个条件。

11月会议的“左”倾盲动主义，贯彻到实际工作中，给各地的党组织造成了许多损失，引起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批评和抵制。周恩来是比较早地发现问题并在中央提出来的。

11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周恩来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留在中央工作。在实际工作中，他对11月会议的“左”倾在各地造成的盲动主义，逐渐有所觉察。12月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议题之一，是讨论浙江省委决定的《浙江目前工农武装暴动计划大纲》。周恩来在会上说：浙江省委关于暴动的布置，恐怕太乐观了，结果恐怕是群众没有发动，遭致暴动失败。会上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中央给浙江省委的指示信。周恩来在信中对浙江省委指出，你们浙江的农民暴动，还没有发动群众，使得土地革命深入，“便先计算到扑攻省城，这不仅客观事实不能做到，即在主观上勉强去做也必是专靠几杆枪的军事投机行动”，“你们上次的暴动计划因为太不切实故中央未予核准”。他强调浙江今后的工作应该是努力使党和工会和农民间的组织迅速恢复和建立起来，发展广大的乡村游击战争和城市工人的日常斗争，广泛地争取群众，然后才能发展到暴动的局面。

12月6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会讨论时指出，青年团近来只是想暴动，认为试一下即使失败也不要紧，这是军事投机，孤注一掷，同当时存在的“一暴成功”是两个极端，都是不对的。任弼时接着也说：“刚才恩来说的是对的，随便暴动是很危险的。”会上还讨论了江苏问题，江苏省委提出明年元旦前后全省暴动，江南江北一齐动。周恩来表示不妥，说这个看法不好，日期不应该这样来定，要看准备的程度来定。同志们对于农村的情况是不是说得太乐观了，乡下的同志是不是有非暴动就没有出路的观点呢？7日，中共中央致信江苏省委说：“冒昧地定了一个全省或无锡等地暴动的日子，于发展农暴有碍”，“定期暴动的条件是应该在统治阶级趋向崩溃、群众斗争加紧时的必要根据上”。现在江苏各县的最主要工作，是“发展游击战争，有些地方如无锡、常州、宜兴这一区域便可以游击战争发展到割据的暴动局面”。

12月16日，中央常委会议讨论到江西问题时，周恩来指出：江西的农民运动还处于群众发动的初步的斗争，应该加紧宣传使农民明了土地革命的意义。他们的军事计划也太早了一点，要注意到“无动不暴”的危险。

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共青团湖北省委控告罗亦农和长江局取消湖北省立即暴动。周恩来发言说，从整个形势看，共青团确实有“无动不暴”

的意见，他们对暴动的看法没有成熟。会议经过讨论认为，罗亦农和长江局的措施是对的，因为革命主观力量薄弱，武汉还不能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

这年底，周恩来连续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尹宽和福建临时省委的指示信，信中说：“凡是斗争就认为暴动的观念要纠正过来。”“暴动这一名词必须用在群众斗争发展到最高点以武装形式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意义上。至若城市工人带有武装性的斗争，或是乡村农民非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都不得谓之暴动。”这封信后来在1928年1月8日发出。信中讲了很重要的意见，说：“你们现时所决定的暴动条件，既缺少主观力量的估计，又没有农民群众激烈斗争的事实，这样子便贸然说‘闽省的暴动条件已十分成熟了’，实在是一个错误”。“斗争还没起来，暴动便先决定，不是误解暴动，便是玩弄暴动。即使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农民由激烈斗争已发展到最高形式，而党的主观力量还一点没有或有而不能发生领导作用，党在此时还应先加强党的工作，发生领导作用，然后才能谈到暴动”。

总的说来，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形成的盲动主义，在党内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同志的批评和抵制下，到1928年初就在许多地方停止执行了。

这年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周文雍、恽代英、杨殷、叶剑英、聂荣臻等，趁广东、广西军阀混战、广东军阀部队离开了广州这一时机，领导国民革命军第4军教导团、警卫团和广州工人赤卫队等举行广州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起义后由于优势兵力的敌人猖狂进攻，起义军遭到失败。张太雷英勇牺牲，剩下的部分武装和人员转移到海陆丰等地区农村，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消息传到上海后，中共中央立即开会研究，周恩来提出自己到广东去，因为他对广东情况比较熟悉，由他去处理善后。李维汉说：恩来在中央，离不开。瞿秋白和李维汉都主张李立三去。李立三说：恩来去是比较合适，如果恩来不能去，自己愿意去。于是中央决定派李立三到广东处理。

1928年1月初，李立三到了香港。他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指导广东省委召开全体会议，检讨广州起义失败的问题。会上，他批评广东省委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等，并且处分了许多起义领导人。消息传到中央，1月16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周恩来认为，广东省委这次会议对广州暴动的认识太粗浅，影响很坏，对同志的严厉处罚是不对的。会议决定周恩来为中央起草一封给广东省委的指示信。周恩来在指示信中说：中央不同意省委这次会议的根本精神和主要结论，这次会议的根本错误在于把注意中心放在查办当事负责同志和单位上，太侧重主观上的责备而忘记客观上的困难。

后来，3月中旬，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到香港，主持召开了广东省委扩大会议，纠正李立三对广州起义所作的错误结论和惩办做法。周恩来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充分肯定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和起义领导人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英勇的革命精神，总结了经验教训，说明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力量对比上敌强我弱，又没有能争取到广大农民的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没有能及时撤退到农村中去。周恩来对有错误的同志，也进行了批评，但是宣布撤消原来对起义领导人的处分决定。在香港的时候，周恩来还指示广东省委组织营救在香港被捕的省委书记邓中夏。不久，邓中夏得到释放。

在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向上海迁移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寄希望于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如果广州起义能配合南昌起义军攻占广州，中共中央机关就迁到广州。后来，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广州起义也没有成功，中共中央就留在了上海。这时候的中共中央机关，比较简单，中央不设部，只是在常委会领导下设一个组织局。组织局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调查、交通、文书、出版、分配、会计等科，还有妇委，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机构。组织局的领导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组成，罗亦农为主任。不久，罗亦农代表中共中央去武汉指导工作，组织局主任就由周恩来代理。1928年1月10日，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周恩来为组织局主任。

如前所述，周恩来反对暴动中的冒险主义，但是，并不是他不重视武装工作、军事工作。

这时候的组织局，已经开办了军事训练班，而且进行对国民党军的兵运工作，组织士兵暴动。当然，也反对兵运中的“左”倾盲动。例如192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陕西省委的指示信，着重谈士兵暴动，这封信是周恩来起草的。

信中说，士兵暴动要有成熟的条件。所谓成熟的条件，就是要：（一）驻地附近要有群众运动，要有工农的坚强组织。（二）要有党的指导。（三）要能造成一个暴动的割据局面。（四）要比较有胜利的把握。指示信说：如果条件不成熟，那就宁肯推迟。

周恩来主张和支持武装斗争，从他支持贺龙去湘鄂西开辟根据地，可以看得很清楚。

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后，1927年11月初，贺龙到了上海。

贺龙住下不久，就见到了周恩来。他看见周恩来身体虽很消瘦却比以前健康，感到十分欣慰。他对周恩来说：“部队打散了，我贺龙一个人来见你，真是不甘心哪！”周恩来安慰他说：“贺龙同志，现在国民党悬赏10万大洋捉你，你的头很值钱哟。”贺龙说：“我这颗头早交给党喽！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跟着党走！”

周恩来告诉贺龙说，中共中央已经对他的工作作了考虑，让他到苏联去学习军事，同去的还有林伯渠和刘伯承。贺龙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

11月16日，一个共产党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敌人知道贺龙到了上海，下令严密搜查。贺龙只得停止一切活动，严密隐蔽起来。第二天，刘伯承、林伯渠登船走了，贺龙未能成行，在中共中央机关等了十几天，仍然走不成。在这段时间里，贺龙反复考虑自己以后如何行动有利，他想，既然去不了苏联，就去搞红军吧。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周逸群，请周逸群向周恩来报告。贺龙后来回忆，南昌起义失败后，自己有一股不服气思想，不相信就打不赢蒋介石，所以就想回湘鄂西建立武装，以为总会搞起来的。过了几天，周恩来再次会见贺龙。贺龙又向他谈了自己要去湘鄂西搞武装斗争的想法，并说：“从武汉到湘西沿长江一带的车湾、藕池、新堤、调关的驻军，有些是我过去的部属。长江两岸土匪多得很，大多数是被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是可以收编改造的。湘西是我的家乡，我从民国8年开始就在那里拖队伍，和北洋军阀打了10年仗，我人熟地熟，干起暴动来更方便，有成功的把握。”周恩来问：“一路上的安全，你有几分把握？”贺龙说：“问题不大，上了船我自己当心点，到了汉口，我就能活动了。沿长江走水路回去，我有把握，你

难道忘了，我叫贺龙，龙归大海嘛！”两人哈哈大笑。

关于贺龙的去止改变，瞿秋白反映给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不赞成，担心贺龙去后会离开党。1928年1月6日，中央常委会讨论到这个问题时，瞿秋白说：贺龙问题，国际代表是很不信任的样子。周恩来不以为然，说：湖南、湖北要恢复党的组织，贺龙去湖南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他最近对党的态度也很好，只要我们有力地指导，贺龙是可以去湘鄂西的。第二天，常委会继续讨论两湖问题，周恩来仍旧主张贺龙去湘鄂西，发动群众，“做成割据局面”。会议终于决定“贺龙去湘西”。

临行之前，周恩来请贺龙、周逸群吃饭。他告诉贺龙：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徐特立、柳克明为委员，负责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还告诉贺龙、周逸群，到了汉口便与湖北省委书记郭亮联系，接头地点是谢弄北里17号。1月中旬，贺龙等离开上海去武汉。

1928年2月底，贺龙在周逸群陪同下到达湖南桑植。贺龙出面召集了亲族和旧部武装约三千人，组成工农革命军，攻占桑植县城，成立了中共桑植县委。4月初，优势敌军向桑植进攻，新成立的工农革命军被击溃散，周逸群转到洪湖地区，贺龙收集失散部队三百多人，在桑植、鹤峰两县边界打游击，又逐步发展起来，后来创建起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除了贺龙外，另外两个人的部队也在周恩来的关注之中，这就是朱德的队伍、毛泽东的队伍。

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后，余部一支由董朗率领，进入了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结合，另一支由朱德率领，驻在三河坝，即第25师约两千人。当时潮汕已失守，麇集于这一带的敌军有四万左右。朱德同周士第、陈毅等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研究后，决定尽快离开，甩脱敌人重兵。于是这支部队转战湘粤赣三省的边界地区，12月间进入广东北部，驻在韶关西北30里的犁铺头。他们原来是去支援广州起义的，但到这里时，广州起义已经大败了，于是就在犁铺头休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常委会开会时，有人提出将朱德的军队集中到赣西南。周恩来不赞成，认为25师不一定到赣西南，现在湖南也需要派人去，应当看实际情况而定。21日，中共中央派组织局的军事科科长李鸣珂送信给朱德。信中说：“据我们所知道的在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他们如果驻在这些地方，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一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这月28日，中央常委会讨论了湖南问题，谈到毛泽东的部队，周恩来主张派人去视察。1928年3月9日，周恩来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湘鄂赣边界的割据区域要连贯起来。朱德军队要坚决留湘南，向茶陵发展为好。毛泽东的部队还是在遂川，但是不必死板地决定驻在某地，要根据需要而定。

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吃亏在没有自己的军队，这是周恩来感触很深的。正如后来他对埃德加·斯诺所说：我们没有从国民党军官中发展必要的革命骨干，以致许多本来能够争取到我们这边的许多优秀军官脱离了我们。如果我们当时努力去争取这批军官的话，1926年征集和装备十个师的共产党

参见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

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

部队还是可能的。

周恩来十分重视军队，他一直抓紧军事工作。这时虽然组织局里边设有军事科，而且组织局主任就是他自己，但他认为这个机构不能适应客观的需要。在1928年1月中旬的一次中央常委会上，周恩来提出来要组织军事委员会，因为军事科只是作技术性工作的，不能向下指导。会上有的常委不同意，认为有正式军队才要设军委，现在没有必要。瞿秋白支持周恩来的意见，同意设立军事委员会，直属中央领导。最后，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罗亦农与国际代表商议，起草一个详细的工作大纲。后来，这项工作由于中共六大不久即将召开，军委推迟到六大以后才成立。

当时，周恩来对于如何从国民党军中发展我们力量的作法，也有了比较系统而成熟的考虑。1927年12月，国民党政府的安徽省负责人柏文蔚，要求我们的同志去帮他办“学兵团”。这样的事情在过去国共合作时期是不足为怪的，但南京国民党政府和武汉国民党政府都已公开反共，安徽柏文蔚此举使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感到意外，他们在11日写信上报中央。周恩来看后，20日复信安徽临委，问柏文蔚知道不知道我们这几个同志是共产党员，或是只知道他们是有能力的左派，如果对他们没有危险，可以帮他办“学兵团”，但是必须按以下条件：（一）学兵团团长必须是我们同志。（二）学兵团一开办即须发枪。（三）学兵团的用人权要在团长手中。（四）学兵团的成分要多介绍些识字的工农和贫苦知识分子参加。（五）训练计划由团长全权规定。另外，学兵团要取得当地的33军的谅解，并且要在学兵团中秘密地建立党团组织，支部要建在连上，党团员间彼此互不知道，营设特派员，团设委员会，团委会不得超过三人，直接受省委指挥，团委会、营特派员、连支部的彼此关联均须绝对秘密。而且这项工作应与附近县区的农民运动密切关系。周恩来还告知他们，对高桂滋、杨虎城部队，也可派些同志进去作下级军官。

不过，当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整个形势如何认识，并在这种认识下制定党的总的路线、方针、政策。这需要由党的六大来解决。

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中共中央早就在考虑的事，因为国共合作破裂了，大革命失败了，对于中国革命今后是什么性质、现在是革命低潮还是高潮等等这些问题，党内有争论，需要讨论决定，从而制定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就讨论了召开六大问题，准备在1928年3月开。在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形势下，要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谈何容易。1928年1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讨论了这个问题，感到在国内很难开这样的会议，不如放到国外去开。瞿秋白说：是不是放在澳门？苏兆征说：香港可能比澳门好些。最后也没有定下来。不过确定了到会代表人数以50人为限，由组织局进行名额分配。

这年2月，中共中央得知共产国际3月在莫斯科要召开赤色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有些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如苏兆征、邓中夏等，将要率中国的代表团出席。这样，为便于有关人员的到会，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出来中共六大最好能在苏联召开，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说，共产国际对这次大会看得很重要，认为应该开，不过时间在4月开不可能，

要再推后些。4月26日，主持共产国际工作的布哈林给中共中央来电，说是可以派人来。于是，中共中央决定瞿秋白、周恩来等赴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任弼时留守国内和李维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正式代表84人，各地方的都有。后来参加六大的代表加工作人员、旁听的，共有142人。

5月初，周恩来和邓颖超带了一个小手提箱，动身赴苏。他们登上一艘由上海开往大连的日本轮船。周恩来留着长须，穿着长袍，打扮成一名古董商人。邓颖超穿着一件半旧旗袍，是家庭主妇的模样。

组织上为了照顾他们的安全，给他们订的是头等舱，但是他们的穿着打扮，与坐头等舱的阔入身份很不相称。再加上船的那天，正值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山东济南屠杀中国民众的“五三惨案”之后，周恩来他们很关心，把上海的各种报纸都买了一份，准备在船上看看。船过青岛，短暂停留，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市区吃了午饭，又买了青岛的各种报纸带回船舱。这样，可能引起了船上的日本密探的注意。

这是周恩来的一次遇险，邓颖超回忆说：

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我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我们进行盘问。首先问恩来同志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我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他是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我们说，在船上没有事可以看看。他们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他们当即让恩来同志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恩来同志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问到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姓周，叫曼青。问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他们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恩来同志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恩来同志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不像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盘问，恩来同志泰然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在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盘问不出什么来，抓不住把柄，他们只好让周恩来回旅馆，周恩来和邓颖超当天下午离开大连，坐火车往长春，然后转往吉林县（今吉林市）看望他的伯父。在火车上仍被跟踪。到长春后，在旅馆换了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去吉林在伯父家停留两天，到哈尔滨。在火车站上等到李立三，通过李立三把关系联系上，然后乘火车到满洲里，进入苏联境内，赴莫斯科。

中共六大是6月18日召开，到7月11日结束的。这次会议主要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国民党统治中国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变了没有，从而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再一个是当前中国革命形势如何，究竟是革命高潮还是革命低潮。开会以前，斯大林在莫斯科市内的一个大楼里接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都参加了。斯大林说，中国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中国的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既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他以俄国的二月革命为例作了

说明。关于第二个问题，斯大林说，国民党蒋介石等叛变后的中国，现在是革命形势的低潮，不是高潮。当时李立三是主张高潮论的，他对斯大林说，现在还是革命的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对他解释说：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嘛！革命高潮是将来的事，而不是眼前的事。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是创建红军。如果能够把参加农民运动的人们争取过来，并且集中部队打下几个城市，那么，这将对今后的局势有更大的意义。并且强调说：在任何时期，农民都是不能领导工人和革命的，革命必须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

斯大林的这次谈话，为中共六大定了基调。六大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而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六大正确地指出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当时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这次大会，虽然也有其缺点和错误，但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周恩来是中共六大的主席团成员、大会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他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军事的报告。军事报告总结了党从事军事活动以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为了联合战线而仅仅帮助国民党巩固国民革命军，“根本取消了我们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作的意义”，“始终没有尽力发展工人纠察队，没有将农村中的农军发展起来，来做夺取乡村政权的力量”。第二种是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抹杀一切军事工作，反对一切军事准备、军事技术的训练，都目之为军事投机”。报告强调指出：“目前任务在夺取成千成万工农群众，在军事方面，开始军事组织、军事技术工作”，秘密组织工农武装，加强敌军工作，特别是士兵工作。报告专门论述了建立红军的问题。总之，“在现在中国军事新局面下，武装暴动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在准备武装斗争(中)，军事力量是主要原素”。这些意见，对于后来中国红军的创建、发展和根据地的建立，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周恩来在六大的军事报告，第四部分讲的是六大以后军事工作的主要任务，其中讲了九段：军队工作、兵士运动、在帝国主义军队中工作、工人武装组织和训练、农民武装运动、建立红军问题、党员军事化问题、党的军事部组织问题、兄弟党的帮助。现将第六段全文引在下面：

建立红军问题

(一)红军的来源有：游击队扩大的，军阀军队倒戈来的。由游击队扩大过来的占多数，一定要有地方苏维埃政权建立方能有红军组织，否则是游击队形式。红军建立，必须在地方苏维埃指挥之下。

(二)工农夺取政权后建立红军。红军的成分应是工人做主要成分，尤其是指挥官，须工人占多数。

(三)建立红军原则：把雇佣性改变，开始采征兵制，经过宣传，再采自愿兵，从作战中渐渐改变而成。红军长期采征兵制，非自愿兵，但退伍有定期。军官须无产阶级化。军官不一定要工农分子，但一定要无产阶级化。红军一定有政治工作，党负责政治工作，政治部是党在军队中最高机关。红军绝对取消党代表，党代表是从国民党产生的，在苏联只有政治委员，由苏维埃政府派，但多半是党员。

(四)红军移动问题。建立红军的目的是非保守在一地而是要移动的，这

与赤卫队常在一地不同。红军是要帮助苏维埃政权发展，要有移动条件。红军成分须注意，雇农、佃农不愿去，因红军要移动，流氓无产阶级成分免不了要有，主要的要有无产阶级做领导。

（五）红军分配问题。对这个问题布哈林同志曾提出过，虽然现在实现几省割据，红军应分散在各地，但仍有关联，在发展农民暴动时，可以分几队，使能发展。

（六）红军组织。不能死板规定一定要有全国编制。现在还没有全国总暴动形势，各地作战需要不同，红军组织须以适合当地需要为原则。

（七）工农与红军关系。海丰农民看红军如神圣，或天外东西，与敌人作战时有农民参加，反而红军死伤数少。但有的地方，因言语不同，红军打死无人料理。因此，教导团反感，得出这相反的意见，这表示红军与农民没有打成一片。在城市工人与兵士没有打成一片，失了红军的阶级基础。

（八）红军一定要在苏维埃政府指挥下，绝不能单独受党直接指挥。海陆丰红军光在东委指挥下，实际在东委书记一人指挥，脱离群众政权的指挥，这应改正的。中共六大，是一次总结经验教训的会议。对于军事工作，理所当然地要由周恩来来思考和总结。他到了莫斯科后，一方面参加筹备六大的召开，一方面也有时间来考虑三年多来领导军事工作的实践。他参加过部分六大代表组织的关于南昌起义的讨论会，请苏联军事专家座谈过关于军事工作的经验和具体作法，使自己领导军事工作的思想政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他的军事报告是一个成功的报告，尽管在有些方面还不成熟，还须进一步探索和发展，但是在当时来说是比较正确的。后来，六大通过了一个《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基本上是按照周恩来的军事报告内容写的。六大决议还指出：“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而且要使他深入，使他团聚起来，引导农民到有组织的斗争，到自觉的创立苏维埃政权和实现土地革命的斗争。”“建立工农革命军，在现时游击战争发动的区域，是可能而必要的”，“游击战争将成主要斗争的方式，党必须积极领导”。当然，这时由于国际的影响，在中国党来说，还没有脱离城市中心论的束缚，而且过分强调工人成分，但对军事工作的认识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这对于后来在中国各地纷纷建立革命根据地，是有很积极的影响的。

7月10日，中共六大选出中央委员23人，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19日，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常委分工，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不过后来周恩来没有就任秘书长之职，实际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六大后，中央设立了军事部，部长是杨殷，常委中由周恩来分管。1929年8月杨殷等在上海被捕随即遭杀害，周恩来就兼军事部长。

军事部的位置，自然高于原来的组织局军事科，但是这仍然是一个执行机构而不是一个决策机构，而对于军事，需要有一个更重要的机构来领导。1929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设立军事委员会，直属政治局领导，军事部撤销，它的工作与组织有关方面由组织部负责。后来，因为当时主管军事工作的周恩来正在北方解决顺直省委的问题，政治局决定军事部与组织部合并事宜待周恩来回上海后再讨论。周恩来不久回到上海后，中央又忙于解决江苏省委等一连串问题，这件事也就拖了下来。这样，中央就既有军委会，又有军事部，好在都属周恩来分管，也就并存了下来，直到1930年。这年2月，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中国党是处在夺取政权的情况，

有红军、苏维埃区域存在，军委一定要健全，军事部与军委台而为一，直属政治局。此后，军事部就撤消。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的1月30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军委由周恩来、陈郁、聂荣臻、陈赓等七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聂荣臻为参谋长。

六大后的军事部，按当时的组织法应该下设参谋、组织、兵士、特务、交通五个科，但后来兵士、特务、交通等科并没有成立，只有前边两个科，因人员不多，工作很忙，日常工作要处理文件，安排接头，同各省来人谈话，还要进行统计调查，收集军事书籍，编辑军事小册子等。从军事部成立到1929年6月大约9个月所做工作就有：拟定通告经中央发出的，有各级军事机关组织大纲、工作计划大纲、士兵运动草案、党员军事化问题等。1929年3月，国民党内部爆发蒋桂战争，军事部为军阀战争中我们的工作给各省发出公函。各地方的军事决议案、通告、军事报告，都要送军事部审查，一切军事问题都要报军事部，并予以讨论答复。这几个月，经军事部接待的有由广东东江到上海的百余人，有从各地武装斗争中撤到上海的百余人，并对其中能工作的同志仍派到各地作军事工作。对大革命失败后散失的国民党军队中的党组织和同志，渐渐地找到了一些线索，恢复了一些关系。编辑的军事小册子有游击战争、武装暴动、市街战术、城市军事组织、农村军事组织、五五制编制大纲草案、广州暴动的军事经验，等等。

周恩来在1928年11月上旬回到上海后，首先要向各地传达六大的精神。11月13日，他起草的致南方部队的指示信发出，信中说：“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武装暴动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是行动的口号而是宣传的口号”，“我们今后的工作，无论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或军事工作，都应根据这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总的路线去做”，“要很艰苦地深入群众发展党的政治影响，树立党的群众基础，领导群众斗争，扩大群众组织，才能更有利于革命高潮的来到”。这是要各地军事干部完全抛弃年初的“左”倾盲动的影响，扎扎实实深入群众中去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党员重视军事工作。1929年2月6日的中央常委会上，通过了周恩来修改提出的关于党员军事化的通告。通告针对大多数党员不懂军事的状况，强调军事工作对整个革命工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以实现党员军事化的口号，做整个军事工作的核心，整个军事工作能否做得有力，完全要视党员军事化的程度以为断”。要求各地党组织在夺取工农群众的中心工作的同时，开始实行有系统的军事政治组织和军事技术的工作。通告还提出了实行军事化的具体办法。

当时的军事工作，实际是两大部分，一大部分是对根据地军事斗争的开展，另一大部分是对国民党区域军队中工作的开展。这里以中共中央给贺龙和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和中共中央关于军阀战争中的士兵运动给各省委的指示信，来看一下基本的精神。这两个文件都是1929年3月发出的。

192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致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言中说：“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种直接革命的形势，故工、农、兵士、贫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在目前还是一个宣传的口号。”强调在农村中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农村苏维埃的重要性，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主要的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广大，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主要的还是群众的力量，不应只看见武装的力量）而企图立刻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关于游击战争的发展区域问题，原则

上“应该是向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更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的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以及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最宜。”

据 1929 年前后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黄玠然回忆，当时中央凡属组织、军事问题的文件，由周恩来起草。他回忆说：

在中央政治局里，周恩来同志是最关心苏区工作的。指示我，对苏区来的文件，要我亲自批，首先办，抄好后立即送交中央（当时苏区来的文件都是药水写的）。对苏区来的文件，他总是第一个看，大多也是由他提出在中央讨论的。因为当时有的领导同志并不重视苏区和红军的工作，只有周恩来同志重视这方面的问题。他对于苏区提出的要求，总是千方百计地在人员和物资上给提供帮助。

在人员上，首先是把大量的军事干部送往苏区，因为当时苏区最需要的是军事干部。当时中央规定，凡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和黄埔、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以及其他军事干部，都交由军委分配工作。据我所知，这部分干部，除白区需要外，大部输送给苏区。第二是派政治委员，这也是苏区需要的。当时凡是在白区工作站不住脚的，都送往苏区。第三是输送工人。当时在白区的失业工人，和由于参加工人斗争站不住脚或被开除的工人，在本人同意下，也送往苏区。

在物资上，对苏区提供了很多援助。当时，党在白区开了很多商店。诸如米店、杂货店、木器店、酒店、药店、文具店等。这些店有多种用处。一是领导人被捕时，可说是某店老板作掩护。二是用来打铺保（因为当时找社会职业和租赁住房都要有铺保）。三是为了在物资上接济苏区，特别是苏区缺少的电讯器材、药品、布匹和文具纸张等。在 1930 年前后，我们还在各个苏区周围开了各种商店，既为便利就近输送物资，同时有的作为输送干部的交通站。如汕头、九江这些地方，都开了不少店铺，以支援苏区。当时经汕头运进苏区的物资很多。这些店铺，不一定是自己经营掌管，多是利用社会关系开办，而为我所用。这些工作，大都是周恩来同志呕心沥血地筹划的。

除了以上所述外，周恩来还十分重视沟通与苏区以及军事指挥上的无线电通讯。1928 年 11 月，他布置张沈川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之后，由张沈川培训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参加学习的有李强、黄尚英、王子纲、伍云甫、曾三等。1929 年冬天，在上海建立起了第一个秘密电台。接着，派李强、黄尚英到香港设立分台。1930 年 1 月，两台开始通报，沟通了中共中央与南方局的电讯联系。周恩来还指示聂荣臻安排参加过无线电训练班的伍云甫、曾三等前往中央苏区，与王诤、刘寅等会合。后来他们利用反“围剿”中缴获的电台，于 1931 年秋沟通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经香港与中央苏区的无线电通讯联络。周恩来还设法构建由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至中央革命根据地（赣南、闽西）的秘密交通线，并于 1931 年 1 月打通。

经周恩来派往苏区的干部是很多的，著名的如：1929 年 6 月前后，派徐向前到鄂东北根据地加强军事领导，派邓小平、张云逸到广西领导武装起义并创建根据地。9 月，派许光达、孙一中到洪湖苏区工作。12 月，派陈昌等三人到湘西贺龙处工作。1930 年 2 月，统一鄂豫皖边区党的领导，建立鄂豫皖边区特委，由郭述申任特委书记；统一三省边区军事指挥，建立红 1 军，许继填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曹大骏任政委，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9、10 月间，派张爱萍、黄火青等到中央苏区工作。1931 年 8 月，派关向应到湘鄂西苏区。

派出这些重要干部时一般都由周恩来进行谈话。郭述申回忆：

1929年年底，我从河南东南部巡视工作后回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我按照秘密工作条件下指定的地点和接头办法，找到了接待我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同志。这位同志看起来很年轻，身着上海居民穿着的长衫，浓眉黑眼，炯炯发光。一见面，他热情地和我打招呼，立即要我和他在户外去散步。我们边走边谈。我向他汇报了河南、湖北边界地区的工作情况。谈完后他说等向中央汇报后再告诉我。不久，即1930年初，我被召到一个党的秘密机关（建国后才知道是吴德峰同志住的机关）去开会。会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我才知道哪次在户外散步的就是周恩来同志。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宣布了中央关于派郭述中等到鄂豫皖的决定。郭述申说：鄂豫皖苏区党的建设和红军的成立，得到了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最早的亲切的关怀和指导，这使我永志不忘。

当时在上海，还多次举办军事训练班。训练班一般时间不长，人数不多，但很有作用。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训练班办得很秘密，从未被破获过。上海新闻路附近的武定路修德坊六号，是一座四层楼的洋房，这里就办过特别训练班。一、二楼是医院，三、四楼办训练班。这是周恩来研究决定的。有时候，一座三层楼房，第一层是店面，经营买卖，第二层就是训练班，第三层是宿舍。周恩来等来讲课，先到第一层谈谈，似乎是买卖，然后到二层。学员住在三层不出门。训练完后，分配工作。周恩来注意军事干部的提高，除举办军事训练班外，还向根据地送军事书籍。例如，1930年9、10月间，刘伯承、叶剑英、傅钟、李卓然等从苏联学习归来到上海，周恩来就支持聂荣臻和他们翻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译出后送往各苏区。聂荣臻说：“我们认为，翻译一本苏军的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对前线会有所帮助”。

军委、军事部另一大部分工作是对国民党区域军队中开展工作。1929年3月31日，周恩来修改、审定的中央关于军阀战争中的士兵运动给各省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说：加紧我们在士兵（指国民党士兵）群众中的工作，这是目前我们中心工作之一。各级党部，尤其是在战争区域内的地方党部，应极力注意这部分工作。根据当时国民党军队内派系战争的状况，指示信说：各级党部应趁此机会，尽量地在各军队中找旧有线索。应尽可能地在不妨碍我们工农运动的情况下，送些同志尤其是为革命而失业的工农同志，到军队中去当兵或任其他职务。……自发的兵变我们应设法去领导。这种兵变的出路，如系范围比较大的，我们可以领导他们走入农民斗争区域，发动游击战争，……在红军区域或我们领导的农民武装区域的周围，可以去投入红军。在战争区域内，我们应注意领导农民中勇敢的分子去夺取溃兵及散兵的武器武装农民。

关于对国民党统治区军队的工作，周恩来也举办训练班。例如1930年2月，他指示李卓然等在上海秘密组办兵运训练班，训练投诚或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学员结业后，就派回国民党军队进行兵运工作。1931年3月，他指示朱瑞、李富春举办兵运策略训练班，并把参加学习的袁汉澄、王超、李肃等派往国民党军的第26路军工作。这年12月，该部在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军，编为第红5军团。

1929年7月，周恩来派邓小平（化名邓斌）到广西，对广西国民党左派

领袖俞作柏（时任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国民党广西绥靖分署主任李明瑞进行工作，又先后派了四十多人到广西。邓小平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后来领导了著名的左右江起义。

聂荣臻是1930年下半年到中央军委工作的，他也讲到过孙连仲的第26路军，是通过朱瑞在1931年夏天在上海与军委接上头的；还讲到西北军军长吉鸿昌主张抗日，反对内战，党派刘仲华通过邓宝珊与他取得了联系。1932年吉鸿昌加入共产党，1934年不幸被捕牺牲。军委还通过曾希圣，与程潜部下李明灏建立了联系。聂荣臻说：军委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指导和支持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向革命根据地提供情报，也是军委的重要任务之一，因为军委通过各种途径，对于国民党打算向我们什么地方进攻，什么时候用多少兵力，一般都能及时了解，就通报给各革命根据地。除了情报，还为他们输送干部，提供药品和其他物资。前方有些重要的伤病员，也转到上海来，由军委掩护到有关医院医治。

当年在中央军委机关里作秘密交通工作的黄杰说：1930年时，军委机关秘密设在上海成都路，是一幢三层楼房，周恩来、刘伯承经常去，聂荣臻有时也去。周恩来是军委书记，对党的军事工作实行全面领导，十分繁忙，他对于湘鄂西、鄂豫皖苏区以及长江局的一系列指示都对各根据地的建设和红军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30年3月初，周恩来编写过一个《中国红军的数目与区域》。表中标明红军人数、装备、分布等情况。从中共六大后开展军事工作，到1930年3月初，全国各地共有红军62700多人，枪支38900多支。红军编为1至13共13个军，分布在鄂、豫、皖、湘、赣、桂、粤、闽八省127个县，并且以豫、苏、皖、浙、闽、鄂、湘、粤、桂十省内的162个县为游击县。

这时期，是红军初创时期。起义，有的胜利了，有的失败了。起义胜利了，怎样发展壮大、实行武装割据？这有一个探索的过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内部矛盾还没有激化到战争的时候，他们就调集军力来镇压各地的武装起义和工农政权，再加党内领导有时发生“左”倾错误，因而党领导的武装和根据地并不稳定，有的站住了并发展起来了，有的则起来了又被镇压下去了。

例如当时的江苏。南通、海安、如皋、泰州地区，第一次农民武装起义是1928年5月。这年冬，起义武装从游击小组编成小型游击队，这地方也慢慢发展成游击区，中央军委派了张爱萍、黄火青去领导。这支队伍人数最多时有二千多人，成为红军一个军——红14军，有枪六七百支。当地党的组织叫通海特委，下属八个县，负责人李超时，曾任14军军长兼政委，后来接替者是刘瑞龙。与通海地区隔江向南的，是淞浦特委，下属十个县，特委书记吴仲超。长江南岸江阴、宜兴、无锡等地也搞过起义，但是能够延续下来的，只有红14军。红14军的活动受江苏省军委、中央军委领导。1929年底省军委书记是李树勋，后来离开江苏去南方局工作。刘瑞龙、李超时曾经到上海向周恩来汇报过通海地区游击队活动情况。1930年南通起义失败。

又如在浙江，是金贯真领导武装斗争。金贯真在1925年周恩来任东征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时，是政治部的科长，后来去苏联学习。中共六大期间见过周恩来。王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搞宗派，金贯真是反对的。1929年冬回国后，先是参加了周恩来办的特别训练班学习，后被分配到浙江任特委书记。这时，王明以第三国际东方部的名义来电报，说金是托派，不能分配工作。

周恩来说：我们照原则办，谁能工作，谁不能工作，看实际表现。金贯真到浙江后工作得很好，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武装斗争，成立了红 13 军，人称“浙江的金龙”。金贯真后来在领导农民斗争中牺牲了。这支武装在 1930 年秋也受到严重损失。

经过斗争的反复和起伏，红军游击战争得到发展的，主要有井冈山地区，后来又转战到赣南、闽西地区；湘鄂西地区，这是贺龙等前去开创的；鄂东北地区，1928 年 10 月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巩固和扩大割据区域；豫东南地区，1929 年 5 月商南起义逐步建立根据地；皖西地区，1929 年 11 月农民起义，在豫东南的红 32 军支援下，成立红 33 师。上述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地区，遵照中共中央二三月间指示，成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此外，还有湘赣、湘鄂赣边界地区。这是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开辟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是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红 5 军在 1930 年 4 月发展到 5000 多人，军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副军长黄公略。6 月，红 5 军第 5 纵队同鄂东南根据地的部分赤卫队合编为红 8 军，代军长何长工、政委邓乾元。

赣东北地区。1928 年冬，起义的工农革命军改称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1929 年 10 月成立苏维埃政府，方志敏为主席。到 1930 年 2 月，红军发展到 2000 多人。与赣东北相邻的闽北地区，也在 1928 年进行农民起义，到 1930 年 1 月，红军发展到 1000 多人。

广西左右江地区。1929 年在邓小平领导下，12 月在百色宣布起义。起义武装编为红 7 军，军长张云逸，邓小平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部队有 2800 人，建立右江革命根据地。1930 年 2 月，又领导龙州起义，成立红 8 军，共 1000 多人，军长俞作豫，政治委员邓小平。

广东东江及海南岛地区。1929 年 8、9 月间，重新打开了海陆丰斗争的局面，到 1930 年 5 月，东江地区红军合编为红 11 军，古大存任军长并代政治委员。海南岛地区于 1929 年秋组成红军独立团，在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领导下，陆续建立几块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1930 年 8 月，红军扩大为第 1 独立师。

川东地区。1929 年 4 月，万源、宣汉等地农民武装小组和铁矿坝工人武装小组以及梁山、开江的部分工会会员、农会会员起义，组成红军川东游击军第 1 路，有 300 多人枪，建起一块游击根据地。1930 年春在敌军进攻下失败，游击根据地被占。在此期间，中共党组织又发动驻涪陵的国民党第 20 军两个连起义，组成川东游击军第 2 路，赵启明为司令，李鸣珂为前委书记。7 月，中共梁山县组织发动群众起义，组成游击队，后成为川东游击军第 3 路，司令李光华、副司令王维舟。

陕甘边和陕北地区。1930 年起，刘志丹领导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活动，到 1931 年在甘肃合水县南梁地区组成南梁游击队，有 300 多人。同年，中共山西省委的晋西游击队到陕北，发展到 300 多人，称陕北支队。10 月，两支游击队会合，编成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

在这些红军队伍中，力量最强、领导最正确、影响最大的，是红军第 4 军，人称“朱毛红军”。它是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队伍，与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一支余部和湘南起义的农军，会合以后组成的。

1927 年中共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于 9 月初先后到江西的安源和铜鼓，召集湖南、江西边界的一些县的党组织和军队领导人开会，传达八七会议精神

和中共中央、湖南省委关于举行秋收起义的指示。毛泽东当时是中共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起义的目标是会师长沙，夺取长沙这个省城。在湘赣边界地区的革命武装有 5000 多人，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1 师，下属 3 个团。

9 月 11 日，第 1 师按预定计划举行起义。起义后，分三路向长沙进发，但沿途都受挫。9 月 17 日，毛泽东命令各路军都向湖南浏阳县东南的文家市集中。19 日，毛泽东在这里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放弃原来的进攻长沙的计划，部队脱离平江、浏阳这个敌军聚结地区，沿着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向南转移。沿途又遭敌军袭击，29 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时，已不足 1000 人。毛泽东在这里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然后继续南进，10 月下旬到达井冈山的茨坪，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发展革命军队，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

10 月下旬的时候，朱德所率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离开广东三河坝后，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朱德在这里对队伍进行了初步整顿。10 月底，到达大余。朱德、陈毅又对队伍进行了整顿，编为一个纵队，司令朱德、指导员陈毅、参谋长王尔琢，全军七八百人。后来又进行了上堡整顿。当时，驻守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是第 16 军，军长范石生。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学。1926 年建 16 军时，周恩来就派过一批共产党员到范部建立党的组织。南昌起义军南下时，周恩来就曾给朱德等写了介绍信，准备与范军发生联系。朱德部队在上堡时，范石生主动派他部队中的共产党员韦伯萃来联系，希望合作。当时蒋介石正派军追剿南昌起义军余部，朱德等就率部开到湖南汝城，用范军一个团的番号伪装起来。不久，离开范军转入湘南地区，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 1 师，组织了湘南暴动。消息到达上海后，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广东问题时，指出：朱德部队在湘南发动暴动是好的，不宜回广东。湘南暴动遍及二十几个县，约有一百万人参加了起义。南京国民党政府命令纠集七个师，南北夹击，进逼湘南。朱德决定退出湘南，上井冈山与已有联系的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1928 年 4 月下旬两军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4 军。军长朱德、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毛泽东，全军共 6000 多人。6 月，按照中共中央规定，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 4 军。

6 月中旬，江西敌军调集 5 个团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举行“进剿”。下旬，红 4 军在龙源口歼敌一个团，击溃敌两个团，打破了这次“进剿”，革命根据地拥有了三个全县和四个县的部分地区，达到全盛时期。7 月上旬，湖南、江西两省敌军联合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一次“会剿”，8 月下旬又发动第二次“会剿”，造成边界的失败，根据地缩小。9 月到 11 月，经过红 4 军转战井冈山南北地区，根据地又基本恢复。这时，1928 年 7 月下旬由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 5 军，已在 12 月 10 日到达宁冈，与红 4 军会合。

此时，中共六大决议也已由中央派人送到井冈山。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进行学习，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特点、策略等认识更为明确。这时传来了湖南、江西、广东三省国民党军将要对井冈山根据地举行第三次“会剿”的消息。更为严重的是，敌军严密封锁，使井冈山的红军衣服、食物十分困难，红军不能到远地游击，经济没有出路。因此，1929 年 1 月上旬，红 4 军前委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 4 军、5 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各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彭德怀、滕代远率原红 5 军部队和红 4 军

的第32团留守井冈山，朱德、毛泽东率红4军主力出击赣南，外线机动作战，打破敌人的封锁。

1929年1月14日，朱德、毛泽东率红4军主力下井冈山突破封锁线，占领大余城，不料受到敌军猛烈攻击。红军撤离大余，向广东北部南雄方向撤退，到达乌径。敌人追兵逼近，红军紧急撤离，重入赣南。在平头坳，与追兵接触，小有损失。在圳下，军部险遭覆灭。拂晓时敌军来到，朱德的警卫员开枪掩护，中弹牺牲。朱德妻子伍若兰被敌军俘去，后押送赣州，英勇就义。毛泽覃腿部中弹。陈毅被敌人抓住大衣后，把大衣向后一甩，正好罩住敌人，自己快跑脱身。毛泽东后来写道：“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蹙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1929年2月10日，红军到达瑞金、宁都边界大柏地。11日是农历大年初一，敌军冒雨向大柏地前进，进入了红军伏击圈。红军将敌军第15旅的两个团大部歼灭，缴获人、枪各800多。这是红4军下井冈山以来首次大捷。12日，红军不战而得宁都城，休整几天，又主动撤离。19日到达东固地区，这里是红军游击区，红4军在这里休息一星期。由于敌军进逼，25日红军撤离东固，经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宁都等地，进入闽西，3月14日占领长汀，缴获了敌人的军需工厂，筹得大批军饷。陈毅当年有诗：

闽赣路千重，春花笑吐红。

败军气犹壮，一鼓下汀龙。

4月1日，红4军回师赣南。这时，红5军也已离开井冈山到赣南，两军会合，局势好转。

在1928年夏天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期间，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布哈林对于中国的红军运动、在农村建立苏维埃，看法是悲观的。布哈林认为红军在农村中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老百姓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所以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1929年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红4军为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于1月中旬撤出井冈山以后的行动方针。会上，军事部长杨殷汇报了当前敌人对红4军的围攻情况。周恩来说：要消灭红4军是不可能的，朱德、毛泽东能出来一次更好。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作出分散红军，隐蔽大的目标，调朱德、毛泽东出来的决定，要周恩来起草一封指示信。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修改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致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信中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目前党正处在困难的环境，但中国革命高潮仍是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中央依据六大确定的方针，决定有计划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和持久。信中强调说：“中央决不是要你们采取失败主义的精神将红军遣散四方，而是要你们在适宜的环境中（即是非在敌人严重的包围时候）可能的条件下（依照敌人的军力配置和我们武装群众的作战能力与乡土关系），分编我们的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去”。“发动农民的日常工作走入广大的土地革命”。指示信要求朱德、毛泽东来中央，“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面朱毛两同志来到中

《陈毅传》编写组：《陈毅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4页。

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

这封信，经过辗转传送，于4月3日送到红4军前委。这时，红4军的处境已见好转。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红4军前委会议，讨论了中央来信。会后，根据讨论精神以前委名义复信中央。信中说，中央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说：“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潮的条件。”“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

其实，这时候中央的想法也已经改变。4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向忠发起草的中央给朱德、毛泽东的指示信。周恩来在会上说：朱、毛出来的问题，原则上是如此，但根据现在实际情形要写得活一些。会议决定此信由周恩来修改。7日，经周恩来修改的中央致毛泽东、朱德信发出。信中说了红军目前总的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并说：润之、玉阶两同志着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15年后，周恩来曾说起调朱、毛到中央这件事：“后来蒋桂战争起来了，我们觉得红军有可能发展，就作罢了。”

6月，中央收到了红4军前委对中央2月去信的复信。12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会上，周恩来认为4军前委说中央对形势估计悲观“是不十分正确的，因为站在全国来分析不能如此”，同时表示中央去信中让红军分散等问题“是有些毛病”，常委已决定召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各地红军问题，朱德、毛泽东处应派一得力人员来参加。

但这时，红4军内部发生了问题。

这年5月，中央派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刘安恭到红4军工作。刘安恭参加过南昌起义，在苏联学习的又是军事，所以一到红4军后就受到尊重，前委任命他担任军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但是，刘安恭不了解红4军的斗争历史和实际情况，对于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提出来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这就促发了红4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当时红4军的主要领导干部，在总路线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争论，在于党怎样领导军队、军队在农村的武装斗争怎样进行。

当时红4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毛泽东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问题。他认为，红4军的大部队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带来了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红4军是从失败中拖出来的，党的组织薄弱，个人领导权太大；而且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他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红4军中有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意见不合，并且认为军内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

6月8日，红4军在白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了要不要成立正式军委或是应该撤消临时军委。表决结果，41人中以36票对5票通过了取消临

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不再是临时军委书记(他在10月间打东江时牺牲了)。会议决定陈毅任政治部主任,还决定召开中共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

6月22日,中共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陈毅主持大会,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会议所作的结论,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是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后来称民主集中制)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当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会议改选了红4军党的前敌委员会,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红4军领导,以红4军前委特派员的身分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

中共红4军七大的决议案和毛泽东、刘安恭等致中央的信件,都通过中共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8月13日的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说:这是红4军前委内部的分歧,是历史上很久以来意见不同的冲突,因为他们工作很努力,所以没有大的爆发。这次有了点休息时间,同时又因刘安恭去了,发生了问题。刘安恭的信把朱德、毛泽东分成两派,许多是不台事实的,是在故意造成派别。现在对有些问题还不清楚,陈毅快到了,等他来了讨论后再作整个回答,目前可以先去一封信勉励他们,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已经解决的问题不应该再争论,同时要批评他们不应有的消极观念。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信先回答一下。8月21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4军“前委诸同志”的信发出。

这封信先分析了中国目前军阀战争的混乱政局,指出红4军七大的主要精神是在解决党内纠纷,而没有针对目前围攻形势着重于与敌人的艰苦奋斗,“这不能不说是代表大会中的缺点”。

信中肯定了“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这个意见,认为非常正确,同时指出红军扩充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地方武装上,武装农民是扩大红军的前提,应该把这看得同发动群众斗争一样重要,不容许有丝毫动摇。这也是周恩来一贯的重视军队的思想的体现。

信中指出,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不光是游击作战,而且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准便要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在目前游击状况下,没有必要采取前委与军委双重组织制,应当合在一起。目前环境中的红军中的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便于作战,战胜敌人。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党内民主了,在比较集权制之下,不要妨碍党内民主化,又不是极端民主化。信中还强调了红军中政治部工作和宣传队组织,是“红军中政治命脉”,工作不好会动摇根本路线。

这封信告诉红4军前委:“你们应知现在朱毛红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较对于闽西一处大的多,能保全这部分实力而更扩大之,便是对于全国政治影响的保全与扩大。”“你们在目前敌人四面包围中,主要的任务是在向敌人奋斗。党内为正确路线的斗争应从积极方面联系到与敌人斗争的任务上,使全体同志热烈的精神不仅用在党内为正确路线的斗争上,且更本此精神集中力量向着敌人。”

信中说:“凡你们经过之区,必须使红军不仅尽其作战的努力,还须成为广大的宣传队以发动群众彻底地收缴民团散军的枪械以武装农民,使群众能广大地在土地革命任务之下行动起来。”“你们的任务便首先是:游击区域的发展,农民武装的加强,红军的扩大,而土地革命的深入更是根本任务。”

8月下旬，陈毅经厦门乘香港英国轮船到达上海，同中共中央机关接上了头，向李立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中共红4军七大的情况。8月27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汇报了同陈毅谈话的情况。会议决定召开一次临时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29日，在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陈毅详细地汇报了红4军问题的由来和现状。会议决定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讨论红4军的问题，周恩来为召集人。

这时正是召开中共中央军事会议期间，陈毅一方面参加三人委员会讨论，一方面参加军事会议，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得到很大的提高。他在多年后曾几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周恩来要陈毅代中共中央起草一封给红4军的指示信。这就是9月28日的“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在总结红4军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了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信中讲了目前军阀混战的形势、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其前途、红军发展方向及其战略、红军与群众、红军中党的工作、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等，在8月去信的基础上又有了许多发展。信中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

信中也指出了代表会和前委扩大会的缺点：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战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半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去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

指示信也指出了朱德、毛泽东的错误，并说：“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这些错误：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仍应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这封指示信经周恩来审定后，要陈毅带回红4军，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团结一致，作出决议。陈毅表示坚决接受中央指示，回红4军去向有关同志做好解释说服工作。指示信在头上写明：“陈毅同志来，详谈一切。中央于其口头及书面报告后，决定给前委以下列之指示。”末尾写明：“凡此各项，概指其大要，详细解释及具体办法已向陈毅同志面

谈，当由其口达前委及全军同志。”

1929年10月1日，陈毅离开上海，11日到达中共东江特委所在地，然后继续北行，在梅县到蕉岭的路上遇到了正在南开的红4军第1纵队，得知军部在松源。陈毅就到松源与朱德见面。朱德对他说，10月初曾召开中共红4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曾给毛泽东去信请他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回信说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陈毅是个很好的同志，他到中央后思想已大大提高，听了后表示：“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他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他向朱德详尽地介绍了在中共中央的感受和讨论的情况以及中央的决定。当天夜里，前委召开会议，由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并详细作了解释，谈了具体办法。会后，陈毅派专人把中央的指示信送给在蚊洋的毛泽东，并附自己一信，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11月中旬，朱德、陈毅率红4军回闽西。23日，再次攻克汀州。26日，毛泽东也到汀州。毛泽东向朱德、陈毅等前委委员表示诚恳地接受中央的批评，表示愿意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陈毅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上海之行，也诚恳地作了检讨。

11月28日，毛泽东、朱德、陈毅召集并出席前委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团结、民主的会议。会上一致通过三项决议：一、召开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4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这次会议是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同一天，毛泽东写信报告中共中央说：“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4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1930年2月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写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说：“关于4军的重要与其对全国以及对国际的影响，诚如省委所说，如果错入失败之途，确为促进革命高潮动力的损失。”“4军由粤境退入闽西，润之便已病好，见着陈毅后，便复职且来一信致中央，声明4军前委完全接受中央的指示，前委中一切问题已解决。润之来信很积极，发展方向他们亦接受中央指示。”对于这个结果，中央显然是满意的。周恩来在信中说：“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也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当然，对于红4军，中央是很重视的，正如信中所说：“4军是所有红军的主干，中央必将以最大力量注意。”

1929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红4军的问题时，周恩来曾提出：朱毛那里需要来一个得力的人到中央报告；同时中央要派一个有力的人去看一次。后来，中央派涂振农作为特派员到了红4军。毛泽东、朱德分别同涂振农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且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向中央军委写报告说：“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4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这证实了周恩来8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看法。

1930年1月15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创刊。创刊号全文刊登了陈毅写的《关于红4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刊物在编者按中说：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在编制、筹款、

政治军事训练、官兵平等、开支公开与群众关系等方面的经验，都是别开生面的。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学习红 4 军的经验。

第七章 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中

- 斯大林会见周恩来，建议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
- 告别上海，经“秘密交通线”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 支持毛泽东提出攻打漳州战役，两人第一次合作得很好。
- 怎样看待毛泽东？他与临时中央的认识不同，并多次推举毛泽东为红1方面军总政委。
- 与苏区中央局有关作战方针的争执中，和毛泽东认识达到一致。
- 宁都会议上维护毛泽东从事军事工作，被指责为“调和”、斗争“不坚决”。
- 与朱德率部取得第四次反“围剿”重大胜利，创造了红军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1930年8月19日，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

当周恩来在莫斯科的时候，中共中央发生了李立三“左”倾错误，使得党和红军的力量遭受很大损失。8月上旬周恩来和瞿秋白先后动身回国，是要纠正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6月11日决议的错误，也就是纠正“左”倾错误。

由于斯大林要同周恩来见面谈话，所以周恩来在莫斯科等了一段时间。周恩来说：“等了两个月，才与他谈了一点钟的话。”但是这次谈话的内容很重要。会见时，周恩来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国革命特别是红军的发展情况。斯大林则向周恩来建议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斯大林的建议，同他的思想是相合的。

回到上海后的第三天，即8月22日，周恩来就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报告的内容一是传达共产国际的精神，指出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时搞普遍暴动是不妥的，党的主观力量是不够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批评中央在他离开上海去苏联这半年来，对于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注意和领导得不够。他强调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发展红军的重要性。针对李立三等认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是“割据观念”这个错误认识，指出：根据地决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地有力地发展。目前在中国的赣西南、闽粤边等处，最适合作为革命根据地，因为那里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巩固这些地方以便向着工业中心城市发展，可以与反动统治阶级形成两个政权的对抗。

在这以后，周恩来一方面和瞿秋白一起，致力于纠正立三“左”倾错误；另一方面，他想方设法加强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巩固和统一革命根据地的工作。4天后的26日，他在总行委主席团会议上发言说：应当在几个革命根据地区域内统一党的领导，成立苏区中央局，以指导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工作。苏区中央局设在哪个革命根据地？也就是哪个根据地称中央苏区呢？会上决定中央局设在赣南革命根据地。关于红军，这次会上决定设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一切军事工作。不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后，与现在的中央军委是什么关系？周恩来提出：革命军事委员会与中共中央军委可以是两个系统，前者是指挥根据地的军事工作的，后者是指导非革命根据地（即白区）的军事工作的。这个意见也在会上通过。

后来，这些意见越来越成熟和系统。9月9日的总行委主席团会议上，

决定召开全国性的苏区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中央政府，开始可以是临时中央政府。周恩来在这次会上讲了党、政、军的相互关系：中央局指导临时中央政府，临时中央政府指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局也可以指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根据地的各个军区。

随后就是落实苏区中央局组织的问题。周恩来在9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要求中央派自己去苏区工作。由于周恩来在中央的工作任务重要，这个问题在会上没有作出决定，直到20天后即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才最终确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当地两个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但是周恩来一时还离不开中央工作，在他来去之前，由项英暂时代理（后来中央给红1、3军团前委去信说，苏区中央局在项英还没有到达苏区前，可以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代理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1月15日在江西小布正式成立，项英为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等9人为委员。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25日，组成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周恩来为委员。27日，大会选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是实际上却是内部派系林立，各霸一方。拥有重兵的有蒋介石系、冯玉祥系、阎锡山系、桂系四个大系，还有一些小系。1928年，四系联合战胜了不是国民党的奉系张作霖。1929年，发生蒋桂之战。结果，桂系失败，李宗仁跑到香港，白崇禧、黄绍竑也逃到国外。蒋桂战争之后，发生了蒋冯战争，同时发生了张发奎与桂系联合的反蒋战争。冯玉祥战败，张桂联军也在12月底退入广西。1930年，发生了蒋、冯、阎中原大战，作战双方各有大军六七十万，最后蒋介石取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存在和发展，一直是蒋介石的忧心所在，还在中原大战没有结束的时候，在前方的蒋介石就向南京政府发电报，要发表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为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剿匪”总指挥，进行“剿匪”。中原大战结束后，10月中旬，蒋介石任命了各地“剿匪”、“清乡”、“绥靖”的督办、总指挥等，指出“围剿”要以赣南为重点，3至6个月解决战斗。其中，孙连仲是江西“清乡”督办，谭道源是赣西“剿匪”司令，张辉瓒是永丰县“剿共”“清乡”委员会主任。

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认为，这是“目前主要的危险”。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出了“目前工作计划”，说：目前军阀混战有了暂时休息，国民党从前方调回兵力，向湘鄂赣三省增兵，布置“围剿”红军，“的确有相当实现的可能”，“我们只有从内外两方坚决的迅速的进行保卫苏区和红军的计划”。指出红军现时的作战已超过了过去游击战的范围而开始进入大规模的战争状态。我们正确的战术应当是：在以红军作主力的大规模作战中，要调动最广大的武装群众在敌人军队的前后左右发动最广泛的游击战以疲惫敌人，截断一切交通运输以围困敌人，遣派工农群众中红军中尤其是俘虏过来的士兵中的得力分子到敌人军队作最有力的鼓动以动摇敌人的兵心，这样来便利红军的进攻和对敌人施行各个击破的突击。

接着，中共中央在10月29日专门给红1、红3军团前委发了指示，讲对付敌人“围剿”的策略问题。指示中说，“这次敌人‘围剿’红军的计划，是不限于1、3两集团军的所在地域，不过1、3两集团军是敌人进攻的最主要的目标”。指示中说，面对敌人的“围剿”，如果你们不坚持进攻以击破敌军，而采取暂时的退守、分兵与休息，或企图向湘南逃窜，或不进不退与敌人相持，这些都是不对的。所谓进攻的策略，不是要去打长沙、打南昌，而是要集中一切武装力量，统一指挥，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打击”，也就是“集中1、3集团军的力量，击破敌人的一方，以压迫湘赣两方的敌人，使之反攻为守，这样来击破敌人的包围”。

这时的中共中央，主持人实际上是瞿秋白、周恩来，而军事是由周恩来主管的。他对于反击敌军“围剿”的指导方针，简括说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在敌军围攻中，敌强我弱，敌众我寡，但集中兵力击敌一路，则成为我强敌弱，我众敌寡，这样各个击破，就可以打破“围剿”。正如他起草的中央致赣东北特委的指示信中所说：“发动最广大群众的斗争力量，联系着苏区非苏区的群众运动，集中与巩固红军的领导，配合着农民的游击战争，加紧在敌人士兵中的工作，这样，来与国民党军队作持久战，来疲惫与涣散敌人的战斗力，在适当的力量对比上”，“击破敌人的一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

1930年12月10日，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前夕，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军的训令：“1、3军团及第12军均在红军前敌总司令朱德同志及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同志直接统一指挥之下行动，第7军和第10军在与1、3军团取得联系后，亦须立即听受其指挥。”

12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亲自组织对中央苏区的进攻，总兵力11个师又2个旅，共10万多人。毛泽东、朱德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主力，隐蔽待机。12月30日发动龙冈战斗，歼敌第18师师部和两个旅近1万人，缴获各种武器9000多件，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兼师长张辉瓒。1931年1月3日，发起东韶战斗，歼敌第50师1个多旅，缴获各种武器2000余件。毛泽东后来总结经验时说：“1931年1月的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谭道源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就这样被打破了。

毛泽东词曰：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针，立即得到周恩来的赞成，并且推荐给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1931年3月2日，中共中央向红军各地军以上指挥员发去公函，说国民党军队将向苏区和红军进行第二次“围剿”，并说道：在战略上，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击溃敌人的主力。当着敌人大举包围，我们必须利用敌人的弱点，击溃敌人的一方。如能诱敌深入，聚而歼灭，这也是可采用的战略。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成立

以秦邦宪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周恩来将前往中央苏区。

12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打扮得像个工人，上身穿的是藏青色哔叽对胸短衫，下身是哔叽裤子，头戴一顶鸭舌帽，告别了邓颖超和她的母亲，手提一只手提箱和一个网袋，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上了一只英国小火轮。这是一种客货混装的轮船，沿着海岸线航行，从上海到汕头。到汕头后先是住在金陵旅社，后来发现楼下镜框内挂着一张1925年的“汕头市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照片，相片里就有周恩来，于是搬到棉安街一家旅店去住。在汕头，周恩来重新化了装，装扮成一个画相先生，身穿铁灰色长袍，头戴一顶半新半旧的礼帽，脚穿布鞋，手提一只小藤箱，箱子里装的是画相用的水彩颜料、纸墨笔砚，然后向苏区进发。

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时候，决定建立一条由上海通往闽西、赣南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他考虑得很细，对于交通线上设立交通站及其任务，挑选交通员及他们的注意事项，都有明确规定。这条交通线由上海到汕头到潮州到大埔，然后到永定经河田到长汀。他规定在大埔、永定等县设大站，在两个大站之间设若干小站，同时，在汕头、潮州、大埔等地开设旅店或商号，利用合法的身份掩护秘密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开设在汕头的富春旅社，潮州的交通旅社，九龙的金台酒家，香港的荣宝斋，大埔的大同酒家、万丰布庄、裕兴祥京果店，清溪镇上的庆丰客栈，多宝坑的云天客栈等，都是一些秘密接头地点或采购物资的据点。周恩来指出：地下交通站的任务是递送情报和党的文件，护送来往白区和苏区的同志，护送从白区送往苏区的物资。

在周恩来的指导和帮助下，中央苏区成立了“工农通讯社”，实际是地下交通总站，县设有工农通讯社的分支机构，也就是地下交通站。周恩来强调对每个交通员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挑选，政治上要绝对可靠，必须是共产党员，而且要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行动灵活多变，态度沉着冷静，斗争机智勇敢。永定县接近游击区，是很重要的一个站，永定县的工农通讯社开始由蔡义昌作主任，后来调李沛群负责，李沛群调中央采办处工作后，由张发清负责。

这条交通线建成后，已经输送了很多干部和物资到苏区。现在，周恩来也要由这条交通线到苏区了。

周恩来在交通员萧桂昌的护送下，由汕头经潮州，出松柏关，向大埔县方向前进。由这里直到福建长汀的河田，是交通线中最重要的一段，中间经过永定县的游击区。其间，国民党的军队和民团严密封锁，筑有调堡、岗楼，有许多关卡、岗哨。要通过这一地段不能走大路，只能走罕无人迹的山路或山沟，且白天不能行走，只能在夜间摸黑行进。周恩来到了大埔交通站的所在地青溪镇后，当晚交通站站长卢伟良派出六名交通员，武装护送周恩来乘黑夜绕过封锁线，翻山越岭，攀藤附葛，中经多宝坑、铁坑、柏公凹、巫屋坑，走了整整一夜，于第二天到达永定县境内的乌石下村。

乌石下有永定与大埔之间的一个小站，交通员是夫妻俩，男的叫邹日祥，女的叫江萃英，这是两个十分机警能干的交通员。对于这位满脸胡子的画相先生，他们不认得是谁，只知道是一个重要的“客人”。为了招待客人，他们想买鸡和肉请吃一顿饭，但是没有买到，于是把家里惟一的一只鸭子杀了招待“客人”。周恩来由他们夫妻二人护送，向古木督前进。江萃英打扮得走娘家的模样，在前面探路，周恩来和邹日祥跟随在后面，夫妻二人一直把

周恩来送到永定县“工农通讯社分社”的所在地古木督，才返回乌石下。告别时，“客人”紧握住邹日祥的手说：“同志，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夫妻二人说：“这是党支给我们的任务，是我们应该尽的责任。”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有一次去广东，见到了当年大埔交通站的站长卢伟良。周恩来问起邹日祥夫妇是否健在，卢伟良说还健在，还有通信联系。周恩来嘱托他：“请你写信转告他们，周恩来向他们问好。”事后卢伟良给邹日祥、江萃英写信，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夫妻二人才知道几十年前他们护送过的那位胡子“客人”，原来是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由古木督出发，在永定交通站长李沛群和另外两名交通员护送下，到达合洒镇，这里已经是区苏维埃的所在地了。然后又由合洒经上杭县境的白砂、河田，到达长汀。在去长汀的路上，他给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写信，报告了途中与李坚贞等的谈话，了解到闽西的党组织在“社会民主党”问题上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后果，说：“据我在途中所见到闽西党的最近决议及中区党的文件，都还只言反AB团反社党的成功，而未及他的错误。可见此事转变之难与问题之严重性。”

22日，周恩来到达长汀。25日，他又给临时中央政治局写信，说：“汀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假使不是肃反工作做得那样严重错误，则群众的积极性与干部的产生必不致如现在感到困难”。信中还谈到了闽西苏区的发展方向，可“以闽西独立师与红军3军团配合取下上杭、武平，巩固闽西根据地，与中央苏区完全打成一片，以红军12军主力军向闽北发展，与江西红军联成一片行动”。

12月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之职。1932年1月7日，他主持苏区中央局会议，检讨中央苏区肃反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会议通过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中，指出了肃反工作中存在的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提出：“今后肃反工作，要执行彻底转变。”会后，又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使得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基本上得到纠正，这对于巩固苏区和红军，为此后军事上取得胜利有重要的作用。

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之前，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曾经同周恩来谈了一次话，告诉他：到中央苏区后，组织上毛泽东只管政府工作。这就是说不让毛泽东管军事。还告诉他：进攻中心城市已经可能，要他到中央苏区后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行前，为中共临时中央起草了致苏区中央局电，说国民党军正计议大举进攻鄂豫皖苏区，“对赣江上游防守较松，红军主力似宜乘此攻向西进，首取赣州，迫吉安，与赣西南打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不久，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的决议》，要求“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而这时的周恩来，到瑞金后曾经征求了毛泽东对于攻打中心城市这个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队固守坚城和红军攻城的技术条件不具备等情况，说明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致电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回电说：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于是苏区中央局就开会讨论攻打哪一个城市为好？会上，许多人认为抚

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部十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五个师，只有赣州守军较少，而且同周围其他军队联系不密切。毛泽东仍旧不同意打，并且建议听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项英说他曾经问过彭德怀，彭德怀根据赣州敌军的情况说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会议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打赣州。

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军事要地，东、西、北三面临水，城墙坚厚，易守难攻，素有“铁赣州”之称。战役初始，红军主攻部队进攻受挫。国民党军为解赣州之围，很快以第11、第14师约2万人由泰和地区赶赴赣州西北部，此后又有4个团进入城内。红军英勇战斗，数度强攻不下。红军攻打赣州，历时33天，不但没有攻占赣州，反而自身伤亡3000多人，而且丧失了利用当时有利形势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巩固和扩大苏区的时间。最后，红军只好撤围赣州，转移到赣州东南地区进行整训补充。

3月中旬，周恩来从瑞金赶到江口圩，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总结围攻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夹赣江而下，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的城市，以红1军团、红5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3军团、红16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率领中路军北上。

这时，福建是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方，除张贞的第49师外都是地方保安部队。闽西的红12军刚占领了上杭、武平两县，守城的地方部队被击溃后退往广东。毛泽东根据闽西敌情发生的变化，主张中路军转向闽西。他的意见得到红1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的赞同，他们向中革军委报告了毛泽东的主张。3月27日和28日，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同意由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率东路军攻打闽西的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这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会后，毛泽东赶到长汀。他在长汀进一步了解福建的情况之后，30日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建议攻打漳州。他在电文中说：“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1军团及7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电文中还说到红5军团现在离红1军团太远，应随后入闽，至迟要在4月20日到达龙岩待命。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就从瑞金赶到长汀，4月1日开会讨论。会议听取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批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周恩来命令红5军团昼夜兼程，赶赴龙岩，以免驻大埔的广东敌军乘机占据龙岩威胁攻漳州红军的后方。

周恩来在听取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关于漳州的地下党组织、地理环境和国民党兵力分布等情况汇报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介绍闽西苏区的革命形势、物质条件以及各县的武装情况后，指出红军攻占漳州，不是为了占领中心城市，而是为了歼灭敌49师张贞部，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充实红军的给养和武器。这一指示同毛泽东的攻漳意图在战略指导方针上是完全一致的，是不同于当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攻打大城市的方针的。

长汀会议后，周恩来留驻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

要。

4月10日拂晓，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消灭守军张贞部近两个团，当天下午攻占龙岩城。1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报告了龙岩取胜的原因是团结兵力，击敌不备，并说将要在这里休整两天，等主力部队会合后，“即直下漳州”。红5军团14日到达龙岩后，毛泽东就以红5军团的第13军守龙岩，保障从龙岩到漳州的供应线，第3军随红1军团南下攻漳州。漳州地势平坦，没有城墙，守漳州的只有张贞第49师两个旅（6个团）和师直属独立团、独立营、补充营、炮兵营、工兵营、特务营、辎重营等，约一万人，孤立无援。19日晨，红军发起进攻，张贞弃守而逃。20日，战斗胜利结束，红军占领漳州，俘虏敌军副旅长以下官兵16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

红军南下进攻漳州，因漳州离苏区距离很远，因而后勤保障特别重要。周恩来在长汀要求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大力支援红军进攻漳州，指示他们做好各地的政治动员，供应红军所需的粮食和军用物资，调动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作战，保卫后方和军事要道，组织运输队、担架队、卫生队，以及做好其他配合工作。在周恩来和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和号召下，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掀起了热火朝天的扩大红军、支援前线的活动。

各地的地方武装立即行动起来，有的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有的负责保卫后方和军事通道的安全，有的拿起鸟铳、土炮等加紧向外游击。连城、上杭、龙岩等地苏区的工农群众，积极报名参加红军或地方武装。中共长汀县委4月4日紧急通知各区在三天之内调集500人的运输队、随同红军出发到前线。永定县出动了一千多人的赤卫队，担负运输任务。为了抢救伤病员，后方组织了大批的担架队。汀州“福音医院”院长傅连障派出了医务工作经验丰富的医生带了上百名卫生队员到前线，医治伤病员，并把他们及时运回根据地医治和疗养。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闽西人民成立了粮站，筹款购办粮食，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和富农的多余粮食，保障征漳红军的粮食补给。苏区群众每人自愿节省三升米，便宜卖给红军。为了加强对支前工作的领导，东路军在龙岩西陂区设立后勤指挥部，负责前线的后勤保障。闽西党组织派出得力干部，从事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斗争地主恶霸，发动群众作好支前工作。

漳州之战，缴获各种枪2100多支、各种炮6门等，还有无线电台一部、飞机两架，筹集了大批布匹、药品、食盐、煤油、印刷机等物资，募得银洋百万元。这些东西，都急需运回革命根据地。周恩来和罗明等得知攻占漳州后，立即组织人伙赶赴漳州，搬运战利品和筹得的物资。当时的运输条件是十分艰难的，途中五六百里山路，全靠肩挑手抬，运输队员们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把战利品和物资运到中央苏区，充实了红军的装备，缓解了革命根据地人民物资紧缺的困难。当时的革命根据地，由于敌人经济封锁，许多红军战士没有发服装军饷，军民日常生活必需的食盐、药品、布匹奇缺。红军攻占龙岩后，曾经向龙岩商会借款五千元，说明待攻占漳州后归还，可见困难的程度。攻漳战斗胜利后，借款归还，困难缓解，红军在长汀办了一次“金山银山”展览会，还建了一个熔银厂，把在漳州等到的银元重新熔化，制成苏区的货币，稳定了苏区的金融。红军还把在漳州筹到的一批图书运回瑞金，办了一个中央图书馆，丰富了人民和红军的文化生活。

周恩来在罗明等陪同下，还到长汀的河田、濯田、涂坊、宣城、长桥等区乡视察动员情况，宣传组织群众，并在长桥夹乡召开基层干部会议，进行调查研究。在周恩来的带动下，张鼎丞、李明光等省委、省苏维埃的领导人 also 到连城、上杭、永定等县深入基层，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周恩来这一时期在长汀的工作，为红军攻漳提供了物质保障，也为巩固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作出了贡献。曾经参加过红军攻漳战役的杨成武说：“毛主席率领东征部队在前线，周总理把总部移至长汀工作，在后面筹划一切。闽西工农群众支持打漳州，都是总理组织的。”这说明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支持和在龙岩、漳州战役中的历史贡献。

在红军东路军攻漳州时，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赣江以西浴血奋战，牵制了国民党军，支援了东路军作战。福建的厦门、福州中心市委和闽西、闽南的一些游击组织，也都进行了配合。

周恩来在《实话》第五期上发表文章说：红军东向恢复龙岩区，消灭了张贞的部队，乘胜占领了漳州、南靖、长泰、漳浦一带，发展了新苏区和新游击区，剪除了广东军阀进攻闽西苏区的一翼。

漳州战役后，国民党政府于1932年5月撤消了原来驻在江西的“绥靖”公署，改设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陈济棠为副总司令，把所属部队分为9路，第1路是粤军余汉谋部19个团，部署在广东和江西边界的南雄和赣州、南康、大庾、信丰地区。6月上旬，将第19路军（蒋光鼐、蔡廷锴部）3个师从江苏镇江用军舰运到闽南，以漳州为基地，面对闽西苏区。5月下旬，红军总参谋部通报给东路军说，陈济棠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有勾结广西军阀共同入侵赣南苏区的可能。5月29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东路军回师赣南，与粤敌作战。6月初，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1、5军团分别由龙岩地区向西，6月下旬到达赣南天心圩等地。6月5日，中共临时中央向苏区中央局发出军事训令，指出：“1、5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3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赣州如一时不能攻下可先取吉安，同时应一部分兵力牵制临（川）南（丰）线与樟树吉水之敌。”为了统一指挥，周恩来在长汀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的称呼，恢复红1方面军番号。红1方面军仍辖第1、3、5军团。方面军总司令由朱德兼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参谋长叶剑英。关于方面军政治委员由谁来担任，与会的许多人提名应由周恩来担任，周恩来不同意，认为由毛泽东担任合适。在他的坚持下，后来会议同意毛泽东仍“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主持大计”。

关于怎样看待毛泽东，这时候周恩来与中共临时中央的其他人认识是不同的。周恩来到苏区后，在战争的实际上认识到毛泽东指挥军事才能卓越，主张不打赣州和后来主张打漳州都是正确的，而且毛本人也喜欢军事工作，所以主张毛泽东任1方面军政委。项英到上海于4月11日向中央报告苏区中央局赣南会议的情况，说中央苏区是“狭隘经验论障碍新路线的执行”，听汇报的一个中央常委就说，“中央区的领导，我以为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民粹派的观点，是离开布尔什维克的认识的”。“中央区是以为目前的革命是农民或贫民的革命”，“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另一

参看王大同、张利生：《周恩来对红军东征漳州的历史贡献》。

个常委说：“狭隘的经验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这些批评，都是针对毛泽东的。所以这时候能争取到毛泽东仍在前方“主持大计”，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东路军回师赣南，然后向广东南雄开进。这时是6月份，天气炎热，各种疾病困扰，沿途还要打地主豪绅的土围子，十分艰难。敌粤军发现红1、5军团回师赣南，就以一部守赣州、信丰，以第1师等共6个团由南康开向大庾地区，企图乘东西两路红军尚未会合时候，各个击破红军。7月2日，红3军团在大庾东北池江附近击溃敌军4个团，敌军退据大厦。3日，红1军团一部进攻梅岭关，击溃守敌控制了梅岭关这个要隘。这时候，在江西上犹地区的蒋军第14、52师向大庾急进，粤军的两个师由广东韶关赶住南雄、一个师由江西信丰向南雄，企图夹击红军。7日，韶关之敌到南雄，信丰之敌到乌迳。8日，红1方面军领导决定集中红1、3、5军团，同时消灭这两部粤军。这天，红5军团在水口对岸同敌军接触，击溃敌军两个团，敌退守水口及其附近。9日，敌军在水口增至10个团，红5军团未察觉，继续攻击中伤亡很大，红军独立第3、6师赶到，稳住了战局。红1方面军领导得到这一情况后，即令红1、3军团和红12军迅即去水口方向会歼敌军。10日，红1军团和12军到达战场击溃敌军，敌退入南雄。蒋军两个师在大庾东北的青龙、杨眉寺地区停止前进，配合作战的湘军第15师退回桂东，至此战役结束。

这次战役，红军共击溃粤军15个团，打击了粤军的嚣张气焰，不敢再向赣南冒进，基本稳定了中央苏区的南翼，消除了红军主力北上作战的后顾之忧。但是这次战役，兵力没有集中，打得很苦，缴获不多，红军伤亡较大。聂荣臻称之为“著名的恶战”，说“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连河沟里的水都有血腥味。

几年后，毛泽东总结说，这次战役是“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本来是可以算作胜仗或大胜仗的，“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周恩来1932年7月到前方了解战况后，曾致信中共苏区中央局说：水口之战虽然胜利，但只是打成击溃战，教训在于行动迟缓犹豫，分兵应敌，未以全力对付粤敌。

水口战役后，周恩来到前方，以后就基本上是随红1方面军行动，指挥军事。1933年12月，后方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之职由任弼时代理，周恩来作为苏区中央局的代表在军队。

当时在前方领导红1方面军的，有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周恩来代表党组织，毛泽东是苏维埃政府主席，朱德是中革军委主席、红1方面军总司令，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1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党、政、军委、方面军，等级重叠，而红1方面军中，总政委一职无人担任。周恩来到前方后，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商议，主张由毛泽东担任总政委。取得一致意见后，25日，周、毛、朱、王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

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

此种办法如何，飞电复。

电报去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同意红1方面军设总政治委员，但仍旧主张

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兼任。为此，29日，周恩来又以个人名义给苏区中央局写信，再次陈说如果毛泽东不兼总政委，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周恩来写道，“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坚持由毛泽东任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再三恳请中央局考虑前方的意见。

8月初，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对红1方面军进行整编，在前方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最高军事会议，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这期间，中央局同意了由毛泽东任红1方面军总政委。8月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通令，宣布：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1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关于军事行动方面，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曾在7月15日发布告前线红军战士书，提出要红1方面军“毫不疲倦的乘着这一伟大胜利的开展，继续与敌人决战，继续歼灭敌人，迅速的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来实现江西首先胜利”，要求红1方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赣州，调动敌军，然后红1、3、5军团主力乘机在赣江上游渡赣江，沿江西岸北进，向蒋军主力陈诚的4个师发动进攻。周恩来去到前方，也是带着中央局的这一精神的。到了前方后，他经过实地考察，了解前方的情况与敌我态势，不由改变了看法。此时，赣州有敌军两个团据守，南雄、大庾两处有敌第17师，新城有敌第52师，南康、上犹两地有敌第14师，遂川有敌第43师，曾前有敌一个旅，泰和以下有敌第59、90师，敌第28师一部在赣州，一部在万安，总计赣江西岸敌军已经集结了40个团以上的兵力。周恩来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商议后，认为原来的计划难以实现，四人联名电告苏区中央局：我们再四考虑，认为赣江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绝断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往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罗（指陈诚、罗卓英）等四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如敌人渡河东决战更好。

8月初，红1方面军在兴国县附近的竹坝召开军事会议。接着，周恩来在兴国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决定红1方面军不渡赣江西岸作战，而是在赣江东岸北上作战。这时，知敌军已经发觉红军将要北移，驻南康、新城的蒋军两个师亦沿赣江北进，敌第28师集结万安。会议认为赣江以东敌军兵力比较薄弱，乐安、宜黄地区仅有敌军一个师防守，比较好打，决定红1方面军北上消灭驻守乐安、宜黄等地的国民党军，逼近夺取吉水、樟树、新干等城，威胁南昌、九江，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红军行动。会后，红1方面军拟定了第一期作战计划草案，决定“于三日中全部开拔，十日后开始战斗”。

这时，驻守乐安、宜黄的是孙连仲部一个师，另有一师驻崇仁、抚州。朱绍良部三个师一在南丰，一在南城，一在两者中间。吴奇伟师分布永丰、吉水、吉安、樟树、新干。陈诚部两个师一在吉安，一在泰和。

8月15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报告中央局并中央说：“我军决以迅速坚决秘密的行动，先攻乐安、宜黄，消灭孙连仲大部，乘胜攻南丰、南城消灭朱部，开展赣东一面，求得巩固的向西迎击陈、吴等师增援部队，以更有利的取得赣江下游中心城市，造成夺取南昌的形势。”

这时候的中共临时中央在“左”倾路线指导下，强调的是“积极进攻、

夺取中心城市”，周恩来在文字上有时也提这些词句，但在实际运作中，是强调实事求是根据际情况制定方针政策的。

乐安、宜黄两县的国民党守军是孙连仲的第27师，师长高树勋，共6个团。这股敌军离中央根据地最近，又比较弱。红1方面军由南向北到达招携、东韶一线，“行军八日，只休息一天”，是在根据地里边行军，群众条件好，行动又严守秘密，所以敌军并没有发觉红军的行动。8月16日5时，战斗打响，红1军团用第3军袭击乐安，没有成功。17日改由第4军强攻乐安。红军四面包围乐安城，攻城部队用云梯登城，前仆后继，勇猛冲锋，很快就突入了城中，打开城门，别的部队随即由城门涌进，到中午就结束了战斗。敌守军共3000多人，从旅长、团长到勤杂人员全部被歼，无一脱逃。攻城这天，敌军飞机前来袭扰，也被击落一架。

19日，红军续攻宜黄。宜黄守敌是高树勋师约两个旅（四个团欠一个营），以主力守城，一部据守城外工事。红军以红3军团在城南担任主攻，19日又令红1军团在宜黄西北地区，一面佯攻宜黄北门，吸引敌军部分兵力，一面在北部警戒崇仁、抚州敌军的增援。20日拂晓，宜黄战斗打响。这天下雨，宜黄城周围地形开阔，城外工事较多，进攻没有奏效，于是改为夜攻，调整了部署。这夜天气转晴，月明如昼，红3军从西北门攻进城内，红3军团同时也攻进西南门和东南门，守敌大部被歼，一部分出东北门向龙骨渡逃跑。红3军奉命追击，22日在龙骨渡又将逃敌千余人截获，大部俘虏。高树勋带少数人逃走。

乐安、宜黄之战，两战两胜，取得了歼敌约3个旅、俘敌5000多人的重大胜利。红军连克乐安、宜黄，使得周围的抚州、崇仁、南城、南丰的敌军受到很大震动。驻守南丰的毛炳文师吓得急忙向南城靠拢。红军23日乘胜占领南丰，在南丰缴得米面数千袋、汽油五百多桶。

红军几天内连克乐安、宜黄、南丰三座县城，震动了南昌、樟树、抚州的敌人，使江西和赣粤边的敌军纷纷重作布置，不但使粤军更不敢深入革命根据地，巩固了苏区边境，也使赣西的红8军有了发展机会，可以逼近吉安。江西前线紧张，使得蒋介石连忙把胡宗南的第9师从武汉开来南昌，从而也减轻了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的军事压力。

按照原来的作战部署，红军在攻克乐安、宜黄后，是应乘胜攻占南丰、南城的。24日，红军进抵南城近郊，但这时情况已有变化，为此，周恩来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商议，决定改变部署，不攻南城。28日，周恩来向苏区中央局写信讲了他们的设想：“此次北上的作战方案，已交弼时同志带去，后在行军过程中又拟有更具体的方案，大致已电告中央局，即是首先消灭敌27师，取得乐、宜，乘胜东击毛、许、李，取得南丰南城，然后西向迎击陈、罗、吴主力，在有利条件下，可先取赣州，然后过河。这一方案是在敌情未变动前定的。当我们攻下乐安，敌情无大变化，我们乘胜迅速攻下宜黄，这是依照既定方案坚持执行的结果。等乐、宜相继攻下，直接震动了抚州、南昌、樟树，敌情已起大变化，且毛、许两师已仓猝放弃南丰，我们乃固执原定的计划去攻南城，便犯了不机动的错误。”

“故决定不攻南城，暂将方面军撤至南城至南丰至宜黄两线，工作几天，不过早显露我军企图，准备东进敌人（陈、吴等师）进至相当地点，即给以迎头痛击。”

这之后，发生了苏区中央局在前方的领导与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领导之

间的长达一个月左右的争执。争执的中心点，在于中央局后方领导坚持贯彻临时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要红1方面军进攻敌军主力，“夺取中心城市”。

8月28日周恩来给苏区中央局去信提出不打南城后，中央局后方同志就表示了不满意，同一天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认为这是错误的，没有攻占南城，是没有“圆满胜利”，提出“我主力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应绕至乐安、宜黄一带，从敌之左侧背给以各个击破，而以小部队在南城方向以迷惑敌人。29日，红1方面军按照这一指令向乐安、宜黄方向移动。30日红3军团在宜黄遭到敌军袭击，有一个多团失去联络。31日敌军占领宜黄，此时东面的敌军又跟在红军后边，准备与西面的敌军夹击红军。这样，红1方面军才撤到东韶、宁都一带。当时，红1方面军连续作战，已经很疲劳，准备休息两天，再作大的行动。9月5日，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报告了敌情变化和红军所在位置，并说目前战役将在东韶、水口、洛口一带，我决集中最大力量决战。

对此，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领导没有同意，9月7日致电周恩来，指责他们撤围南城后“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部，这是缺点”，“撤退东洛”，“再撤退宁都青塘，待敌前进”“是不正确的决定”，要红1方面军仍袭取永丰，将敌军向西调动，予以各个击破。

周恩来在8月底已经看到在红军攻占乐安、宜黄后，国民党军队已注意固守城池，积极筑路、修炮垒，为此他在8月底曾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说，对国民党作战，必须以“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攻其要害，能使其离开据点，在运动中消灭之，这点很重要”。在运动中消灭敌军而不强求进攻中心城市，这是周恩来在战争实践中达到与毛泽东一致的认识。接到中央局9月7日的电报后，他在8日电复苏区中央局，不同意袭取永丰的行动方针。他说：红军5日才在东韶、洛口集中完毕，现去西袭永丰，不但红军尚未休息过来，而且敌军会事先防我西去，敌第52、43、59各师都在永、吉附近，所以袭取永丰将成为不可能。他认为红1方面军休息七天绝对必要；敌军的目的在于驱逐红军，恢复据点，攻入苏区，红军则可一边休息，一边以部分兵力发展游击运动与新苏区。

9月，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在蒋介石“即将倾全力向我中区及赣东北进攻”的情况下，红军应采取“择敌人弱点击破一面，勿待其合围的方针”。这时，红4方面军正在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湘鄂西根据地红军也在进行第四次反“围剿”。在赣东北，敌军的第四次“围剿”9月中旬将要开始。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对这些苏区的反“围剿”是十分关心的。9月上旬，他们曾电苏区中央局转中共湘鄂西分局并临时中央，提出：“我们认为，敌以重兵围紧鄂西苏区，红3军应集结全军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消灭他这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牵制其他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如因顾虑苏区被敌侵入而分一部兵力去堵，不仅兵少堵不住，对于决战方面又减少兵力，损失更大。”指出“分散与持久硬打是给敌人各个击破我们和分进合击的最好机会”。

9月中旬，他们又连续致电鄂豫皖苏区领导说：“红4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利于我们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地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

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目前国内战争的环境，红军尚须力求避免过大的牺牲，争取便于消灭敌人一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在一次激战后，须力争相当时间的休息与补充，以免过度的疲劳而影响和减弱红军战斗力。”“若机械地固守一地求战太急，反足以招致自己损失大敌人不能消灭的不利条件，敌人再进，所固守的地区仍要失去。”

在中央苏区，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领导红1方面军，正是本着这些方针与敌军作战的。9月中旬，敌军已集中六个师，将宜黄、乐安、南丰占去，这时是不宜与敌人硬拼的，而应巩固后方，以待时机。17日，周恩来在宁都小元地区致信苏区中央局说：西从古县，经招携肖田，东达甘竹这一线以北，在永丰、乐安、崇仁、宜黄、南丰、抚州、南城、黎川之间，“有一块极大的地区，纵四五百，横七八百里，还没有完全赤化”，应该重视这一地区的工作。

9月23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下一步行动方针，说：“出击必须有把握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我们认为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电文中表示：“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当敌情变化“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机动的集中兵力去作战”。第二天，周恩来还专门致信苏区中央局，申述采取这一行动计划的理由，说：“据我们看来，这是目前情形中最好的办法。”

但是，苏区中央局不同意，25日电复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说：“在目前全国苏区红军积极行动艰苦作战中，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而不能配合呼应鄂豫皖、湘鄂西红军，“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周恩来等接到苏区中央局这个电报后，立即商议，当天仍以四人署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坚持原定计划，说：“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是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近在布置更大的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

这封电报去后，苏区中央局还是不同意，坚持他们原来的意见，26日电告周恩来等。于是周恩来等再电苏区中央局，表示目前攻乐安没有把握，而且即便用很大力量能消灭吴奇伟师，以现在红军实力，也不能打击敌人的强大增援部队。现在还是执行原定计划，布置宜黄、乐安中间一带战场，争取群众以调动敌人为好。

这一天，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出了《敌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当然是经周恩来同意后发出的，内容也是同

他们的主张一致的，指出当敌人实行对中央苏区与红军总攻时，要有把握地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粉碎敌军的第四次“围剿”，现在要迅速肃清宜黄、乐安、南丰一带拦阻红军北上的白区地主武装，使红军可以巩固地迫近宜、乐、南丰各城市。

这个《训令》遭到苏区中央局的严厉批评，29日电告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30日，苏区中央局专门给周恩来电报说：“我们现重新向你提出前方前次分散赤化南丰河两岸，做一时期扩大苏区工作等意见，是对形势估计不足，不去深刻领会攻取宜黄受分散所造成之严重的错误教训。”强调对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要“给以无情的打击”。

这样，10月3日至8日间，在宁都小源召开了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刘伯承列席了会议。

会议按照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的精神，“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会议批评“进占漳州”“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批评“南雄战役”“犯了分兵错误”，“乐宜战争后，又重犯了分兵筹款错误”，“最后在南雄宜乐之间分兵赤化的计划也是错误的”，等于清算了漳州战役以来的所谓“问题”。会议批评了“前方同志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特别指出泽东同志等待观念的错误”，集中批评了毛泽东，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门负责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不再负责军事领导工作。周恩来在发言中承认前方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但指出后方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并且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周恩来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毛泽东留在前方。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周恩来提出了两种方案供会议选择：“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会议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多易发生错误”。毛泽东也因为不能取得苏区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办法。最后，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第一种办法。

会后，毛泽东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他对与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什么时候电召我就什么时候来。

正当宁都开会期间，在上海的临时中央10月6日也在开常委会讨论苏区中央局问题。博古说：“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张闻天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于是临时中央向苏区中央局发了指示电。这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经离开，留在宁都的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按照中央来电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周恩来代理红1方面军总政治委员。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1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在宁都会议上，主要的斗争矛头是对着毛泽东的，但是也涉及到了周恩

来。特别是周恩来在会议结论中维护了毛泽东，使得苏区中央局的后方领导人十分不满。他们向上海的临时中央报告说：周恩来“没有站在坚定的立场集中火力反对”毛泽东的“错误”，“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指责周恩来“在斗争中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开展了的斗争战线”，“在斗争中不坚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沈阳。几个月内日军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开始向热河省（今分属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进攻。全国人民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抗战，但是蒋介石却在11月30日发表讲话，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调集兵力“围剿”主张抗日的红军。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国民党驻军第19路军在人民抗日要求影响下，违抗蒋介石命令，奋起抗战。蒋介石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巨大压力，镇压抗日运动，5月间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无驻兵权。23日，下令调第19路军到福建“剿共”。

6月18日，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召开鄂豫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确定第四次“围剿”计划，叫嚷说：“这回围剿的成败，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不能成功，誓当成仁”。7月间，他向美国军事借款1200万美元，调集50万兵力，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他先向鄂豫皖、湘鄂西发动，准备解决这些地区后，再向中央苏区进攻。

到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期间，敌军对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基本结束。但对于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还没有准备完毕。此时中央苏区周围的敌军分布，在乐安、南丰、抚州地区有八个师，峡江至万安一线有六个师，赣南和闽西、闽南有粤军第19路军驻守，赣东北的余江、上饶、德兴地区有四个多师，但赣闽边境的建宁、黎川、泰宁、邵武、光泽一带只有周志群的一个新编第4旅和另外两个师的各一部，兵力比较薄弱。

宁都会议上苏区中央局在前方的同志既然已经受到批判，会后，前方的同志必须遵照中央电示和苏区中央局决定的方针，实行“进攻路线”。进攻什么地方？周恩来和朱德，王稼祥判断敌情后，认为赣闽之际敌军较弱，10月14日，致电苏区中央局：决以广昌之东北为出击点，首先打击周志群部，进占黎川、建宁、泰宁三城，赤化宁化、建宁、广昌之间的一片地区，打通与赣东北苏区的交通，附带地解决给养、棉衣问题，并集结兵力，准备求得战争。

同一天，红1方面军总司令朱德、代总政委周恩来下达了战役计划，命令红1方面军向闽赣边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地区进军，消灭盘据在这一地区的敌人。16日，红1方面军从广昌一带出发，开赴前线。红1军团为中央纵队，任务是消灭建宁、里心的敌人；红22军为右纵队，消灭泰宁、邵武的敌人；红3军团为左纵队，消灭黎川的敌人。

这次战役，战斗进行得比较激烈的是攻打建宁。建宁城地处闽赣边界，是一个军事要地，三面环水，像一个半岛形状，地形险要，易守难攻。驻守建宁的敌军是周志群的第4旅第2团。红军大部队向建宁进军之前，先派出了侦察人员，机智地化装后进入了建宁县城。这时正当敌军第2团团团长胡廷扬大张旗鼓地在城隍庙为他的母亲“祝寿”，又是摆宴席，又是演戏。侦察人员利用这个机会，顺利地摸清了敌军的整个布防。红军神速地进攻建宁城，

歼灭第2团一部分，敌军闻风丧胆，立即逃命，红军占领了县城。随后，红3军团和红22军也相继占领了黎川、泰宁。红军就在建宁、里心、客坊、安远这些地方建设新的根据地，打土豪，筹资财，都获得相当的成绩。

红1方面军东出建宁、黎川、泰宁，选择敌人兵力薄弱的方向，以较小的代价占领了这一地区，这一行动是完全正确的，对以后的反“围剿”作战是有利的。

当时的“进攻路线”，不容红军停顿下来在这一地区就地发动群众，巩固占领地区，进行反“围剿”的准备，而是要红军继续进攻敌人，粉碎敌人“围剿”于其大举进攻之前，于是就有了金溪、资溪战役。

11月16日，红1方面军分由黎川和邵武、光泽地区出发，17日击溃敌人第5师一个团，占领资溪。19日在资溪附近歼敌一部，占领金溪。敌人很快调第24师和27师分别由南城、抚州向金溪合击。20日敌第24师进到南城东北；21日，红3军团和红3军主力向敌军发起攻击，歼灭一个团。之后，敌人除已将驻守南丰的第23师向南城集结外，还把驻在赣江流域的吉安、吉水、永丰地区的陈诚部三个师调到抚河流域，连同原已在这地区的军队，共有九个师，组成抚河方面“进剿”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1933年1月4日至5日，红3军团和红22军乘敌军正在调整部署，消灭了驻守黄狮渡的敌第5师第13旅，俘敌一千多人。红军复占金溪。敌人迅速调三个主力师进到浒湾，7日，其中两个师向金溪进攻，一个师向黄狮渡进攻，企图围歼红军于浒湾东南地区。周恩来、朱德等决定以红1军团、红3军团和红22军、红31师为右纵队，以红5军团为左纵队，分别迎击敌人。浒湾战斗1月8日上午9时半打响，敌人有飞机大炮助战，打得十分激烈，打到下午3时以后，敌军全线溃退，经过浒湾不敢停留，直接逃向抚州。当晚红军进占浒湾，红27军追击逃敌一直追到抚州城边，途中又歼敌一部。浒湾战斗，红军歼敌两千多人，缴获武器弹药较多。金溪、浒湾两役共俘虏敌人四千多，缴枪四千多。但红军伤亡也不少。

聂荣臻说：红军打下了金溪、资溪以后，“没有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向东北发展，以沟通赣东北根据地与我们的联系，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失策”。“浒湾战斗之后，1军团继续留在浒湾至金溪一带活动，一面待命，一面征集资财，后送伤员、俘虏和战利品，一面北向东乡、余江等地游击侦察。当时周恩来同志建议，我主力红军北上贵溪等地，打通与赣东北红10军的联系，然后待抚州等北线敌人出动增援或进攻我军时，在抚河到信江之间广大地区于运动中消灭敌人。这本来是一个比较好的主张，我们军团领导人是支持的。但遭到中央局别的几位同志的极力反对，理由是我军远离根据地（赣东北也是根据地）作战于我不利，另外又怕我军主力北上后，敌人大举向中央根据地进攻，无法抵御。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建宁、黎川、泰宁解放后，在周恩来等的关怀下，1933年1月成立了中共建宁中心县委。4月26日，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0次常会决定，将建宁、黎川、泰宁、金溪、资溪、光泽、邵武、闽北苏区，以及信江、抚河之间一带地区，建为闽赣省。闽赣省后来成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的一个坚强后方。

周恩来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除了和朱德总司令领导红1方面军在

中央苏区与敌军作战外，还时刻关心着其他苏区的战斗。在中央苏区红军作战不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这时其他苏区，特别是鄂豫皖和湘鄂西、洪湖苏区，在反对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中遭到了不同情况的失利。1933年1月21日，周恩来和朱德向苏区中央局提出了关于目前战局的分析和几点建议，并要中央局转中共临时中央。其内容为：

对于鄂豫皖苏区——迅速派得力干部尤其是军事干部去发展游击战争，从现在的地方武装中组织起几个独立师，向麻城、罗田、黄梅、广济与豫东逐步扩大。

对于湘鄂西苏区——派人去贺龙处，在湘鄂西彻底平分土地与扩大红军，赤化湘西。

对于洪湖苏区——派人去秘密恢复组织，组织游击队。

对于湘赣、湘鄂赣苏区——中央局派人去主持工作，红8军、红16军配合行动，打通袁水流域向樟树、吉安方向发展，成为中央苏区左翼。

对于闽浙赣苏区——帮助他们成立红11军，使红11军和红10军成为中央苏区有力的右翼。

对于东江、琼崖、广西各苏区——中共广东省委大力领导，指示东江红军应向北发展。

对于到达川北的红4方面军——加派一批陕甘川同志进去，要在川东的红军与其会合，依傍巴山向汉水流域发展。

对于白区军事斗争——办一个经常的游击运动训练班，多派人到白区群众斗争发展的地方去开展游击战争，特别要派人去争取东北和热河义勇军的领导。

这时候，中央苏区面临着敌人的大规模的“围剿”。

1932年冬，蒋介石结束了对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以后，便集中50万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和红1方面军

周恩来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除了和朱德总司令领导红1方面军在中央苏区与敌军作战外，还时刻关心着其他苏区的战斗。在中央苏区红军作战不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这时其他苏区，特别是鄂豫皖和湘鄂西、洪湖苏区，在反对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中遭到了不同情况的失利。1933年1月21日，周恩来和朱德向苏区中央局提出了关于目前战局的分析和几点建议，并要中央局转中共临时中央。其内容为：

对于鄂豫皖苏区——迅速派得力干部尤其是军事干部去发展游击战争，从现在的地方武装中组织起几个独立师，向麻城、罗田、黄梅、广济与豫东逐步扩大。

对于湘鄂西苏区——派人去贺龙处，在湘鄂西彻底平分土地与扩大红军，赤化湘西。

对于洪湖苏区——派人去秘密恢复组织，组织游击队。

对于湘赣、湘鄂赣苏区——中央局派人去主持工作，红8军、红16军配合行动，打通袁水流域向樟树、吉安方向发展，成为中央苏区左翼。

对于闽浙赣苏区——帮助他们成立红11军，使红11军和红10军成为中央苏区有力的右翼。

对于东江、琼崖、广西各苏区——中共广东省委大力领导，指示东江红军应向北发展。

对于到达川北的红4方面军——加派一批陕甘川同志进去，要在川东的

红军与其会合，依傍巴山向汉水流域发展。

对于白区军事斗争——办一个经常的游击运动训练班，多派人到白区群众斗争发展的地方去开展游击战争，特别要派人去争取东北和热河义勇军的领导。

这时候，中央苏区面临着敌人的大规模的“围剿”。

1932年冬，蒋介石结束了对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以后，便集中50万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和红1方面军

2月4日，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电告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令红军先攻占南丰，并乘胜威胁南城、抚州，说：“此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这样，红1方面军只好进行攻城部署，同时周恩来仍电告苏区中央局：“为着在连续的战斗中有更多的运动战好消灭敌人，同时在敌人进攻布置未完毕前仍可求得运动战，似不宜先在攻坚上损伤过大的战斗力，如损伤大而又不能攻入，则更挫士气。请求你们考虑。”2月9日，周恩来和朱德率红1方面军由黎川附近的集结地区向南丰开进。12日，完成对南丰城的包围。傍晚，红军对南丰的国民党守军发动进攻。

陈诚得知红军进攻南丰，一方面命令在南丰城内的国民党军第8师凭城固守，另一方面急令所属的各个纵队迅速向南丰增援，企图在南丰城下合围红军。

红军攻南丰，激战一夜，夺得敌军在城外的大小堡垒十几个，但是城外还有20多个堡垒在敌人手中，这些堡垒十分险要，堡垒后边又是开阔地。已经夺得的堡垒离城还远，城墙上有炮楼。这一夜激战中，红军损失三百多人，缴获不足一营，红3军团牺牲了一个师长两个团长。到了白天，周恩来等察觉敌军在外的一个团撤回到城内，并且断了浮桥，说明敌军是要固守待援。同时，得知敌军增援部队正分三路向南丰开来，从南城开来的有两师，从宜黄开来的有一师，从乐安开来的有两师。

在这一情况下，周恩来和朱德果断地采取措施，把原来的强攻南丰改变为佯攻南丰，决心先消灭增援部队。红军由南丰城外撤退，以红11军伪装红军主力，在里塔圩和新丰街之间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红1方面军主力却秘密地转移到中央苏区的前沿东韶、洛口地区，寻机歼敌。

陈诚受到迷惑，以为红军主力到黎川方面去了，就命令第2、3纵队向黎川前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敌第1纵队为了配合行动，罗卓英在2月24日亲率第11师由宜黄南下黄陂，李明的第52师和陈时骥的第59师由乐安向东南推进，准备到黄陂与第11师会合，然后奔袭广昌、宁都，截断红军主力退路。

周恩来、朱德等在东韶开会商议，认为敌第52、59两师已经暴露在红军面前，与敌第2、3纵队距离很远，处于孤立状态。黄陂山高路窄，地形险要，是打伏击战的好地形，决定在黄陂打伏击歼灭这两个师。25日，周恩来、王稼祥发出给各军团的指示说：“蒋介石大举进攻的部队已向着苏区开动了，决战就在这两天开始。这是连续残酷的战斗，应号召全体红色军人以最大的决心与勇气争取第一仗的大胜利，给反革命的进攻以迎头痛击。”指示规定了政治工作的十五点要求。26日，周恩来和朱德发出进军命令：“我方面军拟于27日，以遭遇战在河口、东陂、黄陂以西，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地带，侧击并消灭乐安来敌。”红军分为左右两翼队，平行北上，包抄敌军。

这一天，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隐蔽在深山密林之中，由于群众条件好，没有走漏一点消息。朱德指示部队要特别注意隐蔽，不能暴露过早。周恩来说：这是这次战斗成败的关键，告诉战士们要沉得住气，放手让敌人往前走，东边还有我们的部队，敌人是跑不了的。

27日上午9时多，远处人喊马嘶，敌人过来了，军官还坐着轿子。敌人过去了四个团，最后是辎重部队，后边还有一个团掩护。等到他们全部进入伏击圈，红军一声号令总攻，顿时枪炮声天崩地裂，震动山岳。敌军大吃一惊，不知所措，顿时丧失抵抗能力，东奔西突，想夺路逃跑。红军发起冲锋，展开捉俘虏竞赛。经过三个小时，敌52师师部和154旅的一个团被歼，师长李明受重伤被俘后死去。第二天，红3军团将这师的前卫部队155旅歼灭，接着，又在红1军团协同下将敌154旅主力歼灭。敌第52师全军覆灭。同时，敌第59师进入了红军右翼队的伏击圈，红5军团、22军、12军冲下山去，将这师截成几段，大部歼灭在黄陂、霍源地区。师长陈时骥率残部逃向乐安，被红军左翼队歼灭，陈时骥被俘。

这次战斗，歼敌两个师，俘敌师长两人、官兵万余人，缴枪万余支。敌人把武器弹药丢得满山满谷，许多新式武器和望远镜还没有开箱就被红军缴获了，附近几个县派了很多农民来帮助红军打扫战场，搬运战利品，搬了一个星期才搬完。

黄陂战斗发生，敌军第2、3纵队赶紧改变方向，由南城、南丰地区日夜兼程赶来援救，企图夹击红军。红军为了争取主动，避免被敌军所围，从3月2日起陆续撤离战场，转移到小布、洛口、东韶地区，准备下一次战斗。4日，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说：我军拟俟集中后，仍选敌一翼于运动战中消灭之。

陈诚部队两个师被红军歼灭后，仍想找红军决战。但是在苏区军民严密封锁消息的情况下，摸不清红军的去向。鉴于原来“分进合击”的方针失利，敌军调整了部署，改为“中间突破”，将原来的三个纵队改为前后两纵队：原第2纵队为前纵队；原第1纵队剩下的萧乾的第11师和第3纵队的第5、9师为后纵队。周恩来和朱德为了迷惑敌军，3月16日命令红11军向广昌开进，以吸引并扣留国民党军前纵队，红军主力则在隐蔽地待机侧击国民党军后纵队。16日，敌军前后纵队一字长蛇地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方面前进，企图攻占广昌，求得歼灭红军主力。

广昌地区的红11军，在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配合下积极活动，以拉大敌军前后两个纵队的距离。陈诚误认为这就是红军主力，立即命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并将后纵队的第5师也配属前纵队指挥。到20日，敌军前纵队进至甘竹、罗场、洽村一带；后纵队的第11师进至草台岗、徐庄一线，后边是第59师的残部，第9师进至东陂附近。这时敌军前后两个纵队之间的距离，已经拉开近50公里，出现了对红军有利的战机。

3月20日，周恩来和朱德签署了红1方面军作战命令，指出国民党军后纵队第9师将到东陂，第4师将到草台岗、徐庄附近，要各军团各军立即作好战斗准备，“于21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之11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对于敌军的一字长蛇阵，周恩来、朱德仍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不打头，不打尾，集中红军主力从侧面打它的腰部。出击的队伍仍分为左翼队和右翼队，左翼队有红1军团和红21、22军加独立第5师，右翼队是红3军团、红

5 军团。左翼队由西北向东南攻击，右翼队由西南向东北攻击，红 5 军团还有钳制东陂之敌和防止敌前纵队回援的任务。

20 日晚，红军各部先后进入攻击位置。这时，敌第 11 师到达徐庄以南地区，第 59 师残部到雷公嵯附近，第 9 师在东陂掩护。当地山路崎岖，行军困难，第 11 师就地露营，不久，其前卫部队同红军第 5 军团一部接触，全师转入就地防御。

21 日拂晓，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红 1 方面军向进入草台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第 11 师发起攻击，以一部兵力钳制东陂地区的敌第 9 师，切断该师与第 11 师的联系。聂荣臻和林彪督促红军按命令规定的时间出发，拂晓已向敌军占领的黄柏岭前进。黄柏岭是紧临草台岗的制高点，高约五六百米，不攻下黄柏岭即无法攻下草台岗。红军冲锋肉搏，发起猛攻，敌军第 11 师居高临下，凭火力进行顽抗，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敌人的飞机来助威，到处扔炸弹。聂荣臻和林彪等在前沿阵地指挥，也被炸弹的气浪吹倒在地。他们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指挥战斗。下午，红军终于将黄柏岭上敌人的第 11 师解决，守敌两个团在突围中也大部被红军歼灭。右翼队红军攻占了龙咀寨阵地，歼敌约两个团。至此，敌第 11 师大部被歼。

在红军攻歼敌第 11 师时，罗卓英督令敌军第 59 师残部和第 9 师一个团积极进行援救，在雷公嵯南端和大排地区遭到红军严重打击。第 11 师被歼以后，敌军各部队纷纷后撤，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就基本被打破了。

这次草台岗战斗，消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即陈诚赖以起家号称没有打过败仗的国民党军第 11 师（只逃走了不过一个团的兵力），师长萧乾和参谋长、一个旅长被击伤，三个团长被击毙。旅长黄维坐着担架逃出了根据地。

总计黄陂、草台岗两仗，共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三个师，俘虏敌人一万多人，缴枪万余支，并缴获新式机枪三百挺，大炮四十门，创造了红军战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毛泽东在当年的《红色中华》第 97 期上称之为“空前光荣伟大胜利”，给了蒋介石以“最致命的打击”。1936 年，毛泽东在陕北时曾经对埃德加·斯诺说：1933 年，“南京开始第四次，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这一次红军第一仗就把敌两个师解除了武装，俘虏了两个师长。敌第 59 师被部分消灭，第 52 师被全部消灭。”“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国民党第 11 师，接着也被消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它的师长受了重伤。这几仗构成了决定性的转折点，第四次‘围剿’随即结束。”

当国民党军第 52、59 师在宜黄、乐安一带被包围时，粮弹均绝，蒋介石派飞机向两师投送子弹。这两个师覆灭后，蒋介石给陈诚发“手谕”说：“惟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第四次反“围剿”后，朱德总结这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曾经说道：“我们的战略以各个击破为原则”，“红军战术的主要原则迅速、秘密、坚决，这次都执行得不错”。“南丰撤围后，红 11 军东出迷惑敌人，按期达到，敌人误认为我主力东移黎川，而我主力实则南进又转向西进，很迅速地到达目的地。在边区行动，敌人始终不知我主力所在地。以数万红军大规模的行动，能够做到出敌不意袭击敌人，这是确守秘密的证明，也是开创了一个大部队袭击之战例。红色战士的坚决，较前更好，与敌接触个个勇敢坚决，反复冲锋，白刃战肉搏十余次，一直冲到最高峰，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干脆地

消灭敌人，可为红军战术上最好的战例。”“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和地方工作配合红军作战，有相当的成绩。”

5月8日，临时中央决定中革军委从前方移到瑞金，在前方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1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1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这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等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其后中共苏区中央局与中共临时中央合并，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央指示，发布了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命令指出：1927年8月1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为了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这一决定。

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2月3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朱德，另一副主席是王稼祥。

第八章 战略转移的征途上

- 第五次反“围剿”之初，他的正确意见遭到斥责，后实际上被取消军事指挥权。
- 黎平会议上支持并采纳毛泽东向川黔边进军的建议，李德大怒。
- 他对于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关键和重要作用，决定他仍为“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 新的“三人团”即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立，他为“团长”。
- 与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
- 批评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意见。
- 在两河口会议上提出北上方针，得到了一致赞同。
- 为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北上，辞去红军总政委一职让予张国焘。
- 艰苦卓绝，积劳成疾，被用担架抬着过了草地。
- 参与指挥直罗镇战役取得胜利。该役为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失败后，于1933年5月在南昌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并亲自指挥这次“围剿”。他调集重兵，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步步推进，持久作战。

这次“围剿”，蒋介石直接用于进攻红1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兵力有50万人，分为南北两路。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第1、2、3路军，共计33个师又3个旅，担任主攻。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11个师又1个旅，配合北路军作战。东有第19路军蔡廷锴所部和归他指挥的7个师又2个旅，阻止红军向东；赵观涛所部5个师又4个保安团，阻止红军向赣东北。西有西路军总司令何键部9个师又3个旅，阻止红军向赣江以西。

这时的中央苏区，经过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扩大到8万多人，群众武装也有了很大发展，从敌我兵力对比上看，与前几次反“围剿”相差不多，如果按照正确的战略和军事原则，打破“围剿”取得胜利是有可能的。

但这时，中共临时中央推行了一套错误的战略和军事原则。1933年6月13日，临时中央发来了对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这个作战计划是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在上海拟定的。指示中批评红1方面军前段军事行动的“弱点”在于“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即方面军，这就不能从各方面配合作战”。为了在闽、赣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指示要求“从方面军调出若干部队”“进行分离的作战”，具体说是要派遣红5军团，作为“东方军”。

中央局转给周恩来、朱德这个中央指示时，又说：为切实执行这一作战计划，拟改令彭、滕率3军团全部，去做东方军的基干，并拨驻汀州之模范师，上杭附近之第19军，宁化独7师、19师、20师及长汀以北和闽赣边省地方部队等，归其统一指挥。

周恩来的军事思想，一贯主张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军，对于分兵是不同意的，红3军团是红1方面军主力军团之一，更不宜分离。接到电报后，6月18日他就和朱德向中央局提出意见说：“方面军主力1、3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只同意红5军团组成东方军。

21日，临时中央负责人秦邦宪、项英、王稼祥等又电周恩来：“沪指示编组东方军团及其作战纲领，主要的是改进从前一手打入的单一作战线，而成为更有利的配合各方的两根作战体，来开展战斗新的局面”，坚持“3军团作东方军团”，其他部队作为中央军在抚河、赣江间活动。

此后的将近三个月，东方军入闽作战，虽然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本身受到削弱；中央军也没有取得预期胜利。红军分离作战，削弱了战斗力，丧失了准备反五次“围剿”的宝贵时间。同时也使蒋介石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能够从容地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策划“围剿”，并命令“进剿”的部队在根据地周围休整补充，构成堡垒封锁线，准备第五次“围剿”。

后来，毛泽东曾把这叫作“两个拳头打人”，指出这是错误的。

1933年9月25日，敌人北路军的3个师向中央苏区的黎川发动进攻，开始了第五次“围剿”。中共临时中央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毛泽东后来说：“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部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周恩来是主张以运动战消灭敌人的。他在1933年4月写过一篇《论敌人的要塞》登载在《红色战场汇刊》上，文中说：“就一般说来，我们应先消灭敌的野战军再攻取其要塞。”他在5月间写的文章中说：“总而言之，我们要用少数的兵力放在次等方向，去抓住多数的敌军，以便抽出多数的兵力，在主要的突击方向，有把握的去消灭敌军。”红军比起敌军来，并不是总体上占优势，但是“在决战方向集中优势的兵力和兵器”，而被抽出兵力的方向就成为对优势敌军的钳制方向，这是红军在运动战中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也即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军的战术。这在周恩来的思想上是一贯的，即便到了中央对军事领导的“左”倾错误严重的1934年春，周恩来和朱德等在给方志敏的电报中，仍然指出：你们应“集中和扩大红10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进攻部队”，“派遣得力的独立部队伸入到浙西活动”。

但是，在后方的中央领导无视周恩来等的不同意见和过去作战的宝贵经验，一再命令红军插到敌人堡垒地域间隙中去消灭敌人，还说什么“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周恩来、朱德都是组织纪律性很强的领导人，只好遵照执行中央的命令。从1933年9月下旬到11月中旬，红1方面军就是依照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在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作战近两个月，结果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自己反而遭受到很大的损失。

蒋介石虽然派了重兵四面包围了中央苏区，但是其中只有北面的北路军是蒋的嫡系部队，也是进攻苏区的主力部队，其他各路部队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是“杂牌”，他们对蒋介石的态度也很不一样。

“一二八”事件后，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第19路军在上海英勇抗日，受到蒋介石的压制。现在他们奉命来“围剿”中央苏区，并不是他们的本意。第19路军广大官兵主张抗日，厌恶内战。1933年1月1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和张国焘以及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名义发表的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苏区等三

个条件下愿与国内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这在国民党部队中是有影响的。第 19 路军调到福建后不久，在 8 月间，秘密派吴明作代表到延平前线同红军联络。吴明就是周恩来旅法勤工俭学时认识的陈公培。

第 19 路军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他们对蒋介石不满，而他们的驻地福建又正好与中央苏区接壤，如果与第 19 路军结成军事统一战线，很明显地对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是十分有利的。周恩来对第 19 路军的这一行动很重视，9 月 22 日致电项英、彭德怀、滕代远，建议派袁国平到福建西芹地区同吴明面谈，进一步了解蒋光鼐、蔡廷锴的真实意图，并介绍说吴明过去是共产党

员，后来脱党，常在各派中奔走倒蒋运动，并供给我们相当消息。经过会谈，彭德怀交吴明带去回信，对第 19 路军提出的合作要求表示欢迎。双方在前线进入休战状态。10 月 26 日，第 19 路军和福建省政府与工农红军代表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 月 20 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和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21 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福建人民政府签定抗日停战协定四条。22 日，双方又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停止军事行动，确定了边界，恢复了交通贸易关系。之后，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从福建向苏区运去了大量的食盐、布匹、药品、军械等物资。

“福建事变”使蒋介石大吃一惊，他不得不从北线主力中抽调部队转向福建进攻，这就延缓了对苏区的“围剿”。周恩来认为军事上应当相应采取行动支援第 19 路军。24 日，他在前方致电瑞金的中革军委，并以红 1 方面军名义致电博古、项英等，报告福建多变后的敌情变化，指出蒋介石目前正推延进攻中央苏区，调集兵力东进由浙入闽，以资溪、光泽为入闽方向镇压福建政府。他敦促中央早日作出决定，以红 3、红 5 军团侧击国民党军入闽部队。电报中说：“3 军团是否参加侧击向钟贤前进之周纵队或参加向嵩市、贵溪县前进之邢樊纵队”，“5 军团除留一团守备杉关、洵口、湖坊、毛家溢地域外，其主力是否应与 3 师配合侧击向钟贤延伸筑垒之周纵队。”临时中央没有采纳这个正确的建议。

同一天，周恩来和朱德致电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兼红 10 军军长刘畴西、红 7 军团军团长寻淮洲等，指出福建第 19 路军反蒋独立，蒋介石已抽兵向浙赣闽边境集中，要求赣东北和闽北抓紧这一时机，以游击战争，截击敌人的联络运输，扰乱其后方，并集中红 7 军团主力准备截击敌军，但切忌正面迎击与强攻堡垒。

但是，第二天，中革军委发来了关于红 1 方面军行动的训令，认为“不应费去大的损失来与东北敌人新的一路军作战，而让 19 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

27 日，周恩来又致电博古、项英等，报告说敌军由江西开往福建，由浙江省边城入浦城已不是主要路线，主要路线是由金溪、资溪入光泽、邵武，提议在资溪、光泽间组成新独立团并令闽北独立团移到邵武、光泽以北活动，令陈毅尽力迟阻敌之进扰。28 日，朱德、周恩来两次致电寻淮洲和政委乐少华。第一份电报中说：敌军入闽，其出邵顺纵队之右侧正对着我闽中苏区，且后方延长，给我闽中部队以活动和发展机会，“令 19 师帮助闽中游击队，积极扩大并发展闽中游击队，不断截击邵顺间敌人后方联络部队及进行一切破坏工作”。第二份电报说，红 7 军团明日应以一个最精锐的侦察营向将乐

地域出动，任务是与 19 路军部队取得联络，并侦察将乐，如在将乐的非 19 路军则驱逐或占领之，如敌部队向将乐、万安前进，7 军团主力须迟滞拒止和侧击之，但须避免决战。

但是，临时中央从“左”倾观点出发，对福建人民政府抱着完全不信任的态度，认为“在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拒绝予以支援。12 月 5 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批评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并没有任何真正反帝与反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实际行动”，因此“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说什么“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

周恩来、朱德侧击入闽攻第 19 路军的国民党部队的建议遭到拒绝。12 月 13 日，在瑞金的中革军委又决定将红 1、红 3 军团组成西方军，西调永丰地区进攻国民党军构筑的堡垒线，结果劳而无功。

第 19 路军在孤立无援情况下，12 月 16 日与由赣北南下的国民党军在建瓯等地开战，节节败退，连失厦门、福州，退集泉州。蒋介石采取老办法用收买敌军部下来分化敌军，第 19 路军将领沈光汉、王维寿、区寿年、张炎等被收买，於 1 月 21 日通电拥护蒋介石。福建人民政府失败。

这一时期周恩来在前方向中央局指出的意见，经常不为中央同意，或被严厉斥责，或受中央强令“你们决须根据军委意图”行事。而中央（中革军委）的命令又常常变化，如 12 月 13、14 日在一昼夜 24 小时内四次变更作战命令，使前方无所适从。12 月 16 日，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说：“连日电令屡更，……请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给相机处理之电给我们”。

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已在 9 月间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他在博古的支持下，实际上掌握了中革军委的领导权。12 月 20 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临时中央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 1 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原“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机关。以后就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作战，实际上就是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军队。

1934 年 1 月 4 日，周恩来和朱德离开前方，回到瑞金。

1 月下旬，国民党在镇压了福建人民政府和第 19 路军以后，随即把它的入闽部队改编为东路军，协同其北路军、南路军，重新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中革军委本着李德等“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思想，要红军在重要城镇、大居民点、交通要道、隘口等地构筑碉堡，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来顶住敌人，还经常轻率地要红军主力对敌人的堡垒阵地或有堡垒作依托的敌军发动进攻。在这种错误战略指导下，红军对敌军的反击战，虽然都打得非常英勇顽强，但都没有能够击破或打乱敌人的进攻计划，红军自己却遭受到重大损失。

4 月 10 日，敌人集中 11 个师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城池广昌，编成河西、河东两个纵队，沿抚河东西两岸交替筑碉前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以及敌军装备精良、军力强大的情况，急忙抽调红 1 军团、红 3 军团、红 5 军团、第 13 师、红 9 军团、红 23 师，共 9 个师的兵力，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敌人进行“决战”，提出了“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错误口

号。广昌保卫战开始后，战斗非常激烈，历时 18 天。红军虽然给了敌军很大杀伤，但是自己也伤亡了 5000 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干部伤亡数也很大，有一个团，连级干部只剩下一个人。这一仗不但没有保住广昌，还丢掉了建宁。27 日晚，红军撤出广昌，向广昌以西以南转移。这是一次与敌军拼消耗的阵地战，给红军以后的作战，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广昌之战后，敌军重新调整部署，加紧对中央苏区中心地带的“围剿”。这时，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已很短缺，红军已经失去了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应当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适时地突进到外线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战机，歼灭敌人。早在“福建事变”时候，毛泽东就向中共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广昌之战后，在瑞金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提出：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至于转移的方向，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但是中央没有接受这些主张，而只是致力于阵地防御。

国民党的“堡垒主义”战略采取“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的原则，得利于红军打阵地战。毛泽东主张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应该跳出敌军包围圈，打到敌人后方去，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周恩来也是这么想的。他虽然对中央苏区的作战无权决定，但当他派遣程子华去鄂豫皖苏区进行反“围剿”战争时，是这样交代的：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占绝对优势。敌人用碉堡、封锁线，把根据地不断压缩并分割成几小块。敌人有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交替地攻击、堵击、追击。我们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也变小了。这样下去，如果红军得不到人力、物力补充，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出路是什么？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根据地的压力。根据地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老根据地就能保存了。

关于建立新根据地的想法，周恩来也是和毛泽东一致的。程子华回忆这次谈话写道：“红军主力去建立新根据地，应选择什么地区呢？周副主席谈到这个问题时，是从毛主席关于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的规定出发的。”“根据地要选择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有较大的革命影响，或者是那里的群众容易争取；要具备便于我军作战、防御的地形和较丰足的粮食和其他物质条件。”

周恩来 1934 年 1 月初回到后方瑞金后，前方的军事指挥实际上是由博古、李德直接负责了。以后这一段时期，周恩来说，他主要是管军事，而且是形式上的，实际是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他只是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

后来，1943 年延安整风中，周恩来曾经检查自己犯了王明“左”倾错误

程子华：《为党掌握武装而斗争——回忆在周总理教诲下走过的胜利历程》。

时说，教条主义者们之所以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除了有共产国际的原因外，还同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为教条主义者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所迷惑有关。周恩来是严格要求自己了。实际上，周恩来对李德的错误是有抵制的。根据当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

周恩来同志当时也是军委副主席，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同李德接触较多，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的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

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进行这些争论时，我经常在场，有时由我从中翻译，有时周恩来同志直接用英语对李德讲。他对李德的错误最了解，只是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坚持“左”倾错误，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周恩来同志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周恩来对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本来就是了解和赞赏的，所以他当然是支持毛泽东同志的。

周恩来一直是重视部队的政治工作的，这时又是红军的总政治委员，直接抓政治工作。1934年2月7日，他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开幕会上的致词中说：“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12日，他在会上作《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报告。报告中说：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一切政治工作，都要为着前线上的胜利。报告在谈到红军目前实行的堡垒战、阵地战时，他指出：“我们主要的作战形式还是运动战”，“我们反对单纯防御路线，我们要进行运动的防御”，“从运动战中来消灭敌人，这是最有把握的”。

广昌之战失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开会，讨论中央红军是否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问题，讨论结果决定红军主力准备走。这次会的时间大概在1934年5月。会后，将这个决定报告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表示同意。从决定转移到出发，中共中央书记处开过四次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成立“三人团”，“由三人团处理一切”。周恩来说过：后来的实际情况是“三人团”主要管军事，而且是形式上的，实际仍是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例如中央红军转移时党政领导干部谁走谁留下这样的大事，就没有在“三人团”讨论，完全是博古决定，没有告诉周恩来。

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撤离中央苏区，但是主管军事的李德并不积极作撤离的准备，仍然是硬打硬拼。7月上旬国民党军以31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开始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全面进攻。李德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错误方针，继续同占优势的国民党军拼消耗，说什么“以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8月5日，国民党军集中9个师向驿前以北地区发动进攻。红军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15公里纵深构筑阵地固守。在6日的高虎脑、半桥防御战和13日的万年亭防御战中，红军击退国民党军的多次集团冲锋，使蒋介石的精锐第89师丧失战斗力退出战斗，但自身也伤亡很大，不得不于27日

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其余各路敌军均向中央苏区中心推进，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已经只有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联成的一块狭长地区了。只是到此时，红军才真正准备出发，向新的地区转移。

8月18日，周恩来在《红星报》上发表《新的形势与新的胜利》。文章说：在六七两月，敌人经过了重新部署兵力和修补马路碉堡，7月的下半月便进行了大举进攻的新的步骤。进攻的主要路线是以三个纵队兵力，向驿前方向进攻企图占石城。配合进攻的有由连城方向攻汀州，西北线五个师以上兵力攻兴国；南线逼粤敌以主力进攻会昌。文章提出：苏区的形势险恶，红1方面军要时刻准备着全部出动去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文章实际上暗示了要准备转移。

当时苏区南线的“围剿”军是粤军陈济棠的部队，他们对“围剿”很消极，对红军打打停停，占领筠门岭后就没有再前进。历史上陈济棠曾经通电反蒋，他担心蒋介石打败红军后会从福建方面抄粤军的老家，因而想与红军和谈。陈济棠派了一个认识周恩来的姓徐的高级参谋秘密到瑞金，给周恩来送来一封信，说准备派总参谋长黄幼民和黄旭初、黄炽文三人为谈判代表团，你们最好派你们的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谈判。周恩来找何长工谈了话，要何长工当总代表同陈济棠谈判。周恩来说：“长工，如果我用电报通知你，说你喂的鸽子飞了，你就赶快回来，我会派一名干部在会昌等你。”

何长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穿着西装，戴上草帽和墨镜，坐着四人抬的大轿，带了一个骑兵连，前去谈判。到筠门岭敌军前哨时，敌军连长对部下说：“这是总司令请来的客人。”他们对何长工说：“何司令，不打了，两家和着算了。打败了你们，我们捞不到什么，你们打败了我们，最多也只能到广东吃几根甘蔗。”何长工同黄幼民等在离筠门岭约40里的一座洋楼中谈判，经过三天三夜，达成五项协议：一、同盟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三、互通情报，设有线电话。四、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五、可以互相借道，双方在现战线后退20华里。

这时，何长工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说：“你喂的鸽子飞了。”黄幼民得知后问：“你们是不是远走高飞？”何长工答：“不是，这是说我们和谈成功了，和平鸽子飞上天了，表示祝贺。”陈济棠派了一个骑兵连送何长工回苏区。何长工到会昌后，周恩来派人送来一封信，说在于都等他。何长工连夜到于都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这次谈判谈得很好，不过我们不能这样做了，我们要行动。别的职务暂时没有，请你到教导师当政委。”

这时，各路红军都集结在于都河（贡水）北岸。要离开苏区出征，必须渡过于都河，就要在河上架桥。于都河宽六百多米，水深一至三米，河底为沙石。为了架桥，周恩来已在于都住了20多天，亲自指示征集器材。为了避免暴露，架桥作业在每天下午5时到次日晨7时之间进行。10月14日，周恩来来到作业现场视察。10月16日，渡河行动开始，连续几天，都是在下午6时到第二天晨7时之间进行。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红军总部已从瑞金出发，踏上征途。

在这之前，10月上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由项英、瞿秋白、陈

何长工：《同陈济棠部队谈判前后》。

潭秋、贺昌、陈毅五人组成中央分局留下，并成立以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

10月21日，出征的红军突破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据守这一道封锁线的是粤军，由于谈判达成协议，红军向南突围时敌军实际是边打边撤，没有对红军堵截，所以红军在短时间内顺利通过了陈济棠的管区。之后的一个多月中，红军以“久困之师”，又连续突破敌军的第二、三、四道封锁线，打破了国民党中央军和粤军、湘军、桂军三四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冲出了重围，渡过了湘江。部队从西征开始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

国民党判断中央红军将会到湘西同红2、6军团会合，就在湘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了20万军队，设了四道防线。

12月4至6日，红军翻越老山界。从这时起，中央领导层内发生争论，主要是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造成的。红军应当采取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并向周恩来提出：鉴于在去红2、6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省通道县城。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开会，讨论了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周恩来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向贵州进军的建议。但是，会后博古、李德仍旧坚持到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

15日，红军攻克黎平。18日，周恩来在这里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渡乌江北上。会议的《决定》指出：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目前已不可能，而且不适宜，“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会议决定到遵义后开会总结反五次“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和教训。黎平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有了黎平会议，才有遵义会议。周恩来后来说：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这以后不久，停止了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

1935年1月2日至6日，红军渡过乌江。1月7日，占领遵义。遵义是贵州北部的一个重镇，四周山峦起伏。它北通四川重庆，南是贵州省会贵阳，东有武陵山，西有大娄山，全城约有三万多人，交通方便，市面繁荣。红军西征尽管战斗艰苦，但仍是纪律严明的人民军队。周恩来是红军总政委，他在处理军事全局之外，仍十分强调政治工作。红军占领遵义后，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周恩来亲自检查了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会议鉴于情况已有变化，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会议的第二项议题是清算“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博古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说红军失利是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接着周恩来作这个问题的副报告。他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地承担了责任，并批评了李德、博

古的错误，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会议认为：军事领导的错误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同志负责，而李德、博古应负主要责任，提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 error，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会议最后作出以下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二、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撤消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

聂荣臻说：周恩来“从长期的实践中，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见解是正确的，也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确定向四川进军。当时选定的北上渡长江的地点是在重庆上游宜宾到泸州一线。1月19日，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赤水、土城前进。周恩来和中央纵队离开遵义到泗渡。

在遵义会议上，曾经批评中央政治局对军委领导非常不够，所以此时政治局每天讨论作战和行军路线，周恩来、朱德根据会上决定下达作战或行军命令，组织实施。

红军的行动，使得蒋介石感到川南受威胁，于是急令驻川参谋团贺国光和川军刘湘组织“川南剿总”，派潘文华为总指挥驻泸州，集中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布置堵击，封锁长江。另一方面令龙云的滇军入黔，令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红军，调中央军上官云相部由豫、鄂入川至松坎，令周浑元部渡乌江至黔西、大定（今大方）侧击红军，吴奇伟部在贵阳待命。

1月29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指挥红军西渡赤水河，准备相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但这时川军潘文华部36个团已到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防堵。红军避实就虚，进入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区。在进入扎西之前，途经四川、云南、贵州交界处的鸡鸣三省村时，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博古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红军2月8日进驻扎西镇，在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回师东渡赤水，重占遵义。2月20日左右，红军二渡赤水，24日占领桐梓，25日攻下娄山关，28日进入遵义，追击敌军直到乌江北岸。这一战役击溃黔军王家烈部8个团和吴奇伟部两个师，俘敌约3000人，缴枪千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

红军二渡赤水后，蒋介石亲自飞到重庆进行“督剿”，下令要围歼红军于乌江以西地区。

面对这一形势，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和王稼祥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并且规定“各兵团一到集中地即受前敌司令部指挥，但第1、3军团后方部则受野战司令部指挥”。

蒋介石指挥军队向遵义合围，红军则由遵义向西开进。3月10日，中共

中央在苟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下一步军事行动，林彪、聂荣臻提出进攻打鼓新场（现金沙县）的建议，会上得到通过。周恩来后来回忆说：

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的，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会后，中革军委发出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避免了红军一次重大损失，因为如果红军攻打新场，12日才能到达，届时滇军也将赶到和黔军会合，而且川军还可以侧击红军。10日晚，军委下令红军向平安寨、枫香坝、花苗田地集中，寻求新的机动。

这之后，鉴于作战需要集中和果断，召集那么多人来讨论容易误事，毛泽东提议还是成立一个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西渡赤水红军南下渡乌江前，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也即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为“团长”。

遵义会议后的红军行动，同过去大不一样，忽东忽西，飘忽不定，避实击虚，攻城略地，蒋介石只好分散兵力，四面防堵。3月16日，红军又西渡赤水，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迅即调兵到川南防堵，不料红军突然又掉头东向，四渡赤水，从遵义、仁怀大道疾进南下。蒋介石急由重庆飞抵贵阳指挥堵截。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4月2日佯攻息烽，前锋逼近贵阳，蒋介石大为着急，急调滇军到贵州增援。红军派一部兵力东渡清水江，佯作东进湖南。蒋介石怕红军去与红2、6军团会合，急令中央军和湘军、黔军堵住红军不让东出湖南。不料红军主力在贵阳城下虚晃一枪，即迅速南下，乘云南兵力空虚，从4月10日起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今长顺）等县城，16日至18日在贞丰县的白层渡过北盘江占领贞丰、安龙、兴仁等县，23日进入云南，随即占领平彝（今富源）、罗平。27日连克白水、曲靖、沾益、马龙，前锋逼近昆明。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赶紧调兵防卫昆明。红军趁金沙江两岸空虚，决定“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军委派刘伯承率领干部团直去禄劝县皎平渡。周恩来亲自到干部团了解情况，作了布置。同时决定红1军团夺取龙街，红3军团前往洪门渡占领渡口。

莫文骅曾经讲过抢渡金沙江的情况：

4月29日那天，干部团前进到离天险金沙江280里的彝民地区，接到中革军委命令，要干部团“五一”夺取金沙江。30日，一天走了100里，半夜起来继续走，一天一夜走了180里，金沙江已映入眼帘，波涛汹涌如万马奔腾，真是“浩浩长江水，莽莽向东流”。队伍迅速接近河边，那里正横着两只小船，可以容30个人，于是先渡过去一排人。在河边上捉住了60多个国民党兵。两只小艇一日夜只能渡1300多人，于是又分头找船，结果弄来了6条船，撑船工人纷纷替红军撑船，使得红军渡河成功。干部团渡江到北岸后，接到命令占领离河岸20多里的通安，于是留一个连维持渡河秩序，其余攻向通安。结果，敌人伤亡遍地，被俘600多人，内有团长一人。这时才知通安敌人有两个团，内有副师长一人。通安战斗，开辟了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天险的道路。从数量上说，抢渡金沙江的先头部队只有80人左右，参加通安战

斗的也不过 400 条枪。

5 月 4 日，周恩来渡江，和毛泽东、朱德、刘伯承一起指挥红 1、3、5 军团于 9 日全部渡过金沙江。红 9 军团也在云南巧家过江。至此，红军终于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5 月 12 日，周恩来参加在会理郊外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意见。

24 日，红军占领大渡河边上的石棉县安顺场。安顺场是大渡河边的一个渡口，这里同金沙江一样，架桥是不可能的。金沙江水流湍急，不可以坐船成直角渡江；在安顺场渡大渡河，船一定要顺水冲成斜角才能渡过，来回要一个小时才能渡一次，而当时只有一条船。渡河点的对岸有敌军一个营据守，河中是波涛澎湃，岸上是火力封锁。清朝同治二年四月，也就是阳历 5 月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太平军几万人到安顺场，渡河未成，全军覆没。蒋介石希望红军到这里后，成为“石达开第二”。

红军到达安顺场后，就凭这一只木船，17 个勇士在汹涌波涛中抢渡成功，攻占了对岸。26 日下午，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赶到安顺场，看见大渡河水流太急，虽然此时已有四只小船，但一天只能渡一团多人，于是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聂荣臻、刘伯承率红 1 军团第 1 师和干部团循大渡河左岸，林彪率红 1 军团指挥部、红 2 师主力和红 5 军团循大渡河右岸，上溯 300 里，抢夺泸定桥。29 日，红 1 军团第 4 团第 1 营第 2 连 22 名战士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占领泸定桥，到 6 月 2 日，红军全部过河。

渡过大渡河后，国民党在后面复占泸定桥。红军继续北上，在天全河击溃敌杨森部 6 个旅的堵截，7 日占天全，8 日占芦山，突破敌军的芦山、宝兴防线。接着，翻越海拔 4000 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道路险峻的夹金山。夹金山位于宝兴县西北，懋功南面，茂州、理县西南，每天下午就大雪纷飞，山下是夏天，红军只穿一身单军衣，山上则是严冬，红军上山前既不可能补充衣服，也不可能发点酒，只由各连烧些辣椒开水每人喝一碗。不少红军战士牺牲了，永远留在了这里。

6 月 12 日，红 1 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到达懋功（今小金）的达维，和红 4 方面军的先头部队李先念部会师。16 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也翻过夹金山到达维。达维是藏民区。在达维休息一天后，就到懋功，与在懋功的红四方面军第 30 军会合。晚上，开了红 1、4 方面军干部联欢会。

红军在懋功，东边控制了由灌县进懋功的要道巴郎关，南边控制了由天全、宝兴进懋功的夹金山，抗击两面追来的川军。因而能够休息几天，进行整顿。16 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张闻天致电红 4 方面军领导人说：“今后我 1、4 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指出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大渡河西岸和西康（当时的西康省，为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地区）“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6 月 20 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张闻天致电张国焘，请“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但是张国焘推托不来。当时张国焘的口号，一是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一是西进西康、青海、新疆，认为不同意他的这种主张就是右倾，就“应当严厉反对”。为了统一战略思想，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6月26日在两河口开会。周恩来等离懋功到达两河口。

6月25日，周恩来在两河口出席了红1、红4方面军会师大会，并会见了张国焘。张国焘问周恩来，红1方面军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周恩来因张国焘也是中央负责人之一，当然实言相告，说大约还有3万人。张国焘听了以后，自恃红4方面军现在有8万兵力，对中共中央的态度就立即变得强硬起来，并且说红4方面军准备西去。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县两河口开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刘伯承、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林彪、彭德怀、聂荣臻、张国焘、林伯渠、李富春，共16人。

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回顾了红1方面军撤离苏区以后的转战经过，围绕目前行动方针问题，论述了在松潘、理县、茂县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理由是：（一）川陕甘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县、茂县地域虽大，但道路狭窄，敌人易封锁我，我不易反攻。（二）川陕甘群众条件好，人口较多，1、4方面军要扩大红军，必须在人口多的地方才好。而松、理、茂加抚边一带，人口只有20万。（三）松、理、茂一带粮食缺少，有些地方甚至粮食还不能自给，草原牛羊也有限，生活习惯也不适宜。另外，敌人正要阻截、封锁我们，其意图是陷我于松、理、茂地区，我们如果真的陷在这里，就没有了前途。因此，必须迅速前进，向东向南都不可能，应向岷山山脉（四川北部与甘肃相邻的大山脉）以北发展，争取这一地域。

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他提出五点意见：（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的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二）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翻过山去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三）应看到哪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它。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松潘方面，如攻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就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6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的地区去。（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朱德也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说：背靠西北、面向东南这一总的战略方针应该决定下来。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打下敌人，建立根据地。要调动敌军在野战中消灭之。

会上，彭德怀、林彪、博古、王稼祥、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等也都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从松潘打出去。张国焘在会上也发了言，口头上也表示同意北上的战略方针，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最后，会议“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政治部作训令（博古）；政治局写一个决定（洛甫）”。

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内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部，夺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红军能胜利地向甘肃前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都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可以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

地区成为川陕甘苏区的一部。

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情况是：红 1、4 方面军会合后，蒋介石估计红军可能入西康、青海或者北上陕甘，同时也要防红军向东，所以集结了川军主力刘湘、孙震、李家任等部约 90 个团兵力，固守江油、汶川一带；用胡宗南部 27 个团固守甘肃文县和四川松潘、平武、江油地区；用杨森、邓锡侯所部约 50 个团由宝兴、大川、牛头山向红军方面筑垒推进；用刘文辉、李抱冰约 15 个团在康定、丹巴、泸定地域筑垒并扼守大渡河。另外，用薛岳部向四川绵阳集中，郭勋祺部在新津集结，用意都在于策应岷江东岸。同时任于学忠为川陕甘“剿匪”总司令。这些部署，其意图就是阻止红军入甘肃或东渡岷江，也防堵红军向南复渡大渡河，就是想用川北的广大荒原，以封锁和困锁红军，使其灭亡。

鉴于蒋介石的上述部署，红军为了不被困死，必须迅速北上，首先要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控制松潘以北和东北的通道，以利向北作战。6 月 28 日，中革军委发出了《关于进攻胡的战役部署》。29 日，又发布了松潘战役计划。张国焘开始也表示“同意打松潘”，还说“松潘占后，平武、南坪就好打了”。但是，当胡宗南集中 10 个团以上的兵力于松潘时，张国焘畏惧而不敢进攻松潘了。29 日，他违背中央决定，提出“1 方面军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兵力向西发展；4 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的四面出击的错误主张。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和反对，松潘战役计划没有能实现。

6 月 29 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但是，张国焘并不满足，想攫取中共中央的更大权力。他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表示要“充实总司令部”，要任总政委。他鼓动一些人向中央要职务，如陈昌浩在 7 月中旬连续致电中央，表示“职意仍请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并要“给军委独断决行”的大权。为了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北上，周恩来愿意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7 月 18 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暂由周恩来帮助；陈昌浩参加中央军委常委。张国焘在会上提出要增加红 4 方面军一批人增加为中共中央委员，会议没有同意。

红军丧失了进攻松潘的有利时机后，必须另找途径迅速北上。8 月 3 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改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4 日至 6 日，中共中央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当时政治局委员共有 8 人，张国焘要再增加 4 方面军干部 9 人为政治局委员，遭到会议拒绝。会议最后作出了增补三名正式中央委员、两名政治局委员、两名候补中央委员等组织决定，并决定恢复红 1 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红 1 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沙窝会议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红 1、4 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以红 1 方面军的红 1、红 3 军（即原红 1、3 军团）和 4 方面军的红 4、红 30 军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率领，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北进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左路军以红 4 方面军的红 9、红 31、红 33 军和红 1 方面军的红 5、（即红 5 军团）红 32 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以朱德为总指挥、张国焘为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北进向阿坝地区开进，到阿坝后东进到班佑同右路军靠拢，

然后向甘南齐头并进。

自从长征开始以来，周恩来一路上十分辛劳。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挂起地图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等情况汇齐后，经过分析研究，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商定，然后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睡觉时往往将近黎明。遇有紧急情况时，常常彻夜不眠。白天又要同大家一起行军。由于粮食缺乏，他同大家一样吃野菜和青稞。最后，终于积劳成疾，到8月上旬，连续几天一直发高烧，不能进食。医生检查后确诊是肝炎，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但是在当时环境下无法消毒，不能开刀和穿刺，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并从高山上取来冰块冷敷在他的肝区上方。同时把因病编在休养连行动的邓颖超调来照料。周恩来睡在木板床上，一直昏迷不醒，邓颖超就在地上铺了点稻草，睡在一旁照看。靠着冰块局部冷冻，周恩来逐渐清醒过来，后来排出了半盆绿色的脓，烧慢慢退下来，才发现邓颖超在他身边。

这时候，军情紧急。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分工负责军事。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因病没有参加。会上，毛泽东首先作报告，再次强调北上创建根据地的方针，并指出红军到达夏洮流域后，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会上大家同意这个方针。

8月21日，右路军开始北进过草地。草地一望无际，都是绒密的青草，气候恶劣，天天下雨，水流满坑遍野，有些地方三四十里水深及膝，犹如泽国。水呈淤黑色，发出阵阵腐臭气味，喝了立刻肚子发胀，甚至胀而致死。地质面硬而下软，因为地面长满青草，草根互相联结，草丛下河沟交错，泥泞不堪，人走在草上就会摆动，必须小心翼翼，轻轻踏步，一不留神就会陷入泥中。地面下的淤泥松而且黏，人和骡马一陷入其中，就不易挣扎出来，越陷越深，甚至遭灭顶之灾。红军在草地行军，没有固定的道路，全靠自己开辟，认准北方，向北前进。

周恩来是随红3军过草地的。他连续几天发高烧，没有吃东西，身体十分虚弱，根本不能行走。看到这个情况，彭德怀果断地说：“抬”。他要红3军参谋长萧劲光组织担架队，把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抬出草地。担架队组成后，在1925年东征中曾任周恩来副官的陈赓自告奋勇担任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要亲自给周恩来抬担架，和战士一起抬着担架艰难地走过了草地，磨破了双肩，自己也累病了。周恩来自己无法走，心中很难受，多次想挣扎着走下担架来又做不到。几十年后他仍念念不忘这段情谊，50年代杨立三去世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一定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葬。

胡宗南发现红军北上后，即令第49师于8月27日向包座急进，会同在上下包座地区的独立旅堵截红军。8月底，已经北出草地的右路军与敌军激战，歼敌军一个师共5000多人，缴枪1500支，完全占领上下包座。这是红1、4方面军会合后的第一次重要战斗。这样，红军北出甘南的门户已经打开，胡宗南的主力部队远在下里之外，甘南敌军不多，碉堡封锁线尚未筑成，从下包座到甘肃的西固、岷州只有五六天路程，沿途是汉人区，路宽、粮多、房多，如果左路军能迅速靠拢过来，红军集中向东北开进，将能打开新的局面。

这时，左路军也已经过了草地，到达阿坝地区。但是，到阿坝后，张国焘又对北上发生动摇。9月2日，他致电中央，说什么“噶曲河水涨，上下

30里均无徒涉点”。3日，他又致电中央，公然反对北上方针，决定南下，说什么“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以待毙”，“决定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还说，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也多阻碍，要右路军也南下“回击松潘敌”。

9月6日，周恩来随红3军在阿西，得知在甘肃南部的国民党军只有新编第14师师长鲁大昌的一部，于是和彭德怀、李富春告知红1、3军休整几天，并致电在前面的红1军集中在俄界，向罗达侦察。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来周恩来住处开了一次非正式会议，到会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王稼祥。会议分析了南下、北上的利弊。周恩来和毛泽东都认为只有北进才有出路。陈昌浩表示南下要再走草地，不好，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主张南下。会议经过讨论，决定7人联名答复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希望左路军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

9日，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周恩来、洛甫、博古、毛泽东、王稼祥，仍坚持南下。这天，他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要他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由于陈昌浩正在作报告，电报先到了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手里。叶剑英看后觉得事关重大，借机到毛泽东住地给毛泽东看了。毛泽东感到情况紧急，立即与洛甫、博古等磋商，一致认为等待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当即到红3军驻地与周恩来、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确定中共中央和红1、红3军立即北上，脱离险境。

10日清晨，中共中央率红1、3军北上。周恩来率领后梯队出发，途中制止了前来追赶的红4方面军同志想动武，保护了红1方面军干部危秀英等脱险，然后经阿西于11日到达俄界。在阿西时，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陈昌浩、徐向前，令他们率红4、30军跟进，并规定以后右路军统归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以红1、3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并成立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的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17日，红军攻克甘南门户号称天险的腊子口。27日，周恩来出席在榜罗镇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陕甘支队向陕北苏区行进，和当地红军会合。

红军到达甘南，这里人烟稠密，物产丰盛，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面粉、盐、油，这同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几个月不尝油、盐相比较，真是大不相同了。到了哈达铺，休息两天。这里物价便宜。总政治部特别提出口号：“大家要食得好。”这个新奇的口号传遍了整个部队。各个连队伙食单位都宰鸡杀鸭，屠猪宰羊，每天三顿，每顿三荤两素。战士们喜气洋洋，不约而同地说“过新年啊！”

榜罗镇会议后，陕甘支队作好了去陕北的政治动员和物资准备。29日，中共中央率红军分三路北上，翻过六盘山，通过回民区，穿过国民党军的两道封锁线，7日在固原县青石咀消灭来犯的东北军何柱国部骑兵一部，缴获敌马百余匹。红军从此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今吴旗）镇。并击溃了尾追而来的敌军骑兵2000余人。10月22日，周恩来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

略任务是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的革命。至此，红 1 方面军主力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十余省、行程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陕甘支队在吴起镇短期休整后，10 月底经保安东进，于 11 月初在付泉附近同红 15 军团会合。11 月 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常委的分工问题。会前，张闻天有一个考虑：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周恩来负责组织局的工作。会上王稼祥提出，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有经验。毛泽东也支持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提出主要仍由周恩来负责，自己当副手。周恩来表示：个人愿意做军事工作，但领导不必更换，由毛泽东任主席。最后，会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即中革军委），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从此以后，毛泽东与周恩来这两位伟大的军事家一直密切合作，互相配合，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军事，决胜千里之外，直到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红 1 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同红 15 军团会合，敌人感到是很大的威胁。敌“西北剿总”决定以五个师的兵力，南进北堵，逐渐向北压缩，消灭红军于洛水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10 月底，敌第 57 军四个师沿葫芦河东进，11 月 1 日占领大白镇，留一个师留守，主力向直罗镇、邠县（今宫县）前进。13 日，周恩来出席军委会议。会议决定乘敌第 109 师比较突出，部署歼敌于直罗镇地区。

直罗镇是甘肃合水通向陕西部县大道上的一个大集镇，南北是山，中间一条狭长谷地，大部队展开较难。11 月 20 日下午 4 时敌第 109 师进至直罗镇。当夜，红军将其包围。次日拂晓发起进攻，不到两个小时就占领了镇子。敌师长牛元峰率一个多营逃到镇东头一个小寨顽抗。徐海东回忆说：“这时太阳升起了老高。我们向山上看去，只见周副主席同其他同志从山上走下来。他们都拿着望远镜，边走边向敌人固守的小寨子观察。当走到我们近前时，周副主席和干部们一一握手，详细地询问了第一次攻击的情况。最后周副主席指示：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粮，又没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他。”这时，东西两路敌人援军开来。红军以少数兵力围困第 109 师残部和阻击从邠县西援的敌第 117 师，主力向西迎击由西向东开来的敌 57 军另外两个师。敌军害怕被歼，23 日下午沿葫芦河西撤。红军歼其一个团，敌军退回太白镇。敌第 117 师也逃回邠县。“牛元峰待援无望，趁黑夜率领残部向西突围逃跑，我 75 师的战士，随即跟踪追击。战士们说：‘一定要把这条牛追回来。’一气追了 25 里，追到直罗镇西南一个山上，牛元峰和他率领的残部一个多营最后覆灭了”。

直罗镇战役，共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 5300 多人，缴枪 3500 多支，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第九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

- 多次东渡黄河，协助毛泽东部署红军主力东征作战。
- 同张学良在肤施天主教堂会谈。事后，周恩来说：“快慰平生”；张学良称：“一见如故”。
- 瓦窑堡遇险，他沉着冷静指挥，首先保护毛泽东等撤离。
- 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迫蒋介石承诺：“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
- 奔忙于延安与西安、南京、上海、庐山之间，同蒋介石及其代表商谈合作抗日事宜。
- 一份珍贵的手稿——《对日作战刍议》，可见他当时的军事指导思想。
- 赴山西会晤阎锡山，提出平型关、忻口作战方略，推动山西全民抗武。阎锡山说：“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
- 在武汉开展军事统战工作，曾多次与白崇禧会晤。为徐州会战献计，白崇禧、李宗仁大加赞赏。
- 武汉沦陷前夕，到《新华日报》社口授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并最后一批撤离。

红 1 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的时候，中国的形势正处在急剧变化中。1935 年，日本发动了“华北事变”，更加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钦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了《何梅协定》，国民党政府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达成《秦土协定》，把河北、察哈尔省（今北部属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属河北）的大部主权给了日本。接着，日本又搞什么“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要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实行由它控制的“特殊化”。国民党政府竟然答应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实际承认了河北、察哈尔的所谓“自治”。

1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所提出的这些条件，不但要并吞整个华北，而且要把全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领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保卫华北与保卫中国，以争取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中国工农红军现在是站在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最前线，它坚决的相信，它是能够胜利的承担起这一光荣的历史任务的。”

红 1 方面军主力北上甘南时，蒋介石为了统一西北方面对红军的“围剿”，在 9 月 26 日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己任总司令，以东北军领袖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山西五省军队，组织对红军的“围剿”。

这时在陕北的红军只有一万余人。苏区的面积狭小，人口很少，粮食不足，物资缺乏，红军给养困难，并且不易扩充。在苏区四周包围苏区的敌军，有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第 17 路军）、宁夏马家军，共 10 多个师。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正在向西安——兰州公路两侧集中。苏区的北边和东边有原驻守陕北的国民党军第 84、86 师和从山西西渡黄河过来的阎锡山部 5 个旅。敌强我弱，苏区处于围困中。

1935 年 12 月 17 日至 25 日，周恩来参加了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

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形势、任务和军事战略问题，分别作出了决议，认为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中国革命到了一个新时期，党的策略路线和政策都相应地作了改变，在军事上确定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的方针，“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之最广泛的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

这次会上，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这月，周恩来指示中共陕甘省委做东北军下属一些师的工作。到月底，红军和驻守陕西甘泉的东北军达成了抗日协定，双方在前线面对互不打枪。

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达到一个新的高潮，中国革命开始进入向全国性对日抗战过渡的阶段。

1936年1月25日，周恩来和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等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东北军的将士们绝大多数都是愿意打日本帝国主义的”，东北军的出路不在打红军，不在进攻苏区，而在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

对于在几次战斗中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军官，周恩来组织他们参加学习班，使他们了解红军的抗日主张。193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阅兵式，让学习班的人也参加了。周恩来在阅兵式前讲话，号召东北军和红军携起手来，共同抗日。周恩来还亲自到学习班向全体学员作报告，分析了必须抗日救国的道理，讲了团结抗战的重要性，号召全体东北军官兵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力量。

东北军军官高福源，是张学良很熟悉的部下。高福源在学习班中弄清了是非，亲眼看到红军的所作所为，苏区军民团结一心抗战，又听了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和亲切谈话，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决定回去把所见所闻亲自报告张学良，向张学良提出联共抗日。

张学良担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后，司令部设在西安。开始的时候，他认为红军人数不多，打败红军不成问题，待“剿灭”红军后再抗日吧。但是同红军打了几次，都吃了败仗，东北军不到三个月被红军歼灭了三个师。他的部队被红军消灭一个师，就被蒋介石取消一个番号，再得不到补充。长此以往，他担心东北军将会丧失殆尽。高福源向他报告了所见所闻后，他很高兴，要高福源再去瓦窑堡，带去一封信，约共产党负责人在洛川相见。高福源到苏区转送了张学良的信。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决定，随即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去洛川会谈。1月21日，李克农来电报告说：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的不乏其人，对“剿共”态度消沉，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复通商。

周恩来除了负责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外，还协助毛泽东部署军事工作。1月上旬，他和毛泽东命令红1军团、红25军向陕西关中的洛川、白水、澄城、韩城、宜川地区进军，以扩大苏区和红军，扩大抗日宣传；向北则令刘志丹、宋任穷率红28军、红78师直逼横山县城，以巩固苏区北部。这时，南面的西北军杨虎城一贯是与中共有来往的，东北军已取得默契，北面则是大沙漠，红军要实现抗日和取得发展，只有向东。1月10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红军在陕北渡过黄河东征。通过山西，开赴冀察前线，直接对日作战。

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红军东进抗日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17日，周恩来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2月中旬东征，周恩来、博古、邓发留在后方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全面负责东渡黄河的后勤准备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组织了黄河游击师，师长阎红彦、政委蔡树藩、政治部主任杜乎，兵员近500人，负责赶造船只，筹办粮食物资，组织水手工会，做好治河警戒，进行东岸侦察。周恩来亲自拟定了《后方工作计划》，对红军东征的后勤事宜作出具体安排。

山西的阎锡山为了阻止红军东进，急忙将已进入陕北的晋绥军4个旅撤回柳林、离石、中阳地区，会同本来已在这地区的第71师等部加强防守。2月17日后，周恩来到清涧县，指挥红28、红30军在晋绥军东撤时，进占了宋家川、吴堡等要点，并且配合地方武装，收复了陕北苏区的一部分被占地区。20日，红军主力渡黄河东征，周恩来多次东渡黄河，协助毛泽东指挥红军东进。3月初，协同毛泽东部署了兑九峪战斗，歼敌两个团，迫使阎锡山将部队撤到同蒲铁路沿线。阎锡山一面向南京蒋介石请求派军队增援，一面把自己能机动的部队集中起来，编为4个纵队，向红军反击。鉴于黄河西岸敌军防守空虚，周恩来电告刘志丹、宋任穷：红28军有“恢复打通并扩大神木、府谷、葭县、米脂苏区消灭敌高双成一部的任务”。红28军由吴堡地区北上，进入神府苏区，协同当地武装，积极打击敌人，收复了神木、葭县（今佳县）的大部失地，并以一部兵力沿黄河西岸活动，策应东岸红军主力的行动。周恩来到陕北后，又指示红28军从兴县罗峪口强渡黄河，到离石、中阳一带配合南线红军作战。

在军事统战工作方面，周恩来布置李克农再次去洛川同王以哲、张学良谈判，指出：先商谈局部合作抗日和经济通商问题，力争谈成。经周恩来的安排，2月21日，李克农、钱之光、戴镜元等由高福源陪同，从瓦窑堡出发，25日到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谈判。这期间，南京的蒋介石也在经过陈立夫、陈果夫系统的曾养甫同中共北方局所派的周小舟、吕振羽接触，王世英则同西北军杨虎城达成了红军与西北军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各守原防、互不侵犯等协议。周恩来主张，对南京蒋介石的工作与对西安张学良的工作，应当分头进行，对张学良的工作仍旧经过前方的王以哲。到3月初，李克农和王以哲达成四条口头协定：（一）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二）红军同意恢复王的第67军在鄜县（今富县）、甘泉、肤施（今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经济通商。（三）肤施、甘泉两城现驻67军部队所需粮秣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四）恢复苏区与白区之间的通商。

周恩来和张闻天、毛泽东等在3月5日向陕北红军各省发出电报，传达了这些协定，说“务使我方军民与67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到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讨论抗日讨卖国贼之目的”。

李克农在洛川同张学良见面时，张学良表示：“希望跟周恩来先生亲自谈一谈。”李克农回来后，汇报了这一情况。3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到肤施同张学良会谈。

这时周恩来是在山西前线，27日和李克农等动身回陕北瓦窑堡。2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署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为一致抗日告全国民众书》发表，提出了停止一切内战，不分红军、白军，联合抗日；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会，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等等。周恩来回

到瓦窑堡后，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介绍了东北军、西北军的情况，说这两支部队都有可能联合反蒋。会议决定加强做这两支部队的工作，认为杨虎城是可靠的同盟者，应当真诚地问他谈判，并要王世英转告杨虎城，注意搞好同东北军的关系。

4月7日，周恩来由李克农陪同从瓦窑堡出发，8日晚到达肤施城东北二十里的川口。9日，张学良、王以哲偕中共党员刘鼎由西安乘飞机到肤施。当晚，周恩来同张学良在肤施的天主教堂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谈。会谈从晚上一直到第二天清晨4时，参加的人有张学良、王以哲和周恩来、刘鼎、李克农。李克农、王以哲等在外间，周恩来、张学良在里间谈。开始寒暄时，周恩来说，自己是在东北长大的。张学良说，他知道，他听老师张伯苓讲过，我们是同师同年。

会谈就这样谈下去，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认为在抗日问题上，有可能争取同蒋介石合作。周恩来说：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意把张学良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他们都对会谈十分满意。

周恩来10日偕李克农、刘鼎离开肤施，12日返瓦窑堡。他在4月22日给张学良的信中说，9日会谈“快慰平生”，中共中央领导诸同志“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并告诉张学良“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如约派刘鼎继续赴张学良处工作。张学良在会谈后对刘鼎说：“我是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的好的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地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早见他多好呀！”他说：“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抗日。对中国共产党，我不仅知道他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道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还说，经过这次会谈，“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50多年后，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采访时，还回忆起这次会谈。报道说：他说“周恩来的反应极快，谈吐及见识不凡，使他有一种一见如故的亲近信赖感。会谈中，他们达成了协议，取得‘中国应立即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抗日’的共同认识”。

1936年春，周恩来写了《对未来世界大战的分析与目前任务》一文。文章说：“世界战争的估计——每天恫吓着人类，较前夜更进一步”了，“帝国主义打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因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军备未扩充好，彼此关系未确定好等原因，有可能推延。而“日本对华，希望以极小代价完全取得中国，首先华北”。中国应“先有国内联合抗日，才能有力求国外联合”，我们“必须分别我们的立场与各派的立场，然后才能分别谁敌谁友，才能领导我们的朋友随着我们前进。而抗日与降敌是分水岭”。文章指出：“中共领导群众的任务是以组织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

红军主力东征，到4月底已消灭敌军约7个团，俘敌4000多人，缴获各种枪4000多支、炮20多门，自身扩军约8000人，筹得款项30多万元。蒋介石为了阻拦红军东进，调了十个师开进山西，派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令黄河西边的国民党军配合进攻陕甘苏区，而这时苏区西边的神府、靖边、安边、定边和甘肃的环县、合水地区，都比较空虚。

4月28日，前方的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和各军团领导人说：“方

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我军决西渡黄河，第一步集结于延长地域”。到5月5日，东征的红军全部西渡黄河到延长、延川、永坪地区休整。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命令说：“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西北军委决以红军之一部钳制蒋阎西渡部队及陕北、渭北敌人，以主力组织西方野战军活动于陕甘宁广大区域。”第一步目标，是夺取和赤化安边、定边、环县、曲子镇。6月6日，周恩来和毛泽东电告彭德怀：横山、定边间500里是北出绥远、宁夏通往苏联的战略枢纽，应以红81师和红28师骑兵团，在一个半月内完成初步赤化。甘肃的庆阳、洪德线及其东西地区是西方根据地的重心，红1军团和陕甘宁红军主力7月半以前在此地完成赤化。

西征的顺利开展，有利于后来迎接红2、4方面军北上。

周恩来在4月9日与张学良的会谈中，张学良表示如果蒋介石真的降日，他立即离开蒋介石，但目前还是争取蒋介石，因而仍需接受蒋的命令，这样，受命进攻苏区势在必行。双方商议结果是红军在关中加强活动，阻止杨虎城军队前进；陕南红军逼近西安至潼关大路以及地方部队在关中积极行动，可使对方造成借口，延缓前进。后来蒋介石为了抗拒红军东进，强令东北军、西北军向北进攻，企图封锁黄河。红军主力西征后，蒋介石又强令东北军与驻在绥德、清涧的中央军配合，包围夹击苏区。6月14日，东北军分三路向瓦窑堡推进，已经到了平步塔、青化砭、下寺湾一线。周恩来致电王以哲说：“务望火速电令前线兄部停止前进”，否则“造成双方敌对，于目前局势实有大害”。王以哲部接电后撤回到蟠龙、永坪以南。但是，东边的中央军仍在进逼。此时红军主力远在西边，中共中央决定撤离瓦窑堡，由周恩来指挥东面各军和地方部队抗击进攻的敌人，并布置中央和军委转移。19日，周恩来又电告王以哲：如果中央军将占领瓦窑堡，我们必事先通知你们，由东北军占领。

撤离工作在周恩来的统一计划和周密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驻瓦窑堡的红军部队已分别离开瓦市，中央机关和军委各单位等也都已转移。6月21日，周恩来和毛泽东等正待撤离，忽然遭到了国民党军高双成部骑兵的袭击。这在周恩来的军事生涯中是很为惊险的一次。赵桂来在《危难中的转移》中曾有描述：

“早晨，周恩来坐在枣树荫下，一边批阅文件和电报，一边等待毛泽东起身后一起出发。砰！砰！突然，传来了枪响。接着，枪声激烈，敌人来自横山县的石湾方向。

瓦窑堡是陕北的一个重镇，座落在陕北黄土高原的山峦之中，受到国民党军的四面包围。南侧是东北军和西北军，已经互有默契。东北是汤恩伯的中央军，在绥德、米脂、清涧一带驻扎了4个师。周恩来特意派了阎红彦、蔡树藩的红30军到延川准备侧击敢于进犯之敌，并命令谢嵩、甘渭汉的红29军到延川冯家坪待命。北边的榆林、横山一带驻扎着地方军阀高双成、高桂滋部。他们矛盾重重，自身难保，张学良、杨虎城都去做过他们的工作，他们对打内战都表示忧虑。想不到敌军来自这个方向，这时守卫瓦窑堡的卫戍部队都已调往前线，卫戍任务由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赤卫营接替。

来的敌人是骑兵和民团等，约有上千人。县游击队、赤卫军都前往阻击。

张云逸副参谋长向周恩来报告了敌人来犯情况和我方的布置，说：峦家坪一线已被突破，来犯之敌已进至米粮山北麓，很快就会到达通讯连和保卫队的警戒区。估计通讯连和保卫队也不会坚持多久。

瓦窑堡有 1800 多户人家，城池依山而筑，延秀河从东边流来，将山分为两半，一半在城内，一半在城外。城内的一半叫米粮山，是最高的点，控制了米粮山，便可控制全城。

周恩来来到毛泽东住处，对警卫员贺清华说：‘小贺，该叫醒主席了。’毛泽东起来后，说：‘恩来，我们一起走。’这时，张云逸来向周恩来报告：‘前边打得很激烈，敌人已攻进街巷，请周副主席和主席先走，我殿后。’周恩来和张云逸分手后，走到毛泽东处说：‘主席，你该走了！这里，我和张胡子殿后。’

敌军从西门、北门而来，毛泽东等从南门撤出，周恩来在十字路口视察了梯次配备的散兵线观察哨，吩咐军事参谋陈友才说：告诉刘排长还要往前布置，要完全控制这条南北通道，并保持接触。待撤出南门之后，再分出一半兵力，迅速向右翼前进，进行战斗警戒。

有一股敌军冲来，陈友才率领一个班冲上去，来了个反冲锋，当场打死打伤几名敌人。敌人不知虚实，生怕中伏全歼，狼狈退了下去。周恩来目送毛泽东、张闻天等出了南门，然后对张云逸说：我们也该撤了。并交代陈友才说：告诉刘排长，不可恋战，尽快脱离接触，掩护转移。

毛泽东、周恩来等脱离险境后，几天后到保安住了下来。这次袭击瓦窑堡的，是高双成的张云衢（骑兵张）部的私自行动，听说中共中央已撤走，目的是来抢劫财物。进占瓦窑堡后，东北军、西北军都急电话问第 86 师师长高双成，高双成特意说明进占瓦窑堡非本人所愿，是对部下督查不严。”

周恩来等撤离瓦窑堡后，即令红 29 军、红 30 军包围瓦窑堡。高双成急令张云衢撤出瓦窑堡回石湾，并斥他“胆大妄为，擅自行动，目无军纪”。23 日，东北军进入瓦窑堡，红军撤消包围。

这年春天红军渡黄河东征时，发出的宣言是既抗日又反蒋的，对蒋介石称为“万恶的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久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已在考虑对蒋介石的政策是否应有改变。4 月 9 日周恩来同张学良会谈时，张学良提出有可能争取蒋介石抗日。中共中央研究后，决定接受张学良的意见。5 月间东征军回陕北，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电文中已不再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并列，而是改称“蒋介石氏”，提出“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9 月 1 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说：“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样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6 月 2 日，在国民党统治区，李宗仁、白崇禧等提出抗日反蒋，组成“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接着出兵湖南，进逼衡州，与蒋军发生战争。蒋介石急调在甘肃、陕西的嫡系部队南下抗衡，对陕北苏区的军事压力减少。李宗仁、白崇禧派代表到陕北要求同中共订立抗日协定；四川的刘湘等开始趋向抗日反蒋；华北的宋哲元、傅作义等也相继同中共开始商谈抗日问题。到 7 月底，红一方面军结束西征，大量杀伤了敌军，俘获人枪各 2000 多，战马

500多匹，开辟了纵横200多公里的新区，使得新开辟的地区与原陕甘苏区联成了一片。

9月初，南京方面的居正、程潜、朱培德等带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到广西南宁，调解蒋介石和李宗仁等的冲突，任李宗仁为广西省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委会常委。“两广事变”解决。蒋介石急调胡宗南第1军由湖南兼程北上，继续进攻红军。

11月上旬，红1、2、4三个方面军会合后，中央军委认为：敌军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于统一战线。10月30日，周恩来和毛泽东发出给彭德怀、贺龙等的电报，指出应打击胡宗南部，现有极好机会。11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研究决定，由周恩来去前方，协助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

周恩来11月15日离开保安，18日到达河连湾和彭德怀会面，协助他制订了三个方面军在山城堡的作战计划。19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我昨夜到，彭德怀今晨赴山城堡布置作战。彭为了作战关系，要多留我几天，助他管理后方和进行战斗，准备多留几天。

胡宗南第1军分三路于17日向红军进攻，右路第78师向山城堡前进。红军分别隐蔽在山城堡周围地域。20日，敌第78师进占山城堡、小台子、风台堡等地。红军决定迅速发起歼灭敌第78师的战斗，然后向北横扫敌人中路第43师等部。21日，红军发起攻击。黄昏，敌军撤退，红军攻入山城堡，然后转入追击，把溃乱的敌军压迫在山城堡西北的山谷中。到22日晨，将敌军大部歼灭。这一仗，共歼敌一个多旅，给了蒋介石嫡系主力胡宗南部以沉重打击，迫使敌军停止了进攻。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大振了红军的声威，对于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积极的作用。张学良对红军的胜利感到振奋，发来了贺电。蒋介石则“万分焦虑”。在国共两党正于南京进行的谈判中，陈立夫在条件上也向潘汉年作了一些让步。

12月7日，中央军委主席团转发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组成23人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组成军委主席团，以毛泽东为军委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

12月1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致函蒋介石，批评他集中了胡宗南等部共260个团进攻苏区，说明红军为了自卫，不得已而有山城堡之战，呼吁蒋介石“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但是，蒋介石在解决了“两广事变”后，态度转硬，坚持内战。4日，他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红军，否则将要把张、杨的军队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

蒋介石在西安的时候，张学良、杨虎城劝蒋介石停止内战，蒋介石不从。12月上旬是张杨劝蒋不断的时期。由“苦谏”到“哭谏”，遭到蒋介石拒绝。9日，西安的学生一万多人举行游行，提出“反对内战，一致抗日”，要到蒋的住地临潼华清池去见蒋，蒋介石准备了机枪要对学生动武，张学良得知后赶紧到中途拦住学生。学生们群情激愤，张学良表示，本人要在一星期内用事实来回答大家。

12月12日，双十二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扣留了

参见杨奎松：《山城堡战役胜利的幕后及影响》。

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等八项主张。这天深夜，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

毛泽东、周恩来等接到张学良打来的电报后，一方面，立即由中革军委把蒋介石在西安被扣一事通知红军各军团，令各军团加紧准备，待命行动；一方面，由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提议张、杨立即把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把西北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原来针对红军的固原、庆阳、鄜县、甘泉一带，可以只留少数兵力，红军“决不进占寸土”。并且告诉他：恩来拟到张处协商大计。

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会议肯定西安事变是推动抗日的，决定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西北发生的这一行动，是为了抗日，这需要向全国各党各派解释清楚。由于中央军已西向逼近潼关，战争一触即发，周恩来提议：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

13日，周恩来和毛泽东致电张学良：刘峙有可能从河南进占潼关，提请杨虎城兄注意坚拒。为确占兰州、汉中，及隔离甘肃的蒋军为两部分，提议于学忠军，巩固兰州城，王、董两军和骑兵军集中平凉、会宁线，红军主力进至海原、固原地区，以有力一部尾随胡宗南军。这一天，毛泽东、周恩来还给张学良去电报说：如果中央军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电报中还请张学良派飞机到肤施接周恩来去西。14日，周恩来和毛泽东给张学良去电，提出四点建议：闻冯钦哉师集中西安，冯不可靠，希注意。宜以孙师集中西安、潼关间。胡、毛、曾、关甚恐慌，日内尚无可为，主要注意樊、万。东北军愈集结愈好，但兰州万不可失。红军准备全力增援。这几条建议是很重要的，保证了西安的安全。

15日清晨，周恩来带领罗瑞卿、许建国、张子华、童小鹏等一行18人，骑着马，冒着纷飞的大雪，赶去肤施。去的时候中央给周恩来的使命，是到西安看一看情况。

周恩来到肤施后，17日下午乘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到西安。飞行途中，随机来迎接他的刘鼎向他汇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这时候周恩来的想法是：共产党要多做工作，不要使事变酿成更大的内战；而要推动抗日，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刘鼎。

周恩来到西安金家巷张学良公馆时，已经是下午6点多钟了。他住在东楼的三层。当晚，他就同张学良会谈。张学良讲了因为劝蒋没有结果，才发生了西安事变，逼他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看来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可能性。张学良主张只要蒋介石答应他们提出的八条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放他。周恩来表示，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极表同情，决定给张、杨两将军实际的积极的援助，使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能够实现。

这一天，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说，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保障。并说，我与张学良商定，红军主力仍先开庆阳、环县以便机动，此外至少用一个军到肤施、甘泉，以便南下策应。

18日，周恩来同杨虎城会见。杨虎城表示同意周恩来和张学良的主张。

这天，周恩来又给中共中央去电说：“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也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

中共中央连接两电后，18日向南京国民党中央发了电报，说：“蒋介石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提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等主张。还说：“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19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指示》说：中共的基本方针是，“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在主张和平解决的同时，周恩来13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联军作战计划。红军方面，如胡宗南军仍尾追，可予以回击；如胡军向王以哲军攻击，红军应侧击胡军消灭之。21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说：顷与张商定作战计划，如战争开始，采取在西安以东会战的办法，东北军与西北军迟阻敌军于临潼、渭南间，红军由庆阳、西峰经咸阳、兴平到兰田、商县以南地域，以便与东北面的敌军作战。在甘肃，以红军一个军尾随胡宗南军。22日，周恩来又向中央书记处致电说：张、杨和他们的部下左派都希望早日形成西北联军局面，我提议下一步由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发表联合宣言，宣布成立抗日联军西北军政委员会，并推举张学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红军成为抗日联军第3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军政委员会参谋长，张学良提出请叶剑英担任。

在军事部署的同时，西安的谈判比较顺利，西安事变终于得到和平解决。12月29日杨虎城致各县长的公函中说，蒋“曾向虎城表示”，“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并答应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六条。

后来，周恩来在中共七大作的报告中说：“对西安事变，我们党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取得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同意，把蒋介石放回去。蒋介石本人当时具体的诺言是什么呢？就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

但是，周恩来没有想到张学良会送蒋介石回南京。12月25日，当他得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等悄悄离开高桂滋公馆驱车去飞机场，立即乘车追赶，赶到飞机场时，飞机已经在天空了。周恩来不禁叹息而回。

在以后的岁月中，周恩来一次又一次地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张学良，但都未能如愿。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奔忙于延安、西安、南京、上海、杭州、庐山之间，同蒋介石及其代表商谈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问题，在红军改编和边区改制的问题上，一直没有达成协议。

1937年7月7日，周恩来由西安飞抵上海。

这天夜里，发生了卢沟桥事变。驻北平（今北京）丰台的日本军队开到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桥东的中国军队驻地宛平城进行搜索。中国驻军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日军即增调军队，炮轰宛平县城，向中国驻军发起进攻。

驻守宛平城和卢沟桥附近的国民党第 29 军第 37 师第 11 旅广大官兵，在旅长何基沣指挥下奋起抗击。中国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了。

日军全面进行侵华战争，是早有预谋的。1936 年 5 月，日军参谋本部就在《帝国军队用兵纲领要旨》中提出“制敌先机，采取攻势，谋求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6 月，陆军部制定《昭和 12 年（1937 年）度的对华作战计划》，规定了在中国的华北增派兵力，“在华北五省进行作战”；对华增派兵力“向南京作战”，“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对华南作战“大致为一个师团的用兵计划”。日本的历史学家藤原彰在所著《日本近现代史》中也说：“不能说这次战争是偶然发生的。日本帝国主义一向企图扼杀中国革命并把中国全部领土置于自己统治之下。因此，不论是否这时爆发这一事件，也不论是否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自从 1910 年以来的一贯政策就是力求把中国化为殖民地。因而把这个事件一举扩大为全面的大规模战争，是有其充分理由的。第一，是当地日军的强硬的挑战方针。他们蔑视中国和中国人民，看重日军的威信，采取了凭发动强硬军事力量迫使中国方面屈服的态度。”“第二，日军的中央部和政府对于中国的抵抗抱有乐观估计，认为用威吓的简单办法就可以使中国屈服这种轻率的判断，铸成了事态日益扩大的原因。”

7 月 8 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内说：“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通电中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7 月 13 日或 14 日，周恩来来到庐山，向在庐山的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个宣言是周恩来起草，经中共中央通过后，带去给蒋介石的。途经上海时，还征求过宋庆龄的意见，宋庆龄表示支持。宣言开头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在宣言中，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同胞提出了“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等三条奋斗总目标，和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四项诺言。最后说：“寇深矣！祸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地团结啊！我们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七七事变发生后，17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是他又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当时在庐山，蒋介石正在召开有各方面军队要员参加的庐山谈话会，但

是不允许正在庐山的周恩来、林伯渠、博古等参加。实际上仍旧是不允许中共公开活动。对于周恩来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也不予以发表。

这时在国共会谈中，蒋介石反而有所后退。原来双方已经商定陕北的红军编为三个师，三个师上边不能设指挥部，但是可以设政治机关来管理和指挥。但7月14日周恩来同国民党代表张冲会谈时，张冲说，蒋介石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

于是，周恩来在7月15日致函蒋介石说：“来庐后所陈宣言，已荷阅正，从此露布四方，当能使举国同慰。”这是指《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说的。接着说：“现在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关于军队统率问题，与前次庐山所示又有出入，实使来惶惑，无以自解于党中同志。”并且说这样的话“事难疏通”，且“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这次庐山谈判，问题没有解决。周恩来7月18日离开庐山，28日回到延安。在延安，同中共中央商议了红军改编出动抗日的事情，决定我方要求是红军集中三原县进行改编，编为三个师4.5万人，三个师上边设总指挥部，朱德任正职，彭德怀任副职。

到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被日军占领，华北局势危急。周恩来到陕西三原县的云阳镇，出席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并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商定红军改编中的编制、分布、干部配备等问题。8月1日，收到张闻天、毛泽东来电称，关于红军作战，依当前敌我情况，应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周恩来同朱德、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等商议后，复电提出：“关于红军只出三分之一问题，我们再三考虑，认为仍以红军主力出去为妥，其理由：（一）七月寒电已声明改编即出动；（二）政治影响好；（三）易求补充；（四）易要求和执行独立自主的作战任务；（五）与外蒙联接有发展前途。”并且解释说：“另一方面要求发表总部及补充，一方面又要求只出一师兵，比较难说。”

后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下属三个师：115师，120师，129师，还是三个师都东出抗日了。115师、120师先行出动，129师稍晚出去，只是从129师中拨出一个旅的建制，即第385旅成立留守兵团，作为保卫后方、保卫中央的武装力量。

8月1日，周恩来在云阳接到毛泽东转来的张冲急电，说是蒋介石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去南京商议国防问题。周恩来2日电复张冲说：如果是开国防会议，就准备由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去；如果是谈话性质，则由周恩来同林伯渠、博古、叶剑英去。4日收到张冲复电，说是开国防会议，还是要毛、朱、周去参加。

8月9日，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结果，国民党并没有让他们参加国防会议，而是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的谈话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当前战争中，必须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朱德也在会上说：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该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们的大片

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周恩来、朱德发表的意见，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周恩来这一时期的档案中，有一份他的手稿，题目叫《对日作战刍议》，不知是否原来准备要在国防会议上发言的提纲。从这一手稿，可以看到周恩来这时的军事思想：

对日抗战，是持久性的战争，因之，必须由现时中央政府所发动领导的全国军队的抗战，发展到全民族全面的抗战，才能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全民族抗战必须在全民族中进行战争动员，不单是军队动员，而且要进行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各方面的动员，不单是前线动员，而且要进行后方动员。战争愈持久，后方的作用愈增加其比重性。

政治动员要在政治民主化的原则下进行，国防大计不但使各方面得以与闻，并且应使各方面参与讨论，共同负责。

经济动员要在经济国防化的原则下进行，他不仅要支持长期的对日抗战，并且要由此达到中华民族的经济复兴。

军事动员要在军事普遍化的原则下进行，他不仅要动员全国军队开赴前线，并且要动员全民族实行参战。

在政治、经济、军事动员三项下，周恩来又作了条分缕析，提出方案。

正当周恩来在南京会谈期间，淞沪抗战爆发。8月13日，日军大规模进攻上海，南京受到威胁。在华北，日军从关东军和日本国内增调来了兵力，以已占领的平津地区为出发地，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向国民党军发起新的进攻。蒋介石急于调红军开赴前线，在谈判中表现了较多的团结合作的愿望，同意了不向红军中派遣国民党人员，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三个师上设指挥部，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8月中旬周恩来同何应钦商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何应钦答应中共可派人到南方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协助红军游击队改编。这月，周恩来在上海会见了叶挺，请叶挺出面改编南方游击队。

8月21日，周恩来离开南京，到陕西洛川参加22日至2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报告了南京谈判、上海抗战等情况，对于红军的作战方针，认为“还是运动游击战好”，主张“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中力量消灭敌人”。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主席、副主席）。

8月2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发布命令，宣布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下辖115、120、129个师。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属第二战区，朱德、彭德怀为总司令、副总司令。周恩来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八路军是平时的军队编制，就是说平常的时候也是有的，而第十八集团军是抗战时期的军队编制，既然是战时编制，那么战后就可以取消了！文章在此。”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就此宣言发表了谈话。至此，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

8月底，周恩来在西安收到毛泽东来电，要他赴山西会晤阎锡山，商量

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作战等事宜。

9月3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和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等经风陵渡到山西。阎锡山派亲信梁化之用专车来迎接。火车上，拿出密密麻麻的菜谱请周恩来点菜，还问是吃中餐还是西餐？周恩来婉言谢绝说：只要给我下碗面条，放点豆芽就行了。阎锡山的下属很震动，说：“你们共产党这么大的人物出来，既没有带多少随员，又不肯吃宴席。要是我们的将军、司令出去，什么夫人、小姐、随从人员一大堆，什么弹子球、麻将牌，山珍海味，大吃大喝，奢侈极了。你们周将军真是廉洁可敬啊！”阎锡山安排周恩来住进太原的东缉虎营街傅公祠内的绥靖公署高级招待所。不几天，周恩来搬到了东坝陵桥成成中学里的八路军办事处住。薄一波出面，组织山西军政训练班和民众运动训练团请周恩来作报告，地点在国民师范大礼堂。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

成千的群众得到消息也来了。只见人山人海，礼堂里和院子里挤得水泄不通。那天上午，周恩来同志来了，徐向前等同志也来了。周恩来同志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走上讲台。当时，周恩来同志只有三十多岁，风华正茂，仪表堂堂。为了让听众能够听好这次讲话，我们事先准备了一个扩音器放在讲台的桌子上。可是，他把扩音器推到一旁，就开始作政治报告。他的声音高昂、宏亮而清晰，不仅礼堂内的听众听得清清楚楚，院子里的听众也都能听得清楚。周恩来同志讲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讲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如何才能取得胜利，还讲了目前是战争的开始阶段，敌强我弱，失掉一城一地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的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不是取决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持久，能不能坚持抗战到底。他说，只要能坚持下去，就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转化。到头来，必然是敌弱我强，直到我们反攻，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还号召大家脱下长衫，换上短衣，走上前线，去工作，去战斗，去打击敌人。周恩来同志足足讲了三个钟头。人们被他那既有鼓动性又有说服力的讲话征服了，台下鸦雀无声，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像大海的涛声，激荡在五千多听众的心头。

周恩来在太原停留几天后，就赶往代县大和岭口行营指挥部同阎锡山等会商，然后到大同会见第二战区北路前敌总指挥傅作义，商定八路军“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运动战，以太行山脉及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成立绥察及晋北战地各级动员委员会”，“阎同意我们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等9条。阎锡山见过周恩来后，显然是被周恩来要坚持抗战的言辞说服了，对薄一波说：“周先生对抗战前途看得非常清楚。”“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周恩来在同阎锡山晤谈中，提出了建立有各方代表参加的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建议，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阎锡山开始是不大高兴的，认为这样一来山西失陷的地方，今后就没有了。周恩来估计到这一点，要薄一波去说服阎锡山。薄一波对阎说：“现在把沦陷区交给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是最大的人情，同时还可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果不让，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要坚持，也无可奈何，因为那些地方是共产党、八路军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的，怎能不让？如果不让，连个人情也落不到。”阎锡山想了想，也只好

如此。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工作区域包括绥远、察哈尔、晋西北、雁北、晋东北（后属晋察冀边区），由左派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共产党方面的委员有邓小平、彭雪枫等人。各级动委会在宣传抗日，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上，做了大量工作。

9月13日，大同失陷。周恩来和彭德怀向中共中央报告说：日军可能“以重兵‘扫荡’雁北，直逼雁门关，以骑兵突破广灵、灵丘，攻入平型关，取代县、五台，直下太原。”“我军两个师速集中涞源、灵丘、阜平地域，依傍太行山，发展游击运动战。目前或将来万一处于不利，可依山向西南发展，并可吸收大批友军、流亡群众及散兵资材。”还说：“山西一切事无阎做主不能做，致华北关键在阎”，仍在努力争取阎锡山多作一点事。14日，周恩来和彭德怀又致电毛泽东、朱德，提出我115师主力集结涞源，120师主力集结灵丘，129师进至阜平，担任发动五台、盂县东部以及唐县、曲阳、行唐以西，获鹿、平山铁道以北这一区域，扩大本身。作战方针以游击运动战，避免固守，在有利条件下应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24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日军正以主力猛攻保定，以一部袭击千型关，另一部占左云。八路军第115师在广灵、灵丘以南平型关一带待机，贺龙率第120师师部及张宗逊旅开晋西北，建议第129师速开正太线南北地区武装民众，组织游击战争，扩大队伍，以后逐渐向西南山地转移。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令129师在9月底从陕北开出，先到正大铁路一带，以后转向太行山区。

9月21日，周恩来同朱德又往大和岭口行营见阎锡山，提出将八路军115师部署到平型关东北方向的五台、灵丘地区，待机设伏，以运动战配合晋军在平型关消灭日军，研究确定了平型关战役的作战计划。原晋军将领陈长捷回忆说：“周恩来至雁门关岭口同阎锡山会商作战方略，决定用运动战来配合阎锡山所拟的平型关围歼日军的作战计划。”“他为我们讲授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要旨，并一再指示我们：必须发动群众，才能取得抗战的伟大效果。”

9月25日，第115师主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坂垣师团的一部，歼灭日军1000多人，取得八路军出师以来的首次大捷。平型关大捷后，周恩来在太原举行记者招待会，请大家参观缴获来的战利品，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并增强了大家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在八路军给进攻平型关的坂垣师团以有力打击时，日军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在9月27、28日先后突破国民党军茹越口、下社村内长城防线，直逼繁峙，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侧后；在河北，沿平汉、津浦路进攻的日军，已经占领保定、沧县等地。10月上旬，国民党军放弃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退守忻口东西一线阵地，阎锡山调集了8万兵力，由卫立煌任前敌总指挥，与日军决战，保卫太原。

10月初，周恩来会见阎锡山和卫立煌，指出中国军队必须依靠人民，改变战略战术，把主力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的战法，主动打击敌人，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单纯消极防御的战法，在防御中要采取积极的“反突击”，并说明八路军现在在决战问题上不是主力，但将在敌后游击战中起决定作用。

10月4、5、6日，周恩来连续与阎锡山、卫立煌、傅作义、黄绍竑等商议。周恩来建议不要把所有兵力放在正面打阵地战，而应以忻口周围山地为固守阵地，诱敌至代县、忻口线，侧面出击消灭敌人；对日军不要消极防御，而应有所回击。他还提出，日军占领保定、石家庄后，将转而夺取太原，应迅速加强娘子关一线的防御部署。但阎锡山的作战思想在于忻口正面堵击，未能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去做。

这时的周恩来，已经预见到正规战的前途不利，游击战在未来华北地区的重要性。9月底，他同中共北方局讨论了华北游击战争的部署，拟将华北划分为九个战略区：绥西、绥察边、晋西北、晋南、晋察冀、直南（冀南）、直中（冀中）、冀东、山东，在这些地区组织游击战争。

八路军在晋东北、察南、冀西北区作战，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把日军的几条后路都切断了，对于忻口的正面战场起了很大作用；八路军还在阳明堡袭击了日军机场，炸毁了日机20多架，使中国军队阵地上几天内免除了空中威胁，这都对中国军队坚守忻口战线是有利的。但日军在进攻忻口受挫后，加紧了占领石家庄后西向娘子关的攻势。10月26日，娘子关失守，下一步即将西攻太原。11月2日，在太原北部的国民党军只好放弃忻口，向南撤退。

“八一三”后，尽管淞沪抗战已开始，已经形成全国性的抗战局面，但是蒋介石并没有下定抗战到底的决心。9月7日，他派蒋百里去意大利和德意志，意图请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出面调停中日战争。蒋百里以蒋介石特使的名义先到了意大利，通过墨索里尼的女婿、外长齐亚诺，见到了墨索里尼。齐亚诺暗示：斡旋中日关系的中心在柏林。蒋百里立即离开罗马去柏林，见到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的空军统帅戈林。戈林说：“中日两国都是德国的朋友，中日战争使德国左右为难，所以德国愿意把握时机做中日两国间的调停人。”这时候，日本参谋本部也有电报给日本驻柏林的陆军武官大岛浩，要他试探德国是否愿意出面调停。于是11月3日，里宾特洛甫分别电告驻南京大使粤斯卡·陶德曼和驻东京大使赫伯特·冯·狄克逊，说德国愿意调停中日战争。同日，狄克逊把日本广田外相交给他的停战条款通知柏林，柏林很快就指示陶德曼把这些条款转达给蒋介石。

鉴于南京政府对持久抗战发生动摇，国内产生一股妥协和平的空气。周恩来在10月19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说：中国战局已进入新的危机，提出了“我党公开发宣言，反对和平妥协，要求开放党禁，开放民运，改造军队，武装民众，为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抗战到底”等八条建议。张闻天、毛泽东复电表示“我们完全同意”。后来，11月13日，周恩来又发电报给张闻天、毛泽东等说：日敌提出条件：一、沪占领区划为租界，二、华北自治，三、内蒙独立，等等。因此，沪、宁失败求和的空气渐浓，晋局亦危。他提出：“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以此为一切动员的中心”以及其他建议。

娘子关失守，忻口撤退，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进攻太原。早在10月中旬，周恩来就认为日军占领石家庄逼近娘子关，主要的进攻目标是太原；如果敌军突破忻口和娘子关，我军以太原为中心的内线作战便缺少回旋余地，必须转向外线作战，同时游击战的配合也就更加重要。他主张保卫太原的战斗，“必须背靠山地，在野战中求胜利，不应以多数兵守城，或正面堵击”。

在国民党军撤出忻口的当天，11月2日，阎锡山在太原召开军事会议，周恩来应邀也参加了。会议研究守卫太原问题，决定由傅作义守太原。傅作

义表示接受。后来，周恩来又同傅作义会面，谈到守太原的问题时，他告诉傅作义：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在战略上不应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要注意保存有生力量。

另一方面，为了支援太原的傅作义，11月4日周恩来向朱德、彭德怀提出：现在东线敌人分两路向太原西进，一路由寿阳、榆次，一路由昔阳经沾尚镇，并以一部南下太谷，我东线红军钳制该路是对的，还应以一个支队向榆次、太谷之线活动，抗击敌人，以掩护友军左侧翼运输。6日，又建议八路军第115师徐海东旅加入雁门关方面打敌援军。此外，还同卫立煌会商，建议卫立煌对守太原城的傅作义部多作鼓励和督促。

这时，阎锡山的部队丢城失地，中央军也纷纷向南乱退，大片土地沦于敌手，太原失守也已是迟早问题。10月27日，周恩来和刘少奇发出了致各部队、各地方党部的指示电，其中提出：在被敌占领区域，共产党与八路军以自己名义，公开直接去动员群众。在我军后方，八路军、共产党应努力争取公开地位与公开直接动员群众的权利，各地党部在可能时应有公开代表在群众中活动，完全代表党的态度，传布党的主张，号召群众起来，提出要求为改善生活而斗争，组织工会农会参加自卫队游击队等。扩大与深入共产党八路军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用地方党、八路军名义公开发表各自宣言，广泛散发对地方群众的传单、刊物、标语等。八路军在各地要努力直接去扩大红军，地方党要动员群众去加入八路军。这也就是要八路军和中共各地党部在国民党军撤退后，独立自主地动员与领导群众进行抗日。11月8日，太原失守。

周恩来是在阎锡山、黄绍竑等都走了以后，才离开太原的。11月5日，日军逼近太原城，城的东、南、北三面城郊已被日军占领，只有西面未占。西面出城不远便是汾河，河宽千米，河水滚滚，深可没人。河上没有渡船，只有两座陈旧不堪可单车通行的木桥，南边的一座已被日机炸毁，仅剩北边一座可以通行。

上午，办事处处长彭雪枫已嘱参谋张震将汽车送到汾河西岸隐蔽待命。晚上，周恩来办完一切事情后，方才离开，同行的有彭雪枫、廖其康、李金德、王选文、张震和司机共七人。彭雪枫和张震到城防司令部去取了傅作义准予出城的手谕。守城门军官搬掉沙袋，露出暗道，暗道很窄，只能单人行走，只好丢下汽车出了西门。城外混乱已极：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军车、装甲车，互相挨挤；逃难的老百姓携儿带女，被挤在两边田里，前边走不动，后边还向前挤；桥上，往东和往西的汽车顶了牛，互不相让。这样一到天亮，日军飞机一来轰炸扫射，不知要死多少人。周恩来心系群众，双眉紧皱，他立即对傅作义的守城军官交代，要他马上下令，让部队原地待命，不得与逃难的群众抢道，并马上派工兵抢修桥面，派人疏导交通，一定要在拂晓前让老百姓通过汾河桥。他协助城防军官劝导东来的车辆退回，直到疏导、清理、修理工作安排就绪，才低声命令大家迅速过桥。有一处桥面塌陷，桥板已掉到水里，只有一条尺把宽的木板架在那里，周恩来叫大家手牵手一步步往前挪。千米宽的桥，走了几十分钟才过去。到了河西，找着已隐蔽在那里的汽车，上车向汾阳方面进发。9日到达汾阳，11日到临汾。太原失守后，这时临汾成了山西的政治中心。

参见赵桂来：《夜出木西门》；廖其康：《随卫周副主席列山西》。

13日，他向中央发电报说：太原既失，敌正长驱南进，直下风陵渡只是时间问题。他提出：目前应强调游击抗战，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并训练干部，以坚持抗战，由红军组织和领导的游击队现已有万人，山西各县游击队据14县统计已有4000多人，动委会领导的有1000人。关于正规红军，他赞成刘少奇的提议，三个月扩大到10万人。并要放手收容国民党军队的溃兵、散枪和资材。还提出要以决死队8000人为基础，加强晋东南的工作。

太原沦陷，阎锡山的部队被打散了，而且证明是作战无力的，我方准备以牺盟会为骨干，成立决死队。周恩来同意。与阎锡山商量，阎锡山也同意，称为新军。新军共有四个纵队，其中第1纵队最大，由薄一波负责，到了太岳地区，后来与陈质、谢富治部队会合。阎锡山有兵工厂，有枪有炮不给八路军，但给了新军。后来大部分新军加入了八路军。

11月16日，临汾召开党政军民联欢大会，请周恩来讲。周恩来讲说：在上海、太原相继失陷后，目前的抗战局势正遇着一个新的危机。这个危机的特点，是政府军队抗战颇难为继，而全民抗战犹未兴起，青黄不接，国内外调停的空气相当抬头。他从战局、国际、军事和民众动员等方面，用事实来揭露了国民政府片面抗战带来的严重后果，并指出国内外妥协调解空气抬头带来的危机，如汉奸政权的活跃，投降主义的生长，地区“特殊化”思想的增长，失败主义情绪的发生等。那么，华北抗战能继续吗？能持久吗？

周恩来说：绝对地能！

他分析了能持久抗战的因素，这就是敌人兵力不足，我们在地形、气候、民众条件上都有利于持久作战。现在民众武装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特别是晋察冀边区的发展，将是华北持久战的模范根据地；八路军在华北作战，将成为推动和领导华北持久抗战的重要因素。华北的持久战，将影响和推动全国抗战的开展。然后，他讲了坚持华北抗战中我们的任务，并讲了有革命的军队和它的指挥，便能坚持华北抗战到最后的胜利！

他的讲话激起全场听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受到热烈欢迎。会后，听众自动集资把讲话记录印了几万份广为散发。

这一天，他致电中央说：“华北抗战正处于正规战斗将结束，游击战争成为主要方式的过渡中。”

11月25日，周恩来回到延安。周恩来在山西，时间不过两个多月，但作用很大，为八路军今后的工作创造了种种顺利条件。

1937年11月中旬，在中国南方，日军攻陷上海，并且占领了苏州、常熟等城市。11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一些军政机关先行迁到武汉办公。

11月下旬，日军向南京推进，月底逼近南京。蒋介石深感形势严重，打算妥协求和，12月2日会见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表示同意以日本在11月上旬提出的条件为谈判的基础，要求停止敌对行动，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等。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委会，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实现中日“和平”。

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日本政府得意洋洋，态度更趋强硬。21日提出了比先前更苛刻的条件，如中国要在一些国土设立非武装地带、中国要给日本赔偿等，并限定中国政府必须全部接受，在1938年1月6日以前答复。这时中国国内，共产党坚决抗战，广大人民和爱国人士抗日情绪高涨，国民党内部多数也不愿妥协投降，蒋介石见了日本这些苛刻条件，不敢贸然接受。

日方表示强烈不满，1938年1月16日，宣布中止谈判，近卫内阁还发表了“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扬言要另外扶植伪政权。国民政府也在1月18日发表声明，表示维护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承认一切伪组织。

1937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为了同国民党进一步协商两党合作，并准备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特委派周恩来去武汉。

周恩来离开延安去武汉，途经西安。17日，在西安的各团体代表谈话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中，他提出了坚持长期抗战的三个基本条件：巩固与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加强统一的国防政府；在现有的国民革命军基础上加强与扩大统一的国防军。他强调要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群众来争取长期抗战的最后胜利。

18日，他到达武汉。武汉当时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各方人士都关注着周恩来的到来。周恩来除了忙于和国民党谈判以及组建中央长江局外，1938年1月8日，他在《群众》周刊上发表了《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表明了他的政治、军事思想。

文章一开始说：“只有持久抗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这是抗战五个月中最主要的教训！”前一时，和平妥协的主张甚嚣尘上，然而日寇的贪欲，却是无止境的，日本内阁的声明，对于中国的屈服主义者算是给了当头一棒，说明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他总结了抗战五个月来的主要经验教训，指出持久战可以发扬和增加我们的长处，而敌人则战线延长，兵力不够，短处日益暴露，长处逐渐减少。中国军队装备和技术条件落后，阵地战不是特长，今后应发挥在山地战运动战中的特长，在敌人占领和包围区域，则以游击战争为主。这里，周恩来是就整个中国军队来说的，阵地战等话主要是针对国民党军队说的。

接下去，他讲了战斗的具体办法，其中专门讲了“发展敌人占领地区的广大游击战争”：“依据敌人现有的兵力，不论其在北方，在津浦，在东南，只能占领我国交通要道及重要城市，如敌继续前进，其后方将愈加薄弱。因此，我们应抓紧敌人这一弱点，派遣某些得力部队，到敌人占领地区的侧面后方，做游击战争的骨干，去动员组织和武装被敌摧残压迫或被欺骗的民众，首先以自立的原则，一直发展到脱离自己乡村城镇的武装队伍，去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以袭击、扰乱、疲惫、分散和吸引敌人，并配合我主力作战。只有这样，才能使敌人不易在其占领地区，树立汉奸组织和汉奸部队，更难于统治起来。”

最后，他写道，一切办法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争取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必遭最后的惨败，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必然会达到最后的成功。

当时在武汉，有中共中央代表团，又有中共中央长江局。1937年的12月23日，这两个组织开了联席会议，决定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由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在西安）组成，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下辖机构有参谋处、秘书处、民运部、组织部、宣传部、党报委员会。长江局的工作范围包括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并领导东南分局和新四军的工作。一度受长江局领导的还有中共（北）平（天）津唐（山）点线工作委员会。

周恩来在武汉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同蒋介石继续谈判。双方成立了两党关系委员会，委员会认为要制订一个共同纲领，推定由周恩来起草。周恩来写出了包括抗战建国许多重要原则的《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经 12 月 30 日长江局会议原则通过后，当日提交两党关系委员会讨论，1938 年春协商定案。但是，蒋介石不愿意承认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平等地位，同时看到纲领是一面旗帜，它要单独来举，因而把双方商定的这个纲领搁置了起来，而在 3 月底 4 月初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鉴于这个纲领同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某些原则上是一致的，长江局就按照中央的精神，帮助国民党来实施这个纲领，并在实施中发展和提高。

周恩来在长江局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广泛开展军事统战工作。

日军占领南京后，12 月 24 日和 27 日相继占领了杭州和济南。为了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接南北战场，日军决心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方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

徐州是江苏省北部的重要城市，在黄河、淮河之间，鲁、苏、皖三省之边，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在这里交叉而过，周围山峦重叠，河流纵横，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中国军队控制着徐州，北可以威胁济南，南可以进逼南京，隔断了日军华北部队与华中部队，而中国军队则保持了陇海铁路这条军事大动脉，从侧翼保卫了平汉铁路的安全。日军先后集中了 8 个师、5 个旅（支队），约 24 万人，于 1938 年 1 月下旬开始南北对进，夹击徐州。

守卫徐州的是桂系首领李宗仁。当时徐州地区划为第五战区，李宗仁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他坐镇徐州，指挥着津浦线的军事。

桂系与中共中央是早有联系的。1936 年“两广事变”时，李宗仁、白崇禧等曾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对这件事中共中央曾有过回复。1937 年 7 月初，通过刘仲容的联系，中共中央派张云逸访问桂林，与李、白有所商谈。1938 年在武汉，白崇禧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周恩来是政治部中将副部长，都在军委会工作，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周恩来与白崇禧谈得很亲切，对抗战的战略战术问题也经常互相磋商。2 月中旬，广西学生军从桂林出发，经过武汉，准备开赴第五战区参加徐州会战，白崇禧要程思远邀请周恩来对这批学生军讲话。周恩来去讲了话，鼓励这些青年利用一切机会，采用一切办法，动员人民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以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周恩来的饱满的革命热忱，坚强的战斗意志，热情洋溢的讲话，青年们听时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程思远说，这是对广西部队讲话的第一个中共领导人，“周公有着气宇不凡的风度，和蔼可亲而又令人尊敬的仪容，特别是他那双炯炯有神、清澈敏锐的眼睛，使人感到它具有有一种特别的、神奇的、感人的力量”。

这时，徐州会战在即。第五战区先后调集了 11 个集团军和军团、64 个师，约 60 万人防守徐州地区。1937 年 12 月中旬起，南路日军华中方面军指挥第 13 师沿津浦路北上；北路日军华北方面第 2 集团军分路南下，其中一路沿津浦路南下。山东韩复榘不战而逃，日军占领济南，1938 年 1 月 1 日又占泰安。蒋介石召开前线会议，韩复榘被查究正法。白崇禧参加了这次会议。

白从前线回到武汉，向周恩来通报速韩经过，并请教津浦线南段作战方针。因为那时津浦线南段日军正分三路北犯，定远、蚌埠告急。周恩来想了一下，对白崇禧提出建议，认为在津浦线南段作战，正面应诱敌深入，而置重兵于铁路两侧，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紧密配合，借以困扰敌人，使其不能渡淮北上配合北面敌军作战，这样我在北段便可以集中优势兵力，置敌于死地。

白把这一建议转告李宗仁，后者大加赞赏。李乃令第 11 集团军李品仙，将 31 军迅速西撤，让开正面，而置于学忠的 51 军于淮河北岸，凭险固守。这样，日军进至淮河。就在这时，31 军等部忽自敌军左侧面出现，向东追击，一举将津浦路南段之敌截成数段。进抵淮河之敌恐后路被切断，迅将主力南撤。于是南段战事，遂成相持之势。此周公之计所致也。

敌在津浦线南段进攻既不得手，乃重新调整态势。3 月初旬，以少壮军人派的板垣征四郎师团从北线东面迫侵，而又令廉介矶谷师团南下，意在必得徐州。

蒋介石急派白崇禧到徐州协同李宗仁指挥作战。行前，周恩来又偕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到武昌熊廷弼路白崇禧公馆商议作战方略，周建议应用运动战与阵地战配合作战。白素有“小诸葛”之名，对周提出的此一战略方针，极为赞赏。白到徐州后，即以此法协助李宗仁部署兵力，确定战略，遂取得台儿庄血战的重大胜利。

白对周公的战略指导时刻不敢忘怀。1939 年 4 月 6 日，白在夏衍所办的桂林《救亡日报》上题曰：“台儿庄的胜利是在战术上运用游击战配合阵地战的结果。”这表明他不敢忘本。

为了协助徐州会战，周恩来令新四军第 4 支队在津浦线南段，协同国民党桂系李品仙、廖磊两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线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

另外，周恩来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到徐州见李宗仁，劝李不在徐州城而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张爱萍到徐州向李宗仁讲了几条：一是日本侵略军占济南后南下，孤军深入，骄兵必败；二是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儿庄一带都是山区，对我有利；三是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配合，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可以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李表示这个意见很好，并要张转告周恩来。

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歼灭日军 1 万多人，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的气焰。

后来，这年 7 月，李宗仁到武昌，入东湖疗养院治疗牙疾。刚巧周恩来也住在东湖，就在寓所设便宴招待李宗仁，谈谈团结抗战问题，商得李宗仁同意，在第五战区成立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请共产党员钱俊瑞、胡绳等负责，吸收一些进步青年参加工作。后来钱俊瑞等又同李宗仁联系，组织了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从而开辟了豫南、鄂北抗日救亡工作的新局面。在这之前，2 月间长江局就通过朱蕴山与李宗仁协商，成立了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省分会（后改称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周新民、张

参见程思远：《我所知道的抗战初期的周恩来》。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第 165 页。

劲夫、狄超白等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各部门重要工作。在这个组织的掩护下，中共安徽省工委迅速地把下属的特委、中心县委、县委基本建立起来，发展党的力量，掀起抗日救亡群众运动高潮。后来各县动委会的 300 多名干部和各工作团的 1700 多名团员，绝大多数参加了新四军。武汉失陷后，周恩来与白崇禧同车南撤，周恩来向白崇禧提出在广西桂林设八路军办事处和一批文化人撤到广西，得到白的同意，后来在抗战期间广西成了抗战文化工作比较发展的地方。

除了第五战区外，周恩来还向河南（第一战区）开展了军事统战工作。程潜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周恩来、叶剑英在 1938 年春派张友渔到河南任第一战区政训处设计委员，开展对程潜的工作。长江局、周恩来多次指示中共河南省委和新四军第 4 支队第 8 团队竹沟留守处，要巩固与抗日党派和人士的团结，共同抗日。根据这些指示，河南省委成立了统战委员会（后改为统战部）和上层工作委员会，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第一战区政治部工作。河南省委还同商震、张钫、张轸、刘茂恩、于学忠、刘汝明、冯治国、何基沣等国民党将领，同汝阳、洛阳、淮阳、商丘、南阳等专署专员及信阳、西华、扶沟、襄县、桐柏、永城等县县长，都建立了很好的抗日合作关系。后来除桐柏县长不明外，其他县长都加入了共产党。何基沣是卢沟桥事变时起而抗日的 110 旅旅长，周恩来 1938 年初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接见他。在谈话中周恩来说：“中山陵前，出了个剖腹明志的续范亭将军；卢沟桥上，出了个坚决抗日的何基沣将军。这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欢迎何基沣去延安参观。何基沣 2 月到了延安，后来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中共河南省委曾经通过何基沣，派了 200 多名干部，以所部的名义，在桐柏山地区坚持开展抗日工作。

周恩来还推动了川军、滇军的抗战工作。1938 年 1 月，中共中央给四川省党组织关于四川工作的意见，是周恩来起草的。这个“意见”中推动四川的地方实力派进行抗战，派干部到刘湘的部队中去工作。这时共产党员张曙时等已经在刘湘的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中建立了中共支部。1 月 20 日刘湘病逝，长江局主办的《新华日报》赞扬他是“抗日的积极分子”。刘湘死后，邓锡侯（川军第 22 集团军总司令）继任刘湘的职务，为川康绥靖主任。2 月下旬邓锡侯到武汉，周恩来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会见他，谈了希望川军能和八路军、新四军团结抗日，协同作战。不久，第 22 集团军投入了台儿庄战役，打得很英勇，滕县之战伤亡万人，第 122 师师长王铭章殉国，第 127 师师长陈离带伤坚持指挥。李宗仁说：“若无滕县之苦战，焉有台儿庄之大捷？”王铭章灵柩到武汉时，中共代表团前去迎接和祭奠，《新华日报》发表了《向为国牺牲的模范军人致敬》的文章。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还到医院去看望了陈离。陈离同共产党早有联系，以后关系日益亲密，给了新四军很多支援，对邓锡侯也做了很多工作。到了解放战争后期，这部分川军举行了起义，这同抗战时期的军事统战工作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于滇军首领龙云，在 1937 年 8 月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到南京开国防座谈会时，就有了来往。双方交谈了合作抗日，并商定建立电台联系。1938 年初，滇军第 60 军北上抗日经过武汉，这个军的第 184 师师长张冲拜会了叶剑英、罗炳辉，要求中共派党员、青年到这个师工作。长江局和中共中央同意，从武汉、延安派了周时英、薛子正，张子斋等党员干部去工作，建立了中共支部。薛子正是长江局参谋处的干部，去后担任过张冲的秘书、184 师

的参谋长，在徐州会战时出谋划策，使滇军打得很出色，连日本的报纸都惊呼“滇军的猛烈冲锋，实为罕见”。后来薛子正担任60军军长卢汉的参谋，开展对卢汉的工作。中共又通过张冲做龙云的工作。这些都为解放战争后期滇军的起义，打下了工作基础。

除了对地方军队外，对国民党上层军事领导人或嫡系，周恩来也进行了不少工作。例如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周恩来就多次到他的寓所去拜会，交谈军事形势和抗战前途。张治中当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周恩来同他有来往，中共中央和长江局派涂特立作为第18集团军驻湘代表，向他开展工作。当1938年11月中旬发生“长沙大火”的事件后，张治中处境非常困难。周恩来帮助修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关于长沙大火真相和张治中省长的《为长沙市火灾告全市民众书》两个文告草稿，指出这场火灾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所酿成的，仇恨要记在敌人身上，我们必须坚持抗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张治中对周恩来为他“字斟句酌”地修改这篇难做的文告，感激不已，过了十几年后还曾提到。

1938年2月，汉口文化界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邀请周恩来前去参加。会上，提出了很多问题，请周恩来解答。周恩来“态度是异常诚恳的，解答详尽而有力”，后来归并成一篇文章：《从目前抗战形势谈到八路军的作战》。谈话说：

过去敌人进攻我国的方式主要是军事的占领，就是说，企图一鼓而攻占我全国重要城市与交通线，使我国屈服，但我国五个月来的抗战，予以严重打击，使它不能实现这一企图。现在的进攻方式，已转而为军事与政治并重了。它一方面尽可能在几个重要军事据点上推进，比如在津浦线与陇海线，一方面尽全力于稳固已占据的区域，尽量扶助一切傀儡政权，并号召国内资本家，来华开发，比如最近沧石路、平热路的赶修，以及华北几个煤矿的开发等。它是要在已占据区域尽量巩固其已得权益，并竭力培养新的力量，作第二阶段新的进攻的基础，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方式的一个特点。

在这个谈话中，周恩来号召：“迅速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以牵制其兵力，不能顺利向前发展。两个月来敌人在晋南不能有多大发展，八路军在后面的牵制，不能否认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关于在已被占区域怎样发动游击战的问题，周恩来说：“我们必须指出如下几点：一、要有坚强的领导，即是要与附近正规军取得密切的联络，并受其指挥，在各部之间，要有互相联系关系，记住游击队决不是流寇式的。二、要有坚强的干部。三、要到处把民众组织起来。四、要时时与敌人接触，若只在自己的后方游击，结果将是扰乱后方了，在不断与敌人接触中才能生长出新的力量。五、行动要采取秘密性质，穿便衣，用短枪，人数不宜过多，可以十余人为一组，遇有敌人辎重经过，可予以突击，及道路桥梁之破坏，散发宣传品，刺探敌情供给我正规军等等，是其主要工作。就八路军的经验，做得好时，常能以一二百人的疑兵散阵，能够吸引住敌人数千兵力，使其不能迅速开赴目的地，完成其任务，达一个相当时期，我相信即在上述的情形下，还有充分开展可能的。”

周恩来是一贯重视部队的政治工作的，这时期他曾多次强调抗战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例如在1938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他讲道：“要使军队中政治工作健全起来，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政治工作加强了，第一可使部队

的战斗力提高，相互间友爱加深，这样，不仅每个人杀敌的勇气会增加，相互间的帮助也更密切，并且还能互相监督勉励。第二可影响到动员的运输队、担架队、民伕等，使他们政治认识提高。因为如果他们的政治认识清楚，他们便会奋不顾身地在战事千钧一发的时候，尤其是在战事失利的时候，在撤退或转移作战的时候，把伤员很快地迁离火线，这样，才能使作战官兵觉得兴奋，觉得有依靠。第三可影响到广大战区的民众。能够这样，民众会对作战部队的爱护上，对受伤的官兵，更加爱护。”

关于组织游击队伍和培养游击干部，1938年初，长江局就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提出“要用一切力量和方法阻滞敌人对郑州、武汉的占领，争取三至六个月的时间以准备和组织新的抗战力量”，并决定一面由周恩来草拟一个书面建议送给蒋介石，一面派大批干部到安徽、河南去发动与武装广大群众，阻滞敌军对陇海路、平汉路的进攻。会上还作出了关于鄂豫皖边、鄂豫边、湘鄂赣边三个游击区工作的决议，要求各区“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积极参加保卫家乡的斗争”；鄂豫边特委要加强对由这地区游击队改编成的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队的领导，鄂豫皖特委的主要任务是在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基础上尽力扩大部队。河南省委根据长江局指示，提出了“发展十万抗日武装”、“全党军事化”，规定河南和苏鲁边的中心任务是准备游击战争。周恩来还主持长江局会议，准备在豫西南和鄂北建立一个军事中心，并设想在黄河、长江之间由彭雪枫负责成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游击战争的军区，发展中州抗日游击战争，在武汉不守时，从长江局转移一部分人到新四军第4支队。

发展游击战争，需要游击战人才和扶持地方游击武装。周恩来指出，举办训练班是训练干部发动群众抗日的一条必由之路，意义重大，必须把它办好。中共湖北、河南省委认真执行了这些指示。在董必武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从1937年11、12月开始，湖北省委由方毅主持在黄安七里坪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由陶铸主持在应城先后举办了汤池训练班和汤池临时学校；还在武汉办了多期训练班，在鄂豫交界的鸡公山办了干训班，全省共培训2234人。在周恩来、叶剑英的关心指导下，1938年2月起，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在确山竹沟一面举办教导队，学习游击战术与研究发动游击战的经验教训，一面举办各类训练班，至信阳陷落前夕，从竹沟、信阳共培养了军政骨干和各类人员3000多人。这些训练班培养出来的干部，后来成了鄂、豫、皖、鲁各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成了新四军第2、4、5师的重要干部来源。

对皖中，周恩来、叶剑英专门指示新四军第4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要注意发展这一地区的地方游击队。周恩来还在1938年春天在武汉会见东北流亡的军人和青年公务员，动员他们到皖东抗日前线开展游击战争，亲自为他们取名为“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这支武装迅速扩大到一千多人枪，跨过津浦线，奇袭小股日军，破坏公路，铲奸除害，保卫民众，威胁日军占领的南京、芜湖一带。1938年夏，中共江苏省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加强了对已建立的游击武装的领导，逐步开辟了苏（州）常（熟）太（仓）、江（阴）无（锡）常（熟）等游击区，一直达到上海的崇明、浦东地区。这年，广东省委也抓了军事工作，一方面抓分散的统战形式的武装，另一方面计划使红军古大存部扩大为新四军的一个大队，发展成为华南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到年底，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广东惠阳、宝安、琼崖等地相继建立。

4月台儿庄之战后，日军大本营发现中国在徐州地区集结了重兵，认为是打击中国军队主力的好机会，制定了《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领案》，决定华北方面军以主力南下攻徐州，华中派遣军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5月中旬完成了对徐州地区的包围，攻陷徐州。接着，机械化部队沿陇海路攻入豫东平原。驻守鲁西南的中国第一战区薛岳兵团与日军激战至30日，中国守军退却。为了阻止日军进攻，经蒋介石批准，国民党军于6月9日炸开郑州东北的花园口黄河大堤，滔滔黄河水经中牟向东南方向奔泻，直到安徽、江苏，成为一片汪洋。日军向东撤退。决堤虽然阻挡了日军西进，但是造成黄河改道，豫、皖、苏三省四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成了泽国，近九十万入葬身洪流，千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日军占领徐州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要求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周恩来、叶剑英当即向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作了传达，要河南省委立即贯彻执行。河南省委动员了一万多工人、学生等回乡，沿陇海、平汉线组织游击队，建立根据地。黄河花园口决堤后，周恩来和叶剑英致电朱德、彭德怀，建议注意黄河两岸游击运动的联系和发展。

5月底，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决定进行汉口作战，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统治中国”。6月15日，御前会议正式决定攻占武汉。日军将正在豫东、皖北的部队转移南下，加强华中方面冈村宁次的第11集团军，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指挥，加上海空军约四十余万兵力，沿长江西进攻武汉。

6月中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了保卫武汉的计划，编成武汉会战作战指挥序列，总指挥蒋介石，陈诚是武汉卫戍总司令，调集第五战区、第九战区大批部队和海空军等，总兵力近一百万人，沿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南北两岸，组织防御。

7月7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指出：一年来敌人速战速决的方针，经过一战再战，虽已占领了我们沿海城市 and 交通要道，但其聚歼我军，逼我屈服的企图，终未达到。一年来我们坚持了长期抗战的方针，击破了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拒绝了敌人和解诱降的活动，这是我们基本的成功。中国抗战，已有了基本的成功和进步，但抗战力量，因有种种弱点，还不够坚强、广大和持久，这需要我们在坚持长期抗战中，改正这些弱点，克服这些困难，争取胜利的前途。

关于保卫武汉之战，周恩来说：保卫武汉的有利条件是有的，但还不足。他认为最好是能击败和阻止敌军于进攻武汉的山地之外，次之也要能侧击和消灭敌人于进攻武汉的山地之中，最后还要能截击和歼灭敌人于湖沼地带。他主张在保卫武汉中消耗敌人，并说：“即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尚未达到质的变化，不得不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转移作战地区，但敌人所能取偿于武汉的，将是焦土荒墟，那我们增长的力量，不仅能继续抗战，而且能在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运动战与游击战的配合中，日益接近于力量对比之质的变化，最后转弱为强，反败为胜，进行决战。”

他说：一切妥协投降、悲观失望的动摇，在现在，在将来，在整个长期抗战中，都应该遭到我们的反对。

9月26日，周恩来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发言指出：抗战将转入第二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在第二阶段要发展游击战争，使正规

战同游击战适当配合。要在战争中建立新的军队。要大胆地把新四军中的老干部放出去发展游击战争。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党的工作。

还在10月上旬，武汉战火临近时，周恩来为《新华日报》写了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他写道：保卫武汉重要，坚持持久抗战更重要！只有坚持长期抗战，加强国内团结，才是克服困难，争取胜利地转入相持局面的基本方针。即使武汉保不住，我们也还有可能继续长期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

21日，日军占领广州。国民党机关已撤离武汉。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同志开始撤离。22日，武汉已处于日军三面包围之中，周恩来到码头送一批同志乘“新生隆”号船赴重庆，返回时，国民党兵已在办事处所在地大石洋行的楼内放炸药，准备炸楼，周恩来只好住到郭沫若家。这时，武汉的大小报刊都已停刊，只有《新华日报》还在坚持。24日，周恩来又送走了郭沫若、胡愈之，到新华日报办公地口授了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24日夜，城市死寂，远处传来隆隆炮声，日军已部分进城。印刷机印出最后的一份报纸，刊出了这篇社论。工人们拿大铁锤把印刷机齿轮砸碎。周恩来率领大家坐上几辆汽车撤离武汉。这时，街上已经一辆车也没有了。

武汉保卫战，从日军攻占安庆开始到武汉失守为止，历时4个半月，毙敌近4万人。10月24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下令放弃武汉。日军26日占汉口、武昌，27日占汉阳。这次战斗，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本妄想使中国屈服、早日结束战争的计划。

第十章 为坚持团结抗战而斗争

- 到达重庆就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领导南方十省及港澳地区党组织开展抗日斗争。
- 同叶挺赴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传达中央精神，维护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团结。
- 赴天目山会见黄绍竑，两人同攀仙人顶。黄绍竑让他看了表明心迹的词作《满江红》。
- 在绍兴，给祖先扫墓，续写家谱，为亲人题字，鼓励军民坚定抗战决心。
- 到衡山为游击干部训练班讲课，曾为僧人暮前题字：“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 为维护团结抗战大局，揭露皖南事变真相，严厉斥责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并写下 16 字的名句。
- 在龙潭虎穴中领导南方局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曾提出“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方针。
- 直接领导华南敌后艰苦复杂的抗日武装斗争，建立和发展东江、琼崖等抗日根据地。
- 在中共“七大”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被选为中央“五大书记”之一。

周恩来撤离武汉后，经长沙、衡阳、桂林到达重庆。12月18日，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代论，阐明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代论名称是《论今后敌人的动向》。

代论说：

目前战局正处在二期战争已经结束二期战争将要到来之过渡阶段。从战略的意义看来，一期战争的特点，敌人是在企图速战速决，求得聚歼我军，逼我屈服，我们则在坚持长期抗战，诱敌深入，以图击破敌人的速战速决。这一战略任务，在敌人是失败了，在我们是成功了。

二期战争的特点将是什么呢？在敌人方面，将因深入困难，后方威胁，不得不停止进攻，围攻敌后；在我们方面，则由防御与退却转入正面相持深入敌后发展，以准备反攻。

代论指出这种相持局面的到来是可能的，必须努力争取，在现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加紧国内团结，提高民族仇恨，扩大战斗意志，反对一切挑拨离间和动摇悲观的观念”。

在军事上，更应加强正面的战斗，加紧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加快我新的力量的补整和训练，以争取相持局面的到来。

周恩来在武汉的时候，一次朱德到武汉，他与朱德去会见蒋介石，谈话中向蒋提出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问题。当时蒋介石看到国民党中央军节节败退，国民党地方军队他又不能完全控制得住，又看到八路军在华北各地敌后轰轰烈烈地开展游击战争，到处打胜仗，所以听后欣然同意重新训练他的军事将领和干部，同意开办训练班，想利用共产党八路军来帮他训练一批骨干力量，使他们学会八路军的一套游击战术，能在敌后站住脚，加强国民党的统治。这件事，得到主战派陈诚、白崇禧的赞成，但是亲日派何应钦反对。

后来武汉战事紧张，国民党政府忙于搬到重庆，这件事就暂时搁下来了。后来，周恩来、叶剑英又对陈诚、白崇禧做工作，促使他们去推动这件事，所以武汉撤退以后，游击干部训练班就积极筹备起来了，地点设在南岳，由蒋介石任主任（或校长），陈诚、白崇禧为副。他们原来提出请周恩来去主办这个训练班，中共中央因为周恩来要负责国民党统治区的全面工作，没有同意，改派叶剑英去。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并带了李涛、边章伍、薛子正、吴奚如、李崇等去任政治教官、军事教官，随去的还有电台、速记、管理和警卫等人员，共约 20 多人。周恩来被聘为国际问题讲师。

这个训练班共办了三期，直到 1940 年 3 月，参加受训的国民党军官千余人。周恩来、叶剑英等通过作报告和教学，广交朋友，向学员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和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道理，激发了学员的爱国热情，使有些学员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训练班的学员，大多数是爱国的，在中共教官讲课和中共工作人员的模范行为影响下，许多人对中共表示钦佩和同情。特别是后来国民党在抗战中越来越暴露出它的腐败无能，而八路军、新四军则战绩辉煌，不少学员对国民党感到失望，把抗日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学员们毕业后分散在各地，但不少人总是找机会到重庆拜访训练班的教官，向教官倾吐他们的思想感情，介绍他们部队的情况。南方局干部则适当地进行一些启发教育，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他们表示愿意同老师保持经常联系，南方局干部就同他们约好今后联系的方法；他们有的表示愿意为革命做点事情，南方局干部就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和可能，请他们帮助提供一些东西。例如，当时中共缺少军用地图，全国大多数地区的军用地图都没有。南方局干部就通过几个学员的关系，把一些地区的万分之一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搜集到，送回延安去了。

周恩来到重庆后，积极筹组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 年 1 月 5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南方局管辖华南、西南各省；南方局委员为周恩来、博古、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以周恩来为书记。13 日，中央书记处又致电南方局，批准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南方局常委，并指示说江西、上海的工作也由南方局来管。16 日，南方局向中央报告了组织分工的状况。南方局下设统战工作委员会、组织部、宣传部、军事组等机构。至此，南方局正式组成。

当时，南方局所辖的，有四川（川东、川康）、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和港澳地区党组织。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大都是在抗战开始前后的救亡运动中恢复重建和发展起来的。南方局领导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在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基础上，着重进行了巩固党的工作。南方局还领导了华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指导建立和发展了广东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南路人民游击队等几支武装部队，开辟了敌后游击根据地。同时，南方局还根据中央指示，逐步加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民工作，发展了许多农村工作据点，掌握了部分武装，准备对付日军的进一步入侵。后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就开展武装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打击敌人。广东、云南、滇桂黔边、粤桂边、闽粤赣边、黔北等地的人民武装进一步发展成为正规部队，列入了人民解放军的正式编制，参加解放战争。南方局还领导八路军驻重庆、桂林、长沙、韶关、香港、贵阳等地的办事处，

指导他们开展工作。

军事组是周恩来、叶剑英等的参谋业务工作机构，它的工作内容有：军事谈判、军事联络、军事宣传、军事情报、军事交友、开辟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军事谈判都是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以中共代表或第十八集团军领导人的身份进行的，同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张冲、徐永昌、刘为章等人谈判。军事联络工作，包括参谋和后勤两项工作。参谋工作主要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情报告，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并分发报馆等，扩大影响；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报日军、伪军情况，并对军事委员会的《敌伪广播》、《敌情通报》等进行研究。后勤工作主要有向国民政府领取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卫生医疗器材、医药、交通运输车辆、通讯器材等，以及建立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上海等地的交通运输网等。军事宣传、军事情报工作，对扩大八路军、新四军的影响，防止国民党反共阴谋，作了很多工作。军事交友是军事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周恩来、叶剑英以他们的崇高声望、同国民党高级军官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以及在黄埔军校任教的特殊经历，影响和争取了很多朋友，在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周恩来在这方面特别突出，通过交朋友争取了很多同情者、同盟者，一直影响到后来的解放战争。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接受改编的部队达 177 万多人，占歼灭敌军总数的 22%。这些部队的领导人，多数都是南方局时候的老朋友。

2 月中旬，周恩来同新四军军长叶挺离开重庆，前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皖南泾县云岭。

这里需要回顾一下新四军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在北方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当时，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除海南岛外在全省建有 14 块根据地。1937 年 8 月中旬周恩来征得何应钦同意后，于 17 日从南京致电中共中央，要中央告知准备去鄂豫皖地区的郑位三和去闽西南的方方以及将派去其他地区的人赶快南下。后来这些同志到达长江南北各游击区和根据地，为组建新四军进行准备工作。这月，周恩来又在上海会见了北伐时期的名将叶挺。叶挺这时虽然已不是共产党员，但仍是心向共产党的。蒋介石曾经想利用他往日在北伐军中的威望，拉拢他担任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军长，遭到叶挺拒绝。周恩来请叶挺出来改编南方游击队，叶挺同意了。10 月 12 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后叶挺到了延安。中共中央同意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指示他从延安到武汉组建新四军军部为了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由项英任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为军分会副书记。

当年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南方游击区和新四军工作问题，明确规定了发展方向、方针政策和组织领导。长江局依据这些原则立即着手进行新四军的组建工作。12 月 23 日长江局第一次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讨论新四军问题。会议同意中央原则决定，认为目前项英的主要工作应在军队方面；各地的游击部队应迅速集中，不必留三分之一的部队在后方，今天的政治形势转变，应拿一切力量到抗日前线上，作战地区可以浙赣铁路划界，路北为第一战区，路南为第二战区，等。

25 日，叶挺、项英在武汉召开了军部机关干部大会，这标志着新四军的

正式成立，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军部在汉口大和街 26 号挂牌办公。27 日，在与国民党就编制问题谈判达成协议之后，项英电告中共中央：“四军编制为四个支队，支队等于旅。”1938 年 1 月 6 日，新四军军部抵达南昌，月底颁布了新四军战斗序列。新四军下辖 4 个支队，共 9 个团，全军 1 万人，6000 多支枪。2 月，叶挺下令各地红军游击队分别向皖南岩寺地区或皖中舒城地区集中。4 月 4 日，军部从南昌迁到岩寺；上旬，新四军万余指战员集结于大江南北，胜利地完成了集中的任务。5 月，军部迁到泾县云岭村。

这时，新四军的工作一直受到周恩来和长江局的关注。如 1938 年 1 月中旬决定鄂豫边的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第 4 支队第 8 团队，行动由长江局参谋处指挥，开出作战时归 4 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指挥。这月周恩来、叶剑英等向高敬亭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力量的指示，要 4 支队从湖北黄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向东挺进抗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2 月 20 日，长江局讨论了新四军 4 支队第 8 团队行动问题，指出目前原则上以巩固部队争取出发到前线为中心，以“保卫河南”作为动员群众的口号。5 月，周恩来同来到武汉的项英研究新四军的工作，并陆续介绍青年和学生赴新四军工作。

在新四军的改编集中过程中，周恩来和长江局一再提出巩固部队和发展部队的任务。项英也十分重视巩固部队。在巩固部队中，周恩来和长江局坚持作好增强项英与叶挺团结的工作，对叶挺主要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项英则强调一定要正确处理好同军长团结共事的问题。6 月 7 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致电毛泽东、张闻天说：“叶挺来汉，经费增加，情绪甚好。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建议组织这一委员会，以项英为主席，叶挺为副。9 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

后来，叶挺感到工作受到项英的干扰和压制，感到项英对自己不够信任和尊重。为此，周恩来曾经批评过项英。8 月 28 日，周恩来等收到了叶挺因在工作中同项英不和而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的电报，周恩来等立即复电叶挺，表示挽留，说项英将赴延安开会，新四军工作请你实际负责，待会议结束后，我们拟去一人帮助整理新四军工作。9 月至 11 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期间武汉失陷，工作重点迁到重庆，顾不上派人去新四军。此时，叶挺去了香港。11 月 2 日，周恩来和叶剑英电告项英，准备向叶挺说明两点：一、新四军应当保持我党的领导，不能改变现行制度；二、工作关系不好，应当改善。向项英说明以请叶挺回新四军工作为有利。后来，叶挺到了重庆见了周恩来。1939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致电中央书记处说：“叶回新四军，我的解决原则，共产党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上为政委。”10 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叶正项副，指出“应尊重叶之地位与职权”，“在新四军干部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之正确关系”。

周恩来在重庆成立南方局的部署告一段落后，就准备去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皖南，代表中共中央向新四军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加强新四军领导人的团结，并视察东南一些省的党的工作。

1939 年 2 月 16 日，周恩来同叶挺到达桂林，一起出席了白崇禧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成立周年会。周恩来在会上讲了军训工作的重要性。在桂林他还同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曹瑛谈了中共广西地方

党的工作。18日，同叶挺离开桂林到江西。19日在吉安会见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同日，秘密会见了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曾山等，对江西地下党的工作作了指示。接着，去江西上饶，会见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23日，到达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

2月23日到3月14日，周恩来在云岭听取新四军领导人的汇报和各支队负责人的意见，召开军部各部门座谈会，到附近的机关、医院、教导总部（抗大分校）和连队驻地了解部队的生活、学习、军事训练等情况，还到新村战地服务团座谈。他向新四军领导人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安排的意見，对项英没有处理好同叶挺的关系问题有所批评。

周恩来在云岭专门作了我军政治工作和政治工作体制的讲话，并作了《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讲了目前的形势与新四军的环境、新四军的发展与困难的克服、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和任务。周恩来说：

今天，抗战正向新的阶段过渡，敌方、我方、国际都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敌人的政策表明扫荡敌后方是它的中心。不论军事、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特别是军事的行动，都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敌后方，所以四个月来敌人没有进攻与深入内地。

我方的政策已转到要重视敌人后方。在新阶段中，我们抗战的中心放在敌后，在敌人占领地区开展游击战，实施新的施政纲领，整理地方武装，跟敌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争胜负。

今天新阶段的中心问题是在敌人占领区，在中国的东部，在黄河以东、平汉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这是中国人口最多、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的财富地区，这就是新四军的环境。

他说，在这样的形势下和环境中，新四军是有发展前途的。他号召大家“愈向敌人的后方，愈能够得到发展的机会”；“愈在困难的条件下，愈能够显出我们的特长，愈能够锻炼我们”；“愈深入到民众中间，愈能够创造根据地”；“要坚持游击战争，创造大江南北的根据地”。

关于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他说：我们在江南敌后地区确定发展的方向，有三个原则：（1）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2）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3）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

根据过去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我们认为，现在在跟民族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大江南北游击根据地的创造是完全可能的。尽管敌人封锁严密，只要我们能够深入广大的群众，善于进行游击战争，我们就不会让敌人完全占领这个地区。

后来，关于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周恩来提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中共中央在此基础上，概括成“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3月14日，周恩来离开云岭去浙江。他去浙江，用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的名义，一路上会见一些主张抗日的开明士绅，18日到浙江金华。浙江当时是抗日的前方，处于长江三角洲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地区，已经沦陷于日军。富春江东岸地区和西岸的山区，基本还在国民党军之手。浙江省政府早已退出杭州，迁到金华，但作为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这时却在浙西山区天目山。黄绍竑对周恩来到达浙江，来电表示欢迎。周恩

来决定去天目山见黄绍竑。

早在抗战初期周恩来在山西时，就同黄绍竑熟识。那时黄绍竑也在山西，大家一起为抗御日军侵略而出力，黄绍竑对周恩来深表钦佩。1937年11月，黄绍竑被调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年底，他到武汉时，曾经同周恩来会晤，同周恩来商讨了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要求中共派人去帮助他发动人民抗日。以后，中共中央和武汉的长江局就从延安、西安、武汉多次派人去浙江协助黄绍竑。如长江局参谋处张爱萍（化名张舟）到驻金华的第3游击支队作政治工作，共产党员王闻识任支队的政训室主任。中共浙江省的党组织帮助黄绍竑制订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在全省各县建立了政治工作队，许多共产党员、民先队员、进步青年担任了领导骨干，推动了浙江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

周恩来3月21日到了天目山麓的于潜，当时这里是一个县。黄绍竑在这里召开了专署和县政府科长、区县国民抗卫队上尉以上军官谈话会，请周恩来作报告。周恩来向大家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敌我态势，鼓励大家要有抗战胜利的决心和信心。22日，周恩来和黄绍竑同赴天目山黄绍竑住处。

周恩来和黄绍竑，分属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不同的党派，但是抗战的目标是一致的。黄绍竑在国民党内属于桂系。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矛盾错综复杂。他虽然是省府主席，一省之主，但有党的系统的掣肘，特务系统的监视，工作起来很不遂心。在天目山住地，黄绍竑请周恩来看了他写的一首词《满江红》：

天目重登，东望尽，之江逶迤，依稀是，六桥疏柳，微波西子。寂寞三潭深夜月，岳坟遥下精忠泪。忖来年守土负寸心，生犹死。

收失地，从兹始，越勾践，应师事，愿勿忘训聚，胆薪滋味。逸豫有伤家国运，辛劳勤把我行治。枕长戈，午夜警鸡鸣，扶桑梓。

周恩来看后，明白这是黄绍竑在表明自己的心迹。词中用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典故，表示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心情。他同黄绍竑商谈了团结抗战的问题，并就共产党参加地方工作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

黄绍竑陪周恩来攀登了仙人顶。仙人顶是天目山的顶峰。峰上有块巨石，拔地兀立，高约十米，上刻“天下奇观”四个大字。山路很陡，步步石级，两侧是几人抱的参天柳杉。周恩来这时41岁，健步而上。峰顶上，山风习习，百花盛开，眺望远方，层峦叠嶂，那白茫茫的是钱塘江，灰蒙蒙的是杭州城，亮光光的是西子湖，都隐在一片模糊隐约中，想到现在是在日军铁蹄下，都感慨不已。

问到周恩来的下一步行程，周恩来表示要过富春江去绍兴。富春江，当时是浙江的最前线，有敌军封锁线，想通过是很危险的。但是周恩来想视察一下最前线的情况，看看最前哨的民心士气。于是26日至28日，周恩来经过桐庐、富阳、萧山三县，渡过富春江，于28日晨到达绍兴。

在绍兴，周恩来出席了绍兴专员公署召开的有各界人士和各民众团体代表参加的欢迎会，在会上讲了来到浙江的感想、国内外形势，回答了各界人士提出的问题。

周恩来在亲属陪同下扫墓，翻阅周氏家谱并续写了自己这一支的人名。这就破除了所谓共产党六亲不认的谣传。

在绍兴，周恩来主要的是鼓励人民坚定抗战的信心，团结起来赶走日本

侵略者。他抄录了沈复生老先生的诗句：

山中岁月纪春王，颁诏何须辨鲁唐。

今日兵甲栖越纽，相期铙吹渡钱塘。

檄传英霍军威远，势压杭嘉士气扬。

成败区区君莫问，中华终竟属炎黄。

他给在发电厂工作的表弟题字是：

埋头苦干，只要抗战胜利，定必苦尽甜来。

他给在上海沦陷区的表弟题字是：

从孤岛生涯中认识敌人，才是真认识。

他给当小学教员的表妹题字是：

精研中国文学，发扬民族意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学！

他给另一个表妹题字是：

毋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

此时，他还书写了一幅岳飞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他号召：“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

4月1日，周恩来抵金华。在这里，他听取了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的汇报，并向浙江省委委员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指出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投降，打击汉奸、亲日派。并说，同在浙江的国民党其他官员相比，黄绍竑是进步的，我们要积极支持黄绍竑，也要积极争取黄的力量。共产党员不论在国民党政府机关还是在群众团体中工作，都要埋头苦干，同友党、友军和其他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争取团结更多的人。

4月6日，周恩来和新四军南昌办事处主任黄道等赴江西。上旬，在江西上饶代表陈诚参加第三战区政治工作会议，并向顾祝同交涉释放被国民党逮捕的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的赖大超等8名同志。中旬，到湖南衡山，在这里视察了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并向训练班学员讲《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他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此，战略是服从政略的。

他说了日本侵华政策的历史阶段，日本侵华的军事政策，日本侵华战争之战略方针，日本侵华的新政策。周恩来指出：日本侵华的新政策，即全面侵略，在过去四五个月内正在展开：军事方面，扫荡重于进攻；经济方面，开发重于封锁；政治方面，利用挑拨兼施；精神方面，怀柔重于残暴。他讲了敌人的国际政策、敌人的新进攻后，还讲了日本侵华政策的前途，说：敌人企图军事上速战速决，失败了；敌人发展为速和速结，中国拒绝了，不上当；于是敌人展开全面侵略，总的政策仍是一战而胜中国，仍是军事为主，企图以战争结束战局。

从我们方面来说，中华民族解放运动有三个阶段。在抗战到底的国策下，我们的政策是：持久抗战——时间；全面战争（全民战争）——空间与人民；争取主动——自力更生，主动外交。在此政策下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消耗战。他说到我国下一阶段抗战的政略与战略重心：一、展开全面战争——动员全体人民，动员前后方，动员全线，使用全力，统一意志，统一力量。二、

重视敌后——政治重于军事，精神重于物质，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宣传重于作战，民众重于士兵，节约重于生产。

最后，周恩来讲了争取胜利的前途。他说：斗争的重心在敌后，在不让敌人利用我们人力物力财力来打我们；斗争的方面在全面；要争取我们胜利的相持阶段，准备反攻，转弱为强，反守为攻，转败为胜，达到我们政略战略的要求。但这是持久的，长期的。

周恩来动员全体人民抗战，是不分党派、阶层、僧俗的。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大敌当前之际，中国的各界人民，无不义愤填膺，奋起救国。周恩来广泛团结各界的爱国、救国人士。例如在衡山期间，他见到了祝圣寺的僧人暮笏，暮笏对周恩来来说，自己虽然是出家人，但也是中国人，在中国受日军蹂躏之际，他也是爱国救国的。他请这位军政界名人题个字，周恩来就为他题曰：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5月，周恩来回到了重庆。这时日军正以大量飞机对重庆狂轰滥炸，企图以此来消灭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5月31日，周恩来发表了广播讲话《二期抗战的重心》。他说：

现在二期作战，敌人要利用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打我们，其主动已操在我，只要我们努力，不让敌人利用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则敌人便无法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而只有继续失败。所以我说，二期作战，争夺的重心在敌后，便是这个道理。

争夺敌后的方针，便是广大发展游击战争，任务有二：一个是建立游击根据地，一个是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敌人在华兵力约36个师团，百分之八十五都使用在敌人占领区域的防卫与“扫荡”上。在敌后，敌人的“扫荡”与我们的反“扫荡”，几乎到处都有。从华北到华南，每天都在血战。假使我们在敌后创造出一二十个游击根据地，每个根据地像五台山、中条山一样牵制敌人四五万，则20个根据地可以牵制敌人侵华的全部兵力。这样，变敌后方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方针可完全成功。

周恩来最后说：“我们今天的要求，是全国最好的兵力，最优秀的人才，都应该深入敌后，争夺敌后，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到那里去消灭敌人，以争取二期抗战的胜利。”

在战略方针上，周恩来考虑应以游击战争为主；在游击战术原则上，他提出了新的十六字诀。

这是他在中共南方局举办的训练班上讲的。他说，过去所说的十六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今天看来有些地方已经变化了。因为过去游击战，是在广大地区，敌我兵力相差不大，所以可以大踏步后退；敌人驻营了，我们扰乱；敌人疲劳了，我们打他。现在情况不同了，敌进我退，敌人马上打进来，这正是他乐意的；敌驻我扰，敌人有碉堡，他不害怕；敌人退却，有时不能追，因为敌人是机械化部队，他一占第二道防线，把兵力布置好，我们就打不过他。所以，十六字诀今天看来不够了，但不是说根本不适用。他根据江南游击战的经验和华北的作战情况，提出了十六个字作补充：敌击我隐，敌分我袭，敌进我伏，敌围我散。他说：“这是根据今天的经验增加的新原则。”

1939年6月，周恩来离开重庆返延安。

1939年，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一年。这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五中全会虽然基本上坚持了继续持

久抗战的立场，反对现在对日妥协，但是并没有断然排除与日本谈判媾和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战到底”，是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回复到“九一八”以前的状态，东北是属于中国的。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把抗战到底解释为只是“回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

抗战以来，国民党丢城失地，节节败退，且政治腐败，物价飞涨，“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民不聊生。共产党军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得到老百姓拥护，力量日益壮大。五中全会把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壮大，共产党在国内政治影响的扩大、政治地位的提高，认为是对国民党的一种危害，只恐危及国民党对人民的统治。于是，在国共两党的关系上，确定了“限共、防共、溶共”的反共方针。会后，国民党中央在4月制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6月制定了《共产问题处置办法》等。但是，当时毕竟还是国共合作抗日时候，还不能公开反共，因而在制定这些反共文件下达时，国民党中央一再要求其各级组织：“本党应付异党之对策与办法，在此团结御侮时期，关系极为重要，应以绝对保守秘密为原则，倘不慎而泄露入异党分子手中，则不仅易滋误会，甚且发生磨擦。”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前后，在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反共的行动。1938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以统一“军令”、“政令”为借口，宣布陕甘宁边区政府为“非法组织”，调集胡宗南等部加地方武装共30多万人，包围边区，不断制造磨擦和军事挑衅事件，到1939年10月，共达150多起。1939年6月11日，国民党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率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屠杀中共方面指战员400多人。12日，国民党第27集团军杨森部，包围湖南平江嘉义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通讯处负责人、新四军上校涂正坤等10人。

平江惨案后，周恩来在中共南方局会议上，指出在力争时局好转的同时，应该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并强调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式和斗争方式，须作必要的改变。

周恩来回延安，也是为了研究解决各地这类事件的办法。回延安后，他就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纪念“七七”两周年的题词：

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坚持统一战线，反对挑动内讧！

发动全面战争，反对包办压制！

他致电陈诚，抗议国民党军队制造平江惨案，说：“北事未平南变又起，推波助澜者大有人在。此种阴谋，弟敢断言决非止于反共，其目的必在造成国共裂痕，以便其破坏抗战，走入不得不对日妥协之途，其处心之深，用意之毒，显系破坏分子所为。”

这时，已临近七七抗战两周年。7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发表时局宣言，周恩来在会上说：这个宣言应该成为动员全国舆论反对日本诱降政策和国民党中投降妥协倾向的有力武器。纲领应该是：坚持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坚持统一战线，反对挑动内战；发动全民抗战。

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宣言提出：我们要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宣言说：“我们要继续抗战，抗战到把日寇驱逐至鸭绿江的对岸。”这就把“抗战到底”的“底”字也明确解答了。

8 月上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周恩来在会上运用大量材料，对两年来的抗战和国内外时局作了分析。他指出：在这过渡阶段，正遭遇着新的困难与新的危机。亦即是如何支持持久抗战，如何发动全面战争的新的困难；亦即是敌人诱降，国际妥协派劝降，国内投降妥协分子逼降的新的危机。在这新的困难与危机面前，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是目前的两大主要危险。

周恩来在会上讲了克服困难的具體紧急任务。关于军事方面，他说：目前二期抗战的战略目的，是要击破敌之扫荡，阻止敌之进攻，而争取真正有利于我之相持阶段到来，准备我之反攻，为实现这个目的，必须抓紧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与培养新的力量两个中心任务。

对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他指出：“战略的要求是要作到变敌后为前方，积小胜成大胜。”他还提出了“游击地区必须依照军事，政治，经济，尤其是地域条件重新区分，以便建立根据地”；“游击根据地的军政权必须统一于该地区主力部队指挥之下”等措施。

这年 8 月，周恩来因右臂骨折，中共中央决定他赴苏联医治。他在 9 月中旬到达莫斯科，住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病，到 12 月下旬出院。出院后，他向共产国际写了一个长达 5.5 万多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后来周恩来回国后，压缩成 1 万多字，刊在新四军的《抗敌》杂志半月刊第 12 期上，名为《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期和目前任务》。文章说：

“中日战争已经进入快三年了，这是一个长久的战争。中国人民为谋其民族解放的彻底成功，只有将战争进行到底。……中国的广大人民和抗战军队，则正增长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要求，以期达到胜利的出路，……”

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就惧怕中国人民之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宁愿在困难前面投降，去与日寇勾结，……所以在目前严重的转变的时机中，克服投降危险，坚持抗战继续和争取抗战胜利，是全中国人民的中心任务。

全中国人民及抗战军队，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敌人占领区域中去，在那里，我们不仅要发展游击战争，并且要破坏日寇“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政策。……那种取消边区，削弱八路军、新四军的计策，是与中国人民抗战的利益不相容的，是中国共产党所不能忍受的，……”

只有团结，才能破坏投降分子的阴谋，只有坚持抗战，才能最后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强盗！”

1940 年 2 月，周恩来离莫斯科回国。回国前，他受中共中央委托，致信斯大林，说目前中国抗战正进入艰难时期，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严重的磨擦，投降与分裂正成为目前中国的主要危险。

3 月下旬，周恩来到延安。

当周恩来在莫斯科治病期间，国内发生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 年 11 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决定了以军事限并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新方针。随之，国民党顽固派发布了《处置共党问题的新办法》和《剿办冒称抗日军的命令》。

1939 年 12 月初，在阎锡山命令下，国民党第 6 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第 61、19 军等部进攻晋西南的新军决死第 2 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这一突然袭击，使晋西南抗日县政府、团体的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遇害者达 200 多人。决死第 2 纵队在八路军晋西支队协同下自卫反击，向晋西北地区转移。阎锡山又令第 7 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指挥第 33 军 6 个团及骑兵 8 个团配合陈

长捷围攻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被击退。同月，阎锡山命令第8集团军总司令孙楚率军进攻晋东南的决死第1、3纵队。决死第3纵队受到损失，7个县的抗日政权遭破坏，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分子500多人被杀害，1000多人被绑架。决死第1纵队由于薄一波等应变工作做得充分，阎军的进攻未能得逞。后来，中共史央派代表与阎锡山经过谈判，决定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活动区域，晋西南为晋绥军旧军活动区域。

也在1939年12月初，胡宗南按照蒋介石密令，调集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10日，袭击宁县，杀伤八路军干部战士300多人。14日，占领镇原、庆阳、合水等地，八路军也遭袭击。1940年初，又以2万多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发动进攻。八路军进行反击，肃清了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吴堡、清涧五县的反共顽固势力，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从1939年11月到1940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制造磨擦事件124起，其中64起是武装进攻，占据枸邑（今旬邑）、淳化、镇原等五座县城。

1939年11月下旬，国民党第97军军长朱怀冰率部由河南辉县、山西陵川，进入冀西地区，压迫晋冀豫边区的八路军第129师青年纵队、冀西游击队等。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亲自去向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和朱怀冰劝告，鹿钟麟持观望态度，朱怀冰继续进攻。1940年1月中旬，八路军第385旅等自卫反击，迫使朱怀冰撤退。1月下旬，国民党第39集团军石友三部向冀南地区八路军挑衅。八路军于2月9日反击，重创石友三部。2月初，国民党顽固派又令朱怀冰、石友三部再次进攻，并令在黄河以南的第41、71军渡河北进，协同夺取太行和冀南抗日根据地。3、4月间，八路军击溃这些部队，歼灭顽军一部，之后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协议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南为国民党军防区，北为八路军防区。

周恩来到延安后，致函阎锡山说：

不幸晋中新旧之争，竟造成骑虎之势。来于远道闻之，已感至痛，归后得悉梗概，深觉此种亲痛仇快之事，必有奸人播弄其间，故欲使先生多年心血所造成之抗战力量归于瓦解而后快意者。诚以八路与新军之合作，曩来在太原与先生计划战地动委会时，即有定议。临汾失守后，八路助新军发展游击，恢复失邑，成绩昭然，而全国亦咸以敌后模范归功先生。乃奸人见忌，故抨新军于外，以毁先生之长城，来实为我山西之模范抗日阵线痛惜不置。痛定思痛，度先生必有同感。此间同志，对山西之团结，夙所关怀。苟先生对团结有进一步办法，来等无不愿尽绵薄，以挽危局，以利抗战。夫唇齿相依，患难与共，处今之世，惟先生能熟察之也。

1940年5月，周恩来到达重庆。6月初，见蒋介石。周恩来说，中共是诚意抗战的，国民党却在抗战中反共、溶共、剿共，这只能帮助敌人，是不利于抗战的。并且指出：有人说中共要进行暴动推翻国民党，全是造谣，中共的发展全是在敌人占领区，是与日军和汪伪争夺群众而得的。

当时的国民党，前方失败，统治区日益缩小，后方则腐败不堪。据蒋介石侍从室的高级幕僚唐纵所记：“抗日三年，有钱者未尝减少，且因物价之上涨而日见感受生活之痛苦，其思想感情，逐渐左倾，加以我政治之无能，腐化依旧，建树毫无，此在客观环境上，均于共党有利，如再过一年两年，纵敌军不深入夔门，社会也将有巨大之变动，其可虑者三。”他说的可虑者一是物价高涨，征兵困难，到处隐伏不稳之势，再是担心日军全力西犯，认

为“凡此三危，时机迫切，不可不虑！”

这时周恩来对时局的估计是：政治形势比以前更坏的可能性增加了，投降与分裂的危机更加严重了，但是条件尚未成熟。蒋介石对国共的破裂尚未下最大的决心，但是投降的危险日益严重。我们的方针，还是争取好转。国民党顽固派还会向中共部队进攻，他也估计到了。9月1日他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苏南皖南须准备顽方进攻（估计这次剿共会从江南开刀）。”

这年7月1日至8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会后，蒋介石指派何应钦、白崇禧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提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地域问题。7月16日，国民党向中共方面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主要内容除了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外，在军事方面，将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山东省的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这一地区，八路军编为三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另再增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按照这一规定，新四军和八路军将撤出很多敌后游击区，并从当时的50万人减至10万人。

7月27日，周恩来带着国民党的“中央提示案”飞回延安。在中共中央常委会的讨论中，周恩来主张：我们党的政策是防止国民党投降，争取好转。现在国内形势不会立即好转或立即坏转，是拖的局面。主张同国民党谈判时在小问题上让点步，在大的问题上求得有利的解决，以缓和反共的危险。在军队问题上，也提出了解决办法。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8月25日，周恩来飞抵重庆。9月初，周恩来把中共中央的复案交张冲转国民党中央。复案中关于军事方面，提出八路军（第18集团军）编为三军九个师，新四军为三个师；改组冀、察两省政府，省主席由中共保荐；保障“中国人民之敌后游击权”，“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之作战权”等。同时，向国民党提出关于调整作战区域和游击部队的三项办法：（一）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和绥远一部；（二）按照第18集团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部队数全数发饷；（三）各游击部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敌。这些意见，被国民党搁置了起来。

10月中旬，蒋介石密令对周恩来、叶剑英进行监视，不得让他们离开重庆。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戴笠、康泽等密商逮捕四川省内全部共产党员的办法。19日，何应钦、白崇禧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叶挺，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和第18集团军各部，在电到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

这就是所谓“皓电”，是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信号。

20日，周恩来电告叶挺和项英：蒋介石和何应钦逼我新四军渡长江的决定是“决不会取消”的，因此急应抢渡一部，并指出在安徽无为县渡江有危险，“宜在无为以东地区渡江”。24日，致电毛泽东说：当前反共高潮正在着着上升，建议中央考虑“皓电”原则不能同意，但必须答复。军事上，可将新四军主力北移，以便“集结应战”；或“立即分散”，皖南部队一部分秘密转苏南渡江，一部分准备就地打游击，江北部队“须作应战准备”。毛泽东在次日来电说：准备蒋介石发动全面反共，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对策是“稳健的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

在这一严重形势下，周恩来同有关各方交换意见，研究办法，在南方局

作好应变安排。11月1日，他又致电毛泽东，建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何应钦、白崇禧，表示在有充分保障下部队先从江南移动，“特别要保证在移动中不许友军袭击”，这实际只“放弃江南，以便集中兵力到江北，布置良好阵势”，必要时应付事变，使我能居主动。

按照周恩来的建议，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电复何应钦、白崇禧，申明长江以北的抗日军队不能撤退的理由，拒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了顾全大局，答应将江南的新四军正规部队移至江北，但须宽限时日。

实际上，据当年蒋介石侍从室负责情报事务的第六组组长唐纵1940年10月24日日记记载，自从国民党方面提出“中央提示案”，朱德等给予答复后，国民党方面已决心发动战争：“现中央决定，上案势在必行，如共党不遵守时，亦强迫其遵行。”据调查统计局报告，八路军有31万人，新四军有9.5万人，山西新军有6万人，涉及10个省298个县，如何解决？办法之一是“对于皓电之执行”。

这期间，国民党在陕北、苏北、皖北、鄂北乃至山西，都在调动大军，企图发难。12月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密令第48军对长江南北两岸新四军联络线及登陆地点严加防堵。这月，国民党泄露皖南新四军即将北移的消息，日军得知后，迅速将长江实行封锁，把大小渡口的船只全部烧毁，在长江中加紧巡逻，舰艇密布，长江岸上岗哨林立。另一方面，顾祝同根据蒋介石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命令，集结了7个师的兵力，在安徽的泾县、太平之间布置了袋形阵地；在皖北，由李品仙布防堵截；另外，由冷欣率部负责封锁新四军到苏南的去路。

周恩来在这时期，为了挽救时局危机，反对投降和内战，一方面主张新四军北移，让出江南；一方面与各方人士交谈呼吁反对发生内战；一方面连续致函张冲转蒋介石，列举最近各地发生的反共事件，并请制止陕北、苏北等地调动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各种努力，为的是发生反共事变，防止国共分裂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而投降日本，同时，也为万一发生事变在南方局组织上作了预防安排。

12月25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周恩来见蒋介石后，表示新四军部队决定遵令过江到长江以北，希望在江北的部队缓调或者免调，并且请蒋介石在新四军调动前按例发放补充，停止国民党在华中的部队向新四军地区前进，停止全国性的对中共的政治压迫。这次会见，蒋介石对周恩来表现得很客气，称周恩来是他的“患难朋友”，并且说：“只要你们说出一条新四军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会见后，周恩来感到蒋介石的话靠不住，是在吓、压之外，“又加哄之一着”。他致电毛泽东、朱德说：“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性”，“仍以分批走苏南为至要”。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9000多人奉命由泾县云岭出发北移，几天后，走到茂林地区，遭到预先埋伏的第三战区顾祝同和第32集团军上官云相所部7个师8万多人的包围袭击，血战七昼夜，除2000多人突围外，其余6000多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叶挺被扣，随后，项英遇害。“皖南事变”发生了。

1月7日，周恩来接到新四军军部在北移途中的告急电后，立即向张冲提出严重抗议。随后几天，分别向顾祝同、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提出抗议，并在《新华日报》晚会上发表讲话。据当年人士的回忆：

1月11日是《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当晚，周恩来、叶剑英等南方局的领导和办事处人员都到虎头岩报社，参加庆祝活动。

正当周恩来在庆祝大会上讲话时，突然机要科的同志从江岩办事处气喘吁吁跑来，送一份从延安发来的十万火急的电报。

周恩来接过电报，脸色刷的变了，双眉紧皱，拿电报的手都在微微颤抖。他的表情震动了会场的人，大家的目光全部集中到他的脸上，集中在他手拿的电报上。

当即周恩来站在讲台上宣布了“皖南事变”的爆发：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多人奉命北上，在进入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已经六天了，突不出去，叶挺将军出面谈判，竟被国民党军队扣留。

接着，周恩来愤怒地斥责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

会场鸦雀无声。大家从近期来的紧张局势，已经看出急变的风云，听到周恩来宣布“皖南事变”的消息后，更加震惊、愤慨。而就在这时电灯熄灭了，人们不免有些紧张，下意识地握紧拳头，准备应付突然袭击。

周恩来依旧稳重地站在那里，他那宏亮的声音在会场中回荡，在人们心中回荡，“同志们，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能到来！”

一会儿电灯亮了，周恩来继续讲：“有革命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着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斗争精神，胜利是会到来的，黑暗必然被冲破的。”

最后，周恩来坚定地说：“皖南事变”是反动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重大阴谋，我们不要被反动派的阴谋所吓倒，要坚决反对他们的进攻，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会上，周恩来又指示新华日报社的同志，翌日就把他的发言发表出去，把国民党派重兵包围新四军的消息透露出去。

第二天，即1月12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上述讲话。

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军长交付军法审判，并通缉项英副军长。

这一天，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拒绝刊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这个反动通令，并要新华日报社在报上发表报导和社论，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但是，这个报导和社论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扣压。周恩来立即为《新华日报》题写了：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他要报馆把题词的手迹，制版刊登在被扣去的报导和社论的空白位置上，加快把报纸印出来，组织好发行力量，抢在第二天各大报发出之前，送到广大读者手中。

《新华日报》出版以后，遭到国民党宪兵的没收。据当时南方局特别会计、曾家岩党支部负责人刘昂的回忆：新四军事件以后，一天国民党的宪兵把我们的《新华日报》扣了。总理知道后，就去国民党宪兵连部交涉（这个连部在上清寺和曾家岩之间），我和祝华等同志跟去了。他们不给，总理就打电话给张冲，张冲来先劝总理回去，总理说你不发还，我就不走。张表示一定要送还，随即给了一部分报纸。周总理拿着报纸在上清寺发给了周围的

参见吕荣斌：《周恩来在国统区》。

群众。这天《新华日报》的销量，从平时的 1000 份猛增到 5000 份。

1 月 20 日，周恩来和董必武、叶剑英致电毛泽东说：据确息，蒋介石 15 日下令对华中以 4 个师扫荡，防止新四军李先念部到平汉路东；以 138、173 师扫荡淮南路以东，防止新四军各部向西；以 189 师扫荡六安和鄂豫皖边；这一切应在 1 月 25 日前准备完毕。蒋介石的政策“是分区剿共，各个击破”。

周恩来等向中共中央建议采取以下办法：一、广泛宣传茂林阴谋，编印各种材料在国内外印发。二、新四军在山东、江苏、安徽、湖北各部以支队将领名义通电反抗军委会，要求恢复新四军，释放叶项，严惩肇事者。三、八路军将领通电声援新四军。四、延安发广播讲话。五、运用向英、美、苏的外交办法压顽固派。六、鼓励进步派别和分子积极抗议。七、动员中间派别和分子积极反对内战。八、如蒋介石公开全面“剿共”则我们一切有准备实行全面反攻。周恩来等估计：蒋介石的两面政策尚未完结而由局部“剿共”到全面破裂，我们对策宜采取让步的两面政策，政治上全面进攻，军事上局部反攻。

周恩来指示中共南方局军事组写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传单。传单经周恩来、叶剑英修改审定后发出。这个传单，驳斥了国民党的诬蔑，澄清了事实真相，在国内外广为散发，影响很大，内容包括：一、关于所谓新四军违抗命令不受调遣的问题。二、关于新四军渡江路线问题。三、关于新四军移动时间问题。四、所谓“借端要索”问题。五、究竟谁打谁的问题。六、所谓要在江南建立根据地的的问题。七、叶、项正副军长与新四军部队。八、取消番号与审判军长。传单指出：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包围，被聚歼，是国民党的有计划的行动。新四军皖南部队只不过是全军的一部（约十分之一），今天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那末大江南北的新四军部队何以善其后？新四军皖南部队既已因上当而被消灭，难道大江南北留下的新四军们会上当么？没有番号的人民武装就不能抗日么？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战员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阵地，坚持抗战。

1 月 25 日，周恩来把中共中央解决皖南事变、挽救时局危机的 12 条办法交国民党，内容包括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取消 1 月 17 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何应钦等 3 人；恢复叶挺自由，继续任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撤退华中的反共军；等等。这一天，苏联驻华大使向蒋介石提出了质问。这月底，周恩来致函回到纽约的斯特朗，附去有关材料。斯特朗随即在纽约的报刊上揭露皖南事变真相。2 月上旬，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函蒋介石，希望国共合作，并派居里来华，表示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也劝蒋停止国内冲突。

中共的严正立场和合理主张，获得全国人民、民主人士和党派、海外侨胞和国际进步势力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国民党中央委员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致信蒋介石反对“围剿”新四军，要求撤消“剿共”部署。黄炎培、章伯钧、沈钧儒、邹韬奋等准备发起民主联合运动，抵抗国民党的压迫。国民党的军界如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表示不愿内战；冯玉祥认为新四军抗战有功。地方实力派山西阎锡山、榆林邓宝珊、绥远傅作义、宁夏马鸿逵、云南龙云、广东余汉谋等，都站在中立地位。文化界数

百名人士发表联合宣言反对枪口对内。海外侨胞联合会和著名华侨陈嘉庚、司徒美堂等通电全国，谴责蒋介石，要求制止内战。

蒋介石在政治上陷入了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境地。为了摆脱困境，他要求中共参政员出席将于2月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中共参政员表示在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条”“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3月1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同国民党方面谈判，提出皖南事变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如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等。同时，也把这十二条临时解决办法告诉了民主人士参政员。

这次参政会，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蒋介石在3月8日的会上发表演说，表示“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闻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会上，选举了没有与会的中共参政员董必武为参政会常驻委员。会后，3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宋美龄也在坐。这次会见气氛比较和缓，蒋介石没有再提要八路军、新四军开往黄河以北的事。

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了。

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后，英国和法国投入了对德战争，欧洲大战开始。当时，日本政府声明：“日本帝国不介入，专注于解决中国事变。”但是随着德军的胜利进展，日本也想于中取得利益。

1940年6月4日，德国对英法军队的作战中，攻占了敦刻尔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随即进攻法国首都巴黎。6月14日，巴黎沦陷。日本即想在东亚的法属印度支那攫取利益。

这时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战争，已深深陷入泥淖之中，而从中国来说，处境也很困难。自从广州失陷后，所有出海口全被切断，外来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只能依靠西北方的苏联和经南方的滇越公路、滇缅公路运来的西方物资。6月16日，日军大本营派遣直属部队第5师一部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并威胁法国政府。法国在6月20日答复日本，表示完全封锁印度支那与中国的边境，同意日本派出军事专家进行监督视察。29日，日本的监督团到达河内。9日，日军进攻谅山与同登地区，法军投降，日军占领了印度支那北部地区。

与此同时，日本又对英国施加压力，要英国切断滇缅交通线，并封锁香港与广东边界。英国屈服，同意封闭滇缅路三个月，在香港地区禁止中国方面的军械和汽油等物资的运输。

1941年6月8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论敌寇两面政策》。文中说：现在德意与英美双方都在争取日本，英国不惜封闭滇缅路，美国不惜承认东亚门罗主义以迁就日本，日军正在集中力量攻我宜昌，我国内的悲观情绪，彷徨心理，一时大盛。“我们当时曾一再指出，新的国际变化就要到来，敌人的困难很大，我们的办法还多，我们不应悲观，而应检讨错误，克服困难。”“敌人的侵华战争，其产生固然根据其灭亡中国的国策，其发展固然是愈陷愈深，愈久愈难结束，但敌人决不会听任自己在战争中淹没，他必然要采取其他方法，以企图达到其战争的目的的。”他说：“敌人的南进政策，其产生固然根据其独霸东亚的国策，其发展固然是走向武力发动与英美造成不可避免的冲突。”

至于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政策呢？周恩来认为，应该“针锋相对”。就是说：敌人以军事的进攻和扫荡来，我们以各线出击和破击战回答他；敌人以

政治的诱降和分化来，我们以反对投降和巩固团结回答他；敌人以军事政治双管齐下来进攻我们，我们便以团结抗战来回答他；敌人要抽身南进，我们便坚持抗战发展力量，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接着，14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写的代论《论目前战局》。文中说：

“目前帝国主义战争正向着扩大和持久的道路走着迈进。

帝国主义战争自去年法国降德以后，显然已分成两个集团。在三国同盟方面，德国是主角，意大利是配角，日寇则在太平洋上发挥其半独立性的助威作用。在英美集团方面，美国是跟在英国后边，一步一步的进入实际参战。

伴着世界战争的发展，太平洋上的风云也就更加紧张了，但绝对不可忽略的两个条件，他们始终影响着太平洋上风云的变化。一个条件是中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已经坚持了四年。另一个条件便是英美作战的重心尚在大西洋不在太平洋。

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是我们抗战的基本国策，运用友邦对日矛盾及争取外援，是服从于基本国策的对外政策。

我们现在只有号召全国军民，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用民主和团结的力量，克服我们当前以及将要到来的更大困难，击破敌人的封锁和分化，以准备我们的反攻。”

6月上旬，周恩来已经从在他领导下做国际情报工作的阎宝航那里，得知德国法西斯即将进攻苏联。他把这一情报立即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迅速地电告了苏联斯大林。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突然进攻，苏德战争爆发。

6月28日，周恩来写了《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一文，发表在29日的《新华日报》上。说：“世界的惊人巨变，已因纳粹德国毫无信义的突向苏联进攻而爆发了。”

“战争的发展方在开始，我们已经说过：‘其战果决不是短时期所可看出，更不是几个仗便见分晓’，但是我们可预言的是时间有利于苏联。”“现在日寇正处在焦急彷徨等待之中。目前最大的可能是北进攻苏，……但是北进也并不是没有困难和顾虑的，”“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抗战中已屹然不动的坚持了四年，现在更不应受这个风浪波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是‘以不变应万变’。”

尽管在德苏战争爆发后，周恩来判断日军有北进攻苏的可能，但他经过分析，还是认为日军仍有向北或向南进犯两种可能。他在5天后即7月3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分析说：“日本少壮要急于求出路，也有可能实行北进或南进的冒险，不过压迫中国仍是主要的。”“蒋是会投机，压我们北进，但也有顾虑，怕我们北进与苏军配合，先取到武装，如日本南进截断滇缅路，接济得不到，则更困难内战。”他估计：“今年再要发动反共高潮更困难，但对我压力绝不会放松。”

七七抗战四周年，中共中央发表纪念宣言指出，日本“反苏之危机固已增长，灭华之方针，则决不放弃，南进以侵略英美荷澳之野心，亦仍然存在”。20日，周恩来发表了《团结起来打敌人》，说日本不管其是在积极准备北进，或者南进，或者南北并进，其灭华的方针决不会有任何变更。“从中国抗战内部来说，也只有团结起来打敌人之一道。中国抗战的对象，是要驱逐日寇出中国，现在更加上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接一起。如此巨大任务，非团结

起全中国人民，全中国军队，不能达到。”

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周恩来在南方局。重庆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蒋介石的特务机关的领导机构也都在重庆。南方局是中共党的组织，对外公开办事机构是八路军红岩办事处、曾家岩周公馆、虎头岩新华日报社，这些机构都是特务监视的重点。例如从红岩办事处到曾家岩 50 号周公馆，不足十里的路程中，就布满了特务岗哨，仅军统特务的就有 80 多个。上清寺离曾家岩 50 号 100 多米远，是进出周公馆的必经之路。这条路很窄，车子进不去，只有步行，这里更是特务们重点监视的地方，路旁一家家茶馆有特务的据点，喝茶、卖茶的不少是化了装的特务，盯着来来往往的每一个人。就在这样的龙潭虎穴中，周恩来领导南方局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他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原则，提出要“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方针。他本人就是遵行这样的方针的。例如，他同西康省的刘文辉交上了朋友。刘文辉在四川军阀混战中被蒋介石支持的刘湘打败，被迫退到西康雅安。1942 年 2 月，周恩来在重庆爱国人士吴晋航家中同刘文辉见面，刘文辉把周恩来看成为良师益友。6 月，周恩来派王少春为中共政治联络员长驻雅安，并且设立了秘密电台，可以同延安联系。后来解放战争时期，刘文辉通过电台问周恩来自己应如何行动，周恩来答复说：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损失。1949 年 12 月解放大军进川西，刘文辉联合邓锡侯、潘文华发出通电，宣布起义。

即便是特务头子徐恩曾等，周恩来也不放弃与他们交往。这里举一个例子。

当时在周恩来身边从事秘密交通工作的袁超俊，一天夜晚受命带着大叠美元到棉花街秘密交通点接头，临行前化装成一个商人模样，把钱放在密码箱里，身穿西服，脚踏皮鞋，手提密码箱，很有气派，开着汽车前去。到了这个交通点的楼口，走上楼梯。这时，从楼梯上走下来一个国民党军官突然问道：“你找谁？”这一下把袁超俊问住了，心想交通点莫非出了事，一时发愣了一下。就在这时，这个国民党军官突然揪住他的衣服，把他扭住往楼下拽。

袁超俊大声质问他要干什么？他说袁超俊是小偷。听了这句话，袁超俊放下了心，知道交通点并没有出事。但是，还是被这个国民党军官强拉硬扯到了不远处的警察局。

在警察局里，袁超俊就从他们诬陷为小偷的角度来说明。他指着自己的西装革履来说：“凭我这堂堂的商人，怎么能去当贼？”他昂首挺胸，理直气壮。但是那个国民党军官却说：“看衣服就说不是小偷，没那么容易。前几天我们就抓住一个小偷，穿的也是这么阔气，说不定你是个穷光蛋呢！”袁超俊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美钞，在警察局的人员面前晃着说：“看看，大爷有钱。”但是，那个国民党军官还是不肯放过他。

袁超俊知道，今天晚上周恩来在特务头子徐恩曾那里。于是只好亮出徐恩曾的牌子。他装着满不在乎而且很神气地说：“既然你们不相信，那么好吧，就请跟我走一趟吧，咱们到徐恩曾府上说话，在这儿犯不上跟你们磨嘴皮子。到那儿，你们就知道大爷我是谁了。”

这一下倒真是把那个国民党军官等镇住了，但他们还是想弄清真假，就跟着袁超俊去。袁超俊开车把他们拉到徐恩曾家宅的门口，说：“到了，我进去汇报，你们稍候。”周恩来去徐恩曾家，跟着去的卫士是龙飞虎。袁超

俊进去就找到了龙飞虎。

龙飞虎听后，就走了出来，把这些人臭骂一顿。他们见是徐宅出来的人，一声不响地挨了骂，却老老实实，低着头回去了。

1941年10月19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代论《太平洋战争的新危机》，预言太平洋战争将要爆发，指出：日本改组内阁后，以武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方针是确定不移的，估计将有多方面作战的主张，这就是太平洋的新危机，“转变这一局势的关键，是太平洋沿岸反侵略国家的共同奋斗”。

这年冬天，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周恩来致电在香港工作的张友渔，指出日本与美国有开战的可能，要求他作好准备。

12月8日，日本突然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14日，周恩来所写的《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说：

“现在战幕已展开了，英美及其属地的军民在日寇突袭之时，便已立即奋起应战。

这正是正义的洪流，太平洋上反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伟大结合的开始。

日寇这次冒险行动，虽是向南，但决非放松中国，亦非忘情北进，而是由于一方面受其轴心伙伴急如星火的催促，另一方面又遇到反侵略国家日益紧密的包围，同时还受到其内部法西斯军人的叫嚣和责难，于是不得不南进，以牵制美英，以声援纳粹，以打开僵局。

今天的战争，已经是世界人类绝续存亡的战争，亦即是侵略者与反侵略者你死我活的斗争。今天的世界，正处在光明与黑暗的分野，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民主与极权的斗争，和平与暴力的对抗，我们坚信：只要全世界万众一心，胜利是一定属于正义方面的。”

文章预计战争初期会有若干挫败，“必须以持久的消耗战和太平洋上联合的力量打击之，才能最后致敌死命”，号召反侵略国家联成一体，共同战胜法西斯。

1942年2月间，周恩来连续致电延安的毛泽东，分析战况，估计时局。他认为：根据太平洋战争情况看，英美一年之内决无反攻可能，日本在南洋用兵极少，毫未影响北进兵力，继续南进和进攻中国的可能也还存在。日本的困难在于，如进攻印度，则兵力太分散，如进攻苏联，则将深陷进去，如进攻中国则难收效。“蒋在此情况下，既不会投降，也不会彻底抗战，既不会与我全面决裂，也不会放弃对我进攻，敌攻苏固要迫我北进，日攻印他也要关门压我，故本年内将为国内政治最困难的一年，但并非最黑暗的一年。”

到了4月间，为了提高大后方共产党员对国民党正在煽动新的反共高潮的警惕性，周恩来向中共南方局的全体共产党员作报告，历数了三个月来蒋介石发动的109起反动事件。他电告毛泽东，建议把这109起反动事件加以编排和广播。这年夏，周恩来“估计蒋目前不敢投降，也不敢放手内战，还是在此二者之间拖延，但对我局部挑衅，政治全面压迫，是不会放松的。”他向中共中央建议，如果蒋介石加紧军事反共，就可以给胡宗南以迎头痛击，“只有打得痛，才能使他知难而退”。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

参见吕荣斌编著：《周恩来在国统区》。

团提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决议。

这件事，在国民党中也进行了讨论。6月上旬，张治中告诉周恩来说，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曾经研究过今后怎样对待中共的办法，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中共交出军权、政权，组织可以合法；一种意见是，中共可以与国民党合并。此时，蒋介石同意周恩来回延安。另一方面，蒋介石密令在西安的胡宗南说：共产国际解散，这对中共是沉重的打击，要胡宗南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

6月18日，胡宗南到陕西洛川，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由第38集团军先迅速攻占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然后协同第37集团军攻占陕北地区。当时因甘肃南部有“西北各民族抗日救国联军”、“西北农民义勇抗日救国军”等自发组织，武装力量达5万多人。胡宗南等令第38集团军进行镇压，速战速决，十日内弭平，然后发动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

据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6月29日日记载：胡宗南复蒋介石电称，“对边区作战，决先收复囊形地带，对囊形地带使用兵力，除现任碉堡部队外，另以三师为攻击部队，先夺马栏镇，再向北进，闭锁囊口。预期主攻在宜君同官间，攻击开始时间，预定7月勘日，并预定一星期完结战局。”

这里所说“勘日”，指28日。这一日记接着说，在此情况下，周恩来这次回陕北之行，“有决定其命运之严重性”。

这一军情，被周恩来安排在胡宗南身边的地下党员熊向晖得知。熊向晖通过秘密电台迅速报告了延安。延安采取了披露消息的办法，7月4日，朱德用明码电报打给胡宗南，内称：“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胡宗南接到电报后，大吃一惊，说：这一手，厉害。

朱德的明码电报发出后，延安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广为宣传。

对方已经了解自己的动作，这个仗还打不打？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开会。胡宗南认为，蒋介石原定是要“闪击”，是偷袭，现在中共已大加张扬，如果仍按原计划进行，日军可能乘隙西渡黄河，而且美英苏等盟邦也会责难。国军长期未打胜仗，此时进军陕北，将给中共以口实，美国可能转而支持中共。所以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他要参谋长据此向蒋介石发电报。后来，蒋介石复电胡宗南，同意罢兵。

7月9日，周恩来由重庆返延安中途到达西安。10日，胡宗南设宴招待周恩来。周恩来在酒会上举杯说：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朱德总司令7月4日给胡副长官的电报。里头说，胡副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问胡副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胡副长官告诉我，那都是谣传。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的山

河土地，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说完，他一饮而尽。胡宗南也一饮而尽。所有作陪的人都跟着干了杯。

7月16日，周恩来抵达延安。8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欢迎周恩来等的晚会。周恩来在晚会上讲话，说：

“这三年来，我们依然是处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三年来没有外来枪弹的补充，没有外来粮服的供给，没有外来医药器材的接济，全凭人民和自力更生，终年打仗，支持着这抗日的战略根据地，吸引着半数以上的在华敌人。八路军、新四军有了这种抗战成绩，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最坚强最可怕的抗日力量。

对全国说，我们党两度制止了内战的危机（皖南事变和这次进攻边区的阴谋的揭露），坚持了敌后最艰苦的游击战争，坚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撑持；因此稳定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情绪和意志，维系了大后方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和希望。”

周恩来在重庆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十分重视抗日武装斗争的工作，除了大力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外，还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具体领导了华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指导建立和发展了华南各抗日纵队，建立了东江、琼崖等抗日根据地。

周恩来在南方局的会议上，批驳了在敌人后方独立开展游击战争会影响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肯定在广东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和作法。在广州沦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在海南岛，通过与国民党谈判，将冯白驹领导的红军改编为抗日游击队。在东江，以国民党认可的方式建立了曾生、王作尧两支游击队。在珠江三角洲，将吴勤建立的游击队改造成为人民抗日武装。到1941年，东江游击队发展到1000多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琼崖独立总队发展到4000人，建立了根据地；珠江游击队也建立了游击基地。

1942年1月与12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先后成立了广东军政委员会、中共广东省临委，以林平为主任、书记。当时林平还兼东江游击队政委，他请示与广东国民党当局谈判应本着什么原则？周恩来电示：政治独立，不混编，国民党不派政工人员、不调训部队，我专在游击区打敌人。周恩来告诉他：你们在任何时候都需准备好对付顽方及日寇两方面的可能进攻形势，目前国共两党的关系稍趋缓和，但是国民党并未放弃局部进攻的政策。随着国内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周恩来不断对华南的武装斗争有所指示。如1943年春，周恩来电示林平：在当前的严重局势下，不宜召集负责同志开大会。必须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应付险恶环境。国民党对我虽趋向于政治解决，“但对东江则势在必打，志在消灭”，对此万万不可忽略。

1943年7月周恩来到延安后，对于华南的武装抗日斗争，仍不断地以中央或以个人名义，去电指导。1944年1月，他去电指示：“凡你们游击所到及其周围地区，你们均可自派干部，发展党与群众工作，并依靠武装，创立和扩大抗日民主政权。”1944年7月25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林平转军政委与临委电：

“敌军打通粤汉路势在必行，你处工作应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之方针加紧进行。

凡敌向北侵占之区，只要其有久占意图，即应由你处派出得力干部或武装小队，至该区与当地党员取得联系，尽力发展抗日武装斗争。将来此项武装在名义上不一定与东江支队联系，与（国民党）余汉谋部也应避免磨擦，以便自己发展。同时敌向北行动，三角洲及其以西地区亦有可能扩大我现有武装，希望广东我党武装能扩大一倍，并提高战斗力。

国民党军队所在地区，我地方党员仍应坚守隐蔽待机之方针勿变，惟临委可斟酌实情抽调一部分干部转至游击队受训，参加游击工作。

你处仍应不断设法派人与琼崖游击队打通电台联系，如可能亦应派人至广州湾附近发展武装抗日斗争。”

1944年8月上旬，日军攻占湖南衡阳后，发动了进攻广西桂林、柳州的战争，占领了桂林、柳州、南宁等地。李济深在广西集合一些人，搞了几千武装队伍。周恩来曾指示林平，如果他们有诚意，可以按照他们需要派干部帮助其发展游击战争。并指出：目前战局重心在桂，但西江北已成敌人进出之路，西江南路最为空虚，敌占地区也较东江为广，我广东游击战争应以向西发展为目前主要方向，同时联系南路，打通琼崖联络，为此应从东江纵队抽出得力干部向西江发展抗日武装，推广游击区域；中路游击，应采取分散发展；北路游击，应仍依山地发展；对外号召组织依各地情况自定适当的名称，如抗日游击队或解放军均可，不必强求一致。

这一年，在东江、珠江三角洲和琼崖抗日游击战争逐步发展的同时，广东的潮汕、粤中和南路（雷州半岛）等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也逐步开展。6月，在雷州半岛成立了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11月，成立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亦称中区纵队，主要在粤中地区）。1945年1月，成立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同月，在各地普遍建立游击武装的基础上，成立了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后改称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亦称南路纵队）。

到了1945年，因形势发展，日军放弃了桂林、柳州等地，抽兵北调，周恩来特地致电林平说：尽管日军在华南放弃了桂、柳，但是粤汉铁路沿线恐怕仍会是敌军进退要道，沿海诸港口除非盟军登陆日也不易退出，所以广西东南和广东西江的半沦陷区，还有一个短时期可以谋发展，应予发展人民武装，实行地方自治，“有地方武装即有地方政权，只要抗日民主实力自大，自会有人承认，处今之世仍拘拘于合法非法，必搞不出任何局面”。

总计华南的抗日游击武装，从广州失陷到1945年8月将近7年的艰苦斗争中，在广东70多个县中浴血奋战，先后抗击和牵制日伪军15万多人，对日伪军作战3千多次，歼灭日伪军2万多人，自身从几百人发展到近3万人，建立了东江、珠江、粤中、琼崖等抗日根据地，各抗日根据地还有数以千计的民兵。到1945年8月，根据地和游击区的面积有8.7万平方公里，人口1000多万。

1944年2月9日，美国白宫给蒋介石一封信，表示总统罗斯福愿意看到派一个美方观察组去中国的共产党地区，以增加有关华北、东北的日军情报来源。蒋介石表面上当然不好反对，但实际上只允许美方观察组去国民党军队控制的地区。6月，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蒋介石勉强同意了美国派观察组去延安。

7月22日，周恩来同叶剑英、杨尚昆等在延安机场迎来了美国观察组的首批成员。27日，周恩来同观察组的谢伟思谈话，就美军在太平洋的进展和美国未来对日的战略以及中国大陆战场的重要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8日，

谢伟思访问周恩来，谈到美军观察组扩大活动范围的可能性时，周恩来表示中国共产党欢迎向着积极合作方向发展这种扩大，不过恐怕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会反对。

美军观察组的一切活动，是在美军在华最高领导人史迪威的支持下进行的。当时，面临中美对日的最后决战，美军预计将在中国沿海登陆，而中国的沿海地区基本上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部队的地区，因此必须与中共进行协商。

9月，周恩来致史迪威将军说帖。其中说道：

“目前战争情况是欧战节节胜利，太平洋战争着着前进，惟我中国正面战场却处在严重的失败之中，……但在另一方面，中国敌后战场（华北、华中和华南）与正面战场恰成相反的对照，在正面是节节败退，在敌后是节节胜利。敌后解放区现已拥有被解放的人口约9000万，占沦陷区人口（2亿余）43%。敌后解放区的面积约83.7万余平方公里，占敌后总面积（126.3万余平方公里）66%。敌后我抗战兵力，正规军（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已达53万，游击队和民兵约220万。

敌后我军所抗击的敌人，在1944年3月河南战役以前，为日军侵华全数（34个半师团，约56万人）的64.5%，为伪军全数（约78万人）的95%。……经常被我国围绕或袭击的1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约有38个，为敌占大城市（45个）的85%；经常被我国逼近活动或破坏的铁路线为9600公里，为敌占铁路线（约1万公里）的96%，被我完全控制的海岸线约800公里，经常有我活动的海岸线约6500公里。”

说帖指出：“如再加以近代的装备和补充，不仅可以牵制今日敌人之进攻，而且可以配合明日盟国之反攻。”表示希望得到军人、物资的接济，要求国民政府和同盟国给予我军应得之供给和援助，“至少应援得美国租借法案分配于中国的军火、物资的全数二分之后来，史迪威因与蒋介石意见不合，被蒋介石所排斥。在中国沿海登陆之事，也因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日本迅速投降，所以没有实现。不过在日本投降之前，此事始终在周恩来的考虑之中，他曾多次以中央或个人名义致电林平，分析英美矛盾，认为英国对港九不会放手，美国的兵力却易比英国先在广东登陆，国民党方面不会放松广东，必有布置，“务使你们在盟军登陆的配合战中不将自己放在各种矛盾的尖端上被攻击受损失”，要“进退有据”。又说：国民党为配合盟军在华南登陆，已成立东南行辕，在顾祝同指挥下等待时机，目前敌占地区及其周围特别是湘粤桂边，兵力较薄，我华南抗日武装可以此为发展方向。并指示：中央决定将临委和军政委合并，改为广东区党委，实行领导一元化。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在23日的开幕典礼上，周恩来发表了演说：

我们党现在有了121万多党员，……我们党现在领导了中国解放区的91万多正规部队，220乡万民兵，近千万的人民自卫军……我们党现在在敌后建立了18个解放区，连陕甘宁边区共19个，解放了9550多万人口，组织人民选举了自己的民主政府共915县。

同志们！我们的面前困难还多，但我们一定要克服困难。革命完全胜利的路程还长，但我们一定要把它走完。

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起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

消灭日本侵略者！

抗日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在中共七大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在随后举行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一起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第十一章 全面内战爆发前的日子里

- 与毛泽东等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轰动山城，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 与马歇尔、张治中一起视察各地停战协定执行情况，并抵达延安。
- 收到署名“冠英”的特务恐吓信，信中附有一颗驳壳枪子弹。他置之一笑。
- 为反对国民党独占东北而斗争。马歇尔说：周恩来是他从未遇过的对手。
- 提出与国民党代表赴中原检查停战协定执行情况。中原我军突围成功，他功不可没。
- 司徒雷登转达蒋介石五项条件，他断然回答：“绝对不能接受，一条也不行。”
- 蒋介石最后关闭和谈大门。周恩来在南京答记者问说：总有一天要回南京来的。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请求投降。

8月10日24时，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延安总部总司令朱德第一号命令发布。命令要“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

抗日战争胜利了！延安一片欢腾。

枣园，周恩来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在紧张地工作，密切注视着急骤变化的局势。

1945年5月8日，希特勒德国无条件投降。盟军作战重心东移集中对付军国主义日本。

在这年4至6月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迎接抗战最后胜利的部署。但当时估计，还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战略反攻阶段，日本才会投降。然而七大闭幕后一个多月，8月6日，美国向日本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并于9日发起对日作战；9日，美国又向日本投下第二颗原子弹；10日，日本政府表示投降了。

随着日本的投降，国内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蒋介石要攫取胜利果实，并发动内战来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8月11日，蒋介石连发三道命令：一是要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二是电延安朱德、彭德怀要中共军队“原地驻防”；三是要伪军“维持治安”，并要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茨令日军不得向国民党军以外的部队投降。

当日，周恩来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起草了以延安总部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出的第二至六号命令。命令要求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诗、万毅等部，由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山东现地向辽宁、热河、察哈尔进发；要求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的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要求贺龙、聂荣臻所部由绥远、察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命令所有山西解放军统归贺龙指挥，统一行动，击破前进路上一切敌伪之阻碍，如遇抗拒，坚决消灭之；命令所有沿北宁、平绥、平汉、同蒲、津浦、陇海、粤汉、沪宁、广九等铁路沿线及其他解放区一切敌伪交通要道两侧的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都

应积极举行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

解放区各部队遵照延安总部的命令，在大反攻作战中迅速出击，率先从敌伪手中收复国土 30 万平方公里，包括张家口在内的城市 280 多座，歼灭日伪军 7 万多人，几乎切断了日军占领区的所有铁路线，人民军队发展到 130 余万人，保卫了人民胜利的战果。

另一方面，周恩来起草了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发表的对蒋介石 11 日命令的评论，经毛泽东修改后于 13 日发表。评论指出：“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之下，有直接派遣它的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军事管制日本和将来和会的权利。”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现在胜利了，普遍地希望国内和平、反对内战。国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苏、美、英都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但是他顾忌国内外的反应，表面上装得是要和平的。8 月 14 日，蒋介石发出了致延安毛泽东的电报，邀毛泽东去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蒋介石在发出邀请毛泽东去重庆的电报同时，授意国民党中央党报中央日报社说，毛泽东是不会来的，你们要借此宣传国民党是要和谈的，但中共不来和谈。于是《中央日报》就大肆宣传《蒋主席电毛泽东，请克日来渝共商国事》，在国内要闻版上，以三栏篇幅、大字标题刊出，做出渴求和谈的样子。

16 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重庆的南方局工委负责人徐冰、张明（刘少文）的电报，指出关于国共和谈，蒋在今年 3 月已经拒绝，后来六参议员访问延安，带回去一个方案，又被拒绝，所以这次请毛去渝全系欺骗，“目前蒋之一切宣传均为内战做文章”，你们应在报上予以驳斥，“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均极有利于我们反对蒋之内战”。

8 月 20 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延安毛泽东，邀请毛泽东去重庆。21 日，《中央日报》又大登蒋介石的这封电报。他们预料，中共不会来人，可以得到一次宣传的胜利。不料，24 日，重庆《新华日报》也用三栏版面大字标题刊出“延安特讯”：《中共力谋团结，毛主席电蒋委员长，派周恩来来渝》。这是 22 日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复蒋介石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

8 月 23 日下午，在延安枣园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几乎在延安的所有高级干部都参加的重要会议，研究赴重庆谈判问题。

毛泽东先发言，第一句话就是：“恩来同志先去谈判，我后一下。”接着，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认为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我党应提出“和平、团结、民主”三大口号，和平是能取得的。然后，毛泽东又说，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之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国际国内都需要和平，解放区的存在以及国民党的摊子没摆好，故只好暂时和平，以便医好自己的伤疤，壮大自己的力量，将来等待机会消灭我们。我们要利用他这个暂时的和平。毛泽东的发言，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当时局势的清醒认识。

周恩来接着发言说：关于谈判，求得妥协是双方让步，可以估计蒋介石还价很低。我们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也可能一面谈，一面打，我吃亏，他理亏。蒋介石今天要下决心打下去还不可能，我们有准备就不怕。从抗战转到和平，实现这个方针的后盾一个是力量，一个是人心，这两个东西很重要，

是我们的依靠。中央决定我出去谈判，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最主要的是看蒋介石开的是什么盘子。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的，但不能失掉我们的立场。周恩来的发言，也体现出他对蒋介石以及谈判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的清醒判断。

对于这次会议上讨论的重要议题，即毛泽东去不去重庆谈判？周恩来说，大家关心的是毛主席亲自出去的问题，这个今天还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能出去。今天也不能做不出去的決定，看我出去谈判情况如何再决定。对蒋介石的阴谋必须有所考虑。由于毛泽东出去这件事太重大，这次会议没有决定。

会议还研究了为准备谈判，由周恩来草拟的对国民党政府紧急要求十二条。内容包括：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解放区抗日军队有权派代表参加处置日本投降后的一切重要工作；严惩汉奸，解散伪军；释放爱国政治犯；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务机关；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和对新闻出版的检查条例；召开政治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紧急措施，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毛泽东看后，增加了两条：救济被难同胞；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后又将十四条归纳为六项，于8月25日在《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发表。

中共中央宣布周恩来去重庆后，国民党方面吃了一惊，中央日报社担心弄假成真，总主笔陶希圣则认为毛泽东是不会去重庆的。8月23日，蒋介石发出第三封邀请毛泽东去重庆电，《中央日报》又大肆宣传。

接到蒋介石第三封电报后，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七个同志，同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再次研究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并考虑到斯大林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意见，以及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的来电邀请，决定同意毛泽东去重庆。26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通知中说，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27日来延安迎接的蒋介石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飞机上午11时许从延安东门外机场起飞，下午3时许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

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轰动了这个山城，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诚意。

8月29日，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举行茶会招待各界人士，说明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中共于25日公布的《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的六项措施。也就这一天，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在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订的《剿匪手本》。

9月初，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方面张治中、张群、邵力子开始谈判。此前，周恩来、王若飞提出了中共的建议，国民党方面不同意，关键在军队

问题。周恩来说：中共拥有武装是革命发展的结果，今天谈判是为了避免双方武装冲突，要以民主和平方式解决矛盾。并问：既然你们不同意我方建议，是你们提出要我们来谈判的，你们的方案是什么？对方因没有准备谈判，提不出方案来。

实际上，蒋介石这时候正在迅速调动兵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线向解放区推进和进攻。到9月中旬，共调动了36个军、73个师。其中，山西阎锡山9月上旬出动7个军，进占同蒲路沿线，一部进入中共上党地区；绥远傅作义出动6个军，夺占归绥等城后东进，先头逼近张家口；陕西胡宗南出动8个军，东出潼关准备进占石家庄、北平、天津；此外还有第11战区孙连伸出动3个军，李延年出动3个军，第10战区李品仙出动2个军，第9战区薛岳出动1个军，第7战区余汉谋出动2个军，第5战区刘峙出动4个军，等。

重庆谈判共进行了43天。

周恩来后来说：日本投降后，国共谈判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到年底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从开政治协商会议到6月休战，第三阶段从7月大打到和谈破裂。第一阶段是国共直接谈判，没有结果，打了三个月内战；第二阶段各党派协商，得到结果，但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实际上被推翻；第三阶段谈判成为烟幕，实际上大打。

在重庆谈判中，最棘手的是军队问题。国民党方面吴铁城说：“只要你们把军队交出来。什么官都给你们当！”王若飞答：“我们共产党什么官也不要，只要求国民党把军队交给人民。”当然，这都是不可能的。于是谈判了军队缩编问题。有过三次变化：第一次，国民党军队缩编为263个师，共产党48个师；第二次，国民党军队263个师，共产党43个师；第三次，在9月19日的会谈中，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如国民党军队缩编为120个师，中共可为20个师。当时，解放区有1.4亿人口，共产党军队有140万人，缩编为20个师，这是很大的让步。但是，国民党不接受。

关于军队驻地，周恩来提出：我方第一步准备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8个地区的军队撤出，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三地区的军队撤出，而将中共所有部队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与陕甘宁边区等7个地区。但是，国民党提出中共方面军队至多不超过5个军16个师，并要由国民党“统帅指挥”。军队驻地与所谓解放区不可混淆，中共可提出地方行政官员名单，送请国民党中央量才任用。

国民党代表仍坚持蒋介石提出的“军令政令统一”。针对国民党方面这种不平等的态度和企图吞并解放军和解放区的方案，周恩来说，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党治时期，我们何能将军队政府交与一党政府。因此政府今日欲求达到统一全国军队之理想，必须采取民主之方式，循一定之步骤，而非可一步登天，一蹴而就。

谈判处于僵局。

这时候，上党战役正在进行。阎锡山以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四个步兵师及一个挺进纵队自临汾、浮山、翼城进占已被中共武装解放或包围的襄垣、潞城、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城，并企图侵占整个晋东南解放区。9月10日，中共军队发起上党战役，至19日，攻克屯留、潞城、长子、壶关，

歼国民党军 7000 多人。

9 月 17 日，中共中央给毛泽东、周恩来来电，提出为了争取东北，我们全国的战略方针确定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毛泽东、周恩来 19 日复电同意。中共中央即电告各中央局：“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

谈判中断了几天。9 月 27 日至 10 月 5 日，双方又举行四次会谈，在 10 月 2 日会谈将结束时，周恩来建议，将一个月来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其中总的方针、军事问题、政治会议问题等，或已双方同意，或彼此意见接近，择其能发表者发表之，以解人民之渴望。国民党方面也同意。周恩来起草的《国共会谈纪要》，经毛泽东修改，10 月 5 日向谈判双方提交讨论的初稿共 13 条，最后一条是关于避免内战问题，中共方面提出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暂留原地待命；国民党方面表示一切武装冲突自须即行停止，惟中央部队不能专赖空运，在必要时，中共军队不应阻止其通过。中共方面复表示，中央军队进入或通过某一解放区，只有在会谈已有结果、驻地已有划分后，才不致发生冲突。这一条，国民党实际是要求其军队以受降为名进攻解放区合法化。后来双方都不愿引起全国人民心理的不安，同意删去这一条。会谈纪要，最后形成 12 条。

这时，上党战役中国国民党军队屡屡失败。9 月 20 日，中共军队围攻长治城，国民党军由第 7 集团军彭毓斌率两个军共 6 个师及省防军一部，由北沿白晋路南下增援。中共军队围城打援，至 10 月 6 日基本歼灭援敌，彭毓斌被击毙。长治敌军突围而逃，12 日被歼灭，俘军长史泽波。这次战役，共歼敌 11 个师和 1 个挺进纵队共 3.5 万余人，缴获山炮 24 门，机枪 2 千余，长短枪 1.6 万多。

10 月 10 日，《国共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在重庆桂园客厅签字。中共签字代表为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代表为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当夜，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与蒋介石长谈。毛泽东告诉蒋介石，他回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仍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商谈，使《纪要》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能在召开政治会议以前得到解决。10 月 11 日，毛泽东乘飞机回延安。

在这个会谈纪要中，国民党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也不得不同意迅速结束国民党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宗教、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同时，国民党却顽固地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并妄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以致无法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

蒋介石的根本目的是要消灭共产党，和谈不过是争取时间调集兵力的手

段。还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就在9月17日以命令形式向内部重新颁发他1933年编订的《剿匪手本》。9月20日，他又密令各战区司令长官：“彼（中共）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10月14日，国民党第11战区孙连仲部的7个师从河南新乡北进，企图与进占石家庄的第1战区胡宗南部的第3、第16军会合。其间平汉线上200多公里的铁路，是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控制的。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军区，“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

傅作义部6万多人企图夺占解放区的张家口，控制平绥路，中央军委指示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集结兵力，进行绥远战役。绥远战役于10月18日开始。

另一路国民党军由徐州沿津浦路北上，在日伪军掩护下，进占济南，侵占解放区，企图控制津浦路南京至济南段，尔后向天津、北平、东北推进。10月12日，中央军委指示新四军军长陈毅、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目前山东与华中的中心任务（除出兵东北外）就是截断津浦路，阻止顽军北上并力求消灭北上顽军之一部或大部。”新四军领导部署了津浦路徐济段战役。这一战役从10月18日开始。

10月19日，蒋介石又发出进攻解放区的密令，要国民党军队“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气势汹汹向解放区压来。

10月20日，在重庆的谈判继续开始，商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这一天，周恩来接到中共中央来电，说蒋现以70万大军向我进攻，如不停止，我方对政治会议无甚兴趣。伪军、受降、解放区三问题不解决，缩军、国大均谈不上。

10月21日，周恩来即在谈判时指出：国民党军进犯解放区已达70万人，再前进，必引起内战。停止进兵、重划受降区、恢复交通、解散伪军四者互相关联，必须先解决，办法是承认各边区政府。

10月22日，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一）规定双方停止攻击，各守原防不动；（二）规定受降区，各自执行，不得相犯。

10月23日，周恩来在谈判会上又指出：孙连仲部向河北，阎锡山部向大同，胡宗南部向石家庄前进，抗战初期这些地区早已划归第18集团军。现在国民党军进兵，使冲突无法避免。

10月26日的谈判会上，国民党代表提出：（一）铁路交通必须恢复；（二）中共军队撤退到铁路线以外；等。周恩来则指出：在解放区问题未解决、受降区没有重划以前，国民党军进兵，即为进攻。必须停止进兵，才能恢复交通。

10月30日的谈判中，周恩来针对26日国民党方面所提几条，提出了经中共中央同意的四点主张：（一）为避免内战，恢复交通，立即停止进兵、进攻、进占；停止利用敌伪军；在八条铁路线（平绥、同蒲、正大、平汉北段、陇海东段、津浦、胶济、北宁西段）上双方都不驻兵；国民党方面如向北平、天津、青岛运兵须经过协商。（二）军事小组只能在上述问题有原则决定后才可拟定具体办法。（三）如不能事先取得协议，中共方面不反对先开政治协商会议，但开会时必须先解决避免内战，恢复交通问题。（四）周恩来回延安前须向国民党政府问明关于国民大会的意见。

在战场上，中共军队坚持了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自卫的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蒋攻我亦攻，蒋停我亦停”；二是胜利的原则，即“不

要浪打，打则必胜”。在这两个原则下，党中央部署了自卫反击的平汉战役、绥远战役、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等几个主要战役，以及其他战役、战斗。其中，最有影响的为平汉战役。

平汉战役发起于10月24日。当时，国民党军自9月从郑州、新乡一带沿平汉路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后，其先头三个军渡过漳河，推进到马头镇、磁县间地域。我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奋起自卫，经一周激战，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1万多人起义，其余两个军在溃退中被围歼，毙伤、俘虏国民党军2万余人。11月2日，战役结束。这一战役给国民党军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对国内形势的演变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59年国民党在台湾的“国防部”编写的《勘乱战史》中说：是役之后，“使政略、战略陷于被动，影响尔后之作战实至深巨”。毛泽东给周恩来打电报说：“此战胜利后，将给‘剿匪，军以极大震动。”

平汉战役的胜利及其他一些战役战斗的顺利进行，说明解放区有能力抵御蒋介石军队的进攻。军事上的胜利，也有力地支援了谈判桌上的斗争。11月3日，中共中央给重庆代表团来电，要求以较强硬的态度提出我们的要求。11月8日，周恩来向国民党更明确地提出新的四条，主要是：为了停止内战，国民党军应全面停止向解放区进攻，从侵占区全部撤退，从八条铁路沿线撤退，取消各地“剿匪”命令，保证不再进攻各解放区。

蒋介石坚决进攻解放区，谈判也难以继续。11月3日，国民党军在美军的支援下，进攻已被八路军收复的通往东北要道的山海关，16日攻占。事实证明，国民党的所谓谈判，纯是“缓兵之计”，其目的是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

11月25日，周恩来飞返延安。

周恩来回到延安前后，国际国内的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前一时，美国虽也拉拢国共和谈，但正像周恩来所说，赫尔利的政策是“扶蒋压共”。向国民党提供军事装备，帮助国民党运兵，甚至出动美国海军陆战队直接替国民党抢占战略要地。这种政策的结果，造成了内战的危机。赫尔利的政策与美国政府当时的考虑是有所不同的。美国政府当时并不希望中国即发生大规模内战。11月27日，赫尔利在美国宣布辞职，美国总统立即任命马歇尔为驻华特使。马歇尔是美国的五星上将，在美国有显赫的地位。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希望中国停止武装冲突，协商解决内部分歧，要求国民党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扩大政府的基础，同时保证美国不会使用军事干涉去影响中国任何内争的过程。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发表公报，表示支持中国的“统一与民主”，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内部冲突，三国坚持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苏美外长还宣布，双方军队在完成各自任务后尽早撤离中国。

周恩来后来曾经说道：“3个月的内战，证明蒋当时还没有准备好。他的主要力量在西南，虽然美国尽一切可能帮他运了5个军到山海关，2个军到华北，2个军到山东等，但他的绝大部分军队还在西南，东北、华北广大地区还被我们解放着，使蒋不可能继续打下去。同时，在国际上有杜鲁门声明，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报，马歇尔来华等。因此，使内战暂停，进入第二阶段。”

这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群众运动高涨。12月1日，昆明各大学举行反对内战集会，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镇压，打死学生4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大中城市群众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掀起了席卷全国的运动高潮。12月9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一二·九”十周年大会上讲话，号召全国青年为实现国家的民主、和平而奋斗。

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使和平的前途出现了一线曙光。

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去重庆继续谈判。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就准备下一阶段谈判和参加政协会议进行讨论。周恩来在会上说，蒋介石企图在有利于他的条件下停战，成立请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的任务是：配合军事自卫，开展政治攻势，同时准备寻求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我们要提出全面停止内战；制定共同纲领；召开国民大会，提出宪法草案原则，充实新民主主义内容；实现双十公告，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释放叶挺、廖承志。会议确定了去重庆谈判的纲领和方针，批准周恩来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还通过周恩来的提议，将重庆局改为南方局，以董必武为书记，王若飞为副书记。

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成员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和工作人员40来人，分乘3架美军C47运输机到达重庆。

12月18日，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了中共代表团这次来重庆，一方面是参加政协会议，另一方面是要继续进行国共谈判。当前首先待解决的是停止内战问题，其次是要讨论出一个和平建国方案。

12月22日，马歇尔到达重庆。23日，周恩来和董必武、叶剑英拜访了马歇尔。周恩来说：中国人民抗战牺牲重大，中国不能再有内战。

12月27日，国共谈判恢复。周恩来将中共代表团关于无条件全面停止内战的提议交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提出：（一）双方下令所属部队暂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二）凡与避免内战有关的一切问题如受降、解除敌军武装、解散伪军、恢复交通及解放区、收复区等，在军事冲突停止后用和平协商方法解决；（三）为保证实现上述两项，在政协会议指导下，组织全国各界考察团分赴有内战的各地区考察，随时报告事实真相，公诸国人。

12月31日，蒋介石决定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同一天，周恩来和王世杰谈判。王世杰递交了国民党的复文，同意停止一切军事冲突，组织军事考察团，对所有同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及受降有关的事项，由国共双方各派代表1人，会同马歇尔商定办法。

1946年1月5日，国共谈判双方拟定《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7日，由张群、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国共双方分歧主要在国民党要从中共手中接收赤峰、多伦两个城市。这两个城市是中共部队从苏军手中接收的，在山海关被国民党军占领后，是为华北解放区与东北联系的要道，不能让出。从7日到10日，三人会议举行五次，双方一直僵持。9日晚，马歇尔着急了，对蒋介石强硬他说，如果不停战，政协会开不成，下一步就是三国干涉，你要考虑。蒋介石这才无可奈何地同意撤回接收赤峰、多伦的要求。

障碍扫除了，10日一早7时半，周恩来即出发到马歇尔住处。在会客室里，由张群和周恩来分别代表国共双方在《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

通的命令和声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上签字，马歇尔出席了。同时签字的还有《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等文件。命令规定：（一）一切战斗行动，立刻停止。（二）除另有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惟对复员、换防、给养、行政及地方安全必要之军事调动，乃属例外。（三）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所有阻碍该项交通线之障碍物，应即拆除。（四）为实行停战协定，应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委员三人组成之，一人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三委员一致同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之。

10日当天，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即发出通告：凡在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对协议“均须切实严格执行，不得有误”。蒋介石也下令“格切遵行”。

1946年1月10日上午10时，全国人民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的国民政府礼堂开幕。蒋介石致开幕词，宣布了四项诺言：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释放政治犯。

周恩来也在开幕式上致词，他说，方才听到蒋主席关于保证人民权利四项的公布，我们表示欢迎这个公布，并愿为实现这四条权利而奋斗。政治协商会议，就要请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一起出来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方案。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实现各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于此，中共代表团愿以极大的诚意和容忍，与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努力合作。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再发生内战。周恩来以宏亮的声音，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诚意，全场热烈鼓掌。

1月11日，周恩来在会上报告停战商谈的经验教训。先谈停战谈判的三点经验：停战商谈应该是全面的，没有条件的；内战问题，全国反对，世界不满，应该迅速解决；谈判方法上应该公开。在讲到停战如何进行时，强调军事调处执行部对与停战有关的事都要过问。在讲到如何消除内战时，说：根本消除内战的办法，是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并指出现在13个省区仍有冲突。

停战问题是政协会议召开的前提，政协会议开幕后，这个问题仍是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因为不停战，和平建国无从谈起。停战令颁发时，国共双方商定的停战时限为1月13日24时，不分何地，一律实行。监督停战的机构实际是军事调处执行部。11日当天，决定军调处三方代表：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三厅厅长郑介民，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美国驻华代办罗怕逊，于13日赴北平执行任务。

1月12日，周恩来在会上报告国共会谈经过。回顾了从1936年以来的谈判历史，提出四点经验教训：要互相承认，不应该互相敌视；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周恩来并说：“以上四点，是从九年来，双方商谈中得来的痛苦经验与教训，虽似泛论，但很希望各位先生和全国人民了解，这是一种由衷之言，我们诚恳希望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上，能够认识到这方面。”

从14日至19日，会议就五个议题进行讨论：关于改组国民政府与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关于施政纲领，关于军队国家化，关于国民大会，关于宪法草案。

1月16日,在讨论军队问题时,周恩来作了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的报告。他说:“和平建国方案是政治协商会议主题之一。这个方案包括两大项目:一是政治民主化,一是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要同时实行,不能同意先有军队国家化,才有政治民主化的论调。在谈到军队国家化的标准问题时,他说:“军队属于国家,也属于人民,军队是从人民来的,只有军队能真正保护人民利益,才能保护国家,才能保护民族。”对于如何使军队国家化,他表示:同意成立委员会,执行整编全国军队的任务;同意全国整编与大量裁兵的原则;凡是抗日有功的军队,应该一面承认,一面整编;要改革军队的制度与教育;地方治安应留地方的保安队或自卫队负责维持等十二条办法。在整编与裁兵的数量上,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林蔚代表国民党提出,计划缩减到90个师。周恩来表示配合,将中共部队整编为20个师。

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十几天的讨论,五个议题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协议。1月27日,周恩来飞回延安,参加中央会议,汇报政协会议情况。当天,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说,这次到重庆有三件事。停战,开政协会议,解决东北问题。停战已做到,政协会议也开得差不多,只有东北问题还没有谈起。会议认为,我们从抗战结束就是和平方针,但前一段的自卫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代表团取得的成绩很大,方针都是正确的。1月28日,周恩来向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关于停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政协会议等情况,中央同意代表团商定的政治协商会议各项文件,委托代表团在文件上签字。

为赶回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会,周恩来29日由延安飞重庆。中途天气恶劣,阻于西安,30日到重庆。

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举行闭幕式。周恩来在闭幕式上致词说:“政治协商会议今天通过的各项协议,证明了这次会议得到很大的成功。”“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这种解决的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讲到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时,他说:“虽然这些问题的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虽然各方面的见解和认识也有一些距离,但我们愿意承认:这些协议是好的,是由于各方面在互让互谅的精神之下得到的一致结果。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拥护这些协议,并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不分地区、不分党派地努力奋斗。”

周恩来在闭幕式上的发言,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实现和平的真诚愿望和认为和平确实能够实现的乐观估计。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提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指出:“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改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并批评了不相信这一切真的能实现的“左”的倾向。2月6日,中共中央告中央代表团,同意参加国府委员会的人员名单。

政协会议的成功,对全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在全国人民心中形成了一个和平的标准:执行政协各项协议,就是民主、和平,违背这些协议,就是走向战争。

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军队整编的谈判继续进行。2月25日,周恩来同张治中、马歇尔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这个方案规定,整编军队分两步走,第一步,12个月,政府军队编为90个师,中共部队编为18个师。然后再过6个月,政府军缩编为50个师,中共

部队编为 10 个师。数量均为 5 比 1。签字后，张治中代表政府致词，说：“本人代表政府签此方案，并百分之百保证其执行。”周恩来致词说：“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向诸位，向中国人民，向世界友邦保证，凡我们签字的文件，特别要包含这次签字的整军方案，我们都要使它百分之百地实现。”

3 月 6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精兵简政”的党内指示：“无论将来情况如何，我们均须精兵简政，减轻民负，方有利于解放区之巩固和坚持。”要求山东、华中和晋冀鲁豫三个地区，第一期精减三分之一，3 个月完成，第二期再减三分之一；对晋绥、晋察冀也作了布置。各解放区根据中央的部署，采取了复员的行动。

国民党内的顽固分子在整军方案签字后，不断发表破坏整军方案的言论。国民党在军队整编方面，也始终没有采取具体行动。

整军方案签字后，为了视察各地对停战协定的执行情况和解决整编中的问题，周恩来和马歇尔、张治中一起，从 2 月 28 日起到 3 月 6 日，到北平、张家口、集宁、济南、徐州、新乡、太原、归绥、延安、汉口等地视察。3 月 4 日，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和延安人民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对马歇尔 3 个月来的工作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他的态度和方法是公正的，并当面向马歇尔致谢。

但是，国内的形势没有朝着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良好愿望发展。尽管内战是停止了一个时期，但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不断发生。

还在政协会议开会期间，政治协商会议陪都（重庆）协进会在沧白堂连续举办讲演会，国民党特务在台下起哄，后来还大打出手，有人被打伤。1 月 26 日，又发生黄炎培的住宅被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搜查事件。2 月 10 日上午，重庆各界召开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在较场口的大广场上，站满了近万群众。周恩来也到了会场。突然，国民党特务在台上台下喊打，大会主席台上，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等被打。这就是闻名全国的较场口事件。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等 11 名政协委员 11 日联名致函蒋介石，提出强烈抗议。12 日，周恩来收到署名“冠英”的特务的恐吓信，信中附有一颗驳壳枪子弹。周恩来收到信后，置之一笑，立即交给《新华日报》公布。2 月 22 日，国民党又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举行反苏游行，并指使特务捣毁重庆民生路的《新华日报》营业部、民盟机关报《民生报》的营业部。周恩来当晚就发表声明，说明事实真相，谴责国民党特务暴行，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

这些事件的发生，显然是与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希望相违背的。但中国共产党作了极大的克制，周恩来仍继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努力寻求和平解决各项问题的途径。2 月 25 日中午，周恩来会见马歇尔，指出国民党中一部分人士，特别是 CC（中统特务的总称），在尽力破坏和推翻我们这些共同成就。而这时，尽管发生了这些事件，还看不出蒋介石的真意。蒋介石曾在政协会议闭幕式上郑重声明，对于政协会议所决定的各种方案，“我敢代表政府先行声明，政府必然十分尊重，一俟完成规定手续以后，即当分别照案实行”。“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的坚决的遵守本会议一切的决议。”

不到两个月，蒋介石的真实意图暴露了。3 月 1 日，周恩来还在和马歇尔、张治中一起在各地视察，落实政协会议和整军方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开幕了。这是政协会议后国民党的第一次全会，蒋介石亲自主持，会上一

片反共叫嚣。二中全会决议中，虽也有表示要执行政协决议的话，但通过了很多重要的推翻政协决议的议案。

周恩来3月18日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的结果令人失望，因为它的决议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他还警告国民党：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

3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和主要民主党派拒绝参加的情况下，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参政会第四届二次大会开幕。会议按照国民党二中全会决定，通过了反对政协的议案。

政治形势恶化了。3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说，蒋介石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一切革命党全部消灭之”；第二条，“如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蒋介石的这两条，“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为平静一点就忘了。2月1日到9日就忘了，较场口事件以后就不忘记了。”

3月15日和18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两份党内指示，要求全党对可能形成的新的内战局面提高警惕。如果反动派发动进攻，必须能够在运动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在坚持实现政协决议的斗争中，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打内战。

国内的军事形势，正像中共中央估计的那样，蒋介石开始局部进行内战了。首当其冲的是东北。

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在东北并无一兵一卒，而中国共产党有它领导的抗日民主联军在那里战斗。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派大批干部和军队进入东北。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东北局。10月31日，成立东北人民自卫军，到11月底，共有部队11万人。1946年1月14日，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27万人。国民党也非常重视东北，1945年9月起，成立以熊式辉为首的东北行营，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由美国军舰海运第13军、第52军，于10月、11月在秦皇岛登陆。

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独占东北的企图。但是东北问题是内政与外交交织在一起的，因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苏军进驻的大城市和交通线要移交国民党政府。从中国共产党来说，当时控制东北的铁路干线和城市也还有困难。11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东北我军从中长路沿线及大城市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东满、北满、西满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建立根据地，以作持久打算。到1946年3月止，通过清剿匪伪，发动群众，充实部队，总兵力发展到31万人。

国民党也不断运兵，至3、4月间，已有包括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中两个（新1军、新6军）在内的6个军调至东北，连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也有31万人。

国共谈判期间，国民党一直拒绝和中国共产党谈东北问题。停战协议也没有包括东北。国民党不承认中共和它的军队在东北的地位，周恩来说，“停战令的结症在东北”。停战令发布后，由于双方大量兵力在东北集结，而国民党军也于2月中旬开始向我军发起进攻，大规模的战争爆发在即，形势十分严重。周恩来2月21日向马歇尔提出，（一）三人小组应去东北，（二）停战令适用于东北，（三）军队整编方案应包括东北。

2月24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东北问题仍将为斗争焦点。

对蒋军的挑衅和进攻，请予防范和准备。2月27日，又致电中共中央转东北局：我军在东北的地位，从事实上和法律上说，国方都是无可抵赖的，但蒋介石有拖延承认的可能，请注意。

3月11日，马歇尔回国述职。在马歇尔回国前，周恩来曾提出希望马歇尔在解决东北问题后再回国，并提出解决东北问题的原则，一是外交和内政分开，中共不介入外交，内政要协商；二是军事和政治平行解决。马歇尔转达了蒋介石提出的五条：执行小组只管军事不管政治，执行小组随政府军行动，政府军可占领一切为恢复主权所必须的地方，中共军队撤出矿区、铁路，等。周恩来指出，蒋的五条，实质是他们的军队可接受一切地区，要中共军队从任何地方都撤出。马歇尔表示再商量。

马歇尔回国后，蒋介石在东北分南北两路向中共军队大举进攻。以新：军、71军向北，预期4月2日夺取四平：以新6军、52军等向沈阳以南进攻，得手后新6军再向北攻四平，直至将中共军队消灭在松花江两岸。同时，刁难赴东北的军事调停小组。

4月5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转东北局和叶剑英：“东北应准备大打，决勿幻想国方能让步。”中央收电后即复电：“情况估计及应付方针甚为正确，望坚决执行。在目前国际国内反动逆流下我党必须有通盘计划以粉碎反动派的进攻。”

4月14日，周恩来电告中央并转东北局，提议在东北方面利用这几天工夫守住四平街，给顽军重大打击，并进入长春。4月15日，我军开始进攻长春，4月18日，攻下长春。

同一天，国民党军向四平发动猛烈进攻，四平保卫战开始。为防止全国局势有变，当天，中共中央即发出指示，要求各解放区主要负责人不得中央许可，不要离开队伍，以应付任何事变。

4月18日，马歇尔从美国回到中国，认为局势全面恶化了。

4月22日，周恩来会见马歇尔，指出：国民党违背3月27日三人小组签订的《调处东北停战协议》，武力占领我方7个城市，我方遂也占领长春。这次谈话后，马歇尔曾向张君勱、罗隆基说，周恩来是他从未遇过的对手。

4月24日，周恩来再见马歇尔，提出苏军已撤完，东北已无接收问题，因此不应再有军队调动，东北应无条件停战，即先停战后谈判。而国民党却坚持先打仗（即占领长春后）再谈判，或是中共撤出长春。谈判僵持不下。这时民主同盟提出一个方案，即中共军队撤出长春，国民政府不派军队，和平接收长春，然后谈判。周恩来表示可以考虑。但马歇尔与蒋介石谈后，蒋介石实际对停战无兴趣，拖而不答。马歇尔也无办法，表示要退出调解地位。周恩来和蒋介石都表示挽留。

在历时一个月的四平保卫战中，中共军队顶住了国民党精锐部队的攻击，重创国民党军，于5月18日撤出。消灭国民党军1万余人，自己也伤亡8千余人。这次战役，争取了时间，并作为一个重要因素，使东北出现四个月的实际停战局面。

四平保卫战结束后，蒋介石更不愿谈判了，一心以武力解决东北问题。5月22日以前的几天，马歇尔天天找蒋介石谈。而蒋在22日告诉马歇尔，他已经三天没有得到东北的消息了，并说为了控制东北局势，他准备24日到沈阳去。实际上，蒋介石命令杜聿明在四平战役后继续向北推进。23日，国民党军占领长春，之后一直推进到松花江南岸，但无力再向北渡江进占哈尔滨。

蒋介石到沈阳后，马歇尔困难地与蒋通信电话联系协商。由于国民党军的不断北进，周恩来在与马歇尔的谈判中，要求给蒋施加压力，停止进攻。蒋介石6月3日回到南京后，同意东北暂时停战7天。周恩来提出，时间太短，停战一个月，至少20天。6月6日，蒋介石发表声明：从6月7日起，在东北停止进攻15天。

为什么会有休战呢？周恩来后来说：“因为国民党占了长春后，兵力分得很散，没有兵再进。当时我们在东北占了有利的地位，山东、山西收复了几个伪军占领的城市，这样国民党需要在东北实行几个月的休息，而在关内动手大打，于是有东北休战。”

东北休战后，国共双方在马歇尔的参与下，对东北问题继续谈判。6月7日，周恩来回延安汇报，并进行研究。中共中央决定目前基本方针是在不丧失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和平，“竭力争和平，哪怕短时间也好”。此时，蒋介石认为局势对他有利，提出的条件越来越高，企图压服共产党，或是共产党主动要求破裂，把责任推给共产党。

面对即将爆发的战火，6月23日，上海十万人举行示威游行，并送马叙伦、盛丕华、张纲伯、阎宝航、雷洁琼、吴耀宗等十位代表前往南京呼吁和平。当天下午，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被国民党特务包围毒打，即下关惨案。6月24日凌晨，周恩来等赶到医院慰问受伤者。有的代表说：我过去总是劝你们少要一些兵，少要一些枪，现在我认识到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支，子弹不能少一点。身负重伤的马叙伦也握着周恩来的手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由于国民党根本不想在谈判中达成什么协议，休战谈判没有结果。周恩来在谈到这一段谈判时说：“23天的谈判，讨论了许多问题，我们还打算再让一二个地方以保全广大的解放区。在停止东北战争、恢复交通、整军等问题上，都作了许多的让步，但结果还是破裂，中心问题仍是政权问题，根据地问题。蒋在形式上是要我退出苏、皖、承德、安东、冀东等地，但他承认的只是黑龙江、兴安两省及嫩江半省，华北只是临沂、大名、上党等几个地区，想把我们完全隔开，先限制在这几个地区，然后再来消灭我们。”

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期间，由于国民党还都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部分人员于5月3日乘马歇尔专机到南京，住进梅园新村30号，对面17号作为代表团的办公室和宿舍。到南京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代表团对外代表中共中央同国民党和美国代表谈判，对内即是中共中央南京局，由周恩来负总责。

蒋介石着手准备发动关内的对解放区的全面战争，并要在3个月至6个月中消灭全部中共军队。这是由于蒋介石自信已作好了内战的准备，并在军事力量上取得很大的优势。

在兵力上，国民党军总兵力已达430万人，整编师86个，在美国的援助下装备美械、半美械的有22个师，还有大量的炮兵和一定数量的飞机、军舰、坦克。而解放军总兵力约127万人，野战军只有61万人，武器装备主要缴自日伪军的步兵武器和为数很少的火炮。

但是，中国共产党自3月份以后，就加紧进行作战的准备，警惕国民党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58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58页。

发动全面内战。同时分析了国际形势，认为世界大战近期没有爆发的危险，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选择了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

周恩来5月3日到达南京时，中原的局势已十分严重，国民党军30万人已紧紧地包围了中原解放区。当天晚上，他在梅园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首先应停止中原内战，以免发展为全国内战。第二天，即访马歇尔，为制止进攻，希望政府派代表去湖北协商新四军第5师的转移问题。

抗战胜利后，原在鄂豫边区的李先念、郑位三等率领的新四军第5师，从广东北返的王震、王首道领导的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从河南中部南下的王树声等率领的嵩岳军区部队，在枣阳地区以北会合后，组成了中原军区。由于这个地区靠近武汉，处于国民党自大后方进军华东、华北、东北的战略通道，蒋介石一直蓄谋下手消灭这支部队。为避免冲突，中共中央准备将这支部队撤至安徽五河一带，后来因为实行停战，未能到达目的地。蒋介石却利用停战，调兵包围了这块解放区。

周恩来十分关注中原局势的发展。早在2月23日他就向马歇尔提出，应该撤围让中原解放军完成转移。3月16日，周恩来给太行、晋绥、山东等解放区的领导人打电报，说：“五师困于粮款，顽方又蚕食挑衅，不允我军马上转移，因之五师危急万分，各地均有立即抢救五师的责任。”3月22日，周恩来在延安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中央决定五师应争取全部合法的转移，在未转移前，应接济粮食。北平、重庆应本此方针交涉。如交涉不成，而被袭击，只有突围，我五师应有此坚定的准备。故全部转移，被袭则突围，应为我五师目前确定方针。”同时委托董必武携六千万元法币去五师，从北平交涉飞机去淮阴调1.4亿法币送去，以解五师之急。董必武接电后，30日即动身去中原解放区慰问并传达中央指示。

5月3日，周恩来提出要求国民党政府派代表去湖北解决中原问题后，国民党勉强接受了周恩来的要求，同意派徐永昌与周恩来一起去湖北。后来徐永昌托病，改派武汉行辕副参谋长王天鸣为代表。这样，周恩来、王天鸣和美方代表白鲁德于5月8日到达中原解放区的中心宣化店。

宣化店是鄂北的一个小镇，只有一条街，居住着百十户人家。它四面环山，地形险要。周恩来一到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一面听取中原领导人的汇报，研究突围的方案，一面同美国和国民党方面代表会谈。在与中原军区领导的谈话中，他要求中原部队一定要丢掉幻想，随时作好迎击对方突然进攻的准备，一定要设法用枪杆子突围出去。同时对如何突围和突围时间、路线等都作了具体周密的部署。

9日上午，周恩来一行离开宣化店，下午到达武汉。10日，同徐永昌、白鲁德签订了关于停止中原战事的协议。协议的签订，推迟了中原内战爆发的时间，争取合法转移了700多名干部和伤病员，为中原军区的胜利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一纸协议挡不住国民党围攻中原解放区的阴谋。6月22日，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队向各进攻地点集结，作攻击准备。26日，开始大举进攻。

中原李先念、郑位三部有了充分的准备和必胜的决心，正确选定了敌军兵力较弱的平汉路信阳以南段进行突破，以小部向东迷惑敌人，主力分左右两路向西突围，经两个月的奋斗，突破敌军重重包围和堵截，胜利完成转移。这里周恩来的功绩不可没。

中原战争的爆发，标志着全面内战的开始。周恩来给马歇尔的备忘录中说：国民党政府军于6月26日起大规模进攻湖北李先念部，这必然引起全国性的大规模军事冲突，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政府。30日，他致电中共中央，说：对于蒋介石的进攻，建议在政治上揭露蒋是大打，在军事上各个击破之。7月1日，中共中央通知各解放区：“敌反共反人民的大内战已从26日围攻五师开始。我即将进行自卫战争。”

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说明他已决定用武力来解决问题。谈判桌上，实际上已没什么问题可以解决，谈判完全成为形式。但是蒋并不关闭谈判的大门，他还要通过谈判不断给中共施加压力，把和谈破裂的原因推给中国共产党。谈判还在进行，但实际性质已有了改变。周恩来后来说：“这个阶段是表面谈判，实际大打，也就是拖中大打。一方面是我们坚持政协路线，另一方面是蒋不断地破坏它。我们把谈判作为教育人民的工作，这个方针，连马歇尔也对叶剑英参谋长说：周将军最近几个月来，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而是为宣传而谈判。这句话有一半道理，但责任并不在我，因为对方不愿解决问题，我们就告诉人民是他不愿解决，用以教育人民。”

战场上，除已开始进攻中原解放区外，国民党军队开始对各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以58个旅，约46万余人进攻华东解放区（包含山东、华中两解放区）；以28个旅，约25万人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以38个师，约26万人，进攻晋察冀、晋绥解放区；以7个军16个师，16余万人在东北开展进攻；以19个旅，约15.5万人准备进攻陕甘宁解放区；还有9个旅，7.5万人进攻广东各游击区和海南岛解放区。

战场上的兵力优势，使蒋介石的态度变得十分强硬。7月3日，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这个决定公布前，中国共产党一无所知，第三方面人士也没有得到消息。7月14日，蒋介石去了庐山，一住就是两个半月。无意顾及谈判。

7月17日，周恩来在上海寓所招待记者，揭露内战扩大、时局恶化的真相，并代表中共代表团发表严正声明，他说：目前内战形势已经从局部向全面发展，大规模内战主要地已在4个战场上进行，中原、山东、苏北和晋南。我们要求国民党当局少作违反事实的宣传，立即下令全面停战，否则应负内战全部责任。

8月6日，刚上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庐山见蒋介石后，约周恩来谈话，转达了蒋介石提出的五项条件：一，让出苏皖解放区；二，让出胶济线；三，让出承德与承德以南地区；四，10月15日前在东北让出除黑龙江、兴安省及嫩江、延吉以外的地区；五、鲁、晋两省须退出6月7日后占领地区。并称中共必须接受，否则，停战、改组政府无从谈起。司徒雷登问周恩来：有没有商量余地？周恩来断然回答：“绝对不能接受，一条也不行。”他反过来问司徒雷登：“蒋何以如此无理，愈要愈多？”司徒雷登说：“蒋说形势已变。”由此可见，蒋根本不想和谈有什么结果，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思想是明确的。当夜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些情况。8日，中共中央复电：“蒋之五条绝对不能接受，一条也不行。”“你的答复很对。”

内战爆发初期，还有一件事，关系到解放区安危，就是黄河归故道的斗争。

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在郑州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使黄河改道南流,说是阻止日寇前进,结果使豫皖苏三省广大地区变成灾难深重的黄泛区,造成了大水患。艰苦抗战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在黄河故道两岸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这里大部分变成解放区,这一地区战略地位重要,因此蒋介石想引黄归故,以水代兵,水淹解放区,把冀鲁豫解放区与苏北、湖北等解放区大开。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即作出堵塞花园口,使黄河回归故道的决定。这是重大阴谋。周恩来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展了坚决的斗争。

黄河回归故道,中国共产党并不反对,关键是先堵口还是先复堤?国民党坚持先堵口,等于将黄泛灾难引向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坚持先修好堤,再堵口放水。这应是合理的要求。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政府未与解放区协商,于河南花园口破土动工,正式进行堵口工程。周恩来即致电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主任蒋廷黻,指出:中国共产党同意堵复花园口,但必须保证现已迁居黄河故道的人民不因黄河突然回归而受危害。

3月3日,他与马歇尔、张治中到新乡视察时,又分向国民党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局长赵守钰会晤,商谈先复堤后堵口问题。后又经过多次谈判,5月18日,与支援这项工作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代理署长福兰克芮·雷、工程顾问塔德达成六项口头协议。随后又向马歇尔提交备忘录,指出“复堤尤重于堵口”,“堵口以前,应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在进行谈判的同时,冀鲁豫和渤海解放区动员了43万军民上堤抢修,完成了400万立方米左右的土方工程。

6月底,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向各解放区发动进攻,修堤工程受到影响。而此时黄河汛期来临,国民党又悍然下令堵口合龙,情势危急。周恩来6月29日、7月8日、7月10日三次向马歇尔送备忘录。7月中旬来往于南京、上海之间,与联总和马歇尔会谈。19日,与负责工程的工程师泰德和“联总”上海分署助理署长普来到开封,现场调查。20日,在开封与联总、行总、黄委会等各方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他从黄河悠久的历史,谈到黄河回归故道,从国民党、共产党谈到中国的前途。发言列举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破坏修堤,拖延拨付施工粮款和杀害修堤员工的罪行。21日,他回到上海。23日,在周恩来的据理力争下,双方达成协议,先修堤,至9月汛期过后再堵口,并对修堤和居民迁移费用作了规定。推迟堵口,为解放区广大军民抢修河堤和转移居民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后来,由于内战不断升级,修堤工程一再受阻,周恩来又进行了反复的斗争。至1948年3月15日,花园口大坝合龙,黄河回归故道。至7月,解放区军民在与国民党斗争的同时,又对故堤进行了修堤、抢险。这年汛期,解放区人民抢修的大堤经受了考验,安然无恙。

自1946年7月中旬起,国共谈判代表双方再也没有进行正式会谈。

随着中国内战的爆发,美国更露骨地支持蒋介石打内战。8月间,准备把储存在西太平洋的价值20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蒋介石,公然鼓励国民党扩大内战。8月23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9月1日,周恩来得知美国已于8月31日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美剩余战时财产出售协定》时,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抗议美国帮

助国民党扩大内战。

马歇尔刚来华时，中国共产党确实表示过欢迎的态度。1946年4月，四平战役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进行内战，但对美国还是“尽可能保持友好关系”。以后，美国援蒋内战越来越明显了。1946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国民党提供了13.5亿美元的各种物资，是抗战胜利前美国援华物资的两倍。其中援助了大量的军备物资，并帮助国民党军队训练15万技术军官。6月份，美国国务院更准备将《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法案》提交美国国会审议，实际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国民党打内战。

9月4日，国民党政府公开宣布国民党军队将进攻张家口。张家口是解放区的政治军事重镇。周恩来对马歇尔说，进攻张家口，就是蒋宣布决心放弃谈判，走向全面破裂。周恩来再作努力，提出召开三人小组会议，讨论停战，但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拒绝。周恩来愤然离开南京，9月16日飞赴上海。

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的一再警告，一意孤行，10月11日，双十节的第二天，攻占了张家口。蒋介石认为，经过几个月的内战，共军节节失利，不禁得意忘形。当天，国民党政府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大”。

这时期周恩来的工作，是使各民主党派人士尽量少参加国民党的“国大”。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把持的“国大”开幕，除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几个无党派人士参加外，各民主党派都没有参加，也就是说第三方面人士大都没有参加。

“国大”召开，和谈大门关闭了。周恩来准备回延安。11月16日，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了记者的问题，宣布中共代表团将回延安。11月19日，在南京机场，周恩来即将乘机起飞回延安。有记者问周恩来，什么时候回南京。周恩来说，总有一天要回南京来的。

17日，周恩来致函郭沫若、于立群说：“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后来，12月底，他在延安致函郭沫若，说：“我们这一面，再有一年半载，你可看到量变质的跃进。”

第十二章 转战陕北

- 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成为毛泽东第一位军事助手，副帅。
- 与毛泽东、任弼时等撤出延安。后来曾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 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领导“第二战场”的“一切工作”。
- 陕北“三战三捷”后，发表文章评“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
- 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一年前，他曾提出大军南下、突破中原战略的最初设想。
- 直接领导中央的军事情报、通讯联络和广播电台工作，使中央“耳聪目明”。

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李维汉、邓颖超等 10 余人，于 1946 年 11 月 19 日回到延安，21 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开会。会上，周恩来先报告了国共谈判情况、美国对华政策、蒋介石集团内部的情况及蒋管区的形势等。

他说，谈判虽然破裂了，“但另一面则收获甚大，使党的和平民主方针与蒋的独裁内战方针为群众所认识”。谈判中，蒋是以不变应万变，其基本关键即在军队与政权，即地盘，他是绝对不让。对共产党，蒋的政策是从削弱到消灭，但对长期作战计划亦无任何把握。我们的方针是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以武装斗争为根本。

刘少奇说：现在已证明，和是不可能了。和虽不可能，但当时去谈是必需的。谈判整个说来是很成功的，成绩就是证明了妥协不可能。毛泽东说：南京谈判有成绩，达到了教育人民的目的。代表团不能早回来，一定要在开“国大”以后才能回来。这样，战争与分裂的责任才清楚，才不会失去人心。我们的条件比之抗战时期是更好些，统一战线比那时更广。很多人以前不理我们，现在要来理我们。我们在国际国内都有广大的统一战线。

全面内战爆发以后，蒋介石认为共军“节节失利”，而在一些重要战役如张家口战役中，蒋介石军队又取得了胜利，他认为打败共产党是没有问题的。那末，这 4 个月的战争形势究竟如何呢？

1946 年 6 月时，敌我兵力是悬殊的，为 3.4 : 1，武器装备中共军队绝对处于劣势。经过 4 个月的作战，国民党军被歼正规军 32 个旅，连被歼的非正规军在内，共计 29, 8 万余人，我军损失 12.2 万人。国民党军占领解放区城市共 153 座，我军收复 48 座，敌多占 105 座。蒋介石认为，他占领了交通要道和众多的城市，取得了重大胜利。而中共中央则认为，我们不断歼灭敌人，消灭敌军有主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敌军占领的城市愈多，守备力量要不断增加，这样，机动作战的兵力逐渐减少。实际上，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变化。

12 月 4 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认为全国的形势是进攻不是退却，党内主要要防止对形势估计不足、不敢放手的倾向。

周恩来到延安后，一面总结一年来的谈判，一面仍花费很多精力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12 月 2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了蒋管区的工作，决定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城工部部长。该部的工作任务是：“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研讨与经管蒋管区的一切工作（包括工、农、青、妇）并训练这一工作的干部。”由于国共谈判的破裂和内战的不断升级，国民党在自己的后

方采取恐怖手段加强控制。周恩来有力地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运动。1947年2月1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中，将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称作“第二战场”。

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人民解放军逐步扩大歼灭战规模，有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在华东、豫北、鲁西南、晋南、晋绥、保定南北以及东北地区全面出击，战役规模也不断扩大，歼敌万人以上的歼灭战为前4个月的4倍。华东战场，集中兵力较多，歼敌数量也较多。1946年12月13日至19日，进行宿北战役，歼敌2.1万多人；1947年1月2日至20日，发动鲁南战役，歼敌5.3万多人；2月20日至23日，发动莱芜战役，歼敌5.6万人。

自1947年3月起，国民党军被迫放弃全面进攻。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上转取守势，抽调兵力对南部战线的两翼山东和陕北战场，实施重点进攻。用蒋介石的话来说，一是攻击共军主力，一是攻击共军发号施令的首脑机关。

2月28日，蒋介石飞到西安，亲自布置对陕甘宁解放区的进攻。这时，国民党军在西北地区集结了34个旅25万人的兵力，企图以攻占延安，摧毁我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

陕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当时共有6个野战旅共2.6万人和3个地方旅，兵力对比十分悬殊，形势严峻。

延安是全国革命的中心，是坚守还是放弃，为全国人民所瞩目。中共中央开了几次会研究，分析了战场的形势，决定力争守住延安，也作好放弃的准备。

3月8日，延安召开了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说：蒋介石国民党“现在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打了败仗，许多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消灭了他的大量部队。过去8个月，我们消灭了他65个旅，捉了他一百多上将、中将、少将”。“蒋介石在财政上也破产了，滥出票子，使票子不值钱，金融闹风潮、东西卖的贵，人民已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和他斗，这纵使有美帝国主义撑腰，也是扶不起来了。因为这样，他想不出别的办法，就只有最后一个手段，拿进攻延安来挽救已失的人心，这岂非梦想！”他说：“同志们，同胞们，我们下定决心不要让别的解放区个个争先，而我们边区倒落后起来。我们是中国的首席解放区，但我们还没有打胜仗，现在我们要当各个解放区的老大哥，就要打胜仗。”“大家动员起来，保卫我们的边区，保卫我们的土地，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我们一定能胜利！”

中共中央在作了保卫延安的军事部署的同时，也作了放弃延安的准备。还在2月中旬，周恩来就抓了中央的撤退工作。2月18日，周恩来和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迁到枣园后沟，开始组织清理文件，坚壁清野。他召集会议，要求中央办公厅对重要档案材料提前转运；与新华社负责同志研究广播电台的转移方案；安排中央与各地秘密无线电台的通讯联络；等等。3月8日晚，周恩来当面交代7日从南京刚回来的童小鹏和罗青长，马上建立一个联合秘书处，专门从事同蒋管区的电台联系。

3月10日，进攻延安的国民党军即将发起进攻，胡宗南宣布作战计划，并说：“只要占了延安，共军就得过河。”3月11日，国民党军的飞机开始

轰炸延安。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搬到延安王家坪解放军总部办公。当天，彭德怀回到延安，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了前线的情况。当场即进行了研究，决定彭德怀和习仲勋到前线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由周恩来代理彭德怀的军委总参谋长职务。彭德怀后来回忆说：“这时我党在南京的办事处撤消，周恩来同志等已从南京撤回延安。党中央秘书长为任弼时同志，军委参谋长由周恩来同志兼。以后，我离开了军委”。

3月13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15个旅14万余人的兵力，由洛川、宜川之线分两路向陕北发起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3月18日，敌人已进攻到延安附近。毛泽东、周恩来在延安党政机关和群众基本疏散完毕后，于黄昏告别了延安，开始向北转移。19日，我军撤离延安，胡宗南占领延安。

3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在子长县王家坪会合。后到达清涧以北石咀驿附近的枣林子沟。29日、30日，在枣林子沟开了一次中央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下，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到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后来，4月11日，中共中央又决定：中央和军委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暂时驻在晋西北，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委员会，在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周恩来3月28日离开毛泽东一行，经绥德在军渡渡过黄河，到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去布置后方工作。30日，毛泽东、任弼时致电贺龙转周恩来：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朱德、刘少奇二同志明晚由石咀驿动身去临县与董必武等同志会合，经五台往太行；接电后请你于数日内回来，嗣后即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人主持中央。

周恩来在三交召开负责同志会议传达中央精神，决定城工部、外事组同志留在三交，对工作作了部署，同贺龙研究了军事和干部问题。4月2日，又与刘少奇、朱德会晤，然后离开三交，西渡黄河，10日到达靖边县青阳岔与毛泽东等汇合。

在青阳岔，决定中央前委机关代号从延安出来时称三支队改为九支队，下属四个大队，支队司令部为一大队，司令员为任弼时，政委陆定一，二大队负责情报工作，三大队负责通信联络，四大队为新华社。周恩来提议：为了保密，每个人应起个代号。毛泽东说：我们一定得胜，我叫李得胜。周恩来说：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我叫胡必成。任弼时是支队司令，就叫史林。陆定一是政委，就叫郑位。

从这时起，周恩来担负起总参谋长的全部职责，成为毛泽东的第一位军事助手，全军副帅。他们每天通过电台与各地联系，共同商议起草复电，不仅指挥陕北战场的作战，而且指挥全国战场的作战。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讲到：“我们领导革命战争时，在全国、在中央决定问题的只有三个人。当时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个人，分散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他们领导全国土改，搞根据地；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主席、周恩来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

《彭德怀自述》，第245页。

《周恩来传》（1898~1949），第685页。

4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从青阳岔，转移到不远的王家湾。

据罗青长回忆：这时在胡宗南军向北进攻的情况下，中央曾经考虑过打进川北，抄胡宗南军的后路。当时国民党第46军军长韩练成在抗战中就与我们有关系，表示愿意进步，为中共工作，时任甘肃保安司令，领兵驻在平凉，只要我们打近平凉，他就举行起义，然后解放军经平凉而到川北，出现在胡宗南军的后方，将使胡宗南进退两难。但是解放军要到平凉，必先打下合水。前不久合水的蒋介石嫡系第48旅惨败于西华池，旅长何奇被击毙，合水空虚。不料解放军到合水城前时，青海马步芳部的骑兵第8旅已到庆阳与合水接防，一打，发现敌军兵力超过预计，而敌人援兵将至，遂撤出战斗。这样，平凉起义就未能实现。

王家湾是一个十几户人家的村子，条件非常艰苦。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住在老贫农薛儒宪家两孔半窑洞里，连一张桌子都没有。但是这个村子地势好，在一个山沟里的西山坡上，四周山峦叠嶂，沟壑交错，交通不便，适合隐蔽。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等住了57天。在王家湾，成立了一个军事组，有五、六个参谋主管作战方面的工作，直接受周恩来领导。有了这个组，并与负责通信联络、军事情报部门一起，参谋总部的机构就健全了。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十分骄狂，急于找中共军主力决战。西北野战军的小部兵力诱敌向安塞，主力埋伏于延安东北的青化砭地区。3月25日，战机成熟，野战军抓住担任侧翼掩护的敌整编27师第31旅，经一个多小时战斗，全歼该敌共2900余人，缴获子弹30万发，补充了我军奇缺的弹药，取得撤离延安后第一个胜利。

青化砭战役后，胡宗南吸取教训，改变了战术，将开进中的国民党军队集结几个旅为一路，几路并进，缩小间隔，互相策应，几乎成为方阵式的行进。这样就减少了解放军捕歼分散孤立之敌的可能。针对这一情况，西北野战军采取的对策是隐蔽待机，以逸待劳，主力隐蔽集结，小部四处袭扰，疲惫、消耗敌人，寻找敌之弱点。当时胡宗南判断共军主力在蟠龙、青化砭西北地区，令8个旅向此方向前进，并令驻瓦窑堡的第135旅南下策应。4月14日，敌135旅孤立于羊马河地区。敌军正派两个旅来接应，在接应尚未到达的时候，我军又抓住战机，发起战斗，经8小时激战，将敌军135旅全部歼灭，共歼敌4700余人。

羊马河战役后，我军继续与敌军周旋。此时，敌统帅部错误判断我军主力正向绥德附近集结，准备东渡黄河，遂令胡宗南迅速以主力北上，令榆林的第22军南下配合，夹击消灭我军于葭县（今佳县）、关堡地区。胡宗南集中了9个旅，分兵两路向绥德前进，以167旅旅部守备他的补给基地蟠龙。此时，战机又出现了。经中央军委批准，我军包围了蟠龙。5月2日午夜向守敌发起突然攻击，激战至5月4日下午解决战斗，全歼守敌167旅及反动地方武装共6700余人，缴获夏季军服4万套，面粉1万余袋，子弹百万余发，医药品无数。司令员彭德怀说，缴获的子弹是最宝贵的。

中共中央撤出延安一个半月，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必胜的信心。同时，从情报得知，胡宗南连遭失败，想固守延安，不再进攻。周恩来和毛泽东、任弼时商议，准备亲自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所在地安塞县马家沟同彭德怀研究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5月10日，周恩来到达马家沟，同彭德怀等接连开了几天会，分析了西北战场的局势，共同确定下一步出击陇东的作战计划。

5月14日，周恩来到真武洞（今安塞县城）出席陕甘宁边区军民庆祝三战三捷的大会。三战三捷，边区人民兴高采烈、群情振奋。会场人山人海，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讲话。他在讲话中宣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自从撤出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同边区的全体军民共同奋斗。当时，会场一片欢呼。周恩来分析了全国各个战场（包括陕北战场）不断胜利的大好形势，号召边区军民团结一致，下定决心，坚持斗争，彻底消灭胡宗南部队，彻底消灭蒋介石集团，早日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

5月12日，新华社播发了周恩来写的题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的社评，内称：

蒋介石最后一张王牌，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老虎背。

胡宗南“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常败将军，其一生劣迹必在这次的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而且这也正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将要死灭的象征。

当时周恩来安排在胡宗南身边工作的地下党员熊向晖回忆说：“5月14日晚，军事谍报头目刘庆增派人送来一份特急件。这是一份情报，说，5月14日，周恩来在真武洞公开露面，出席陕甘宁边区军民庆祝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大会，会上，周恩来公开宣布：毛主席、党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一直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我打电话问刘庆增，这是真的吗？他说，千真万确。”“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把这一重要情报告诉胡宗南，他反而比我平静，没有提问题，没有谈意见，一声不响，只是两只眼睛好像失去了光彩。”

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在陕北指挥陕北战场作战、指挥全国战攻作战的同时，还关心着国民党统治区的武装斗争。撤出延安之前，3月8日，他就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了给中共中央上海分局书记刘晓、闽浙赣区党委书记曾镜冰并告华东局的电报，内说：目前蒋管区后方甚为空虚，许多省分，只有保安团并无正规军，特别是东南各省为然，……解放区军民决心于今年内在蒋介石进攻方面继续消灭他的有生力量，如按照过去八个月已消灭蒋军65个旅的比例推算，则今年内改变蒋我力量对比的形势是大致可以确定的事。因此，在蒋管区发动与组织农民群众武装斗争的客观条件与时间是完全具有的。……相信你们会在群众斗争中建立和组织起武装力量与农村游击根据地而逐渐取得胜利的。

4月底，他起草了中共中央致琼崖特委和中共香港分局方方、尹林平的电报，说：海南岛已在五指山地区初步建立根据地，这是一大胜利。现在海南只有敌人6个保安团，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进行形势下，广东敌方很难再抽多少兵力去，“因此，琼崖自卫战争有它相当顺利的条件，同时，也有它相当困难的条件，结果，必然要在长期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你们要注意基干部队的扩大与建立巩固根据地，民兵游击队的组织和发展，群众经济要求及土地改革由减租减息到清算分田。

5月上旬，周恩来又起草了中共中央给方方、尹林平、刘晓等的电报，说：目前华南蒋军几已调空，闽、粤、桂及赣南、湖南均靠保安总队防守，我在这些地区，除琼崖纵队外，尚存有若干分散的武装力量，极便我开展农

民游击战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蒋管区危机重重，人民斗争高涨，解放区胜利，琼崖游击队发展等，就给我在南方动员群众进行斗争的有利条件。

电报要求他们根据各自情况，在目前的有利形势下开展多种形式的斗争，而一切都应为着武装斗争、群众斗争的发展与党及群众组织的巩固。为此，还对华南党的组织形式和系统作了调整。5月下旬，又去电指出：目前闽、粤、桂及赣南、湘南各地，“实使我组织与发展广泛的人民游击运动。从布置分散的武装据点到建立成块的游击根据地”，“建立起三四个成块的游击根据地，组织起几支成为中坚的游击队伍，准备迎接与配合明年北方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反攻”。并且要他们帮助李济深、蔡廷锴去华南的军事活动，“以动摇与削弱蒋介石的后方统治”。

在陕北三战三捷的同时，其他战场均发动了攻势，东北歼敌近两个师；山东攻下泰安，歼敌两旅；晋冀鲁豫歼敌两万多人，歼正规军两旅，解放12座县城；晋察冀歼敌1万余，解放3座县城；太岳歼敌1万余，解放晋西南14座县城。4月27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电报中说：“现胜利仍在发展中，今后数月将看出蒋我力量对比更大变化与新的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5月4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陈毅、粟裕、彭德怀、习仲勋，部署了各军的任务。其中指示：

刘邓军10万立即开始休整，6月1日后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陈粟军受刘邓指挥。

关于这一战略出击，早在1946年夏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已在考虑。1946年6月18日，当时周恩来在南京，眼见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已势不可免，他给中共中央去电中说道：“我如以两支强兵南下，一插津浦路东，一插路西，直抵江边，京沪局势必将大乱。”这是大军南下、中原突破这一战略的最初设想。6月24日，毛泽东写了军委给陈毅、舒同和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的电报，令刘邓薄负责占领陇海线开封——徐州段和豫东、淮北各城，陈舒负责占领徐州——蚌埠间铁路线，粟裕、谭震林占领蚌埠——浦口间铁路线，然后进入第二阶段，即渡过淮河向南。7月初，周恩来电告中央，现在与国民党是边打边谈，打又为主；刘伯承、邓小平电告中央敌军准备攻焦作、冀南；陈毅电告中央敌军正攻胶济路。此时，毛泽东决定“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这时中共中央的考虑是：第一阶段，我军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域在外线牵制敌军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部队取得胜利；第二阶段，我内线部队渡淮河向南，夺取信阳、大别山、安庆之线。10月15日，周恩来在南京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在军事战略上应与政治相配合”，“在‘国大’前后，还不宜打出来，主要仍在解放区作战，易于歼敌”。

到1947年夏天，国内形势已大不相同，蒋介石要打内战不要和平的面目已为全国人民认清，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民主运动蓬勃高涨。战场上，经过一年战争，人民解放军歼敌112万人，国民党军总兵力由430万降为373万，人民解放军由120万发展到195万。

时机已经成熟。毛泽东、周恩来等果断决定刘邓大军南下。因而有上述5月4日的指示。5月9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

毅、粟裕电，说：“我们正以你们为模范，要求全党全军首先面向蒋管区，将战争引向更远的敌后。”

6月30日，刘邓大军4个纵队约13万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

6月7日，胡宗南的董钊、刘勘两个军的“清剿”部队向王家湾扑来。8日凌晨3时，毛泽东、周恩来一行率中央机关人员离开王家湾转移到靖边县的小河村。9日晨到天赐湾。待董、刘两军过去后，6月16日仍到小河村。以后在小河村住了45天。

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小河村举行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进一步组织和发动战略进攻。参加者除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外，还有彭德怀、习仲勋、贺龙、王震、陈赓等从前方回来的将领。会场就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窑洞前的小院子里，周恩来要战士用杨树枝搭了个凉棚，摆了两张桌子和几条长凳。董小鹏当时为会议照了像，留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

毛泽东在会上先讲话。他说：军事计划，原先计划过边区和陈赓两部集中打，现决定分开打，从战略上、粮食上看都有利。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解决。

周恩来在会上总结了人民解放军第一年取得的成绩，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趋势。他说：过去一年内蒋军有了极大的变化。从建制人员、武器说，都损失了约三分之一，从质量说，不止降低三分之一。敌军在去年7月至10月，占领解放区104座城市，兵力分散；11月至今年2月，敌军逐渐集中兵力，但在此期间我歼敌最多，城市则得失相当；3月至6月，敌军攻势已成弩末，仅在山东、陕北两处进攻，在其他各处我都转入反攻，得城市62个。人民解放军在去年停战时，主力、地方部队共140多万，复员中减少一些；7月大打后陆续增加，连后方机关共达190多万人，已超过解放区的负担能力。所以，今后发展必须求之于新区，主力发展则求之于地方部队升级。

会议一致同意中央军委提出的实行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将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的方针。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作报告。他说：去年的方针是内线作战，把敌人引到解放区来消灭，战略上防御，用空城来换取实力。现在我们已消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我们只有实行打出去的方针，才能取得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彻底摧毁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7月底，胡宗南的刘勘军奉命向北推进，逼近小河村。西北野战军正向榆林集结。8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开小河村，作远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靠拢。8月19日到达葭县（今佳县）城西北的梁家岔。

陕北战场，我军计划攻打榆林，调动敌人北上，配合刘邓、陈谢军出外线作战。8月6日，西北野战军发起榆林战役。7日，蒋介石飞抵延安部署救援榆林和围歼西北野战军的作战计划。令1军董钊、29军刘戡部共7个旅急进“追剿”“九支队”，令钟松绕道增援榆林。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着“九支队”牵着敌军北上，两军相距不到一两天路程。8月16日，中央直属纵队进入曹家庄。这时，国民党军已先后占领了榆林、绥德、米脂、葭县，控制了陕甘宁边区所有县城和绝大部分地区，只有米脂以北、长城以南、无定河以东的南北三四十里东西五六十里的地方属于西北野战军。

在曹家庄的一孔破窑洞里，中央召开了会议，决定继续留在陕北。17日凌晨，南北两路国民党军均已离曹家庄不远，天突然下起暴雨，中央纵队准备通过的佳芦河河水猛涨，过不去。于是转道上山。18日，天又下暴雨，欲过的五女河必须架桥。这时，已能听见敌人枪炮声，敌人的飞机也在头顶盘旋，情势危急。周恩来亲自指挥架桥，好不容易过了河，但大雨倾盆而下，队伍不能前进，只好回返再过五女河。

8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放弃攻打榆林，集中兵力打即将到达榆林的钟松部。钟松非常骄横，8月19日，远离主力进至沙家店地区，被我军分割包围。19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离西北野战军总部东元村不到20里的葭县梁家岔。20日上午，沙家店战斗打响，黄昏时，胡宗南的三大主力之一整编第36师6000多人被全部歼灭。沙家店战役，结束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

8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转移到葭县朱官寨，在这里住了一个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各战区和各野战军：决定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理总参谋长。

毛泽东、周恩来住在朱官寨的一个月，是转战陕北期间粮食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和大家一起吃黑豆、咽野菜。但是这时全国各战场形势很好，大家的心情是愉快的。这时，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的“品”字形阵势展开于中原地区，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到了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我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这是一个对战争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蒋介石的军队和防御体系完全被我军调动、打乱，从此陷于被动。

9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到达葭县西南15里的神泉堡，28日，周恩来向中央直属单位干部、战士作了关于时局的报告。他说：“去年一年自卫战争，蒋介石用三百万军队进攻我们。一年作战，死伤和被俘110多万，就是说被消灭了三分之一以上。这从人数上说的。从建制上看，蒋介石共有248个旅，被我们消灭97个半旅，平均一个月8个旅，还多出一个半旅，也超过三分之一。”还说：一年自卫战争的结果，就是蒋介石的军队承认不能消灭我们，而且他们是要失败的。在人民中，去年下半年还有许多人不相信蒋必败、我必胜，但自今年山东等地胜利以后就相信了。这是一个发展，这个发展很快，仅仅一年，变化就这样大。因此，经过一年战斗取得的胜利，我们有根据有把握地在“七七”口号中提出，要坚决彻底全部地消灭一切蒋介石进犯军。九月又提出大反攻，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对这个口号，人民已经能接受了。

对当前的战局，周恩来说：

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南下，过黄河，过陇海路，直到长江以北。黄河是蒋介石的“外壕”，陇海路是他的“铁丝网”，长江是他的“内壕”。蒋介石总想赶我们过“外壕”，而我们已过了“铁丝网”，打到他的“内壕”了。

西北野战军也要打出去。东北解放军已经出击。这是全国反攻的形势。我们的方针就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蒋管区。”这个方针在今后一年到两年间要实现。

周恩来接着又讲了在一两年内实现这个方针的依据，那就是：敌人——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人民反对；我们——军队愈战愈强，土地改革获得了

人心，扩大了解放区。“我们打倒蒋介石是有把握的，第二年打出去，实行大反攻的决定是正确的。”

11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南移到条件较好的米脂县杨家沟。杨家沟是个大村，有200户人家，是米脂县的米粮川。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决定12月在杨家沟召开一次中共中央会议。

杨家沟会议是中共中央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召开的，中心是通过《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是一个书面报告。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报告总结了前一段军事斗争的经验，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宣布了新中国的基本经济纲领，回答了怎样打倒蒋介石，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不过毛泽东在会上并没有口头作这个报告，而是另外讲了敌我形势、统一战线、英美苏关系三个问题。

会议第二天，周恩来在会上发言，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的第二年取得的胜利及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变化的情况。并说：战争第二年，我军各条战线无例外均转入主动。现在解放区的面积、人口都占全国的32%。蒋管区的学生运动和工人斗争都是历史上空前的。农村游击战在粤闽浙皖大发展。我军则10月份已发展到220万以上，而敌人作战部队下降到256万。国民党现在在东北取守势，华北傅作义在挣扎，南线由顾祝同、白崇禧、胡宗南负责，是蒋介石的军事斗争中心。

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度过了新年。1948年1月11日，周恩来在西北高干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指出战争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他说：敌人“第一年是战略进攻，战术上防御，战役上有时采取进攻；在进入第二年，战略战术都是防御的，战役上尚有采取进攻。这种战役进攻在后来采取重点的办法，把兵力堆在一块进攻。”“我们的办法，是一点两面战术，大胆的派部队从中间切断敌人，另以主力包围其突出之部予以歼灭。再，敌人兵力一集结，其他地方就空了，我就可以收复地方大搞土改。”周恩来提醒大家：“毛主席告诉我们：又要轻敌，又不轻敌，对于整体的敌人我们是轻视的，有信心敢于胜利，对于一个具体的敌人，我们不能丝毫轻视，要一个阵地一个阵地的夺取。”他还讲到政策的重要性，要求大家掌握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的基本方针，集中力量打击消灭当前主要敌人，而不应多树立敌人。他特别强调在执行政策时反“左”的问题，指出“我党历史上右倾错误时间短易纠正，左倾错误时间长不易纠正。”

对于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周恩来写了《军事原则》一文：

一、避强就弱。先打分散之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

二、先面后点。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及广大农村，后取大城市。

三、歼敌为主，略地次之。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为主要目标。后者是前者的结束，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

四、一点两面的包围战，歼灭性打击。劣势中的优势，转入全体优势。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五倍、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之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之目的。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就数

量说，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但在局部上，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优势，保证战役胜利。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为优势，直到最后歼灭一切敌人。

五、无准备、无把握不打。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之把握。

六、勇敢牺牲、不怕疲劳。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与连续作战（即短期内不休息地连续打几仗）的作风。

七、运动战与阵地战。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意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及城市。

八、区别攻城战的各种情况。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据点城市，则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之守备而又为环境所许可之据点及城市则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之据点及城市，则等待条件成熟时，然后取之。

九、主要补充在前线。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及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十、间隙休整不要长。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与整训部队。休息时间。一般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时间。

周恩来说：“以上这些，就是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方法。”

1948年2、3月间，西北战场的局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2月23日发起宜川战役，3月3日结束，歼胡宗南主力整编29军军部及整编第27、第90师共5个旅2.9万余人，击毙敌中将军长刘戡及中将师长严明。

3月10日，周恩来在杨家沟山顶的小操场上向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战士作形势发展和中央机关转移的报告。他说：一年来，敌我力量对比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党中央决定东渡黄河转移到华北去。

后来，毛泽东曾经说过：“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的战争。”周恩来接着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3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从杨家沟出发。周围七八里路村庄的群众都赶来送行，送了一村又一村。当天行军40里，到达绥德吉镇，第二天到葭县刘家坪，23日中午，来到吴堡县川口渡口，乘木船东渡黄河到达晋绥解放区，开始了新的征程。

周恩来在转战陕北中，作为毛泽东的助手，不仅参加各种重大战略决策的制定，指挥全国各战场的解放战争，而且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领导着全军情报、通讯联络、广播电台的工作，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耳聪目明。“陕北广播电台”在周恩来关心下，从中共中央撤出延安的第二天就恢复了播音，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能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受到鼓舞。

周恩来在得知胡宗南要进攻延安，中央即将转移的时候，就组织安排了转战期间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系统，并着重抓了情报工作。他布置负责收集蒋管区情报的社会部的转移，配备电台，独立行动，保持同蒋管区我方电台的联系。当时中国共产党在蒋管区建立的电台，共有60多个。到达枣林沟后，周恩来在军委纵队中专门组成二大队，负责情报工作；三大队负责无线电台和电话工作。

无线电台是中央纵队对外联系的通道，各地情报的上报，指挥命令的下达，前线战况的汇报，无不需电台联络。周恩来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在撤出延安后，他知道国民党军有测量电台位置的“测向设备，为了使敌人摸不着中共中央的去向，他决定中央的电台停止工作三天。周恩来还特地把这一情况告诉各野战军负责人，“现蒋敌有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并告他们“但对小电台因电波弱，不易辨别。因此，望你们在作战前部署期间及作战中，均不用无线电传达，或将司令部原属之大电台移开，改用小电台，转拍至大电台代转，以迷惑敌人”。这些措施是很有效的。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急于寻找中共中央所在地。敌负责侦测无线电台的分队，使用的是美国最新的侦测设备，人员也都经过专门培训。他们向胡宗南报告：攻占延安后，未再发现陕北有固定大型电台信号，有时捕捉到小电台的征象，但迅速消失，飘忽不定，难以判定共军指挥部所在。中共中央在小河村时，蒋介石命令特务机关加紧侦察共方各地电台位置，在陕北和各大城市布置测向台。周恩来及时召集各有关部门开了机要工作会议，研究对策。

对于随中央纵队转战的电台工作，周恩来直接领导，严格要求。1947年9月，中央从朱官寨向神泉堡转移，此时正是中原三路大军调动的时候，需要随时了解军情。周恩来在离开朱官寨前一天，就要求三大队派出电台到神泉堡，与各路大军电台沟通，中央纵队一到，即可收发电报。“到神泉堡后，周恩来规定，电台和机要科即要24小时值班，电报随收随译随送，绝不能耽误。收报译好后即送周恩来，凡十万火急以上的急电，不管他睡了觉，也要叫他起来看”。

9月30日，周恩来与任弼时又召集了一次机要工作会议，与机要通讯方面的负责人研究对付敌人空中侦测、地下破坏、密码破译等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周恩来特别强调这是一条秘密战线的对敌斗争，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因为这是关系到解放战争胜利与失败的严重政治任务，必须完成。

1947年10月的陕北清涧战役中，周恩来命令野战部队的电台联络实行伪装，使敌人摸不清我军去向。我主力部队向清涧集结，攻城战斗打响后，清涧守敌三次电告胡宗南紧急求救，被胡宗南一再申斥，因为据胡的测向侦察，判定我军主力不在清涧。结果此战全歼敌第76师，生俘师长廖昂。

与通讯联络工作并行的是军事情报工作，它是进行战略战役决策的依据。

周恩来在中央纵队中直接领导五六个参谋人员，夜以继日地收集敌情和我军情况，加以分析研究，报告毛泽东，参与作出决策。

对各野战军、解放区、蒋管区来的情报和情况，都要标在五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上。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含每天的位置、长官的情况、部队人数、武器装备、战斗力等情况都要收集；我军前进的位置、战役战斗情况，也要收集。这个小小的班子，工作效率极高，为中央提供了准确的信息。

长期隐蔽在国民党内部的党的地下工作者，为党中央及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这方面的工作也是周恩来领导的，并且是经过长期艰苦的工作，有的已安插到敌人的心脏。例如，熊向晖就是其中的一位。

早在抗战初期，周恩来就“下闲棋，布冷子”，安排地下党员熊向晖打入敌人内部，并作为一条重要线索由周恩来亲自领导。胡宗南进攻延安时，

熊向晖已是胡宗南的机要秘书，他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准确时间及具体部署，使中共中央从容地做好撤退的准备。前面提到的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时配备了无线测向台设备的情报，也是熊向晖提供的。1949年6月，熊向晖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对他说：西安的情报工作做得很成功，你作了努力。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陈忠经、申健三人，可以说是“后三杰”。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都为保卫党中央做了贡献。

周恩来亲自抓情报的保密和敌人密码的破译工作，并制定了周详的办法，花费了大量心血。

1947年9月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情报保密办法给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并告中央工委、后委的电报，指出：“敌人因战争着着失败，警惕性已日益提高，其机要工作已日趋严密，尤其是其密码编制，电台控制已较前漏洞减少，使我侦察工作日益困难，而我全国性反攻正在开始，将战争引向敌区，又更需我情报侦察能配合此反攻局面。望各负责首长重视此事，严格执行规定，以利情报之收获，至要。”在这封电报中，具体规定了一系列工作原则，包括密件销毁，伪装或代码传递，密件限人传阅，秘密一般口头传达，电话防窃听，新闻保密办法等，十分全面。

1948年3月16日，周恩来看了中央军委二局戴镜元、王永俊关于近月侦破胡宗南部密码工作的经验总结报告，批复：“报告写得很好，有内容，有分析，有批评，有方针”，这是总结经验的工作进步的具体表现。“你们说以科学战胜科学，应加上政治，就是说我们掌握科学定能战胜敌人使用的科学。”在密码技术上，“不管敌人如何精益求精，他制度中的内在矛盾及工作中的漏洞是敌人无可挽救的致命伤，故二局工作之有前途是肯定的”。

然后，他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加强对敌方电报密码破译工作给各军区各野战军的指示。指示中说：“近来敌人密码质量日益提高。胡系密码乱数，已多至十万组。国防部乱数亦达两万组。各方均用来去底本。其使用方法亦更加科学，渐渐趋向于一报一密，无限乱数。”针对这种情况，指示要求“各野战军参谋长，在每一战役开始时，必须指定一个专门参谋派赴前线，于战斗结束时，负责搜集敌人的一切密码、底本、乱数和表及来往电报、报告、命令、文件、图表乃至电台、测向台等等”。搜集到后，立即派委员送军区，转送二局。同时要求各单位对二局工作人员实行特殊的保护和管理办法，以保证情报与人员的机密与安全。

在此期间，周恩来对广播电台的领导，也花了很多心血。广播电台是公开斗争的喉舌，中共中央的声音需要及时公布，广播电台是最有效的手段；揭露敌人，教育人民，广播电台能起到最好的作用。可以说，中央转战在陕北，公开的广播和秘密的电台联络，是中央指挥全国战争的两个翅膀。

中央纵队成立时，四大队即是新华社。转战陕北之前，周恩来对新华社领导下的广播电台的转移作了周密安排，确定广播电台分几个步骤转移，采取接力的办法，以保证党中央的声音不间断地传到人民中去。第一步，先派一套精干班子，到瓦窑堡建台，当延安紧急时，瓦窑堡即广播；第二步，在太行选址建台，瓦窑堡转移时，即在太行山广播；第三步，太行建大台，中央带一部电台随中央行动。3月18日，延安撤退，延安广播电台即停止广播。19日，瓦窑堡电台开始工作。4月1日，在太行山涉县建立新华社临时总社，正式接替了陕北的广播。1948年春，中央到西柏坡前，新华社在西柏坡建立

了广播台，5月中央到达后正式广播。

广播电台在转战陕北期间起了巨大作用。“陕北的广播”不仅我方人员听，敌方人员也听。胡宗南在进攻延安前，置备了一架最好的收音机，准备每天听延安电台的广播，并指定专人，全文抄收新华社播发的消息和评论，送他亲阅。3月8日，延安召开保卫陕甘宁边区动员大会，新华社播发了消息。胡宗南也守在收音机旁听。胡宗南占领延安后不久，正在上报赫赫战绩，青化砭战役就遭到失败。胡宗南指示知情者保密，不外传、不上报。但陕北广播电台马上广播了，胡宗南知道瞒不住，只好沮丧地授权下级：报不报，怎么报，报给谁，由他们酌定。新华社的广播电台，向全国报道了真实情况。

1948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等渡过黄河后，骑马经过碛口，又沿湫水河上行，到达中央后委所在地三交镇。从三交镇换乘汽车，3月26日到达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晋绥司令部的所在地——兴县城西15里的蔡家崖村。在这里，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听取贺龙等汇报晋绥地区军队和地方工作情况。4月4日，他们离开兴县，经苛岚、五寨、神池，出雁门关，然后经代县上五台山。4月13日，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4月12日，到达城南庄的前一天，毛泽东提出准备去苏联访问。到达城南庄后，毛泽东就在城南庄作去苏联的准备。4月23日，周恩来和任弼时等率领中央机关到达现属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同原在那里的刘少奇、朱德会合。

第十三章 协助毛泽东组织战略决战

- 关于“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的手稿，是有关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勾画了我军正规化建设的蓝图。

- 第一次提出要准备若干次带有决定性的战略决战。协助毛泽东指挥中国战争史上空前的三大战役。

- 在西柏坡会见傅作义，说：傅先生以人民利益为重，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 具体指导绥远、湖南、云南、新疆等地和平谈判，致使这些地方相继和平解放。

- 提出“军事组织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指出“后勤工作在正规化上要当先，又要殿后”。

周恩来在城南庄期间，1948年4月18日，中央收到粟裕一份长达3000字的电报。电报分析了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执行渡江南下方案后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当前中原战局发生的有利变化，建议华野3个纵队暂不南渡长江，与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在江北有效地打几个大歼灭战。

这是一个大胆的建议，要调整中央已经决定渡江跃进战略决策的部署。粟裕是谨慎的，深知提出这个建议的分量，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是“斗胆直呈”。在给中央发电报前，粟裕向陈毅谈了自己的想法，征得了陈毅的同意。他又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征求意见。18日这天，刘伯承、邓小平给中央的电报也到了，他们基本同意粟裕的意见。

毛泽东看到这两个电报，立即决定要陈毅、粟裕尽快来中央汇报情况，以便中央决策。并要周恩来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从西柏坡来城南庄先作研究。4月30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这个会议，除中央五大书记参加外，陈毅、粟裕、聂荣臻、薄一波、李先念等也参加了。会议主要研究粟裕提出调整南线战略进攻部署的建议。会议听取了粟裕的汇报，同意了他的意见，改变了渡江跃进到闽浙赣的打算，决心集中兵力尽可能多地在江北歼灭敌人，然后再南渡长江。

城南庄会议后，因为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毛泽东不便长期离开国内，决定暂时不去苏联，5月26日也到了西柏坡。周恩来继续以很大部分精力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了许多电报，及时下达调整方案和任命，对各大军区和野战军的组织和人选作相应的调整。

原来，在1947年12月以前，除东北地区外的各解放区的军事领导机关均分前方和后方。12月3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给东北局的电报说：“现时关内各解放军区分前后方，前方以野战军司令员、政委统率野战兵团，后方以甲级军区（又称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统率地方兵团及乙级军区（又称小军区）及军分区，并管理本区范围内的动员、训练、兵工生产与负责供给前方。两者的司令员或政委，依各区情形，有兼的有不兼的。两者隶属关系，一般的是野战军与军区均直受军委指挥，但在行政上则野战军属于军区。此制在自卫战争中，行之颇称便利，对于今后野战军愈向新区行动和发展，愈需要有此区分。东北野战军今后作战任务扩大，主力将逐步南进，东北甲级军区亦应及时成立，同时并指挥冀察热辽甲级军区。林彪同

志应为东北军区司令员及政委，同时兼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兼政委，因为林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时候多，军区可设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主持常务，由罗荣桓、高岗两同志中择一任之。又野战军及军区其他副司令员副政委应如何安排，均由你们考虑提出，报告中央批准。至军区及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亦应分开组织，以便野战军随时行动。”

刘邓大军南下后，陈毅、粟裕和陈赓、谢富治也都出外线作战，三支部队成“品”字形驰骋中原。到1947年12月底，刘邓、陈粟、陈谢三军配合粉碎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围攻，创建桐柏、江汉解放区，完成挺进中原的战略任务。1948年2月17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军委给彭德怀、张宗逊的电报中指出：粟裕军主力已过陇海路北整补，陈谢军前委扩大会议已开完，刘伯承定于2月20日与陈赓、谢富治等会面，商讨配合作战方针，“并由刘邓统一三军指挥”。

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入选的决定》。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个中央局、军区和边区政府均合并。聂荣臻为华北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陈毅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同时仍兼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

同一天，周恩来写的给华东局等的电报中，谈到调邓子恢去中原工作，说：“目前中原局势正在发展中，情况亦较复杂，我野战兵团及地方部队已达五十余万，土改、财粮、生产均须最得力同志前往主持，故中央决定邓子恢同志任中原局第三书记，协助陈毅同志，主持军区及地方工作。”

5月15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通报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部分机构的人事任命。周恩来不再兼任中央城工部长，集中精力抓总参谋部工作；任命了军委秘书长、作战部长、后勤部长、卫生部长和政治工作研究室主任。这些任命，都是准备进行大规模作战的需要。

1948年5月21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华东局并告华北局的电报，同意中央华北局重划军区辖境的意见，即成立察南军区、太原军区、豫北军区、大清河军区。

在此期间，周恩来还起草了一些中共中央的电示，对中共中央局及其组成人员进行了调整和任命。

解放战争进行到这个阶段，开始解放一些中等城市和大城市，当时，农村正在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因而产生了一个如何对待地主阶级在城市所开的工商业问题，也产生了一个如何对待国民党军政机关遗留下来的物资问题。为此，早在1947年12月29日山西运城被解放时，周恩来为中央军委写了给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转运城前线指挥部司令员王新亭、政委王震的电报：“庆贺你们攻下运城的胜利。”并要他们“派定负责同志动员一切力量抢运和保管物资，不许私分和浪费，城内商店工厂作坊，均须责成部队专予的保护，严禁没收和破坏其营业。”后来，1948年4月，周恩来在同去哈尔滨参加工会会议的代表谈话时说：在城市和工厂，过去我们实行的是破坏政策，因为那是对待敌人；解放后，管理城市 and 工厂是人民自己的事了，必须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去作。要克服过去的“左”的现象。

这一时期，战役战斗的规模大了，指挥作战也需要有较为正规的场所。

“为适应指挥重大战役的需要，在靠近朱德、周恩来的院内，由行政部门建了一栋五间宽的军委作战室。这是中央和军委机关最大的办公室。由于前委、工委、后委的参谋人员十来人都集中了，作战部就分为作战、情报、战史资料等科，都围着几张大木桌，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四周墙上挂满了各个战场的军用地图，值班参谋将每天敌我军的位置用蓝色和红色的小旗子插在地图上，朱德、周恩来、杨尚昆（叶剑英到石家庄办军校去了）经常到这里向参谋们了解敌情和战况，同他们研究作战方案。”“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军委作战部的同志们，以严肃、紧张、准确、有效的工作作风完成了任务。他除了每天将战况用书面报告毛泽东外，还经常到毛泽东的平房里当面报告、商谈。毛泽东有时也走到周恩来的小办公室里商谈战局”。

1948年5月17日夜，山西临汾战役胜利结束。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徐向前的指挥下，歼敌2.5万余人，拔除了晋南地区敌人的最后一个据点，使太岳和吕梁两解放区联成一片。周恩来5月19日起草了中央军委给徐向前等的祝贺电，庆贺攻克临汾，并说：“你这次以新成立之兵团，取得攻坚经验，将为继续消灭阎敌支点开展胜利道路。”

临汾战役是一次攻坚战役。周恩来曾经给予具体指导。

临汾城西面靠水，三面为开阔地，城立于一高地上，易守难攻。徐向前在攻临汾外围作战中，主要运用了坑道爆破攻城办法。4月11日，外围东关为我军攻破。4月17日，徐向前向军委报告了攻东关的战法和战果。4月20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央军委的祝捷电，肯定了他们“坚持近迫作业，坑道爆破，并控制主力，决定长时间夺取临汾的计划”。敌人在临汾东关失守后，采取反坑道措施。我军与敌军开展了坑道与反坑道的艰苦争夺，敌人袭击、骚扰、挖洞、放毒气、放水等，斗争异常激烈，挖坑道进度缓慢。5月1日，徐向前颁发《紧急动员令》，增加兵力攻城，并将计划报军委。5月3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拟复电，指出：“你处攻打临汾行动仍按原计划进行，不宜性急，为能更有把握攻下临汾，如必要可照预定日期再延长若干时日。”中央军委来电坚定了前线将士的信心。17日，随着两条坑道中几万斤炸药的爆炸，临汾城被攻破。徐向前脸上露出了笑容。

6月11日，徐向前又指挥发动了晋中战役。7月7日，攻下祁县，把平遥、介休、汾阳、孝义、文水等县之敌与太原完全隔离。同时切断敌主力赵承绶集团北撤之路。10日发起总攻，激战至16日晚，全歼赵承绶第7集团军总部和第33、34军。7月19日，周恩来起草关于晋中大捷的贺电：“庆祝你们继临汾大捷之后，在晋中地区歼灭阎敌一个总部、五个军部、九个师、两个总队及解放十一座县城的伟大胜利。”“现我军已临太原城下，最后结束阎锡山反动统治的时机业已到来。尚望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为夺取太原、解放太原人民而战。”

还在战役激烈进行时，徐向前已考虑到下一步对太原的包围，15日上报中央军委。16日军委复电同意。同一天，周恩来打电报给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和军区司令员陈浚元并徐向前等，说太原形势有急转直下可能，望李、陈迅速将俘虏的杨澄源直送向前兵团处，经教育谈话后放入太原，劝阎锡山等献城出降。华北军区，也要挑选被俘军官，放入太原，进行分化瓦解工作。21日，我军完成对太原的包围。太原是阎锡山的老巢，修有各式碉堡五千多

座。7月21日，蒋介石冒雨飞往太原，为阎锡山打气，许诺空运援军。我军经过连续作战，主力部队也需要休整。7月26日，周恩来起草中央及军委致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电，指出“进攻太原，目前尚是围困阶段”。后来，攻太原主力转入休整。

城南庄会议后，粟裕兵团即准备加入中原作战。5月30日，粟裕兵团渡过黄河。为配合粟裕兵团南渡黄河，5月24日，中原野战军发起宛东战役，调动临颖地区的胡璉兵团南移。战役发起首先佯攻确山，吸引胡璉兵团南移，抑留胡兵团于漯河以南，同时吸引在南阳的张轸兵团东援确山，在运动中歼灭张轸兵团。战役发起后，敌人行动果然如我所料。我军即将战役中心移向张轸兵团，而以另一部阻击胡璉兵团。5月30日，周恩来起草中央军委给陈士榘、唐亮并告刘邓、粟裕电，要陈、唐所率第3、8纵队由吸引邱清泉兵团，改为阻胡璉集团，要他们“坚决阻截敌18军，不使南下增援张轸”。6月3日，粟裕兵团已渡过黄河，周恩来为保证刘邓歼灭张轸集团，再次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给陈唐，要他们以全力抓住胡璉并发动攻势阻击战，使其不得西援，以保障刘邓南阳作战。

粟裕兵团南渡黄河后，蒋介石调兵遣将，企图与粟裕兵团在鲁西南决战。这时鲁西南敌人将集中9至11个师，队形密集，不易割歼。我军决定先打开封，调敌运动。6月18日发起进攻，22日攻占开封。开封是我军攻占的第一个省会，这一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混乱。蒋介石为了稳定人心，急调各路人马，夺开封进行决战。蒋介石令鲁西南的邱清泉兵团、刘汝明部加速向开封攻击前进，令新组成的区寿年兵团在邱兵团左翼，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我军攻开封部队，此时连续作战，已感疲惫，决定放弃开封，集中主力于杞县以东、以南地区围歼较弱的区寿年兵团。6月26日，攻占开封的陈唐兵团两个纵队撤出开封，吸引邱清泉主力向南尾追。6月27日，当两敌相距40公里时，我军即穿插分割，包围了区寿年兵团，并发起进攻。蒋介石急促邱兵团猛攻增援外，又调山东敌整编第25师向西增援。周恩来在6月30日电告山东兵团的许世友、谭震林等，命令他们火速南移，抓住25师。并令豫皖苏地方部队，迅即破坏徐州至商丘间铁路，迟阻25师西援。7月1日，周恩来又为军委起草电报给聂荣臻、薄一波，要他们命令冀鲁豫的独1、独3旅，过陇海路钳制25师，不得迟误。此时战场的形势有所变化，区寿年兵团的72师转入固守，而25师处于运动中，我军主力向以25师为主的黄伯韬兵团全线出击。为保证粟裕兵团作战，7月4日，周恩来又起草电报，令陈谢兵团从正面阻止胡璉兵团北上。电报说：“我粟陈唐张正在续歼敌25师及第3快纵等部队中，敌72师亦被围于铁佛寺地区，有继续歼灭的可能；现蒋介石正企图从各方面增援邱黄两兵团，徐州拟调74师西援，武汉亦有空运步兵北援消息。因此，你们阻止敌胡、吴两兵团北援，以保证粟军南面安全，极关重要。”这几封电报对阻止敌人增援起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保证了主力作战。7月6日，敌人援兵已迫近我主战场，为争取主动，我军撤出战斗，主力分别向南北转移。称为豫东战役的会战胜利结束。

豫东会战，我军在20天连续作战中，歼敌1个兵团部、2个整编师、4个正规旅、2个保安旅，连同阻援作战在内，共歼敌9万余人。豫东战役的意义，除歼敌外，还证明我军在长江以北敌重兵团之间歼敌是完全有可能的。周恩来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贺电中说：“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

战争的第三年度。”

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形势更加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敌人总兵力为 365 万，正规军 198 万；我军总兵为 280 万，正规军 149 万。总兵力为 1.3 : 1，正规军比例 1.32 : 1。比例大大缩小了。敌人的部队，大多是被我歼灭后重建的，士气不高，战斗力不强。而我军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武器装备也大为改善，有 35 个炮兵团，拥有重型火炮 1100 门。我军的作战经验有了更进一步的丰富，可打大规模运动战，也可打城市攻坚战。整个战场态势，敌只在战略要地和交通点、线守备和在其附近作战役性机动，而我军没有包袱，可作大规模的战略机动。打大仗的形势已出现了。

此时，全军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这是人民解放军结合土地改革进行的一个重要运动。周恩来在 1948 年 3 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在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的指示：

“三查与诉苦的新式整军运动，在我各野战军各军区部队中都已实行或正在实行着，其成绩已逐渐从部队的觉悟、巩固、团结、学习和作战上表现出来，其本身就是部队中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精神的新创造新发扬。”

“这次新式整军运动的成绩却是极大，各战略单位都是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在进行。为巩固和发扬这一成绩，现在确实需要将这一民主精神的新运动转为部队中集中领导下的经常的民主生活。中共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了士兵会的组织，似较适宜。”

“中央特责成各野战军、各军区政治部于最近数月内，利用作战间隙，选择几个不同情况的连队，一两个不同情况的营以上的直属队或机关，试行这一组织，并派负责人员亲去指导，以便取得经验，报告中央。”

如何进行第三年的解放战争，如何迎接即将开始的战略决战，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商议。8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周恩来参加了预备会。正式会议 9 月 8 日至 13 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和中央军委重要工作人员共 32 人。这是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会议先由毛泽东报告有关军事问题。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

周恩来在 13 日的会议上作了关于第三年军事作战计划与军队建设的长篇发言。他说：“这个计划是根据两年来的经验，谨慎的估计，很有实现可能。如果给蒋介石的打击很严重，加上财政经济崩溃，内部倾轧，蒋介石可能垮得早些，胜利来得快，我们也应有此准备。当然，也有可能遇到曲折，时间就长一些。我们要估计到这些，不要因胜利太快而没有准备，也不要因胜利推迟而不耐心。当然，今天主要还是争取五年胜利。”

关于解放战争第三年的军事要点，他说：首先，“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把战争负担加到敌人身上，“并且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第二，“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多”，使“攻坚与野战互相结合”。第三，增强各战场的战役上的协同和配合。第

四，做到后勤供应统一计划与相互配合。第五，“军事组织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他说，在第三年的作战计划中，全国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线，各战场上的战役协同增加了，战争的计划性更增加了。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他也提出了新的重要课题：“军事组织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这就可使第三年战略任务计划实现的更好。”他提出人民解放军要“统一建制”的任务，今后成立新部队要报告，不准擅自增编，番号要全国统一排列起来，还必须建立若干正规制度。要向建立特种部队的方向努力，特别是要建立炮兵。要建立地方武装，精简后方机关。他谈到军队后勤工作同地方财经工作的关系：必须说清楚，地方财经部门应尽可能供应前方，军队后勤机关应保证前线及时送到供应，但又要求力求节省，这两方面都应照顾，而且要求前线缴获归公，如此求得后勤和财经结合起来。

关于“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周恩来留下了珍贵的手稿。手稿是个提纲，共分八个部分，一战略方针，二作战计划，三军队建设，四后方勤务，五干部训练，六政治工作，七克服军队无纪律性，八军委在部队走向正规的过渡时期的准备工作。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有关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份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它表述了解放战争第三年要进行大规模作战的作战方针，和由此方针决定的必须和如何建立一支强大的正规化军队。其中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勾画了我军正规化建设的蓝图。从军队扩充、军队编制及武装配备、军队序列、建立补训制度、供给和军队后勤等方面，较完整地规定了人民解放军组织管理、发展和储备军事力量的制度。后来，军队正规化建设工作逐步进行，有力地保证了战略决战的胜利发展。

九月政治局会议后，书记处连续开会，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周恩来所说的“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当时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张清化回忆说：那时，军事上的问题，主要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解决。毛泽东是挂帅的，周恩来参与决策，并具体组织实施。除了军委作战部外，周恩来还有个作战室，由张清化任主任，相当于他的军事秘书，每天根据局势的变化负责标图。周恩来常到军委作战室了解情况。他对敌我双方的战争态势、兵力部署、部队特点、战斗力强弱，甚至国民党方面指挥官的简历、性格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有了什么情况，周恩来总是先仔细地核实并弄清，然后向毛泽东报告。两人经过研究确定对策后，多数由毛泽东起草文电，少数由周恩来起草，而所有军事方面的文电都经周恩来签发。张清化还回忆说：发送军事方面的文电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议后发。有了情况，书记处几个领导人共同商议，然后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文电发出。二是阅后发。由于军情紧急，来不及一起商议，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好文电，再送其他领导人传阅后发出。这种状况是比较多的。三是发后阅。由于情况紧急，刻不容缓，为了争取时间，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好电文先发出，再送其他领导人传阅。

九月政治局会议后，首先集中精力进行的战役，是济南战役。

济南是山东省省会，位于津浦、胶济两条铁路交会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是国民党占领的山东境内惟一的坚固设防的大城市。蒋介石以其“名将”王耀武守城，下属有 11 万重兵。另外，蒋介石以其徐州“剿总”的三个兵团 17 万人的机动兵力，分别集中于商丘、新安镇、蚌埠等地待命北援，企图在我军攻打济南时，北上会战。

战前，中央军委制定了“攻济打援”的作战部署，以 14 万人攻城，以

18万人阻援打援。9月16日，人民解放军从东西两面向济南守军发起凌厉攻势。蒋介石17日急令徐州附近邱清泉、黄伯韬、李弥兵团北上援救；19日，又催几个兵团迅速行动。20日，周恩来起草中央军委给粟裕等的电报，告诉前线，“刘峙已令邱清泉兵团集结临城待命援济”，“你们应迅速集结打援兵团全力于邹县、滕县地区准备歼灭邱兵团”。然而，以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第5军为主的邱清泉兵团，眼望着津浦路两侧我军十几万人的打援纵队，不敢贸然进击。至济南战役结束，还未与我打援部队接触。

早在1946年11月，周恩来在南京时就曾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中央通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加强对国民党军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等部的工作。人民解放军在进攻济南时，经过我地下工作者的工作，于9月19日晚8时争取了国民党整编第96军军长兼84师师长吴化文率部两万人起义，使我军一举占领飞机场和济南商埠以西地区。国民党在后来的战役检讨中说，这是济南战役的“失败关键”。20日，周恩来即起草中央军委给粟裕等电，就吴化文起义后的部队集结地点、宣言内容，我华东野战军欢迎起义的回电内容，以及吴化文部队起义后的编制方案、待遇等作出指示，并说：“吴军即编入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序列，番号亦与华东各军平排，不称新编，以示一视同仁。”

外围打援和争取吴化文部队起义成功，使济南国民党守军跑没处跑，援等不来。9月24日，经过8昼夜的激战，10万守敌全部被歼，守城司令官王耀武被俘。9月29日，周恩来起草中央军委的贺电，指出：“庆祝你们解放济南、歼敌十万的伟大胜利。你们这一勇猛、果敢、敏捷的行动，并争取了吴化文将军所率96军的起义，证明人民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

济南战役是我军大规模围歼敌军主力和解放敌重兵设防的大城市的开始。周恩来后来说：“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

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实际上已决定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方针已定，如何组织大的战役？首要攻击目标选在哪里？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当时考虑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蒋介石在军事上进行了一些调整，采取一些措施来对付人民解放军的进攻。8月3日至6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制定应变方针。主要是：将作战重点置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在东北地区，“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达到钳制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屏障黄河以南之作战目的；在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建立一个“独立作战地带”，在陕西“建立一骨干部队，支配战场，确保汉中，并于四川及汉中及时建立一个坚强兵团，以应陕北之急需”。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合并成一个战区，华北、东北合并成一个战区，“各置统帅一人节制之”；在西北成立一“剿匪总部，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剿匪军事”。将整编师、旅恢复成军、师；加强以主要城市为战略要点的守备兵力和防御工事；同时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组成若干个机动作战兵团，加强应援力量。

敌人军队此时在中原战场有75万人，正规部队84个旅；华东战场有36万人，正规部队35个旅。也就是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战区共有111万人，119个旅。东北战场有43万人，正规部队43个旅；华北战场有51万人，正规部

队 51 个旅。华北、东北战区共有 94 万人，94 个旅。西北战场有 30 万人，正规部队 38 个旅。

中共中央军委分析了各战场敌我双方情况，认为在东北战场，我军具有其他战场暂时还不具备的许多有利条件。例如，我军总兵力已超过敌军，有 100 多万人，其中野战军 70 万人；敌军孤立突出，被我军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等等。从全国战场看，先打东北，也最为有利。叶剑英后来回顾说：“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傅作义、卫立煌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

对于东北战场的战略方针，周恩来在解放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中写道：全国以中原战场为中心，东北战场“如能控制和消灭多数敌人，敌必将逐渐失去在中原战场上的机动”。“一年内我东北野战军及华北二、三兵团如能大量歼敌，肃清北线除平、津、沈以外的各大据点，则东北、华北便可打通，东北敌人增援中原的可能便将减少”。这里表达了两个思想，一是消灭敌军在东北，二是控制敌军，使其不能增援中原。

确定首先打东北后，我军进攻的主要方向首先应选在哪里？东北的敌人被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地区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确定首先攻取锦州，以调动长春、沈阳之敌援锦，然后在锦州、山海关、唐山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东北国民党全军就地消灭。同时，攻占锦州，也就切断了敌人东北与华北两个军事集团的联系，切断了东北向华北撤退的通道，将东北敌军封闭在东北各个歼灭。

1948 年 9 月 12 日，辽沈战役以东北野战军奔袭昌黎至兴城一线之敌而发起。人民解放军 17 日占领昌黎，27 日向北进至塔山，10 月 1 日攻占义县，完全包围和孤立了锦州敌军。这时，蒋介石严令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派兵增援锦州，从沈阳空运 49 军至锦州，另电华北调 7 个师援锦。30 日蒋介石飞到北平，10 月 2 日又赴沈阳，制定作战计划。

10 月 2 日晨 5 时半，周恩来代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等电：“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出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外打下该城。”10 月 14 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进攻，只经过 31 小时的战斗，就攻克了锦州。10 月 17 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央贺电，这次贺电与往常的贺电不同，往常都用中央军委的名义，这次用的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可见中央对首先攻击锦州和取得锦州作战胜利的重视。

为配合辽沈战役的发起和进行，中央军委还部署华北兵团对傅作义集团的牵制。华北野战军部队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于 1948 年五六月间发动了几个战役，以拖住傅作义主力。5 月 9 日，成立华北军区，周恩来在同一天为中央军委起草指示：第 2 兵团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部“主力东进计划不变”，要求他们进行热西、冀东战役，至 6 月下旬，战役结束。7 月 11 日，周恩来

又代中央军委起草了平保（即保北）战役作战方案，并要他们提前行动。7月15日发起，7月20日结束。两次战役调动了傅作义的部队，聂荣臻说：“3兵团到冀东一打，傅作义立刻把兵调过去，我们在保北一打，他又把兵调回来，狼狈不堪。”

7月23日，周恩来又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致晋绥分局等电，要求华北杨成武率3个纵队7个旅组西进兵团，定8月下旬进入绥远作战，以配合东北野战军及杨罗耿兵团行动。8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要聂荣臻、杨成武一起到西柏坡，谈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准备成立第3兵团，由杨成武任司令员，进军绥远，开辟新的战场，配合东北野战军的作战行动。绥远是傅作义所必救的，你们把傅作义的主力拖住在平绥线，调动他们向归绥转移，使华北敌人不出关，少出关。加之华北第2兵团在冀东，第1兵团在山西，这样，就可以保证东北野战军作战的胜利。8月8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央军委宣布成立第3兵团的电报，并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名义致电中共华北局、晋绥分局、西北局，决定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成立前线委员会，以李井泉、杨成武、李天焕、姚喆、高克林及其所属各纵队委员会书记组成之，李井泉、杨成武、李天焕为常委，李井泉为书记，杨成武为副书记，总的领导及地方工作由李井泉负主责，军事由杨成武负主责。8月12日，他又起草电报同意第3兵团准备工作的报告，并询问姚喆部弹药供应情况。8月23日，又起草中央军委致李井泉电，要求加紧进行战役准备工作。9月25日，东北野战军正在包围锦州时，第3兵团突然发起绥远战役。傅作义急令包括他嫡系部队主力第35军在内的10个师向西驰援。傅作义部队一向西，第2兵团乘虚攻击张家口，傅作义部队又被调向东。此时锦州连连告急，傅作义仅从他的60万大军中调出5个师运往葫芦岛增援。

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使东北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10月15日，蒋介石再次飞抵沈阳，严令长春守军向沈阳突围。长春守军中第60军军长曾泽生于17日起义，使我军控制了长春东城，接着新7军官兵也纷纷投诚。18日，周恩来起草中央军委致东北局并林彪、罗荣桓电，要他们对曾泽生“开会表示欢迎”。19日，郑洞国率余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

10月18日蒋介石第三次飞到沈阳时，部署了“总退却”。他确定，主力廖耀湘部夺取锦州，打开通往关内大门，另以一部抢占营口，以待廖耀湘攻锦州受阻时，从营口上船从海上撤退。

10月20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等电，提醒林彪等“必须估计到沈阳敌人在受锦州、长春两处惨重失败的打击下，有选择依现态势西退或转向营口由海路撤退的两种可能，如此两种可能均告失败或无法实现，则只有退集沈阳，依靠空运撤退一部。”这封电报，对敌情估计十分准确。辽沈战役后一段的发展，与这封电报的估计完全一致。

廖耀湘兵团在接到蒋介石指令后，即向锦州方向出动。人民解放军于10月20日下达了全歼东北敌军的政治动员令，在黑山、大虎山组织了强有力的阻击，并乘敌混乱展开大规模的围歼战。28日拂晓，全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及特种兵部队共10万人，包括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的新1军主力和新6军全部，俘虏廖耀湘，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正在人民解放军围歼廖耀湘兵团时，蒋介石与傅作义密谋了一个军事行

动计划，以两个军的兵力，配备汽车 500 辆、炸药 100 吨，组成一支快速纵队，以突然行动经保定偷袭石家庄，意图直接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我潜伏在傅作义司令部中的地下党员得到了情报，立即报告中央军委。当时，华北第 3 兵团远在绥远，第 2 兵团在平绥线一带，近处没有大部队可调，情势危急。

10 月 25 日中午 12 时，周恩来即起草中央军委致聂荣臻等电，通报情况，作出部署：调华北野战军 7 纵主力“即移至保定以南坚决抗阻南进敌人”，力争把敌人挡在滹沱河以北。调距离最近的第 2 兵团第 3 纵队 26 日起，以 5 天行程，不惜疲劳赶到望都地区，协同 7 纵主力作战。同时，也是 12 时，又起草军委致第 3 兵团杨成武、李井泉电，告他们第 2 兵团要调到保定一线保卫石家庄，要他们暂缓攻归绥；同时，又要作出攻城样子，以吸引傅作义一部分兵力注意归绥方面。

第 3 纵队接到命令后，26 日下午即起程急行军南下。周恩来用军用电话时刻与聂荣臻保持着联系。27 日清晨 4 时半、6 时、7 时，周恩来连接 3 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第 3 纵队的行动状况。并通过聂荣臻要求 3 纵 30 日赶到满城。28 日，敌军开始向保定以南的方顺桥试探性推进。29 日，我方又得到傅作义再调第 35 军等两个军的兵力南下增援的消息。周恩来即于 29 日晨 7 时起草中央军委致第 3 兵团、第 2 兵团并告聂荣臻、薄一波电：照此部署，傅作义部除去沿途守备兵力，真能向保定以南者，不过两个军多一点，是我歼敌良机。我应集中 3、4、7 纵及 2 纵 1 个旅，各个歼灭该敌。并要求第 2 兵团主力以四天至五天行程，赶到满城参加作战。30 日拂晓，第 3 纵队提前一天到达定县望都地区。敌人见解放军主力已到，慌忙向保定撤退。偷袭计划宣告失败。

东北战场廖耀湘兵团被歼后，卫立煌匆忙从沈阳乘飞机而走，东北敌军已无招架之功。东北野战军分两路，一路解放沈阳，一路向营口急进，截敌退路。11 月 2 日，沈阳解放。同一天，解放营口。至此，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辽沈战役的胜利，加上其他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使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人总兵力下降为 290 万人，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增长到 300 余万人。而且东北野战军成为我军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力量。毛泽东说：“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力缩短。原来预计，从 1946 年 7 月起，大约需要 5 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辽沈战役一结束，第二个战略决战——淮海战役就开始了。

10 月 11 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决定第一阶段先打位于徐州以东的黄伯韬兵团。第二天，前线指挥部向军委报告准备 25 日发起战斗。10 月 14 日，中央军委发出部署钳制徐州各部援敌的电报，决定刘邓主力不日开始攻击郑州。

10 月 19 日，周恩来电告聂荣臻、薄一波：“刘邓行动已定在 10 月 23 日”，“望告 14 纵依此时间配合行动，派队逼进安阳机场，并设法破坏，务使安敌不敢空运郑州”。10 月 22 日，刘邓部队攻占郑州。10 月 25 日，周恩来起草贺电，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贺电中说：“郑州解放，歼敌万余。开

封守敌，弃城东窜，开封遂告第二次光复。从此，中原三大名城洛阳、郑州、开封均为人民解放军掌握，对于今后战局，极为有利。”

11月6日，淮海战役以攻击黄伯韬兵团打响。8日，国民党第3绥靖区副司令长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3万余人起义，为切断黄伯韬兵团的退路，并完成对这个兵团的合围起了重要作用。11月9日至11日，中央军委连电中原野战军，要他们采取切实措施攻占宿县。攻占宿县，切断徐州、蚌埠间的铁路，就切断了徐州敌人重兵集团的后路，完成对徐州的包围，酝酿着在淮海进行最大的战略决战。16日，中原野战军攻占宿县。22日，人民解放军全歼黄伯韬兵团。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22日这天，周恩来起草中央军委致中原局、华北局、华东局等电，指出：“淮海战役正在胜利开展中。我应作最大估计，准备在徐蚌地区作战3个月至5个月，歼灭蒋匪江北机动兵力40个至50个师，以利尔后突破长江防线，向江南进军，彻底摧毁蒋匪的中心统治。”

黄伯韬兵团被歼后，淮海战场敌军仍有3个集团，一是徐州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一是位于蚌埠及其以北的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一是从武汉驰援的黄维兵团。中央决定先打黄维兵团。11月23日发起至12月15日止，历时23天，中原野战军全歼黄维兵团包括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第18军在内的1个兵团部、4个军部、11个整师和1个快速纵队，共10万余人，俘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吴绍周。战斗中，原由我地下组织控制的第85军第110师，在师长廖运周率领下，于11月27日敌军准备突围时起义，使敌人陷入混乱。12月22日，周恩来草拟了以毛泽东、朱德名义给廖运周的信，欢迎他回到革命的大家庭来。

黄维兵团被包围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孤注一掷，令徐州的杜聿明放弃徐州，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绕道肖县、永城南下，解黄维兵团之围。11月30日，杜聿明开始行动。我华东野战军当机立断，以11个纵队，进行多路、多层次的追击和拦击。12月3日，周恩来起草中央军委致粟裕等电：“关于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总结报告甚好，望本此精神继续指导追歼徐州逃敌的当前战役，期获全胜”。12月4日，华东野战军将杜聿明集团全部包围于徐州西南的陈官庄、青龙等地区。

这时，由于平津战役开始部署，淮海战场对杜聿明集团采取“只作防御，不作攻击”的策略，等到后来平津战役部署完成，1月6日，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攻击，至10日下午，全歼该敌。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共歼敌55万余人，敌人南线的精锐主力全部被消灭。

辽沈战役结束后，中央就开始考虑平津战役的问题。

当时，华北傅作义集团除1个军3个师约4万人位于归绥，1个师1万余人位于大同外，其余主力4个兵团、12个军、42个师（旅），共50余万人，位于东起北宁路的滦县，西迄平绥路的张家口约500余公里的狭长地带上。42个师中，属傅作义系统的有17个师，属蒋介石系统的有25个师。傅作义将其嫡系部队摆在平绥路上，将蒋介石系统的部队摆在北宁线。

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也已打响，傅作义是固守平津张唐，还是向西或向南实行战略撤退，一时举棋不定。蒋介石要他南撤，加入徐蚌大战，傅作义则想如果平津危急，他就西撤绥远。而此时他估计辽沈战役刚刚结束，东北野战军需要休整，一时不能入关，所以可以暂守平津。

11月9日，周恩来起草中央军委致华北和东北领导人电，指出：傅作义

“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似尚未下最后决心。但我如攻打归绥，有促使傅作义集团嫡系三个军及骑三、四个旅提早西退可能。”为争取早日夺取太原并抑留傅作义部队于平张津保地区，以待我东北主力入关协同华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之目的，特对华北2、3兵团改定部署。第2兵团一部向太原移动，第3兵团停止攻归绥计划。并令程子华、黄克诚部担任监视北平之敌任务。这份电报目的是“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张津保地区彻底歼灭”，这一思想对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十分关键。11月13日，周恩来在起草的中央军委致程子华、黄克诚并告东北、华北领导人的电报中，再次强调指出：“尤重在抑留傅部于平张津保地区，不使西退，亦不使其得由海上南撤。”

16日，淮海战场上中原野战军攻克宿县，黄伯韬兵团被歼大部，战场形势迅速发展。17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封约1500字的长电，经毛泽东修改后致林彪等并告华北局。在这封电报中，首先分析了淮海战场的形势，然后指出：“在我胜利威胁下，蒋匪必将考虑其长江防线问题”，而“蒋匪所能调动的兵力，只有华北西北两集团，首先必是华北，因西北胡匪31个师尚负有掩护四川和西南的任务”。华北有44个师，傅作义嫡系约20个师，南撤，傅不愿，“因此，蒋匪嫡系24个师从华北海运江南，是蒋介石今天惟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不调动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我们的计划应放在他可能调动一点上”。接着，电报分析：“从全局来看，抑留蒋系24个师及傅系步骑16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但欲抑留蒋傅两部于华北，依华北我军现有兵力，是无法完成的。”然后，电报提出两个方案，请他们郑重考虑。一是东北野战军提前于本月25日左右起向关内开动，二是不管傅军是否撤走仍按原计划休整到12月半然后南进。从电报口气上看，中央是倾向于第一方案的。在这封电报中还指出：“太原早克确有惊动蒋傅促其西撤南撤的危险，现正与徐周电商是否可以暂时停攻，就地休整，待你们攻平津时再打太原。”这封电报连同9日的电报，中央的战略意图已十分明确，停止攻击太原、归绥，不惊动傅作义；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作战，完成对傅作义的包围，其中心内容是抑留傅作义集团在华北就地歼灭。

11月18日18时，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致林彪等电，通报傅作义已与我们接洽起义。提出“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同时决定“望你们立即令各纵队以二三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8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

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主力10个纵队和特种兵全部向关内进军。11月28、29日，周恩来起草中央军委致程子华、黄克诚电，要他们命令詹大南部在宣化、怀来间破路，“阻止张家口宣化之敌南退，以利杨成武围歼”。11月29日，杨成武指挥的华北第3兵团，突然向张家口外围守敌发起进攻，牵动北平敌军西移援助，配合东北野战军入关。平津战役至此打响。

11月29日我第3兵团进攻张家口外围开始后，12月1日，即切断了张家口敌军西逃道路和与东南宣化敌人的联系。傅作义判断中共东北部队暂时尚不能入关，即调兵西援。5日，傅作义得知密云失守，又在喜峰口发现东

北野战军，判断我军可能要切断平张线，直取北平，急令其嫡系第 35 军回撤北平。7 日，周恩来起草中央军委致华北第 2 兵团电，要他们坚决抓住 35 军，“即以全军于今日取直径直插宣化下花园间，坚阻张家口、宣化敌人东逃。如发现敌已东逃，应坚决追歼该敌”。第 2 兵团 9 日追上第 35 军，将其包围在新保安。12 月 11 日，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包围北平、天津、塘沽、唐山。至 20 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 5 个地区敌军的分割。

傅作义此时虽已派人与我进行和平谈判，但仍动摇于和、战之间。中央军委决定采取先取两头、后打中间的部署，堵死傅作义西逃东撤的道路。22 日晨 7 时，人民解放军对新保安的傅部第 35 军发起总攻，当天下午 17 时全歼 35 军。23 日，张家口敌人突围，我军即行追歼，24 日全歼敌人。1949 年 1 月 14 日，我军对天津发起总攻，15 日全歼守敌，天津解放。此时，淮海战役也于 1 月 10 日结束，所以，傅作义下决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1 月 22 日，傅作义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代表签订北平和平协议。31 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自傅作义提出和平谈判以来，周恩来一直协助毛泽东处理同傅作义的谈判问题。2 月 22 日，傅作义和邓宝珊来到西柏坡。周恩来先见他，对他说：傅先生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和平解决了北平问题，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否则，就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的战略决战，进行了 4 个多月，歼敌 154 万余人。这是中国战争史上空前的大规模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至此已基本消灭，国内局势已基本改观，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

三大战役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四个战场上进行的同时，中共中央指导我西北野战部队对三大战役积极配合。

三大战役相继发起后，中共中央给西北野战军的任务，仍是在西北歼敌，牵制胡宗南集团，使其不能向中原增援。10 月间，西北野战军发动荔北（陕西大荔以北）战役。11 月上旬，淮海战役开始后，西北野战军决定发起冬季攻势，向西调动敌人。11 月 20 日，周恩来起草中央军委致彭德怀等电，同意西调歼敌之计划。并指示：“因今后两三个月中，由于淮海战役的胜利及东北野战军入关，西北敌情将有极大变动可能，到那时，为适应此情况，你们仍须捕捉战机，及时行动。”

12 月 7 日，当淮海战役正在胜利扩展，平津战役开始不久时，周恩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等电：“如一旦淮北四个兵团全歼，华北会战又起，蒋匪欲布长江防线，惟一可调之兵，只有胡宗南系统及新疆各军。因此西北敌情不久有起变化可能，你们应以极大注意侦察胡匪动向，准备在必要时，举行牵制胡匪战斗。”西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始终牢牢地牵制着胡宗南集团，并不断削弱它。

1949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到达北平。之后，周恩来的工作转向与南京政府代表团的和平谈判。

还在 1948 年即将结束的时候，蒋介石集团面临着对他们极其不利的形势，提出“和谈”。1949 年 1 月 14 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讲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接受谈判，并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1 月 21 日，蒋介石下野，退居幕后指挥。由李宗仁代总统。李宗仁表示愿以八项条件为基础谈判。但实际上李宗仁对和谈是什么态度呢？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

当总统之初，有三种任务紧迫眉睫。其一，为着结束内战，我不得不诚心同共产党人举行谈判，以求和解；其二，我不得不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以求得体面的和平。”3月初，李宗仁对即将成为南京政府谈判代表的刘斐说：“现在正在研究，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可见，南京政府谈判的目的是作到“划江而治”，以谈判争取时间，部署长江防务，以便卷土重来。

南京政府代表团4月1日到北平，国共双方代表谈到15日，达成《国内和平协定》。16日上午，南京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派黄绍站和屈武回南京请示。南京政府拒绝接受。

4月20日，人民解放军开始渡过长江。

《国内和平协定》虽然被南京政府拒绝，但这个文件的影响还是深远的。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同国民党一些地方军事力量的谈判，都是本着这个协定的精神。

在此之前，还在商谈北平和平解放时，中共中央就决定对属傅作义管辖的绥远省问题以后再谈。1月25日，周恩来起草中央军委致李井泉电，说：对归绥、包头敌人，“现只采取监视方针”。北平和平解放后，周恩来亲自指导绥远问题的谈判。据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回忆，北平和平解放以后，“绥远的和平起义，就是在周副主席直接指导下进行的”。3月22日，人民解放军和绥远方面代表开始谈判。4月1日，绥远方面代表提出《绥远问题协议草案》。在谈判中，双方在有的问题上发生争执，周恩来叮嘱解放军的谈判代表：实现绥远方式不要性急，要冷静地考虑他们提出的条件，要理解他们的爱国心愿和困难。他们希望和平解决的思想是主导的，但也有幻想、顾虑，也有他们自己的难处，有许多是我们不理解、想象不到的困难和想法。我们应该积极、耐心地去进行工作，等待他们觉悟，否则就不成其为“绥远方式”。5月28日，《绥远和平协议》签字，6月8日正式生效。

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曾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前考虑和共产党合作。6月2日，周恩来致电在香港的乔冠华，说：“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反美反蒋反桂极为必要，请你们认真进行此项工作。”6月间，程潜将他表示起义决心的“备忘录”通过关系送给毛泽东。7月2日，周恩来再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有关人士电：“程潜只要决心反桂系，并布置截断桂系退路，表面上主张湘桂合作，以麻痹桂系，是可谅解的。”程“应力求留在长沙，作为内应”。在毛泽东、周恩来指导下，经过大量工作，8月4日，程潜和国民党第1兵团司令陈明仁，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率部7万余人起义。

国民党云南省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1949年初就派人与中共联系。渡江战役开始后，他又派代表宋一痕到北平与中共中央联系。周恩来同朱德、李维汉接见了宋一痕，对他说，欢迎卢汉起义，但起义时间不要过早，等到解放军临近云南时举行，以免招致失败。10月，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军，12月9日，卢汉起义。

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在人民解放军基本解放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后，也表示接受和平协议条件。9月13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新疆的邓力群等电，要他去迪化（今乌鲁木齐）与陶峙岳洽商和平解

《李宗仁回忆录》，第132页。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八辑，第23页。

决新疆问题。9月25日，陶峙岳通电起义。9月26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也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战略决战规模空前，后勤任务十分繁重。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直接组织领导人民解放军庞大的后勤供应工作。

他十分关心解放区人民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早在1948年4月19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前委注意这个问题，严格检查部队中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订出制度和办法，以利于长期战争和取得最后胜利。9月间，他写了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后勤补给系统及干部配备的决定。

战略决战开始，周恩来面对着庞大的后勤工作，对于从兵员补充到武器弹药的生产 and 配备，从财政经费到物资供给，从组织担架、医药到组织运输，等等，都十分关心，不时作出指示。

淮海战役发起前，1948年10月22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饶漱石、粟裕等电：为利于华东野战军进行大规模战斗任务起见，军委同意增加携行弹药基数。11月14日，华野主力包围黄伯韬兵团后，大战在即，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电，要华东军区“集中一切力量争取此次战役的扩大和胜利”，并“得电后速集中一切汽车火速运送兵站第一线所有之弹药两个基数，限戎筱赶到前线”。第二天，又发电，要华东军区将“执行情况速告”。之后，华东局作了紧急动员，掀起支前高潮。22日，周恩来电告中原局速令豫皖苏分局立即动手筹集作战部队急需粮食；告华北局速令冀鲁豫区“调集1亿斤至1.5亿斤粮食供应华野部队需要”。

中央决定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以后，1948年11月21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李富春等电，同意发50万银元给东北野战军，并要他们提出每月需粮多少，以便通知华北、华东准备。11月28日，周恩来又起草中央军委致李富春等电，同意东北野战军1949年第一季度的后勤计划，并安排华北和华东支援。12月15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东北局和华东局的电报，协调东北野战军的粮食供应问题。这些细致的安排，保证了东北野战军顺利入关。

12月13日，周恩来出席中央军委卫生部第一届药工会议。他在讲话中指出：“战争这样大，伤员这样多，如果没有卫生工作在前线的救护及后方各种医院的治疗，就完成不了这样大的战争任务。”

1949年1月，平津战役正在进行，10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林彪、聂荣臻等并告华北局、东北局，平津两市委及杨得志、杨成武等电，对接管平津和统一领导平津地区一切工作，做出安排。关于平津地区的后勤工作，要求“归东野后勤司令部统一指挥”。接收敌仓库中的军火和军需品，如部队急需，“得东野首长或为林彪、罗荣桓授权之首长批准后，可以动用”。以此解决两大野战军及两个兵团协同作战中规模巨大的后勤工作。

1948年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曾经说过：“后勤是军队正规化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要建立统一的后勤组织及其规章制度。”“确立关内统一的供给标准。”“在军火上，建立军械管理机构”，“军火生产和分配计划必经由军委规定和批准”。“通信卫生器材，统一由军委监督分配。”在部队中，“设立常备担架队”和辎重队，等等。

到了1949年1月，周恩来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后勤代表会议上说：一年半

以前，我们供给 100 多万人，到今年年底，要超过 400 万人。“胜利加快，后勤工作就得加多、加快、加大，一个战役一百三四十万人，两个野战军打两个月加四天，粮食就要五亿斤，弹药也不是一二个基数问题，历史上还没有过。”他说：战争已进入正规战争，一切工作方式统统要依此而改变。“部队要正规化了，首先是后勤。”“后勤工作在正规化上要当先，又要殿后。”

仗越打越大，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也越来越迫切。

在 1948 年 9 月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出：“军事组织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后来会议决定，部队将实行统一编制和正规化，由周恩来准备文件。周恩来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解放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中，对如何正规化、集中化，做了较为详尽的叙述。他首先讲到军队建设要“充实野战部队，增建特种部队，整顿地方部队，精简后方机关”。充实野战部队，“主要地依靠了俘虏兵的争取，部分地从新区动员补充”。增建特种部队，“主要是建立炮兵，首先是建立各纵队的山炮团、营；其次视条件许可，逐步建立各纵队的工兵营、连，野战军的战车重炮团等，北线则应加强骑兵的编训”。整顿地方部队，“应区别地方部队为作战部队和警备部队两种”，“配合野战部队或独立担当作战”，或是保卫地方治安。精简后方机关，要求，“其人数比例应保持占本区武装人员的十分之一上下”。然后讲到军队的编制，他强调，“凡成立一个步兵师或一个特种兵的团，均须呈报军委批准”。整个军队的编制原则“均采三三制”。但人数和武器装备暂不要求完全统一。对于野战部队的番号，“由军委统一编排。纵队和师均依西北、中原、华东、华北的次序排列，地方部队的番号，则按军区分别编排。”野战军按野战军、兵团、纵队排序；地方部队归军区建制，军区分三级。“一级军区及野战军和直属兵团交军委指挥”。

九月会议后，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各军区、野战军之间协同作战越来越频繁，军队建制不统一、番号不一致的问题已迫切需要解决。10 月间周恩来拟定了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要求全军一律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号，组织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三类。野战军分为四个，“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野战军下设兵团，兵团下属原来的纵队改为军，师、旅统一称师。特种兵也要统一编排番号，要求野战军设炮兵司令部，在条件具备时，“亦得组织特种兵部队，统帅直属的炮兵部队、战车部队及工兵部队。全国共分五大军区，与中共中央局同级并受其领导，与中央分局同级者为二级军区，与区党委同级者为三级军区，与地委同级者为军分区。11 月 1 日，“规定”发出，通令全军一体遵行。

后来，由于战争的发展，野战军的作战地域已超过本地区，因而各野战军前面加以原军区的地名，已经不适用。1949 年 1 月 15 日，中央军委进一步作出关于全军组织编制、番号的决定，将野战军改为按数序排列，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依次改为第一、二、三、四野战军。据此，各野战军在战略决战结束后先后进行了整编。此时，我们在广东和华南各地有三万多游击部队，散在闽粤赣边、湘粤赣边、东江、粤桂边、粤桂越边、滇桂边等地农村；琼崖纵队有数千人，建立了四五县范围的解放区。对较大的游击队也分别进行了整编。

还在 1948 年时，周恩来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征求各中央局、各军区、各野战军前委及中央工委、中央后委等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帽花

和臂章的意见。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命令，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的式样。军旗红色，靠旗杆上方缀金黄色五角星和“八一”二字，故亦称“八一军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经过长期战斗，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军徽为镀有金黄色边的五角红星，中嵌金黄色“八一”二字。同日，新华社发表文章《把人民解放军的军旗插遍全中国》。后来，从1951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空军都以“八一”军徽为主体决定了军徽，海军军徽藏蓝色底，衬以银灰色铁锚，空军军徽衬以金黄色飞鹰两翼。

第十四章 挑起组织领导抗美援朝战争重担

- 新中国成立初期，仍然主持中央军委的常务工作。
- 在国庆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亲自加上画龙点睛之笔。
- 中国出不出兵？中央酝酿了多次。他主张出兵，说：不能见死不救，唇亡齿寒嘛！
- 起草致彭德怀电，同意在第四次战役中采取防御作战，第一次提出“拉锯战”。
- 为志愿军的后勤保障操心费力。聂荣臻说：周总理抓得很细，作出了宝贵贡献。
- 以毛泽东名义起草大量电报，指导停战谈判，3个多月中几乎平均一天多就起草一份。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是政务院总理。1949年12月，他说：“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但是，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他仍然主持着军委的日常工作。

建国前，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建国后，周恩来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聂荣臻为副总参谋长。因为徐向前有病，1950年初聂荣臻被指定为代理总参谋长。这时朱德的身体也不好，医生再三要他休息，主持军委工作的是毛泽东、周恩来。

解放战争进展神速，到1949年底，全国大陆除了西藏外，已经全部解放。1950年4月16日到5月1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剩下的战事不多了。此时，解放军的人数包括改编的原国民党部队，已经达到500多万。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需要很大的财政支出。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中央准备大量裁减军队。

1950年4月14日，周恩来在第28次政务会议上说：“1950年把军队数目从五百六十万减到四百万。”5月16日，他在全军参谋会议上讲话，说：目前，“一方面战争还未全胜，需要加强准备；一方面又要使军事开支不要太大”，争取国家财政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为此需要整编军队，复员100多万人，“这是我们目前的重大任务”。6月24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政务院召开的联席会议上介绍军队复员工作的方针政策，会议通过了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

正当新中国准备大量裁减军队的时候，情况突变。6月25日，朝鲜北南双方爆发了战事。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的空军、海军参战，支援朝鲜南方李承晚政府。27日，杜鲁门公开宣布武装侵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还命令他的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帝国主义武装进攻的威胁。

中国立刻作出反应。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6月30日，周恩来约见将去驻朝鲜使馆任政务参赞的柴军武，对他说：“现在美国的地面部队已经在朝鲜参战”，“美帝国主义者必纠集更多的国

家出兵，所以朝鲜战争长期化很难避免，这就会带来影响全局的一系列复杂问题”。“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晚上，柴军武一行离开北京去平壤。

预见到这一战争的长期性，这是周恩来很早就有的正确判断。

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我国军队整编工作被搁置，不久，反而进行扩编，1951年达到600多万人。

周恩来在百忙中，时时关心着朝鲜战事的发展。朝鲜是我国东北的紧邻，而东北，白山黑水，区域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当时中国仅有的一点重工业企业，基本上都在东北。周恩来常注视着地图思考着：战火会不会蔓延开来？会不会影响到我国东北的安全？

他同毛泽东商议了这件事。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7月7日和10日，两次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议，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保卫东北边防的问题。13日，周恩来书面报告毛泽东说：这两次会议商定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分别从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地抽调第13兵团、第42军和若干炮兵师、高炮团、工兵团，共25.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8月5日前到达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通化、本溪、铁岭等地。空军编成3个团在东北训练，成立东北空军司令部。

也就在7月7日这一天，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以美国侵朝军队为主组成所谓“联合国军”，扩大朝鲜战争。杜鲁门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开会，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的准备工作。在会上，他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解放了华南、西南广大地区和海南岛、舟山群岛等。这期间重要的是建设，大家忙于政府工作，部分力量搞军事。今年对军队提出了生产任务和考虑复员一部分，只用部分部队进行解放海岛和准备进军西藏，而在生产和复员上却用了很大力量。朝鲜战争爆发后，给了我们新的课题。美帝国主义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战争的东方基地。它的总企图是不断地由一个战争推动力世界大战。在我们方面就要将其发动的战争一个一个地打下去，使其不能发展为大规模战争。它如果压服朝鲜后，下一步必然进攻中国，根据两月来的作战情况，不能不设想“战争的长期化，要准备在长期化上逐渐消灭敌人”。我们对于朝鲜，不仅看作兄弟国家问题，不仅看作和我国东北相连接有利益关系的问题，而且应该看作是重要的国际斗争问题。根据战争的情况，要设想战争的长期化。这和我们东北边防军的准备工作是有联系的。我们现在如果不抓紧时间积极准备，万一形势恶化，就会措手不及，陷于被动。

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讲到了将来如果出国作战，关于作战后的部队补充问题，可以考虑换班的打法，轮流补充，即准备第二线部队作为后备，待第一线的军或师作战后需要补充时，即调第二线整补，而以第二线一个军或师调前线作战。

8月25日，在第47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也讲到：“现在看，朝鲜战争可能变成长期”，“拖长的可能性增加了”。他讲了在北伐时期、东北抗日联军和关内抗战，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中，都有朝鲜子弟参加，朝鲜民族与我们是血肉相连的。朝鲜人民帮助过中国人民，现在，朝鲜人民将“要长期作战”，“我们应支持他们”，“坚决帮助他们”。

朝鲜战争之初，朝鲜人民军6月28日解放汉城，7月20日攻克大田，

到8月中旬，解放了南朝鲜百分之九十的地区，把美军和李承晚军队压缩到洛东江以东一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美军一面负隅顽抗，一面利用釜山港继续增援兵力。战争成了胶着状态。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在密切注视着，8月中旬连续开会，研究朝鲜的战争情况。总参谋部作战室根据朝鲜战场的状况进行了图上模拟演习，对演习的结果作了分析，认为美军的下一步行动最大的可能是在人民军的侧后登陆，进行中间截断。对于在什么地方登陆也作了分析，认为适宜登陆的港口有六个，可能性最大的是在仁川登陆，它的后果也最严重。8月23日凌晨，作战室的负责同志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个分析结果。周恩来很重视，带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8月下旬到9月初，周恩来多次召集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开会，商谈加强东北边防军问题，并起草了《关于加强边防军的计划》。《计划》决定将东北边防军兵力逐渐增加到11个军36个师，连特种兵部队、后勤部队共约70万兵力，分为第一、二、三线。

后来，9月15日，美军7万多人果然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在两面作战的不利形势下转入退却。28日敌军攻占汉城，29日进抵南北朝鲜的分界线——“三八线”。

美军过不过“三八线”？如果过“三八线”北进，就是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这是一个严重的行动。周恩来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密切地关注着。

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作了《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报告中说：“中国人民密切地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并说：

很明显，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最后一句“也不能”三字下面“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是这一讲话稿的画龙点睛之笔，这是在定稿时周恩来亲笔加上的，说明中国不能置之不理。

这个讲话，10月1日《人民日报》用显著的版面公布了。

接着，10月3日，周恩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迹，说：“美国军队正企图超越‘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这样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把这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我们至今仍主张如此。”这次约见的时间是在凌晨一点钟，这也说明了周恩来急迫的态度和制止战争扩大的心情。这次会见时作翻译的是浦寿昌，周恩来事先对他讲，要突出一个“管”字，把这字翻译成英文要有相当的分量。周恩来这次谈话，是因为中国和美国还没有直接外交关系，要通过印度政府给美国传话，让他们知道中国的态度。他知道中文的“管”字在英文中不大好翻译，特意要浦寿昌好好琢磨一下，以便在翻译时准确无误。

中国将会采取什么态度？美国政府当然是要考虑的。8月间，杜鲁门曾

经派阿弗里尔·哈里曼到东京见“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问他这个问题。麦克阿瑟表示不相信苏联有意于直接干涉，或卷入一场大战，他相信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9月27日，杜鲁门批准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的指示，要他“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并授权他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

周恩来的国庆讲话和同潘尼迦的谈话，迅速地传到了白宫，杜鲁门没有重视，认为这只是周恩来的“恫吓”。但是，杜鲁门觉得“中国对朝鲜的干涉的可能性当然不能不加以考虑”。他要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下指示。指示中说：“今后中国共产党要是不事先声明就在朝鲜任何地方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队，你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只要在你控制下的部队有可能获得胜利，你就继续行动。”一方面，美国政府却放出空气，说是美军将停止在“三八线”上。

10月5日，杜鲁门乘飞机到太平洋中的威克岛，会见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向杜鲁门保证：“朝鲜的战局是赢定了”，“中国共产党参加战争是不大可能的”，最多，他们可能派五六万人进入朝鲜，但是他们没有空军，“如果中国人南下到平壤，那一定会遭受惨重的伤亡”。“在南北朝鲜，抵抗都会在感恩节前结束”。杜鲁门给麦克阿瑟颁发了勋章，说：“这次会谈回来更增强了我的信心。”10月7日，美国侵略军已经开始越过“三八线”，疯狂地向中朝边境进犯。

中国出兵不出兵？中共中央酝酿了多次。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个问题。6日，又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是主张出兵的。周恩来也是主张出兵的，说：我们不想打，但是敌人逼我们，快到鸭绿江边了，不能见死不救，这是援朝，也是卫己，唇亡齿寒嘛！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着我们非打不可。4日下午，中央派飞机从西北把彭德怀接到北京的会场上，彭德怀也认为“出兵援朝是必要的”。会上决定彭德怀领兵前去。

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0月24日，周恩来向国内各有关方面负责干部和民主人士作报告，讲当时形势：

美国飞机已经侵入我国领空12次之多了。我们国家需要恢复生产，我们的确也正在恢复。我们本想1951年减少军费，增加经济建设费和文教费，还考虑增加公教人员生活费，但是敌人不让我们这样做。美军在仁川登陆以后，我们想他是否会停在“三八线”？美国占领汉城，印度尼赫鲁转告我们，三外长会议说好不过“三八线”。但是，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三外长会上决定的是和缓中国，过“三八线”，过了以后，再搞中国。我在9月30日发表了声明。10月3日，敌军已过了“三八线”。我对潘尼迦讲不能不管。尼赫鲁转告英国贝文，贝文通过尼赫鲁表示到离鸭绿江40英里就停止，当时已到平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432页。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435—438页。

壤。现在已由平壤北进。显然，这是第二次欺骗。“敌人得寸进尺”，我们“过去做的已无效，只有力量的管才能起作用”。管的结果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给敌人以挫折，使它知难而退，另一种是它可能孤注一掷，因为美帝国主义内有疯狂的一派，我们应有准备。我们并不愿战争扩大。周恩来说：“力争第一种可能。”

10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在北京最后一次研究了志愿军入朝鲜后的部署和作战方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4个军和3个炮兵师1个高射炮兵团开始秘密渡过鸭绿江。

这时美军和南朝鲜李承晚军队正迅速向鸭绿江推进。25日，两军相遇，开始了第一次战役，经过13个昼夜的艰苦作战，歼敌1.5万余人，到11月7日结束。志愿军把敌人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清川江以南。敌军坚持要占领全朝鲜，增强地面部队到22万多人，飞机1200余架，发动全面进攻，宣称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作好准备，进行第二次战役，共歼敌3.6万余人，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原“三八线”以北（除襄阳外）的全部领土，还进展到“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半岛和延安半岛。这次战役震惊了世界。12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乘胜发起第三次战役，经过9天连续作战，把敌人赶到三七线以南，解放了汉城，又歼敌1.9万多人。

1951年2月4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电，同意他在第四次战役中采取防御作战的方针，但请他注意敌军此次进攻虽以主力9个师旅放在西线作为主攻，但敌在南汉江以东仍有8个师纵深配备进行助攻，而沿海又有两个师为之策应，“其特点为力求东西呼应，齐头并进，其弱点为东线伪军多，力弱，山多，呼应难。我如能在东线歼敌一两个师，打开缺口，则西线敌人冒进可能被停止，但必须设想敌进占汉城后侦知我西线正面力薄，仍有继续前进逼我东线后退可能”。因此，“请令邓华集团在寻机歼敌部署中切忌仓猝应战。如敌冒进，宁可让其深入利我围歼。如敌不进，必须寻敌弱点利我分割歼击一部”。这个电报，特别指出了要寻找敌人的弱点，第一次提出了拉锯战，不上敌人诱我南下的当。后来，经过第四、五两次战役，到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前后共歼灭了敌军23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并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

12月3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金日成会谈，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以统一指挥两国军队作战和前线的一切活动，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方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从此，中朝两国军队开始在统一指挥下并肩作战。

这时，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顾问乔冠华正在美国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周恩来致电他们说：“凡遇以朝鲜停战为言者，你们都不要拒绝谈判，你们应答以只要美军从朝鲜撤退，朝战自停，并且愿将他们的意见向北京作报告。”“我们历来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使朝鲜问题局部化的，故我们坚持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朝鲜，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

朝鲜战争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战争。“打一场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物力的竞赛。”战争的物资消耗十分巨大，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资保障，取得战争胜利是不可能的。彭德怀甚至讲：“三七开，前方功劳三分，后方功劳七分。”例如1953年夏季攻势中，

一次 20 多分钟的火力急射，就用了弹药 1900 多吨。金城战役一仗，消耗物资 34000 多吨。战争三年，仅主副食、弹药、油料等几项主要物资的供应，就近 300 万吨。志愿军是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既要由国内筹集，还要冒着敌机狂轰滥炸运上去。聂荣臻回忆说：“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这方面事情，我几乎每件都向他请示。他抓得很细。”“总之，恩来同志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费尽了心血，作出了宝贵贡献。”

在 1950 年 10 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志愿军入朝作战时，周恩来来说，要“有充分准备，一出手就胜”，在这样的战略意图下，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战争开始后，周恩来挑起了协助毛泽东组织、领导这次战争的重任。从志愿军的编组、装备、兵员补充，到军工生产、交通运输、后勤保障以及作战指挥，他都亲自过问，运筹帷幄。为了保障作战物资的源源供应，他关心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码头等交通枢纽，指示在运输线上普遍建立“交通港”、“防空哨”，建立起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12 月 25 日，周恩来起草中央军委致彭德怀、邓华、高岗、李富春并告各大军区领导电：加强志愿军后勤组织，分别从中南军区、总后勤部调周纯全、周玉成分任志愿军后勤部正副部长。27 日，中央军委发出成立志愿军后勤部的通知。

1951 年 1 月，东北军区召开后勤会议，研究志愿军的供应问题。周恩来就要聂荣臻同他一起专程赶到沈阳听汇报，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如作战部队反映大盖帽不便于爬山、钻林子，周恩来立即指示改换解放帽。他了解到部队在山地作战，棉衣容易扯破，就指示在棉衣面上加绠线。当知道志愿军战斗紧张吃不上饭时，就要政务院向东北、华北、中南各省市布置，发动群众炒面。他还亲自到北京市的一些机关视察，同大家一起动手炒面。他及时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如 1951 年 9 月下半月到 10 月底，各种物资运上去需要 1.2 万个车皮，而按当时铁路运输能力只能上 6000 个车皮。周恩来知道后就指示主要运粮食、被服和油料，保障了前方最迫切的需要。

1951 年 2 月，周恩来给彭德怀打电报说：前方是否需要成立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受志司指挥，请你决定。“抗美援朝战争，对我军后方供应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你们要好好研究一下现代战争后勤工作的特点。”“外国的军事家说，后勤是现代化战争的瓶颈。志愿军后勤必须加强，中央军委考虑，要给志愿军后勤增派防空部队、通信部队……”5 月中旬，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决定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任命洪学智兼任司令员，周纯全任政治委员。

为了改变朝鲜境内铁路管理和军运中存在的问题，周恩来在 4 月间致电金日成，“提议为适应战争急需，设立中朝联合的军运司令部，统一朝鲜铁路的管理、运输、修复与保护事宜”，“中国铁道兵团及朝鲜铁道修复机构均归属军运司令部统一管辖”。5 月 5 日，中朝两国政府就此事正式达成协议。

1 月 7 日，周恩来致电柴军武转告金日成：为了加强两国空军参战的准备工作和有利于对今后中朝空军作战的指挥，提议按照中朝联合司令部的组织原则，成立中朝空军联合集团军司令部。3 月初，他致电彭德怀、高岗并

报毛泽东，“中朝联合空军拟以刘震为司令员，王琏（朝方）、常乾坤为副司令员”。当时在战争中，制空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掩护交通运输，急需空军。这问题一直在周恩来关心之中。1950年12月开始，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了小规模实战锻炼。1951年1月在新安州上空击落、击伤美国空军飞机各一架，这是志愿军空军第一次击落敌机。当时周恩来考虑，准备进入朝境作战的空军部队为17个团，其中中方10个团，朝方3个团，苏方4个团。后来因为机场未能修好，时间后推了。

周恩来早就提出了轮番作战问题。1951年2月上旬，他多次召集中军委会议，商讨志愿军在朝鲜轮番作战的计划，并主持起草了《关于轮番作战方针的指示》。7日，致信毛泽东，汇报志愿军在朝鲜轮番作战的兵力部署。8日，修改并审定《中央军委关于轮番作战方针的指示》。《指示》说：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站住阵地后，经休补后向前反攻，一方面扩大其侵占区，另一方面不容我军在前线较长期休整。为了粉碎敌人的意图，决定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将现在朝鲜作战的9个军30个师为第一番志愿军，另外9个军27个师为第二番志愿军，再准备9个军27个师为第三番志愿军，“如此轮番作战，我既有生力军，又能得到切实整补，既不致陷于被动，又能保持旺盛的机动性与持久性，又使更多的部队学会和美国侵略军作战”。

甚至，他连志愿军司令部的安全也考虑到了。1950年11月他听到前方回来的人谈到，志愿军司令部驻地是著名的金矿区，附近有四部电台，驻扎已近一月，还没有足够的防空洞。他立即写了中央给志愿军司令部党委会的电报：“为保证志司指挥机关及其领导同志的安全，中央责成志司党委会应形成决定，规定志司驻地应经常变动，电台应分散安置，防空洞必须按标准挖好，并布置地下办公室，凡遇敌机来袭，负责同志必须进入地下室，任何同志不应违背。”

他告诉去朝鲜的部队领导人说：到了朝鲜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要尊重朝鲜同志，尊重朝鲜人民，要教育部队更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们要非常重视。”

1951年5月，朝鲜战场进入了相持局面，受美国政府指派的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以私人名义拜访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美国准备以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6月初，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透露了这一意向。经中、朝、苏三国政府商议后，6月23日，苏联马立克在联合国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马立克的建议。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出举行停战谈判的建议。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复函李奇微，同意举行停战谈判。10日，停战谈判正式举行。根据中朝两党中央协议，朝鲜停战谈判第一线工作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停战谈判中朝代表团首席代表为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代表有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以及人民军方面李相朝、张平山等。

中国方面，周恩来直接领导了停战谈判。李克农、乔冠华去参加谈判工作，一切问题随时向周恩来汇报。从谈判的议程、方针、策略直到谈判的地点、中立区的范围，周恩来都缜密地考虑到了。他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了大量电报，经毛泽东同意后发去前方，指导中方谈判代表的工作，仅1951年7月中旬到10月25日，就有近一百份，几乎平均一天多就起草一份。

美方是谈谈打打。它把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

近半数投入到朝鲜战场上，作战飞机最多时达到 2400 余架，舰艇 300 余艘，运用了当时除原子弹外的最先进的军事技术。仅美国远东空军就出动了 72 万架次，投掷和发射了 47 万吨弹药。但他们始终没有能攻破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防线。最后，停战协定终于在 1953 年 7 月 27 日签字。

由于从 1951 年下半年起，朝鲜战场已处于谈判阶段，10 月 9 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会议上，介绍了国家财政收支情况，指出今后的任务是继续“保证战争胜利，稳定物价，发展生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将对部队进行整编。整编后，部队人数将减少到 300 多万。接着，第二天，周恩来审改并批发了中央军委关于停止动员新兵的指示。在指示中增写：军委决定今年所布置的全国 95 万人的新兵动员计划，自令到之日起一律停止动员与集中，“其已动员报名和正在集中途中者一律登记姓名，留在原籍或转回原籍，生产待命，不再集中。从集中途中转回原籍者，应按规定给以路费”。

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军委《军事整编计划》，经过两个多月反复磋商修改，于 12 月 22 日定稿。《计划》规定了整编的原则、内容、步骤等，并指出：这个计划所要实现的目的是，到 1952 年底，军队编制将从现在的 627 万减少到 341 万（在编 285 万，非编 56 万），到 1954 年底军队编制为 300 万。1952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对此计划批准施行。

对于整编后减少下来的部队，除了复员或转业的外，毛泽东、周恩来还考虑成建制地转为工程部队、农垦部队等。毛泽东、周恩来曾联名签署《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集体转业部队的决定》，决定将调拨 41 个整师 11 个整团共 46.5 万人，转为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

第十五章 为国防现代化呕心沥血

- 在政协会议所作报告中，阐述新中国军事制度的性质、特点和要求。
- 参与组织领导筹组中国空军、海军和特种兵部队。
- 出任中央兵工委员会主任，领导军工生产和建设。1954年初曾有“兵转民”的设想。
- 1952年7月初提议彭德怀接替他主持中央军委常务工作和任兵工委员会主任。
- 一个大的政治战略问题——中国要不要尖端武器技术？他的回答是肯定的，而当时苏联不同意。
- 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搬到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他在会上强调对人才培养要大力加强。
- 鼓励回国不久的钱学森写《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并任命其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
- 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核武器是下马还是上马？成立以他为主的专门委员会，决心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
- 提出“三高”的指导思想，成为尖端事业队伍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
-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他说：我们原子弹一响，美国的冲绳基地就向关岛迁移了。
- “文革”中他写下一批科学家的名单，命令严加保护，“必要时用武力保护”。

1949年6月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上，推选周恩来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副主任和起草共同纲领小组的组长。

为了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在勤政殿工作了整整一个星期，拿出了草案，后来几经修改，在9月下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得到一致通过。

这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专门写了一章“军事制度”，共六条。其中前三条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

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根据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教育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设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

下面还有三条，是讲民兵制度、军队帮助国家建设和对烈军属的优待等。

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作了关于这个共同纲领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对于军事制度，他说，这“不仅不同于封建军阀，也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军事制度”，“政治工作制度是它的灵魂”。并且说，“将以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军事制度来统一全国的军队”。

当时的人民解放军，只有陆军，而且陆军基本上是步兵，急需要建立我国的空军、海军以及特种兵等军兵种。

当时的国防工业，解放区原有的兵工厂很少，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兵工厂也是可怜得很，只能生产一些步兵轻武器，远远不能满足国防建设的需要。

这些问题，中共中央和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常务工作的周恩来早就在考虑了。

早在 1947 年 12 月，周恩来就亲笔写了中央军委给中共东北局的电报：你处关于建立空军的准备工作如飞机集存的数量、种类，修理装制的能力，机件汽油的储备，空军人员的训练和数量，空军基地，航空站及工厂的准备以及可能发展的条件等等，统望电告。

1949 年 7 月，朱德给毛泽东写信，建议选派三四百个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并购置一百架左右飞机，组成一个攻击部队，准备 1950 年夏天解放台湾。毛泽东见信后请周恩来召集有关同志商酌。后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着手组建空军。11 月 1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

这年 8 月间，在莫斯科同苏联谈判的王稼祥、刘亚楼来电请示是否组织伞兵？19 日，周恩来致电王稼祥、刘亚楼，原则上同意组建伞兵。

同时，周恩来也在考虑建设海军的问题。1949 年 7 月 22 日，他主持中共中央汇报会议，商讨开办海军学校后所需解决的问题。他派张学思到莫斯科，与刘亚楼一起同苏方谈判建设中国的空军、海军的工作。11 月，在辽宁安东海军学校任副校长的张学思向中央军委报送了《关于学校教育的初步意见》。周恩来看后批示：“再从起义人员中选一些政治可靠的青年，分入普通班与速成班，然后才能鼓励来者。”1950 年初，毛泽东、周恩来在苏联与斯大林等谈判期间，获得苏联的一批借款。3 月 2 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致尚在莫斯科与苏方商谈的李富春、王稼祥、刘亚楼的电报，要他们把海军、空军的军事定货分两年购齐，费用由借款中拨付，“今年度借款六千万美元，已用去四千万美元，其余二千万美元，应作为海空军今年度定货支付之用”。

4 月，周恩来为《人民空军》创刊题词：“为建立人民空军而努力。”

也在这月，开始组建我国的海军。周恩来致电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提出一批急需的海军舰艇、飞机和海岸炮的订单，要求苏方将这批订货在夏天至迟在 1951 年春天前发来中国。当时，人民解放军正准备发动解放舟山群岛的战役，所以 5 月 13 日周恩来又电布尔加宁，请他将中国向苏联订购的空军、海军器材加速赶运和派出，在 5 月底以前运到上海地区。后来，当人民解放军发动解放舟山群岛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即将完成时，盘踞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队秘密组织撤退，人民解放军迅即渡海追击，5 月 19 日解放了舟山群岛。6 月 30 日，周恩来听取了萧劲光关于海军工作情况的汇报，表示同意海军制定一个三年建设计划。

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支付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中国军队装备的改进，促进了特种兵跳跃式地发展。周恩来说：我们的陆军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空军海军不足。那末是否要等到我们力量强大时再抵抗呢？不行。我们要到斗争中去增强自己。他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在全力支援前线，加强国内空防、海防、边防和地方治安的同时，加紧组建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空兵和海军舰队等，突击训练，力争尽早入朝担任作战任务。其中，除了空军领导机构是 1949 年 11 月开始组建的，海军领导机构是 1950 年 4 月开始组建的外，其他各兵种的领导机构都在 1950 年 8 月到 1951 年 3 月间建立了起来，人民解放军由几乎是单一的步兵，发展成为一支有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

以空军来说，为了组建更多的空军部队，1950年9月初，周恩来就指示空军设法在航空学校第二期学员毕业后，组建一个建制为三个团的喷气式歼击机航空师。11月上旬，又审定中央军委致华东军区陈毅、张爱萍等的电报。电文说：为了加速空军建设，以应目前形势的需要，现将由华东准备调出改装为炮兵的4个师改调给空军，作为今冬建设6个师的机构和部队。1951年5月下旬，斯大林为了使中国空军的驱逐机能高度的战斗力，必须用米格15式驱逐机代替米格9式驱逐机，向中国空军赠送了372架米格15式飞机，大大加强了中国的空军。7月中，周恩来说：中国空军目前已经组成16个师32个团，今年冬季各航校的学员毕业后，届时将组成48个团，这样一来，中国空军到1952年底，可以训练出80个团来。这时中国已有8个航校。

抗美援朝战争从中国来说是陆上的战争，但周恩来对海军的建设仍很在心。1950年8月他审查了海军三年建设计划草案后，和聂荣臻约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参谋长罗舜初谈海军建设问题，指出海军“现在要集中力量搞好三个修船厂——青岛、上海、黄埔”，要他们把各船厂的情况写成报告，把所需的各类器材开个清单送给他，并批准了成立招生小组，招收几百名大学生输送给海军院校和空军院校。

10月，他代毛泽东起草致斯大林电，说为了建设海军，我们亟需从苏联获得海军装备，因此，提议派我国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参谋长罗舜初、顾问顾济民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海军方面负责人磋商我国海军建设问题及其所需装备的订货事宜。后来萧劲光等去了苏联，谈中国海军的三年建设计划问题。这个计划是周恩来同他们商讨过两次，并报毛泽东同意的。11月底，周恩来致电萧劲光等说：为了更快地与苏方商定我之海军建设计划，同意你们再直接与布尔加宁谈一下，“如果三年计划一时不易谈定，最好只谈明年度最少限度的并只能用车运的海军防御设备”。1951年3月，周恩来函告海军党委，“友方已决定帮助我们训练四艘潜艇”，要我们人员于4月20日全部到达旅顺。这年，海军方面与苏方商议了中国海军建设的五年计划。12月12日，周恩来把这个五年计划转报毛泽东、朱德等，附函说：“现送上请主席审阅批准，以便按此计划，分五年订货，并拟在1952年先订五分之一约二亿零三百万卢布的货。”毛泽东批了“同意”。1952年5月，萧劲光等又赴苏联谈判，周恩来专门致电萧劲光等，就与苏方商谈海军五年建设计划、1952年海军交货计划几个问题的谈判，作了指示。

1953年2月24日，周恩来到旅顺口视察了组建起来的新中国第一支潜艇部队，对指战员们说：“我们国家需要一支水下作战力量。我们要勇于进入新的领域，开创新的事业！”11月3日，周恩来乘坐海军“大别山”号军舰，在长江口检阅了“武昌”号、“沽河”号军舰和鱼雷快艇、海军航空兵部队，并为海军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奋斗！”

在朝鲜战争中，人民志愿军的一些特种兵部队，陆续参加了战争。1950年12月中旬，周恩来就同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商定了炮兵、坦克部队开赴前线的实施办法。1951年2月，他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将高射炮部队开赴朝鲜北部，掩护我军的后方交通线。4月中旬，他主持军委会议，决定尽一切力量，派各特种兵部队去朝参加战争。炮兵除小部分因训练与装备尚未完成外，其余已全部开赴前线。坦克部队因在我空军未出动前，朝鲜战场无法大量使用，所以决定先去一个坦克团，五月份再增加两个团。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初，由于当时步兵武器的主要来源，是过去

从敌方缴来的，枪炮口径极其杂乱，生产相应的弹药相当困难。1950年11月上旬，请苏联供应我国36个师的步兵轻武器装备。斯大林表示同意。1951年2月21日，周恩来同苏方军事总顾问沙哈罗夫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协定确定由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贷款，用来购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需的军事装备和弹药，并规定中国在1950年10月19日出兵抗美援朝以后的军事订货，按协定所提供的军事贷款数额以武器弹药价格的半价付款。

武器装备从苏联买来，部队的编组、训练也聘请苏联顾问帮助，为了争取时间，有时就组成成建制的机构，向苏军对口接收。例如当时12个航空师和10个坦克团，就是这样把全套装备接收过来的。所以，这时期我军特种兵部队的发展是跳跃式的，十分迅速。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例如，人民解放军的传统，很强调部队政治工作，政治工作人员在军队中有地位和职权，但是按照苏军的编制，却没有这样的内容；苏军是实行一长制的，它的一些条例、制度按照一长制原则，我们是否实行一长制；苏联军事顾问的有些思想与我们不同，我们怎样对待；等等。

1950年11月，周恩来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朱德、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和各军兵种、各总部领导同志都参加了。会议经过两天讨论，解决了一系列急迫的问题。周恩来在总结中说：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统，这是我军过去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当前志愿军和未来战争中我军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保证。这些好传统主要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人民战争的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十大军事原则，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作风，等等。我军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必须保持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当前，我军由初级向高级阶段转变，但基本原则不能动摇。苏军装备先进，制度法规完整，但是有他们的历史和条件，我们有我们的历史和条件。我们应在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采纳苏军条令中适合我军情况的内容，修改、充实我们的条令，而不是另起炉灶，另搞一套。

1951年1月底，周恩来把与刘伯承、聂荣臻、萧克等一起研究商量过的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队列条令（草案）》、《纪律条令（草案）》三个文件送毛泽东，致函说：“目前先以草案由总参谋部颁发试行为好。”经毛泽东审查后，总参谋部于2月1日颁发命令，在全军试行。

这一时期，周恩来还抓了对军事工业的生产和建设。

为了加强对军工生产和建设的领导，1951年1月4日，周恩来和聂荣臻、李富春联名发出中央军委的通知：奉毛泽东主席令，成立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聂荣臻、李富春为副主任，杨立三、李涛、刘亚楼、许光达、陈锡联、萧劲光、何长工、刘鼎、宋劭文为委员，雷英夫为秘书长。

实际上，这项工作在此以前周恩来已经在进行。早在1950年7月以前，周恩来就要聂荣臻召集空军、海军、后勤部和重工业部，会商关于建设飞机工厂、汽车工厂、造船厂和兵工厂四项工业的问题。7月26日，周恩来批示李富春、叶季壮准备商谈苏联派第二批设计小组来中国进行飞机工厂的设计问题。当时周恩来的想法，正如10月底他同苏联军事总顾问沙哈罗夫所说

的：关于我国的飞机修理厂和飞机引擎制造厂的建设问题，我们计划在东北现有工厂的基础上兴建，拟分为两步走，首先做到能够装配和修理飞机，制造某些飞机零件，等到将来条件成熟后再发展为飞机制造厂。12月下旬，他召集聂荣臻、刘亚楼等开会，进一步商讨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道路问题。在作总结时周恩来说：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需要修理。我国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国，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应当是适应战争的需要先搞修理，再由修理发展到制造，由小到大，在设计和建设修理厂的同时，应有今后转为制造工厂的安排。

1951年12月12日，周恩来召集聂荣臻、李富春、何长工、段子俊等开会，研究航空工业三至五年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发展计划（草案）和建立航空工业所需经费与培养人才问题。在会上要求空军方面对计划生产的各类飞机的比例进行一次审查，看是否符合军委规定的比例关系，并同意开办一所航空工业大学培养人才。到1952年7月底，周恩来召集航空工业建设会议，并在会上说，关于发展航空工业的方针、原则和建设规划，要继续按照去年底定的方案抓下去，同时要着手轻型轰炸机厂的基本建设，争取1957年底正式投入生产。

中苏两国代表团达成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协议，是在1951年2月19日。18日，周恩来听取了中方代表何长工从莫斯科打来的电话汇报。周恩来说，我们的外汇不多，不能过多地用在航空工业上，还要照顾到其他工业部门的建设。

这年4月下旬，周恩来审改了嘱人起草的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电文中说：我们正在计划中国今后的兵工建设问题，希望苏方向中国提供各种兵器与弹药首先是陆军轻武器与弹药的制造蓝图，以便仿造。斯大林答复同意。中国方面就派遣以徐向前总参谋长为首的代表团到莫斯科商谈。7月中，周恩来审改了嘱人为毛泽东起草的致徐向前电，在电文中增写：（一）“对苏业已答应的七种武器及附属装备的生产和建立四个新厂的问题，可请其先派设计组来。”（二）“各种弹药厂，须与我原有者结合，须增加者亦应俟其设计组到中国考察后方能作最后确定。”（三）“兵工建设应先签订武器蓝图及设计两种合同，其他合同须俟设计后方能签订。”

1952年7月，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兵工工业建设问题的报告》。其中说，要改造老厂，建设新厂，用三五年时间迅速建立中国自制陆军武器、弹药和海军、空军弹药的基础；规定18种枪炮为国家制式武器，确定建设十几个兵工企业。

后来，1953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说：现在兵工厂的建设规模已经不小，不能冒进，其发展要与整个重工业的发展相结合。1954年1月，在国际形势趋向和缓的情况下，周恩来提出将军需工厂精简到适合国防需要和保留一定比例的储备的生产力的程度，过剩的移交给政府有关部门经营管理。这时已有了军转民的设想。

这一时期，周恩来还关注了军事院校的建设。1950年11月，他三次召集刘伯承、陈士榘等陆军大学筹委会成员开会，磋商筹建陆大事宜。他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好陆大的指示，共同研究了办学的方针、原则，学校的编制与主要领导干部配备等。他综合刘伯承等的建议和意见，确定：（一）为了方便学校今后增设海军系和空军系，将校名定为军事学院。（二）校址

暂设南京华东军政大学所在地，条件成熟后再迁北京。（三）以华北、华东军政大学一部分干部作基础，依靠华东军区组织学院的各级机构。并且说：军事学院的办校方针，仍然是抗大的方针，要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把人民解放军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同时，需要不断地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学习外国现代军事科学。

1950年4月，周恩来在中南海召集朱德、聂荣臻、萧克研究军训部的工作。他说：各个国家都有很健全的军训部门，德国有训练总监部，日本叫陆军三部，国民党也有训练总监部。我们建国了，随着作战任务逐步减少，今后军队将以训练为主，因此也要成立一个统管全军军事训练的部门。他要萧克提出组建军训部的方案来。他还和朱德指导召开了全军军事院校和部队训练会议。并在会后召集军训部部长萧克等讨论修改了《关于军事学校建设与军队训练问题》的报告。

总之，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在周恩来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期间，人民解放军的常规武器进行了改组，军队由单一兵种发展到联合军兵种，军事建设的各方面工作都开展起来，为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1952年7月初，彭德怀因病由朝鲜回国治疗已经痊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彭德怀留在北京接替自己主持中央军委常务工作。自己的兵工委员会主任职务，也请解除，改由彭德怀担任。政治局同意了这一建议。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彪：“彭德怀同志自即日起过问军委日常工作，直接向主席和中央负责。以后一切经过我处转呈主席或主席交我阅办的军委文电，均改送彭副主席处理。”

周恩来虽然不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了，但是他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仍然经常关心着军事工作和领导着国防部的工作。

1955年2月，周恩来、彭德怀分别以国务院总理、国防部长的名义致电各大军区，提出关于全国军区重新划分的若干规定：内蒙古、新疆、西藏军区改属国防部领导。西北军区先将西北军区机构一部和原甘肃军区改为兰州军区；西南军区先将云南军区改为昆明军区，四川军区改为成都军区；华东军区先将山东军区改为济南军区，并接管江西军区；中南军区先将湖北军区改为武汉军区，并将江西军区拨交华东。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军区依次改为沈阳、北京（兼京津卫戍司令部）、南京、广州军区。

1957年12月，周恩来陪同缅甸客人到杭州、上海参观访问。24日，他在驻上海的陆海空三军军官大会上讲话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立以来，经过了多年革命战争的锻炼，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经过朝鲜战争的锻炼，我们的军事装备逐渐走向正规化，部队的军事素养也得到新的提高。从1953年朝鲜停战到现在四年多来，我们做了一些新的部队建设工作，如实行了兵役制度、军衔制度，颁布了各种条令等，这些都促使我们的军队在正规化方面前进了一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另一个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方面，也就是说要在军队的政治素养方面，在现有的基础上更加提高，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更为加强。”

他说：这四年多，我过问军事工作比较少了，但也看了一些报告，知道在这方面有进步的地方也有减弱的地方。他从几个方面讲了进一步提高军队政治素养的问题：

第一，加强敌情观念。军队战时要打仗，平时就应该进行战斗准备，眼睛对着敌人，思想上警惕着敌人，准备战争。我们是主张和平的，但和平必

须通过斗争去争取。有国家，就需要有军队保护；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军队的任务就一天也不会放松。

第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我们的军队是党领导的。党要管军队的重大问题，军队的负责人也要参加党的重大事情的决定。我们军队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要使它成为一支既有高度军事素养又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

第三，加强军政联系。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保卫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因此对国家建设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措施都应该关心，有的要争取直接参加。军队过去帮助地方发展生产，做了许多工作，这种精神应该发扬。

第四，改进军内关系。主要是改进上下关系、左右关系、官兵关系。我们军队是革命的军队，应该保持与发扬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我们军队的纪律是自觉的纪律。军队的民主是我们的优点，应该发扬这个光荣传统，进一步增进军内团结。

第五，密切军民关系。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今后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军民之间的联系。我们军队要永远保持人民子弟兵的光荣称号，永远保持最可爱的人的光荣称号，永远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1958年2月，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去朝鲜访问。18日，他在志愿军干部大会上讲了话，其中又讲到了要保持我们革命军队的传统的问题：“军队讲一点军风纪，由于讲军风纪，就不能不讲一些形式。不然，在作战时就不容易行动迅速、意见统一。我们所以要求军风纪律，就是为了养成这样的意志统一，贯彻命令的迅速。但是，我们还要有另外一方面，即发扬战士们的自觉性，这是更重要的政治灵魂。战士们自觉了，如何去打敌人，他们会想出办法来的。我们过去的‘诸葛亮会’，就是表现了这一点。”“我想我们军队除了必不可少的军风纪所需要的那部分形式以外，尽量的还是保持我们革命军队的传统，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这个很重要。”

1958年7月，美国对阿拉伯国家发动武装干涉，台湾蒋介石集团也加紧了大陆的骚扰和破坏，同时美国军舰在台湾海峡不断制造紧张局势。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向占据金门、马祖岛并不断骚扰大陆沿海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警告性炮击。9月11日，周恩来与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命令解放军炮兵轰击再次驶近金门的美蒋混合舰队中的国民党军舰，并将情况报毛泽东。13日，毛泽东从武昌致信周恩来、黄克诚说：除照你们命令规定路线执行以外，白天黑夜打零炮，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似有大利。22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在目前形势下对金门作战方针，仍以打而不登、断而不死，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为妥。”认为我不宜实施对金门以空军轰炸，目前美军还在控制蒋军飞机不许其轰炸大陆，我也不进行轰炸为有利。毛泽东认为这个方针是对的，即照此办理。

这时期，周恩来一再对外讲话，说明我们对沿海岛屿上蒋军的惩罚和收复这些岛屿，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并声明中国历来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两国之间在台湾地区的争端，而互不诉诸威胁或武力。

60年代初，我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转变我国的经济形势上。军事建设方面，他着重致力于领导我国自己制造“两弹”。但是，他仍不时地对其他军事方

面有所指示。

例如，1961年8月12日，他出席国防工委的会议，就在会上提出了“尖端武器与常规武器并举”的方针，说：尖端要有，有了导弹、核武器，才能防止使用导弹、核武器；如果我们没有，帝国主义就会使用。但面对面的斗争还是要常规武器。现在局部战争没有停止，许多要求我们援助的国家要的都是常规武器。美帝国主义叫喊进行有限战争，也在加紧搞常规武器。苏联是尖端和常规同时进行的。我们早就认识了常规武器的重要性，要很快跟上去。进行调整也包含着这个内容。

又如，1965年1月，周恩来在接见空军在中南地区上空先后击落两架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有功人员时，说：训练要从严从难，从实战需要出发。再一条就是总结经验，打一仗总结一次经验，让后面的学习。经验是飞行员、领航员、雷达兵和指挥员，“一员挂帅，三员协同”，上上下下内内外外各方协作下取得的，各级都要总结。领导要善于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补充完善。你提高，敌人也在提高，所以经验要不断总结。我们不能满足，一满足就后退。

对于海军，他还指出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大陆国家，我们不想向外扩张，以近海防御为主。

到1964年，中国的经济经过几年调整，农业和工业都焕发了新的生机，形势看好。这年底，周恩来讲了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同国防建设的关系。他说：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应当相互促进。我们建设了强大的现代工业，就能够生产更多的新型材料、新型燃料、新型元件和新型机械设备来保证国防建设的需要，促进国防现代化。集中优势的科学技术力量，加强国防建设，突破尖端，这不仅有利于加速国防现代化，而且能够推动整个工业的发展，带动整个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在处理国防科学技术同一般科学技术的关系上，既要使一般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尽可能为国防建设服务，又要把国防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尽可能地运用到经济建设中去。

当时，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发动侵略战争，中国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就中国本身来说，东南沿海是美国在进行封锁，北部边界有苏联屯兵百万。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不会对美国战争，但如果它要打进来，我们也是作了准备的，准备好了它不来，好，来了，就把它消灭。他讲了四句话：（一）我们不挑起战争。（二）中国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人民是作了准备的。（四）你要是轰炸中国，这就是战争，战争就没有界限。

周恩来极为重视我国尖端武器技术的发展。

早在1949年2月，北平刚解放，原子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作为一个代表团成员去巴黎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行前，他想趁此机会托在法国的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助订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为此，他提出需要数十万美元。他提出后又有些后悔，因为这在旧中国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解放了，但是战争还在继续，国家经济很困难。但是没料想竟批准了。后来知道，这样决定，周恩来起了重要作用。

1952年夏天，在编写《五年军事建设计划》的纲要时，曾经考虑过我国要不要研究试制原子弹、导弹、核潜艇等尖端武器技术问题。这个纲要实际上是周恩来主持拟制的。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认为这是一个大的政治战略问题，中国如果没有原子弹等尖端武器技术，人家就瞧不起你。但是，如何搞法，何时上马？还须仔细研究，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为此，周恩来曾专门写信给竺可桢，介绍他的军事秘书去征求竺的意见。竺可桢谈了研究试制这些尖端武器必须具备的条件：一是要有专家人才，而且要成龙配套，集中研究，现在国内已有一些人才如钱三强等，但人还比较分散，我国在国外也有许多专家，须力争他们回国，形成队伍。二是要进口一些尖端的资料设备，是否能争取到苏联的援助。三是要花大钱，搞尖端武器技术比常规武器技术要贵很多，动一动都要以亿元来计数。秘书向周恩来汇报了竺可桢的谈话后，周恩来认为：这是内行话。为了加快这一战略措施，周恩来采纳了竺可桢的一些意见，并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措施。

这个五年军事计划纲要，实际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组成部分。“一五”计划草案带到苏联去讨论时，这个纲要也带去了，粟裕去了。讨论中提到了中国要发展原子弹、导弹问题，苏联没有同意。在国内讨论五年军事建设计划时，也议到了发展原子弹、导弹问题，苏联顾问不同意，认为条件不具备，因为国家正在进行战争，工业基础薄弱，技术人才不足，苏联不帮助。所以，后来在计划中就没有作出安排。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周恩来到莫斯科吊唁期间，听取了以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的汇报，对考察活动给予了具体指导，并帮他们联系参观了保密的苏联核科学研究机构和培养干部的专门院系。

1954年冬，周恩来决定在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下设立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负责开发铀矿工作。1955年1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使全世界人民知道，原子能如果为和平建设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我国为了反对核战争，保卫和平，把原子能用于国家建设，造福人民，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必须掌握原子能。就在这月，周恩来把薄一波、李四光、钱三强、刘杰找去，详细了解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的情况，包括人员、设备、资源，还详细了解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核能技术需要的条件。周恩来告诉他们，中央将要开会研究。

接着，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都参加了。会上，李四光、钱三强等汇报后，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当仪器接近铀矿石发出嘎嘎响声时，大家高兴地笑了。毛泽东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周恩来特别强调说：对人才培养要大力加强。这次会议对我国核科技研究和核工业建设有重大历史意义。

按照周恩来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到1958年夏，我国的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等设备建成了，经国务院批准，物理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任所长，李毅、钱忠尧、郑林、王涂昌、彭桓武、罗启霖、力一、梁超任副所长。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初步形成了。

当时，周恩来的思想是：我们要“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要根本上解决，就必须自己制造”。他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把原子弹、导弹、遥测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他的可以少搞”。

周恩来认为原子弹必须与运载工具结合，才能成为重要武器。他想方设法争取了钱学森由美回国。火箭专家钱学森回国不久，周恩来就亲自鼓励他

写一个《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意见书》提出了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组织草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步骤，开列了可以调来做高级技术工作的21人名单。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钱学森等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他亲自牵头负责筹备。导弹研究设计院、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大力推动了我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聂荣臻说：“1956年总理找我和学森同志谈组织航空工业委员会的事。就是说，我们要搞‘两弹’。那时候，主席也下了决心的，周总理很重视。”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签署国务院命令，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从此，钱学森开始了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技术领导人的历程。

1956年，周恩来亲自领导制定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十二年规划。1957年，他提出：中国核工业要有完整的一套，形成独立的核力量。但规模不宜过大，主要解决“有无”问题。

这时候，我国除电子学、自动化外，全是一片空白。要从头建立，谈何容易。“两弹”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它们的复杂性几乎牵涉到国民经济所有的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要有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周恩来说：我们发展尖端事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要发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组织全国大力协同，从科研一开始就组织协作。他亲自召集会议，从事组织工作和各方面安排。他曾经组织过上百个部、委、局级单位，26个省、市、自治区和上千个厂、矿、院校、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联合攻关。成千上万的科技大军组织起来了。过去在解放战争中组织大规模作战的方法，周恩来、聂荣臻把它用到科技攻关中来了。这种情况，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做到的。人力集中了，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都办起了有关的科系或专业。1958年，我国第一台电子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第一枚探空火箭上天；1959年我国研制成功半导体晶体管电子计算机。科技十二年规划提前五年，于1962年经过认真检查，具体项目基本上完成了，从而有效地解决了一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使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一步，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到1962年，全国科研机构已经发展到1300多个，有各类研究人员9.4万余人，加上国防方面的就更多了。

1960年，聂荣臻向中共中央报告了立足国内发展科技等问题。周恩来看后批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他提出了四个字：要、学、买、钻。要，是向苏联就十分必要的提出来要，不给，就不强求。学，是派留学生、研究生、实习生去学，他们不教，就不学。买，是从西方国家千方百计购买。钻，是不管是否买到、要到、学到，主要还是靠自己钻研。“自己不钻，不仅不能有独特的创造发明，而且也不能把要到、学到、买到的用于实际和有所发展。”

到了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大批工程停工，不少工厂企业下马，摆在面前的一个重大决策问题是：我们的导弹、核武器要不要继续搞下去？是上马，还是下马？争议相当激烈。周恩来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表示要决心搞下去。他支持聂荣臻等的决心，毛泽东也支持，认为不能放松，更不能下马。周恩来提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搞出原子弹来。当时调整国民经济，全国其他基本建设几乎全部停了下来，但是这方面的工程不仅没

有下马，反而有了很大的发展，决心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

周恩来主张：“科学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渐进，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攀，要有步骤和秩序。”

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这个委员会有七个副总理、七个部长参加（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试验工作，以及核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从此以后，我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火箭的研制、试验，一直在中央专门委员会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仅从成立起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就亲自主持召开过九次专门委员会会议，及时解决了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一百多个重大问题。

首先是方针明确，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林彪曾经提出一个方针，叫做“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个方针没有重点，使下面捉摸不透，究竟是先搞原子弹、氢弹呢，还是先搞导弹？周恩来在专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先抓原子弹”的战略方针。并决定加强第二机械工业部的科技力量和领导力量，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为二机部选调优秀人才500名、1100多台仪器设备。这批力量来到后，和原有力量一道，很快投入了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和建设核工业的工作。在1962年12月4日的专门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原则同意了二机部关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准备工作的“两年规划”，要求1964年实现目标。周恩来说：“科学是有规律的”，“要找到它的规律，掌握规律”；“实验工作不要怕失败，多次实验求得成功。”提出：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认真抓紧，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这个规划在1963年3月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被正式批准。周恩来提出了“三高”的指导思想，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三高”的要求，很快被贯彻到二机部和其他国防尖端部门，成为中国尖端事业队伍建设的长期的指导方针。

1963年7月25日，苏联、美国、英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条约不包括禁止地下核试验，它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被剥夺了进行一般核试验的权利，而他们则可以作地下核试验。31日，中国政府发表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国政府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声明》，揭露这个条约的歧视性，批驳少数国家垄断核武器的目的。

8月7日，周恩来致电在日本广岛举行的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表示中国永远站在坚决要求禁止核武器的日本人民一边。他对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说：“要使人了解我们是真为和平，是真正地有效地为反对核战争而努力才反对三国条约。”

这年12月上旬，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二机部领导人刘杰关于两年规划的执行情况和今后工作安排的报告，以及赵尔陆关于对二机部、五机部、化工部、科学院等部门提出的问题和处理意见。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会议决定：鉴于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接近过关，关于试验工作的安排，将地面试验放在第一位，并继续完成空投试验的准备工作，地下

试验作为科研设计项目立即着手安排。

1964年1月，我国的铀浓缩厂已经生产出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缩铀产品，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试验问题。因此，周恩来在4月11日召开的中央专委会上提出：原子弹爆炸试验工作于9月10日前作好一切准备，试验时间由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请国家气象局负责把气象预报搞准确。还提出，要防止事故，把革命干劲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

9月16、17日，周恩来连续两天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讨论关于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预演总结、正式试验时间和其他一些问题。21日，他给在外地的毛泽东写信说：“关于核爆炸及其有关问题，急需待主席回后，当面报告，以及中央早作决定，时间以不迟于24日为好。因为如决定今年爆炸，以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二十天；如决定明年4、5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也需要在10月作过冬准备；如需从战略上进行考虑，推迟爆炸，使之与第二套新的基地的建设和导弹及核弹头生产相衔接，也需要有方针上的决定。”

后来，中央还是决定于1964年爆炸。到了10月，据气象部门报告，15日前后可能出现好的天气；张爱萍和刘西尧从现场送来了关于首次原子弹起爆试验的报告；刘杰送来了有关防空等方面问题的报告。于是，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说：“现在一切已经准备好了，从10月15日到20日之间，由他们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的日期和时间，并告我们。”周恩来还对一些问题作了具体安排。

最后，决定于16日起爆。13日，周恩来将爆炸后的宣传和政治斗争问题向书记处和毛泽东作了报告，得到同意。14日，他把原子弹爆炸后的我国政府声明、新闻公报、中央通知草稿送毛泽东、刘少奇等，并附信说：“这次试验，决采取公开宣传办法，以便主动地击破一切诬蔑和挑拨的阴谋，并利今后斗争。”这天，他下达了核装置就位的命令。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我国西部爆炸成功。那一天，周恩来派张爱萍为现场总指挥，全权负责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周恩来和贺龙、聂荣臻在北京，亲自在电话机旁听着现场指挥口令和倒计时时间的声音。张爱萍在核试验场手持话筒向周恩来准确地回答提问和报告情况。试验取得了成功，中华民族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精神为之大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对我国的核垄断、核讹诈政策破产了。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攻克尖端科学技术之关。世界友好国家和人民，纷纷向我国表示热烈祝贺和同情支持。

17日，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向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发出电报，说：“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原子弹爆炸的成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一夜之间中国跨进了核大国行列，全世界刮目相看。要知道做到这一步，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其中包括周恩来的心血和精力。

10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经周恩来审定的致参与我国首次核试验的全体同志电，热烈祝贺核试验的成功。电文中说：这次成功的试验，标志着我国国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周恩来说：我们原子弹一响，美国的冲绳基地就向关岛迁移了。他在11月上旬就约刘杰、张爱萍、徐子荣、刘西尧谈话，讨论进一步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他指出二机部要加速研制氢弹。他问刘杰研制氢弹的安排考虑。刘杰答：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恩来说，五年是不是太慢了？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那时法国已经研制了四年多还没有搞成功。各国对研制氢弹的技术都严格保密，只字不漏。二机部经过反复论证，向中央专门委员会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把原理探索作为突破氢弹技术的首要措施，得到了周恩来的首肯。1965年2月3日和4日，周恩来主持第十次专门委员会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也就是说，要以比美、英、苏都快的速度把氢弹研制出来。

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恩来为大家制定了工作指导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十六个字充分体现了周恩来一再强调的要“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绝对保证安全”的思想。他还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1965年3月20日专门委员会会议上他提出的“我们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都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按照这个方针，我国从1964年10月到1987年6月的近23年时间里，只进行了33次核试验，而美、苏几十年来分别进行了800多次和600多次核试验。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提前实现了原定的1968年进行氢弹试验的目标。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我国用了两年零八个月，与美、苏、英、法比，速度是最快的，技术水平也比美、苏首次试验的氢弹水平高。

试验中也出过事故。1971年12月30日，我国在西北某地进行投掷第一颗实战氢弹的试验。试验没有成功。飞行员杨国祥驾驶飞机进入预定地点，机上载有一枚数万吨当量的实战用氢弹。塔台发出投掷命令。杨国祥用力伸向推脱装置机关。然而投掷装置无动作。采取超应急措施，第三次投掷仍没有成功。飞机在空中盘旋，气候、温度、气流、速度的变化，可能使氢弹突然爆炸，不但会机毁人亡，基地也会成为一片废墟。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周恩来，浓眉颤抖，保护科技人员要紧。他下令：除塔台指挥外，所有人员，无一例外，全部撤出。而杨国祥坚定地说：“我要带弹返航”。周恩来捏着话筒，沉吟半晌，沉重地说：“要相信我们的飞行员。”终于，杨国祥稳稳地驾驶着飞机，在惊人的寂静中，在某机场降落了。周恩来说：“带氢弹着陆成功，是一大奇迹，要好好总结经验。”事故原因找到了，是推脱装置变形造成的。

1972年1月7日，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在白玉般的天地间，杨国祥又驾机起飞了。到了沙漠上空，塔台发出命令。杨国祥一按开关。天空划过一道闪电，惊天动地一声巨响，飞机一个大回旋，顶大的蘑菇红云升起。中国第一颗实战氢弹爆炸成功了。

这时候，中国的历史已经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时期，与国防建设有关的重点科研项目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委会直接领导下，基本上没有停顿。在导弹、卫星测控、导弹预警系统、通讯系统、红外激光、敏感元件等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配合以后的洲际导弹和通讯试验卫星的

成功发射，打下了基础。

“文革”初期，批斗之风席卷了大陆。一天，周恩来正在举行欢迎外宾的酒会，突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某导弹研究院一位和钱学森一起在周恩来关怀下从海外归来的著名火箭材料科学家姚桐斌被“造反派”整死了。周恩来震惊得手中的酒杯掉落在地上，砸得粉碎。他震怒了，写下了一批科学家的名单，命令严加保护，“必要时用武力保护”。这批科学家中，不少人后来对我国的尖端科技又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屠守锷，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和“长征——2”号火箭的总设计师。1971年9月10日，我国首次研制的洲际导弹飞行试验获得成功。又如梁守槃，后来研制出了中国的“飞鱼”导弹，性能大大优于法国。1984年的天安门阅兵式上出现这种导弹时，曾使得外国人大为惊诧。

“文革”中，林彪下令要把在一线的原子弹工厂全部迁到三线。周恩来制止了这个毁灭性的破坏。把持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下令把发射基地搬迁，把正在建设的某反导弹靶场南迁。周恩来指示，仍放在原来的地区不变。

以周恩来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最初只管核武器研制，1964年开始也管航天事业。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要以此带动尖端事业的全面发展，并把专门委员会的工作转移到战略导弹和人造卫星上来。他说：“下半年重点抓战略导弹，要从东风二号抓起。”1965年2月上旬，他主持中央专委会第十次会议，讨论“两弹”结合、统一领导、各方协作以及专委会扩大等问题。专委会增加了吕东（代王鹤寿）、余秋里、袁宝华、王净、邱创成、方强、王秉璋。

关于试验，他指出：我们的核试验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凡是试验应该得到的科学知识，我们都要得到，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这年12月底，周恩来在第十四次中央专委会上说：今年是两弹结合试验年，明年是导弹年，明年在导弹上要前进一步，希望后年要出更大的成果。

对于原子弹，周恩来指出：要加速小型化，我们要真正制止核讹诈，就必须有自己的真正核威慑力量。在当时，要真正具有核威慑力量，核弹就必须能装在导弹上，否则是不行的。1966年10月27日，我国进行了原子弹和导弹结合的试验，导弹装上真的核弹头，在自己国内从发射场打到降落地。在本国国土上试验，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周恩来指示，一定要做到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要“保证地面上没问题，操作中不出问题，人为的误差坚决消灭掉。”先进行了“冷”试验，证明导弹安全自毁系统和弹头引爆性能装置性能可靠，再进行“热”试测试检查。聂荣臻亲自指挥了这次试验。试验获得了成功。中国有了用于自卫的导弹核武器。

周恩来又提出：“两弹结合进展顺利，接着要抓战术导弹（地空、海防）。这是他的用突破战略武器来推动发展战术武器的思想。中央专门委员会上，确定了战略、战术导弹共有十几个型号。周恩来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指出战术武器的研制工作“要为地空导弹让路”。在1965年12月29日至31日的第十四次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还明确提出要求说：“明年中程、高空、核弹头，有对空的、对航的、低空的，后年要出更大成果”。从1964年到1966年，发射基地先后完成了空空“霹雳1号”导弹的定型试验和“霹雳2号”导弹的初期试验；完成了“红旗1号”、“红旗2号”导弹研制性试验和定型试验。周恩来亲自视察了导弹发射基地，参观了地地导弹发射阵地和

地空导弹实弹发射。到 1967 年 9 月，我国防空部队终于用自己国产的新型地空导弹，把侵入我国领空的、改进了的美国高空侦察机击落了下来。

在 1965 年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十二、十三次会议上，原则批准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规划方案，争取在 1970 年左右制成。我国建造核潜艇，周恩来和贺龙、聂荣臻等在 1958 年就在考虑。这年中央作了决定，但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暂停了。到 1965 年 8 月召开第十三次中央专委会时，在周恩来主持下，批准恢复制造核潜艇。

为了研制这些尖端项目，在周恩来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安排下，冶金部密切配合，提供了高水平的新型材料。上述这些成果，也为后来试制洲际导弹、发射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潜艇水下发射导弹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的成功，是周恩来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思想在科学实践中的丰硕成果。这项工作，我国是从零开始的，钱学森说过：“大家想一想，假使中国没有原子弹、导弹，那中国是什么国际地位？”

聂荣臻说：“中国从事原子弹和导弹技术都应归功于周恩来。”

钱三强说：“我们中国的原子核科学家，在这方面应该说一直是幸运的。国家最高层不单有果断决策，而且实行决策的条件、措施，也都在周恩来的运筹之中。”

周恩来对每次核试验、导弹试验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都要亲自听汇报，找专家咨询，仔细检查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要求把各种不利或意外因素都考虑到，采取最可靠的保险措施。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正是由于贯彻了周恩来的指示，我国的“两弹”试验和外国相比，事故最少，伤亡最小，成功率最高。

周恩来在领导核试验中，不忘记利用核能来为人民造福。1970 年 7 月我国核潜艇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准备就绪，中央专门委员会进行讨论时，周恩来着重审查了启动运行的安全问题，强调“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并指出这次试验是我们开发利用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建设的基础。这年 11 月的一次专门委员会会议上，他提出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弹外，还要搞核电站。我国发展核电站应当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

1974 年 3 月 31 日，这时周恩来已重病在身，还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七二八”秦山核电站工程技术情况汇报。他说：核电站的设计建设，必须绝对安全可靠，特别对放射性废水、废气、废物的处理，必须从长远考虑。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

4 月 12 日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主持中央专委会。他在会上说：一定要牢记我国的尖端事业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

我国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能够独立自主地顺利发展，在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下也没有中断，并为大规模地发展科学技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这是和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与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第 532 页。

钱三强：《最高决策》，1997 年 8 月 13 日《人民政协报》。

后 记

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我们在研究周恩来的军事著作和生平中，这一感受越来越强烈。对于他是伟大的军事家这一方面，过去是讲得很不够的，写得也比较少，因而在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约写《周恩来军事生涯》这一书稿时，我们觉得应该把周恩来在这一重要方面的才能和贡献，尽可能较完整系统地反映出来，奉献给广大读者。

这一书稿，开始时我们的分章比较细，共二十八章。后来，解放军出版社提出把其中的有些章连缀起来，减为十五章，重新拟定了标题，并在每章前边作了提要。这样，阅读起来就比较方便。这本书得以顺利出版，我们要感谢总政宣传部、军事科学院的有关部门。军事科学院杜宏奇同志审阅了书稿，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在这里一并致谢。

作者
1997年12月

